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 编著
罗清 赵仲强 译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序 言.....埃谢里克 (1)

第一部 国民党中国

一份早期的备忘录.....	(3)
呈交大使的备忘录 1941年10月30日.....	(3)
农民的苦难.....	(8)
河南省的饥荒 1942年11月5日.....	(9)
甘肃的政治局势 1943年7月18日.....	(20)
美军对成都地区造成的冲击 1944年2月26日.....	(26)
军队状况.....	(33)
重庆到兰州沿途所见军事调动 1943年7月2日	(34)
未必会接受裁减中国军队的计划 1944年3月19日	(38)
军阀和伪军.....	(41)
蒋介石对桂系的处理 1945年3月21日.....	(42)
中国军队领导人愿意当“伪军” 1943年11月3日	(48)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交易 1945年3月20日.....	(56)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61)
关于自由中国的宣传、心理战和道德教育机构的备忘录	
1942年7月10日.....	(62)
从西北地区墙上标语看中国人的宣传 1943年7月5日	
.....	(64)
戴季陶的佛教国家哲学 1944年5月15日.....	(74)
宋子文的失势 1944年3月7日.....	(77)
蒋介石与“皇室家族”	(86)
传闻中的交通部长曾养甫被免职的原因 1943年9月14	
日.....	(87)
〔《中国之命运》——修订版〕 1944年?月.....	(88)
报道中的委员长的观点 1944年3月20日.....	(90)
蒋家庭内的纠葛 1944年5月10日.....	(92)
五花八门的新闻	(96)
摘自1944年4月4日、5月12日、5月15日、5月26	
日、6月28日和5月23日的报告.....	(96)
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	(100)
中国新闻界人士对中国目前局势的关切 1943年5月25	
日.....	(100)
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和文化控制的不满 1943年6月2日	
.....	(105)
与孙逸仙夫人的谈话 1944年2月14日.....	(107)
与孙夫人的讨论 1944年3月5日.....	(108)
孙科博士的观点 1945年2月17日.....	(111)
访冯玉祥将军——需要改善中国军队的状况和领导 1944	
年6月6日.....	(112)
青年将领集团 1944年2月10日.....	(116)

外交问题：中苏关系	(118)
新疆的局势 1944年4月7日.....	(120)
1944年的危机	(129)
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逐步扩大；中央政府拒绝承认某些地区的自由中国人游击政府 1944年2月11日.....	(130)
日军在中国东南部重大攻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 1944年6月2日.....	(133)
政策建议	(137)
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1944年6月20日.....	(138)
史迪威危机和“需要现实主义”	(159)
在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中需要有更大的现实主义 1944年10月10日.....	(162)

第二部 共产党地区

国共形势 1944年1月23日.....	(172)
边区生活	(179)
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 1944年7月28日(第1号).....	(180)
关于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经济形势的札记 1944年8月3日(第6号).....	(185)
共产党在肃清盗匪活动方面取得的成就：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有力证明 1944年10月2日(第37号).....	(19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总的印象	1944年9月4日(第21号)	(196)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203)
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见解	1944年7月3日(第3号)	(205)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1944年8月3日(第5号)	(219)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声明	1944年8月14日(第9号)	(225)
共产党评国共谈判和需要改组中央政府	1944年9月21日(第30号)	(227)
延安庆祝双十节	1944年10月11日(第42号)	(230)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谈中国国内形势	1944年10月12日(第43号)	(236)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		(24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希望美国继续在延安派驻外交性代表机构	1944年7月28日(第2号)	(242)
访问毛泽东	1944年8月27日(第15号)	(246)
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和美国的倾向性	1944年9月28日(第34号)	(261)
政策建议		(270)
美国需要有一项对应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产生的问题的政策	1944年9月3日(第20号)	(271)
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	1944年8月29日(第16号)	(275)

第三部 与赫尔利的辩论

国共和解的可能性	(285)
国共谈判的失败 1945年2月14日.....	(287)
艾尔索普上尉的看法 1945年2月28日.....	(289)
委员长最近的任命与公开宣布的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意图 相矛盾 1945年3月22日.....	(291)
俄国的作用	(295)
国民党希望和俄国人作交易 1945年2月17日.....	(296)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预言 1945年3月14日	(299)
中国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系 1945年3月23日	(304)
1945年的政策建议	(308)
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 1945年2月14日.....	(309)
中国的局势 1945年2月28日.....	(312)
重返延安	(318)
请求授权访问延安 1945年3月4日.....	(318)
目前共产党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初步报告 1945年3 月11日.....	(320)
毛泽东的见解：美国和中国 1945年3月13日(第10号)	(325)
共产党代表大会将采取的政策——和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 人的谈话 1945年4月1日.....	(332)
后 记.....	(342)

译者附录：	(355)
(一) 中国共产党代表林祖涵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 参政会上的报告	(355)
(二)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 协议 (1944年11月)	(361)
译者的话	(363)

第一部

国民党中国

第一个把不受人欢迎的消息带了来的人，
不过干了一件劳而无功的工作；
他的舌头将要永远像一具悲哀的丧钟，
人家一听见他的声音，
就会记得它曾经报告过一个逝世的
友人的噩耗。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分



一份早期的备忘录

约翰·S·谢伟思1941年春到达中国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时，离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还有7个月。而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行4年了。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发回的所有政治报告的主要论题。谢伟思身为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其正常工作就是起草报告供大使签发。1941—1942年，实际由大使签发的备忘录或报告为数很少。1941年唯一的，也是有案可查的第一份报告是与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谈话的记录。报告中的所见和看法，都是贝尔登的，但所谈问题表明了谢伟思自己的兴趣所在：农民的苦难，军队的士气和国共两党的关系。谢伟思后来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更加证实了他从贝尔登那里听到的情况。

呈交大使的备忘录

1941年10月30日

档案页：893.00P.R./206

10月29日下午和晚上，我同国际新闻社记者杰克·贝尔登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省进行了半

* 贝尔登后来写了一部记述1946—1949年中国内战的经典著作：《中国震撼世界》。（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重印。）

年采访旅行后刚刚返回重庆。贝尔登是我多年的朋友，谈话随便。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他不断叙述了他所谈到的一些事件和情况的细节，他这次旅行非常单纯，没有官方的赞助，由于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沿途和在他逗留过的村镇里，都可以同农民和村民们自由交谈。所谈问题包括征粮，食品价格，当地征兵情况等等，他花了很大力气作记录。虽然中国当局在某种程度上怀疑他同情中国共产党，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给予他的这次难得的机会。下面各点可能是人们关心的：

经济问题

在他旅行所经的绝大部分地区（实际是在中国军队占领之下），仍未解决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他认为，不仅过去缺粮，将来也肯定缺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贝尔登列举的缺粮原因在后面的报告里有更为详细的说明，这里从略。）

他对从日军占领区运进的粮食数量之大感到吃惊。这种交易的一个主要中心是湖北、安徽交界上的一个小镇。有人告诉他，一个月从这里输进价值3000万元*的粮食，而他在途中看到的运粮车辆（主要是手推独轮车），其数目之多，是中国任何其他道路上没有的。一个面粉厂主甚至从天津运进了一台德国造磨面机。日军虽实行强征暴掠，却容许这种流通。在上述事例中，那位面

* 所有数字都是指中国货币。那时，中国币1元的官方汇价约为5美分，黑市价格约为1美分。虽然在战争期间官方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在战争结束时，在自由外汇市场上中国币1元只能换到0.06美分。（本注释和下面的所有注释均为本书编者所加，具体说明有其他来源者除外。）

粉厂主承认付出了9万元。有些贸易是中国人所必需的物品，如刚刚谈到的磨面机。但输入数量最大的是香烟，大量奢侈品如化妆用品以及布匹、镜子等等也运进来了。没有作出明显的努力来制止这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地区的物价会比四川便宜得多。

实物土地税

在他所经过的地区，他没有看到证据说明征收了实物土地税。在远些地区，农民已经深受征收军粮之苦，他不相信他们还会有更多粮食缴纳土地税。

军队士气

从整体说，看来士气是好的。在宜昌，士气特别高昂，他看到，在从宜昌前线溯江而上的船上，伤兵们情绪很好。可是，他发现，在营、团级的下级军官中，对他们受到广泛的监视有某种不满情绪。有人告诉他，在每个集团军总部，都有一个另立门户的特务组织，它独立行事，直接向重庆发报告。此外，还有其他种种秘密警察和政治特务组织。这种压力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下级军官被剥夺了高级军官所享有的特权和欢乐。对此的不满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如果知道了谁是特务，就可能把他枪杀。某些高级军官（特别提到李宗仁）向他表示，他们不高兴和痛恨进行这些秘密警察活动。对于进行战斗来说，军官们的士气是旺盛的。

民心民气

贝尔登以谈话形式进行的大部分实地调查，是沿途在农民和村民中进行的。民心民气和对战争的态度，随军粮负担的轻重不

同和人民是否受过日军实际入侵之苦而各异。在日军未曾到过的河南某些地区，人们直言无讳地强烈表示不满，公开表示希望把中国军队赶走；另一方面，在宜昌周围地区，农民的民心民气是高昂的，在运伤兵下前线的工作中，他们自愿合作，而且干得出色。

对征兵广泛存在不满，较贫苦的农户在这方面受打击最重，征兵的价格因地而异，有些地区高达900元*，有一个据说有150户人家的村庄，1939年要求出新兵39人，1940年40人，1941年头6个月20人。富户家的孩子用出钱、进学校或者在县、区、乡政府中谋个芝麻绿豆官等办法，逃避兵役。

国共关系

他看不出国共关系会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共产党驻洛阳的代表看来得不到一点自由。大约有50个要去延安的人，在被允许成行之前，要在洛阳等待很长时间，有些人已等了几个月。贝尔登同一些与一个军事法庭有关的官员们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他，他们的工作就是镇压和惩处“叛党”分子。他们不否认，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当时有3个在他们看管之下的囚犯是新四军的成员。其中有一个是投奔了新四军并为新四军工作的日本共产党员，他的师团长派他去与该师团辖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系。这个人的唯一罪名显然就是他公认他信仰共产主义（这使他从日军那里开了小差，投奔到中国人方面）。另一个是个17岁的年轻孩子，他参加新四军是因为他不愿被（国民党政府）征调入伍。

贝尔登证实，给予共产党第18集团军的医药供应受阻而未能

* 当富户的孩子被征时，他们就买一个贫农来代替，因此，形成了固定的征兵市场，而且有明确的价格。

运到目的地。他对我所谈到的最近的一个谣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个谣传说，俄国用飞机直接向共产党地区运送了一些药品。（在这方面，国际红十字会的A·V·拉文霍尔特先生最近同我的一次谈话可能是有意思的。当问到是否像另一个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士最近所说的，中国人是如此担心医药品被漏运到共产党地区，以至在夏季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没有医药运到贵州和云南省以北，这种情况是否属实。拉文霍尔特先生回答说，大体正确。在头一天晚上，他还曾经说，中国军医署的头头告诉他，将来从四川往北运送医药品可能会非常困难了。）

农民的苦难

在谢伟思到达重庆后不久，克拉伦斯·E·高思接替纳尔逊·T·约翰逊为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曾在中国从事过30年的领事工作，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顽固的来自一个通商口岸的美国人，常常被人指责持反华态度。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不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性公告和对记者的吹风。更有甚者，1941年春，事态发展越来越明显，美国在华的作用看来要从仅仅是观察日本人的侵略，转变到积极参与反侵略。高思领导下的美国大使馆，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编写来自战地和外地的独立的、第一手的报告，以便能够描绘出它自己关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图景。

谢伟思“讨厌大使馆里单调地坐办公桌的工作”^{*}，而乐于外出活动。由于他的流利的汉语，特别是流利的四川方言，使他成了外出考察的合理人选。

谢伟思到现场的经历对他从中国发出的报告有重要影响。他亲自看到了战时中国国民党统治区里人民蒙受的苦难。他看到了因饥荒而挨饿和形容枯槁的灾民。他碰到年轻的新兵跳到他奔驰着的吉普车前寻死，以求逃脱在中国军队中的慢性的、但是肯定的死亡。他观察到了人民不满的凶险微兆，以及甚至对重庆政府的公开造反。身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谢伟思时常向传教士搜集情况。他们很多人是天主教徒

^{*} 这一引语以及后面的没有注明出处的直接引语，均引自约翰·S·谢伟思1972年9月12日对编者的谈话。

或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上较穷苦的人。这些不问政治的中国内地会的虔诚信徒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看到的情况有什么涵义。可是，在谢伟思听来，他们讲述的那些关于赋税加重、强迫征兵和地方政府腐败的故事，却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他在中国农村地区看到了国民党的失败和丧失了治理的能力。

下面的3篇报告都谈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穷困状况的某方面。报告涉及的时间包括1942、1943和1944年；地区包括河南、甘肃和四川三省。第一篇报告《河南省的饥荒》是谢伟思在1942年秋到华北进行广泛考察后写成的。他曾随同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新闻界代表考察中国西北地区的油田。在返回重庆途中，谢伟思离开队伍，绕道河南去调查关于那里的饥荒的报道。他在那里的细致而精确的观察，构成了他关于这次饥荒的起因、影响和政府救济工作不力的一篇令人寒心而且颇有先见之明的报告的基础。

河南省的饥荒*

1942年11月5日

档案页：893.48/3069

消息来源

10月14日到17日，我访问了河南省，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到洛阳，15日和16日呆在洛阳，然后回到西安。旅途所见情况虽不

* 谢伟思的备忘录原稿附有详细的脚注，这里把很多脚注不是删去、就是并列到正文里去了。

好，但除了高涨的物价和大批大批的难民外，没有看到实际的饥荒。可是，我在西安和洛阳同许多熟悉情况的人讨论了饥荒问题，而且他们答应我可以研究他们占有的报告，这些人包括全国救济总署驻西安的代表齐大鹏（译音）；当地中国救济机构的成员以及驻西安的各种国际救济机构的成员；中国工合组织*在河南的负责人；美国设在洛阳的救济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天主教堂的大主教米甘和美国兄弟会的埃米尔·汪普勒先生等等；当然还有街上遇到的人和难民。

饥荒地区

遭受饥荒的地区是在洛阳以西和以南。临汝、郑州、许昌和郾城是主要的饥荒中心。这是沿黄河新道以西的“前线”地区。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扶沟和尉氏周围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企图改变黄河水道（据说没有成功）以切断日军去年秋天在黄河西岸建立的防线，而在中牟再次实行决堤，所遭受的灾荒特别严重。黄河东岸也有灾荒，但受灾地区大小不详。

受灾人数

对受灾人口有各种不同的估计。齐大鹏先生说有1800万人不同程度遭受饥荒，1000万人需要救助，200万人陷于挨饿。美国救济委员会的消息可能较为可靠。它报告说，至少有1000万人受灾，它同意约有200万人陷于绝境。此外，还应加上来自黄河东岸日本占领区的一些难民，虽然为数不多。在日军占领区，没有

* 中国工合组织是由一批中、外人士建立的，宗旨是促进战时的生产。这些人中包括有传教士、教育工作者和自由的新闻记者如埃德加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区活动，国民党倾向于把这些合作社的组织者视为亲共分子。

进行任何救济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救灾工作颇有经验的汪普勒先生曾说，他认为，受灾地区“没有1921—22年灾荒的受灾面积大，但比1928—29年的灾荒严重”。

严重程度

在受灾地区，1942年春小麦的收获只及“正常年景”的二成，高粱、谷子、大麦在有些地方颗粒不收，但总的也只有二成的收成。某些其他作物如甘薯、花生等稍好一些，估计有五成收成。久旱之后于10月1日左右降了一场大雨，缓和了旱情，有助于荞麦和蔬菜等晚造作物的生长，并使得可以及时播种小麦，以期来年有个好收成。

从事救济工作的人们说，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最坏地步。他们认为，省内的粮食储备总的说来可以维持到年底。1943年麦收前的头四个月将是最困难的时期。可是，人们已经听到来自许多地区的消息说，灾民们在吃树皮草根。救济工作者看到道旁有饿死的灾民的尸体。一个女人的身价（困难时期中国通行的物价指数）已从3000元降到了约300元，可是，够有意思的是，一个新兵的身价，从3000元只降到2000元左右*。

直接原因

造成灾荒的直接原因是：1942年大部分时间中持续的干旱使得春夏作物只有两成收成。但是，这种统计是骗人的：对中国

* 暗示新兵所受可怕待遇的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是：“宁愿在前线被炸死，也不愿在后方受训遭折磨。”河南的灾民又明白地补充了一句：“宁愿在家饿死。”可是，对于灾区内的家庭来说，男人和妇女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在困难时期，妇女，特别是年青妇女，常常被卖作佣人、奴隶或妓女）。妇女可能只是多一口吃饭的人；而男人则是栽种和收获的作物所必需的劳动力。他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作为苦力出卖劳力赚点钱，再不就是推一独轮车，带上仅有的一点东西，宁愿全家逃出灾区。（原有注释。）

农民来说，十成年景是百年不遇的好收成，通常都是七、八成年景，而在河南四成的收成就可以“维持生计”。在正常时期，象这样的歉收也不会造成很大困难，因为在像河南这样一个高度的农业地区，农民通常都有些积余可以度过一、两个灾季。

背景原因

如果不是战争，可能会有人挨饿，但不会造成真正的饥荒，而在河南，造成这一饥荒的背景，就是农民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对他们实行的残暴压迫。这一点是如此明显，我曾与之谈过话的每一个从事救济工作的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向我提到这一点。有些人甚至说，这是“人为的饥荒”。

如象大使馆先前曾报告过的（用电报发给国务院的杰克·贝尔登和格拉罕·佩克*的游记），河南农民的处境几年来一直在恶化。

由于自由中国在运输粮食方面存在困难（重要的交通线几乎全被日军控制），因而要求每个地区向驻在该地区的军队提供给养。这样，一般说来，越是近前线的地区，驻守的军队就越多，农民的负担也就越重。

河南的情况尤其这样，河南面对北、南、东三方面的日军。由于中国军队（1941年5月）在中条山的失利和（1941年10月）在郑州的失利，使得已经驻守在河南的大批军队，又进一步增加了，据从事救济工作的人们的不同估计是，总数达50万到100万人。他们大多数都集中驻在河南西部地区。那里正遭受饥荒，并且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经遭受过各种灾难。由于1938年和今春的

* 格拉罕·佩克，美国作家和艺术家，自费在中国旅行，曾在中国工合工作过，后来进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195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记述他在中国滞留的岁月，书名是《两种时代》。

两次黄河决堤，有些地区被洪水淹了。很多地区因战争而田园荒芜。河南征兵任务特别繁重，尽管发生饥荒，征兵仍在继续。拉伕甚至更为普遍，军事运输需要大批苦力，已经建好的道路受到破坏，建立起了成千上万的炮楼，洛阳城周围挖了30英尺宽的护城河。为了分流黄河水，挖了很多运河，还挖了很多战壕*以阻止仍然据守郑州以北黄河桥头堡的日军前进。有时候，从事这种工作的农民可以得到一些报酬，但大多数情况下显然什么也得不到。即使得到报酬，也只及正常工资的1/3或1/4，甚至不够自己吃饭。（在洛阳挖护城壕每天付给8元，当时该城的工资平均是每天22—26元）

可是，河南农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40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人。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的、无法预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而农民并不是把全部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

* 据来自郑州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估计，为了挖掘这些战壕，所用苦力曾经多达10万人。（原文脚注）

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象是他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至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的赋税负担则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个传教士说，早在当前的饥荒来袭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歉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1000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保持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却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但是，普遍的情况是，人们在和平抗议无效，看到粮食被征走，今冬生活无望之后，就宰杀了牲畜，廉价变卖了农具和少量家当，然后上路逃荒。美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在密县一个地区，已有10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去了。据报告，在7个重灾县，已有46万人逃荒。

征税时间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月份。可是，一直到9月10日才宣布取消征税和不再打算征税。但是，这时有一半的赋税可能

* 保甲是传统的中国地方治安体系。3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加以修改，作为反共围剿的组成部分。理论上说，百户为保，十户为甲，保有保长，甲有甲长。在战时的中国，保甲的主要职能是征税、征粮和征兵。

已经征集完了*。不但如此，这一撤销不包括农民以前在很多情况下所拖欠的税。

救济方面的问题

使向该省输入粮食进行迅速救济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的唯一因素，是战争使交通运输陷于瘫痪。陇海铁路东西横贯河南，平汉铁路南北纵贯河南，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卡车和其他运输工具也不能从陕西筹集大量粮食；陕西省自己也没有粮食。

军事方面的考虑也妨碍了对粮仓内的储粮的分配。在自由中国剩余的土地上的这一条铁路线岌岌可危，一旦被切断，则这些粮食将为军队所需要。

因此，问题就成了一个粮食不够的问题——没有运输工具运送足够的粮食来有效地缓解局势，并相应得出结论说，直接的现款救济无补于事。

政府采取的措施

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不继续——为时已晚——进一步征粮。

粮食现在也正在运进河南省，但数量很小，而且只供军需。**

* 原计划征军粮600万袋（每袋110磅）。后来减到470万袋。据非正式报告，在取消征粮日期之前，已征集完了250万袋，其中还不包括地方和省政府的实物税。（原注）

**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原注）

据美国救济工作人员说，政府拨的500万赈款已很快用光，赈款实际上没有分到农民手里。在很多地区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地方低级官员的处境是如此穷途末路，以至大部分赈款都为他们所得（赈款由他们分发）。总之，赈款少得可笑。

国民政府对于为了帮助播种小麦而确定的400万元种子贷款，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到我访问的时候，还没有通过。在这同时，那些没有背井离乡的农民，设法弄到了足够的种子，趁雨及时进行了播种，他们播种的小麦已经发芽，而且年景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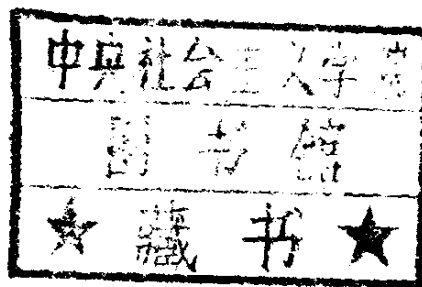
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对许多人来说，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故土，逃出灾区。唯一的出路是西去。政府允许他们免费乘火车从洛阳到西安和宝鸡。*通过这条路线每天大约有3000人进入陕西。此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可能比较少的人沿其他道路西去。地方政府为了帮助这些人逃难，开始时发给每个人5元或10元（具体数目因地而异）的“旅费”。这笔款项很快就用光了，因此，甚至这点为数甚微的资助也就停止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沿途照顾这些难民和向他们提供食物。据一位工作人员估计，约有10%的难民畏于所碰到的困难而试图返回故乡。剩下的有很多人沦为乞丐或小偷。

陕西省政府同意接受10万难民安置在三个新的垦区。实际上，已经到达陕西的难民远远超过10万人。大量难民的到来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在西安和宝鸡这些城市的周围，有很多移民聚居在草棚茅舍或地窖里，我在通向甘肃道路上的彬县这样遥远的地方，看到难民在路上踽踽行进。一位中国人士说，正在努力阻止难民前来陕西……。

全国救总驻西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广泛而相当空洞的计划，

* 洛阳火车站和铁路沿线都聚集了大量难民。他们要等好几天才能乘上火车。他们坐在敞篷车厢里或平板车上，再不就是爬到车厢顶上，甚至在行经沿黄河的危险路段时，也不准下车。许多人死去了。他们还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个人驻华代表威尔基到达潼关那天，日军对洛阳的一次空袭中的主要受难者。（原注）

要求拨款1.5亿元。他的计划包括：



开放河南境内的粮仓。

购置和运输大量杂粮到河南以供分配。

实行以工代赈，诸如建设道路，运河等公共工程，尤其是更急需建设黄河大堤。

利用难民劳力修筑陇海铁路，使之从宝鸡延伸到天水。

安置难民于陕西和四川的未垦土地上，给他们以贷款帮助。

为婴幼儿孤儿建立家园。

向难民施粥和供给御寒衣物。

所要求的这笔款项按战前购买力计算，只等于300万元（约100万美万）。自然是很不敷需要。不但如此，这些显然是齐先生自己的建议，而未得到正式批准。他显然没有信心能得到这笔款项。

饥荒造成的影响

军事上，河南的情况在一个屏障着中国北翼的*、紧靠前线的重要战略地区造成了越来越广泛的瓦解和士气下降。一位美国人描述这些情况是“一团糟，而且还在恶化”。

经济上，其影响必然既包括暂时的损失，也包括恢复中国这一重要经济基地的长远的困难。其他直接的后果是局部性的对正常商业的限制，由于担心当地物资日益短缺**，从而刺激了囤积

*表明这种趋向的证据很多。低级民政官员的困苦处于绝望状态，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被认为已近于崩溃。这个地区的军队的纪律甚至在遭受饥荒之前就已经是出名的坏，中国人承认，现在是更坏了。使当地军官获致巨利的穿越前线的走私贸易仍在大规模进行。最新的一个发展是，输进了大量鸦片，也是由军方进行的，或者是得到了他们的默认。在洛阳，现在打一针吗啡4块钱（0.2美元），而且很容易得到。在政府普遍垮掉了的情况下，对鸦片的限制看来倾向放松。（原注）

**据报道，造成物价上涨的首要原因是面粉价格的上涨。在洛阳，7月初1斤面粉还只卖2元钱，到9月就涨到了11元，许多地区都禁止小麦流动。在取消征粮后，价格下降到6元。

居奇。经济后果还很快扩及邻近各省。河南成了整个西北地区物价扶摇直上的中心*。同时，大批难民流进陕西使劳力市场人力充斥，在有些地方，实际上造成了劳力价值下降。在这同时，由于要把军粮从陕西运到河南，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起农村出现不安迹象。

农业上，灾荒引起的大批耕畜被宰杀和良田沃土受到浸蚀之害，对未来造成了严重损失。

社会上，所造成的眼前后果是，根除了很大一部分人承受困难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后果是，这些苦难可能引起的人们态度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河南农民本来就已经对抗战不感兴趣；现在存在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苦难可能孕育着不满，而这种不满可能演变为对他们的处境的公开抗争**。

迄今还没有迹象说明大动乱就要到来，也没有迹象说明大动乱可能发生***。可能的情况是，农民继续默默含辛茹苦，盼望有好时候到来。但是，渴望和平的气氛和对本来被认为是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

谢伟思对农民的不满可能终将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所作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1944年春，日军在河南发动了一次大

* 7月间我从重庆北上时，当地仍然是全国物价最高的，越北行物价越低。在重庆，大米3.50元一斤，西安面粉2.50元一斤，洛阳2元，兰州1.80元。其他商品价格也大体是这个比例。到了十月，洛阳物价上涨3倍（抛开9月临时的疯狂上涨不算），西安一倍，兰州50%，重庆30%，洛阳当时是中国物价最高的城市，西安与重庆差不多。我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物价现象是，进口货的价格跟着当地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变动；例如，来自天津的香烟、肥皂和其他货物，越往西价格越便宜。（原注）

** 米甘主教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象河南农民那样容忍他们所受到的对待”。这一看法有趣的是得到一位广东人士的充分首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人们决不能象对待（河南）人民那样对待广东人。”（原注）

*** 大多数谈到这个问题的美国人都不认为已有很多农民了解共产主义。只要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共产党的影响，就会给予大力镇压。（原注）

攻势。那时当地居民对中国军队如此厌恶，以至帮助日军来解除国民党士兵的装武。

1943年6月到8月，谢伟思被派遣到甘肃省会兰州建立“听音哨”，甘肃是与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毗邻的一个敏感地区。那时，甘肃是一个农村存在相当大的不安定，甚至有反重庆政府的公开叛乱的场所。在这里，不仅贫苦的农民，而且地主、乡绅和一向势力强大的中国秘密社会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利用这些骚乱来扩大他们的控制地盘，从而使国民党的镇压措施倍加困难。

甘肃的政治局势

1943年7月18日

档案页：893,00/15112

谨向使馆发去关于甘肃政局的备忘录一份，其中特别谈到对地方不安定的明显担忧。

下面是备忘录的简短概要。导致本省南部和中部农村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对苛捐杂税的愤慨和对政府的不满。没有迹象表明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事，而且局面现在较为平静了，可能是由于已经收获了粮食。但是，政府显然担心会继续发生骚乱。已向省内增派了军队，兰州周围正在建立封锁线和碉堡群以防不测。有一些迹象表明，地方政府与其说是担心农村不安定，不如说是更惧怕共产党占领本省。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士的预测证实了这种恐惧。

关于甘肃政治局势的注释

对今年春天席卷甘肃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骚动——或“盗匪活动”——所卷入的实力和人数，难以得到可靠的、全面的报告。

这场动乱很少一部分是由通常的职业盗匪造成的，他们可能有几千人，主要是回民，不时在甘肃西南部闹事。象当前的这种不安定，参与的人数和进行的活动都有增加。

但是，今春起事的很大一批人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集团有着相似的军事纪律，还有各级“将军”和军官，各不同集团之间还有着松散的联系。

与通常的盗匪活动不同的一点是，这些部队都进行自己的宣传。他们的宣传重点是放在解除人民的苦难和负担上。美国传教士所看到的他们的口号抨击滥肆征兵和拉伕，保证减轻征税和各种摊派，要求地方自治。我在甘肃马营镇上看到一些残留的这类标语。但是，总的来说，一旦叛乱分子撤出一个集镇，而中央政府军队实行重新占领之后，很快就把这些标语完全清除了。

叛乱分子一度占领了甘肃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岷县和临洮两个较大的县城以外，他们还挥戈北上，占领了天水、兰州公路沿线的城镇。据报道，在离兰州仅几英里的山里，一度曾驻扎有数千名叛乱者。曾用飞机轰炸兰州东南方的榆中县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轰炸机和侦察机从兰州起飞，据报道，这都是要去对付叛乱分子的。人们认为，至少在轰炸中使用了俄国飞机。

大多数外国人都相信下述报道：叛乱分子总数至少有5万人。但是，某些中国人提供的数字高达20万。甘肃牲畜改良局的所有改良站都关闭了，因为它们都处在发生叛乱的地区。该局局长嘲弄那种要求提供确切的叛乱人数的企图。他声称，在农村地区，所有居民不是叛乱活动的实际支持者，就是潜在的支持者。

政府采取了强大的军事措施来对付骚乱。36军的两个师调到了甘肃，增援当地的大批部队。从四川和河南调遣了大批新兵入甘肃增援，还从西安或平凉地区调进了其他部队，其中包括骑兵部队和重装备部队。

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显然不是一向很高的。他们有些人在同外国人的谈话中公开表示不愿对穷苦的、负担沉重的老百姓作战。地方和省的部队，如保安团之类证明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

们一贯经常投奔到叛乱分子一边。

可是，向省内增派大批军队使得能够戍守所有主要城镇，并逐步把叛乱分子围困于一两个地区。目前，叛乱分子集中的地区主要是陇西和甘谷以南地区，处在岷县与成县之间。小规模的你伏此起的行动——显然更多是传统的盗匪类型——仍在继续，在省内很多地区旅行都是不安全的。举例说，仅仅在3个星期之前，离兰州仅有10英里的一个小村子就受到了进攻。

随着夏季到来，骚乱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农村居民要进行夏收。现在，没有关于大规模骚乱活动的报道。政府部队最近俘虏了一位参与骚乱的“将军”，他以前是岷县的专员。据谣传，为了要他招供出他的同伙，他的双腿都被打断了，最后被拷打致死。

政府官员总是想草草了结整个事态，把它说成是“一般的盗匪活动”，并声称局面已得到完全控制。官方为应付更进一步的骚乱而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与省内外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一般私下意见，都与这种乐观估计背道而驰。

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骚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征兵、劳役、征粮过重和管理不善的愤慨。几乎是全省的人民而不是某个具体集团，都怀有这种愤慨。因此，很难说骚乱活动是由那个集团鼓动和组织的。

省政府被视为“外来者”。建设厅长几乎是唯一的当地人。省主席（谷正伦）是一个前宪兵司令，不受欢迎，被认为残酷凶暴。

在西北地区，回族与汉族之间由来已久的不和的背景显而易见。目前的政府完全为汉人控制，回族人感到不满。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将军可能愿意秘密对他们进行帮助，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帮助他的回民同胞的同时，使中央政府在甘肃处境困难，并可以

加强他自己在青海的地位。

省政府显然一直试图实行一项禁绝鸦片的政策。可是，鸦片交易主要操纵在到处都存在而且非常有势力的秘密社团手里。事有巧合，省主席谷正伦在任南京宪兵司令时，以华东最大的秘密社团青红帮的死对头闻名。他好象试图继续进行这种努力，以限制这些秘密社团的势力，这可能是引起动乱的部分原因。

甘肃省的地主、乡绅，由于未能参与现政权，并且被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而一直强烈反对现在的省政府。

农民的不满无需多说。

因此，有好几个大的集团可能被认为是助长了反政府的活动。但是，农民一无组织，二无领导，而秘密社团与地主、乡绅阶级都关系密切。

有可能，骚乱活动的鼓动、领导和组织工作主要来自当地不满的地主乡绅，秘密社团也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和共同利害。事情很简单，只要把农民潜在的不满加以宣传利用就可以了。在甘肃南部，有一度任甘肃省主席的邓宝珊将军以前的大批部属。在邓将军失掉省主席职务后，他的部队被遣散了，没有给遣散费，很多士兵还保留着自己的武器。在他们以前的长官——也来自乡绅阶级——的领导下，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形成了某些规模更大、更有战斗力的部队的骨干。这些士兵中有些是农民，但他们想到有抢掠的机会和可以逃避征兵，其中大多数人就足以被争取过来。有的地方部队，如保安团等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受的待遇比中央政府的部队要差，他们还同人民和邓将军以前的部队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他们很容易参与叛乱队伍。

一个有趣的因素是，在这些骚乱中，共产党显然没有起什么作用。政府的宣传中，也只是偶然地、半心半意地说到共产党的煽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鼓动主要来自地主和乡绅。用党的词

汇来说，就是腐败的、落后的地方势力。

尽管目前骚乱有所平息，但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普遍认为，到了秋天动乱可能会死灰复燃，而且规模可能会更大。因为这是征收各种赋税的季节。虽然兰州地区年景很好，但并非全省都是这样顺利。受农村骚乱影响最严重的南部地区，遭受干旱以及春季的战乱之害。在甘肃东部的3个县，因霜冻而几乎颗粒无收。在这同时，由于省内军队大量增加，人民的负担比通常情况下大大加重了。

但是，就是把征粮同农民手中所有相比，其比例是否比正常情况下为重这个问题完全抛开不谈，大多数观察家还是认为，事态发展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势头，而且农民对其当前处境的不满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发生更多的骚乱是必然的。如果政府继续采用迄今所用的措施，从其他省调来部队实行军事镇压，轰炸叛乱者占领的城镇，同时，又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造成动乱的条件，那末，肯定无疑将发生更多的骚乱。

尽管官方发表乐观谈话，但是，看来政府显然预期和担心发生更多麻烦。部队和新兵正不断调进省内。大约两年前为了执行使兰州现代化和拓宽街道的计划而拆除的兰州外城的城门，近两个月里又匆匆重建起来。现在有宪兵站岗，而去年这些城门所在的地方只有当地保安队站岗。在兰州周围的农村和山上，正在建起大批碉堡。这些工程的规模之大，使得私人在兰州几乎买不到砖或雇不到泥瓦匠。有消息说，仍有大量部队在叛乱地区内或临近叛乱地区的城镇执行着警戒任务。

这些准备工作对于对付通常的盗匪活动来说是太过份了。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认为，政府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村骚乱死灰复燃，而是共产党人会利用这些骚乱西向进入甘肃中部，然后，可能从那里挥师西北，向新疆进军。

政府的这种担心很可能是真实的。他们必定认为，共产党人完全了解，强调“开发大西北”的极大动机是政治性的，目的在于最终包围和消灭共产党人。许多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和行政当局有着强烈的反共情绪。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另写报告呈上。

有趣的是，政府对共产党人进军甘肃的担心，得到了与共产党人有联系的人士从他们来自共产党地区的朋友处所获消息的证实。这些人显然预期共产党会在一年内实行这种进军。

共产党进军甘肃的打算从未付诸实施。然而，1943年夏，国共关系紧张显然达到一个新高潮，双方一度象似要走向公开的内战。虽然具体详细情况仍不清楚，但是，很明显，共产党人觉得受到中央政府调集在甘肃的大批部队的威胁。无疑，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就是参与镇压农村骚乱的部队。当共产党人采取对应措施，也集中起自己的大批部队时，双方的紧张和互相指责加剧了。一直到1943年秋，局势才开始有所缓和，那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赞成“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对中国农民来说，1944年局面有所变化，但没有改善。在很多地区，随着美军和进行对日空中作战的空军人员大量到来，农民的生活遇到了困难。没有什么地方比成都更是如此了。1944年初，为了使新式的B-29超级堡垒(飞机)能够起落，开始在成都修建几个大型机场，这破坏了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可预见的不安定迹象和反美情绪的报道。当时供职于史迪威将军总部的谢伟思奉命前去调查。成都是四川省省

会，也是谢伟思的出生地。他熟悉这个地区，懂当地方言，了解农民生活的真象。他从成都发出的报告表明他对当地局势的一切细节的敏感，而且他的所见所闻无疑会在任何其他那些被迫充当接待美军的东道主的农民社会里重现。

美军对成都地区造成的冲击

1944年2月26日

档案页：893,248/291

下面是关于我所认为的成都局势的一个简短的总的报告，并就此为对付这种局势而可能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

机场工程在成都地区开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给人以工程受到反对和对美军不友好的印象。在对为修建机场而征用的大部分土地给以补偿之后，暴力反对活动停止了，表面上看来，极其可能的事件的直接原因消除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或者这些工程受到欢迎。各阶级的人们的一个总的态度是，虽不是公开敌视，但都表示忧心忡忡。由于对战争缺乏热情，强烈的地方主义和成都地区潜在的排外情绪，一直存在这种可能性，即这种担忧一旦变成现实，就可能演变为积极的不满活动……

1. 土地问题

土地所有者担心，他们被征用的土地可能得不到补偿。耕种着成都平原绝大部分土地的佃农们忧虑他们被毁的庄稼和房舍得不到赔偿。

可以认为，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前中国人在这一地区修建机场时，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机场的扩建改进工程，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们都没有得到赔偿。

工程的仓促开始，使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涌到工地，而且在没有通知土地所有者并同他们商谈购买他们的土地之前就动工了。立即触发的暴力反抗活动迫使工程技术人员从几个机场工地撤出，并且使工期延缓了10天左右，直到作出安排，对所征用的土地付出赔款之后方才继续施工。

对所有征用土地的实际付款是在2月8日左右完成的。据我获悉，付给土地主人的价款是每亩地1.6万元。这虽然接近官方价格，但可能只及土地实际价值的1/3到1/4。而且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赔款并没有全部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举例说，据报道，有一项工程所在县的县长，把同意给予的1600万元赔款，只付给了1000万，其余款项要在土地所有权弄清楚之后才付给。很明显，在当前通货迅速膨胀的情况下，越是延长付款期，所付款项的币值就会迅速下降。

还作出了安排给佃农以赔偿，这种赔偿是由地主付给还是由政府直接付给，说法不一。我与之谈过话的佃农每亩被毁小麦所得赔偿是800元，被毁家园所得赔偿费是2000元，这两项赔偿都是很不够的。据华西大学的一位农业专家估计，按目前物价算，每亩地800元赔偿金甚至不足所施肥料的钱。

不管是土地主人或佃农都不满意。但是，尽管在通货膨胀时期谁也不愿意失去土地，佃农们可能被弄得无家可归，而且在人口已经过剩的成都平原，可能找不到其他可租种的土地，而有意义的是，由于给予了赔偿，因而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经验，消除了担心，反对活动也就停止了。

现在我们可以表示关切的是，未付的赔款是否能全部、迅速

付给。

2. 劳工问题

担心被征做劳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能及时返回家园进行春收夏种。……

各不同工程被征劳工的态度有所差别。有几个工地看来是持沉默的抗议态度。然而，在大多数工地都是正常友好的，把这归因于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长期的忍辱负重是正确的。一保（理论上说大约一百户）可能被认为是征募劳工的一个标准单位。所需劳工大大超过户籍数目，因此，有些户要同时出几个人。事先不予通知，一旦被征，第二天就要离家。他们必须自带一周的食物、铺草和搭住棚用的棍棒，还要自带担筐、镢头和手推车。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最大的节日新年（即现在的春节）仅仅10天之前，这意味着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力求团圆的时候却不得不离散。最后，他们被告知说，这是因为美国人要求修筑这些机场。

实际的工作条件可能不比通常征用劳工的工作条件坏，而且还可能好一些。被征者都认为，在他们到达工地并实行编组之后，他们吃得还不坏，有大米饭，少量蔬菜和盐巴。他们抱怨没有现钱购买一些必需消费品，如草鞋和少量烟叶等。在成都还听到一些不满，抱怨没有医疗照顾，卫生设备很差，没有笔、墨、纸、砚可给家里写信。

对于最后的这些抱怨，象这样规模巨大和为期甚短的工程，不管是我们还是中国政府，都可能无能为力。但是，我曾与之谈过话的每一个劳工（肯定超过100人），都一致而强烈坚持说，他们没有得到一点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被征劳工可能会得到的现金收入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是，与工程有关的官员同意曾确定工资定额，而且他们都普遍说，除伙食外，每天是20

元。很明显，工人们现在没有得到这些钱。对此应该负责的官员显然是当地的县长和他们管辖下的保长。

我们对这些被征劳工首先要关心的，是要使他能够在农忙开始之前及时返回家园……

我们还应该——特别是如果这些工程最终要由我们付款的话——设法使这些答应给予的钱真正到达工人手里……

3. 担心中央政府影响增强

无疑，四川省各统治集团都担心，负责这些工程的建设工作的中央政府，会通过这些工程加强它在四川这一地区的势力……

当然，这纯粹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只能予以注意，而不能有所行动。

4. 担心与美军发生摩擦

成都的一些官员和士绅担心，大量美军的到来会引起摩擦，或可能触发一些事件。

这种担心的一个背景，无疑是目前广为流传的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以及后来美军在昆明等城市的粗暴和流氓行为的夸大报道。不幸，我们的名声不佳。

另一部分背景是前面提到的强烈的四川地方主义。过去，这种地方主义有时带有强烈的排外主义色彩。成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有很多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且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它也是一个富庶的城市，是大批官员的家属和富有的中国人战时的避难地。由于它既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又没有(外国)租界，因此，当地人迄今几乎是只看到过(外国)传教士。

* 由克莱勒·李·陈纳德统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亦称“飞虎队”。

现在，急需在成都马上派驻能干的、有事业心的公共关系的代表和战时情报局的代表。还可以指派一名专职官员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络，或者为此目的而与美国大使馆（驻成都）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

这些官员的一项任务是努力增进当地人对美国的善意，建立对美国空军的关心，促进当地人对其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他们还可以默默致力于缓和由于当前盛传的关于将要到达成都的美国人的人数而引起的某些不安。这些谣传说美国人将多达20万。

这些官员和其他有关单位还应该尽快为接待美军来到这个城市和使他们在里得到娱乐活动而制订明确的计划……

5. 害怕日本的轰炸

所有各阶层人中都存在某种担心，害怕这些工程的兴建将招致日军对成都城、郊地区的轰炸。

最近，日本电台在广播中扬言要进行轰炸，这一点现在尚不为众所周知，因为我没有听到人谈论这件事，也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进行了直接的宣传，如象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空投传单。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而且根据当地的经验，是有道理的。成都地区过去曾受到过日军的轰炸，主要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航空中心。群众知道，对这种轰炸，没有可靠的防御。

再说一遍是适宜的，四川人一般都有地域观念，他们没有什么抗战意识，也不关心战争。该省从未遭到入侵，而且远离实际的战斗。

虽然时间有限，我们自己和中国人所进行的宣传可能会有些帮助。当然，最有力的宣传和最能激励民心士气的，就是有关这项工程胜利完成以及其使命的重要性的消息。

但是，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快使这一地区能够得到充分的战斗机的保护。具有最大重要性的事就是尽早提供这种保护。如果从军事考虑上许可的话，战斗机的到达应广为宣传，甚至可以举行空中表演。

6. 担心通货膨胀

各阶层的居民，可能尤其是城市居民，担心工程所需大批物资和供养大量美军的问题，会引起物价扶摇直上。不应过分强调这种担心的广泛性和造成的影响。总的心理状态接近于恐慌。

成都地区的物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基本生活费用指数两个月来上涨了70%到100%。以面粉为例，上涨了3倍。建筑材料则几乎上涨了4倍。不幸的是，在人们心里，把这种物价上涨完全归咎于美军。

无可否认，这些建筑工程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后果，包含有在一个有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地区的大量货币支出。象供养相当多的美国军队这种事情，由于当地某些食品，尤其是土豆、上等面粉、牛肉和禽蛋*等资源有限，同样可能造成供应枯竭。但是，把物价上涨完全归因于机场工程和美军是不对的。

甲、在中国，通货一直不断膨胀……

乙、在成都地区，某些商品实际上是匮乏的，例如，去年小麦就歉收。

丙、物价上涨由于四川各种利益集团明目张胆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而加剧了。……

丁、广泛流传的关于美军人数和需要的明显夸大其词的谣言，助长了物价上涨。流行的推理如下：

* 由于史迪威坚持不同意，美国没有向中国运进任何食品。为的是大量“驼峰”运输代价太高，所以美国大兵只靠在当地市场购买食品。

20万美军每人每天需要5个鸡蛋，这就意味着每天要100万个鸡蛋。中国人公开预言，现在一个鸡蛋已从3元涨到6元，很快将涨到70至80元一个。大规模和广泛的囤积居奇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促使物价更迅速上涨。

我们采取缓和物价上涨的行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最主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管制物价的措施，以防止物价完全失控。……

其次，重要的是需要推动工程尽快完工，这就需要中国政府尽快提供足够的款项。……

我们可以考虑采取的一个较为不重要的行动是，不要使我们自己与工程的费用发生关系，而是可以根据当地的供应来调整部队的伙食。……一天至少吃一顿大米或甘薯是不会有困难的。成都平原牛肉很少，可以代之以猪肉，各种豆类和豆制品。看来没有东西可以代替鸡蛋，但是，消耗的数量可加以限制，使之不象在华的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的那样。

军队状况

谢伟思在充任政治报道员时，发现需要对中国军队的状况给以相当大的注意。这些军队常常从属于特定的政治集团。而在对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总的状况显然为其美国盟友所关注。在他访问了共产党地区，并把共产党的军队同国民党的军队加以对比之后，他对国民党军队的估价就尤其重要了。这种估价使他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国民党希望在同共产党的内战中取胜，纯属幻想。

1943年夏，谢伟思曾从重庆去兰州。沿途看到部队和新兵的调动，他对此行所见的描述，是他关于国民党军队状况的最生动的报道之一。这些调动中有一些同中央政府和四川当地军阀之间的政治矛盾有关。看来双方都要在省会成都调集兵力*。向北调动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新兵。“标准的作法是，把征来的新兵调离他们的家乡，这样，他们要开小差就会更困难了，像现在这种情况，他们从四川征来了新兵，他们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穿越秦岭到陕西去，这样，即使他们要开小差，也将无处可去。这些士兵都是半饥不饱的，路旁沟渠里弃置着尸体；穷苦的伕役要为军官抬滑竿。”

* 1943年5月24日，谢伟思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报告，题目是：《中央政府同四川军阀——乡绅的磨擦》（这里未印出，见国务院档案893.165/95）

重庆到兰州沿途所见军事调动

1943年7月2日

国家保密件：893.22/49

谨寄上从重庆到兰州沿途所见军队调动及其一般情况的札记。这些札记可简要概述如下：

有些迹象表明，成都周围有部队集中，有新兵出川北上，后者虽然是正常调动，但是，在这一地区最近唯一重要的部队调动似乎是有七个师调进了甘肃去对付当地的骚乱。

A. 军事调动

在重庆和成都之间（6月5——7日）看到的30辆空军卡车，载运着行李，家具和眷属南行，乘客中军事人员居少数……

当前成都有消息说，前不久（可能是5月份）西康省长，四川“军阀”之一刘文辉将军，从雅安调动他的一部分军队赴成都。与此同时，在成都市内，警察和卫戍司令的部队之间，发生了局部的骚动；中央政府的部队已在成都周围集中。中央政府的军队在紧挨城墙和华西大学校园及对岸的地方安营扎寨。据外国人说，这些部队装备精良，非常严肃认真。在我到达成都（6月7日）之前的两周，他们已经撤走。

在成都以北25公里的新都县城，6月10日看来好象驻满了四川部队。在被用作军营的庙宇和客栈的门口，都挂着该部队红底黑字的军旗。总的气分尚好……

6月13日，约2000人的部队从罗江（成都以北95公里）附近南

下。他们身着卷起袖子的汗衫、短裤和草鞋。一律轻装，其中包括一个背在背上的竹筐，内装一个小行李卷，另有一顶阔边的四川斗笠。10个人中大约只有1个人有步枪。每支部队都带着炊具。他们以密集队形急速行进。军官也是步行，他们讲四川话，士兵们脸色很好，他们的光腿上显然看不到通常有的疮疤。他们显然受过一些训练，也可能是受过部分训练的新兵或后备役人员。

6月15日到广元。广元城内和周围有“新——9师”的大量部队驻防。没有机会了解装备状况，但部队很大一部分是孩子。

6月18日，三队四川新兵，每队约100人，北行进入陕西省茅台子（柳巴）附近。每一队人都有携带步枪的约10人左右的武装押送人员，由一名军官负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都是由新兵用滑竿抬着走。在一队新兵中，还有一位妇女，也由他们抬着行进。新兵没有个人的东西，每一队的炊具和口粮都由他们分摊负运，有人告诉我，在这条路上，不断有四川新兵北上。1942年10月，我在这同一条路上曾看到许多批新兵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行进……

据报道，36军的两个师5月间经天水西进，去围剿当时活跃在甘肃中部的土匪。据说，这些部队已把土匪包围在甘肃中南部地区，此外，还有新兵不断经天水西行。

天水到兰州之间的所有城市看来都警卫森严，也许是由于当地动乱不安。

B. 部队的处境

在四川，特别是成都地区所看到的部队的物质条件，总的说还是不错的。在陕西和甘肃，不管是新兵和老兵，物质条件就

很差了——如此之差，以至有时候简直可以把他们叫做叫化子兵。

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新兵的这种悲惨处境是如此普遍，以至成了外国人和中国人议论的普遍话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向你讲述好几个“可怕的故事。”

在茅台子关（在双石铺以南的公路上约有5000英尺高的一个并不险要的关）下面6公里的地方，一队约100人的新兵，因精疲力尽而死去了两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在我乘坐的卡车驶过时被拖到了路边。另一个还没有完全断气，头朝下躺在一条沟边上。两个因长途跋涉也骨瘦如柴的，显然是被派遣去抬他的人，无动于衷地呆望着他。

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得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据报道，在双石铺一天夜间有60个士兵死去。大多数尸体都未加掩埋，沿途经常可以看到死人，有一些被投到河里。

这条道路沿线一直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流行。在水，新兵被安置到居民家里，因为他们历来住的房子已改作为传染病中心。在宝鸡和双石铺，斑疹伤寒相当流行，从四川带来的疟疾在陕西相当普遍。

中国人自己并不隐讳地说，新兵饿死是因为军官克扣了他们的口粮。我曾看到他们吃饭，除了米饭之外一无所有，一个经常存在的问题是，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抢到很多，而体弱有病的人则吃到的很少。在广元，我看到一群新兵围攻一个跛腿的卖糖果的小贩，他被推到一边，糖果几秒钟后就被一抢而光，押送的人不管不问，直到事情过去。然后，他们朝几个人肚子上踢去，并用枪托打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显然是饥肠辘辘。

在兰州，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病号兵被带着去医院或诊

疗所，大多数人都几乎走不了路。可是，每一批都有一两个荷枪的人押送。

每一个传教士都碰到过开小差的士兵要求给以保护和帮助的事，传教士们不得不拒绝这种要求。一批被强迫入伍的河南难民告诉一个外国人说，在前来甘肃的路上，他们有一半人死去了。在兰州的中国内地布道会的院子，后面紧靠城墙，有好几个士兵设法开小差，从城墙上跳到布道会的房顶上，然后逃走。最后，当局沿城墙内筑了一道墙，以防止这种逃跑。夜间检查客栈和居民住宅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查获没有适当证明文件的人，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是逃兵。有些传教士碰到过官阶高至陆军中尉的开小差的人。

谢伟思的旅途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国民党军队的悲惨状况：装备不足，给养不足，疾病流行，训练很差，领导无方。由于地方军阀个人的军队和政客将军们的军队合流，使军队越来越膨胀，军事上也代表着国家财力的极大消耗，它耗掉重庆政府岁入的80%。不管是像史迪威将军这样的美国军官，或者是国民党中少数进步的有军事头脑的军官如陈诚（后来当了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的副总统）等，都建议裁减、缩编中国的军队，以提高素质，并减轻人民负担。谢伟思在下述报告中说明了为什么这种作法会是可取的，而又为什么没有实现。他在论证中对缠挠着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不可救药的痼疾，作了精辟的概述。

未必会接受裁减中国军队的计划

1944年3月19日

档案页：890.20/802

供参考的备忘录*的第二页报告说，中国人士正在议论把中国军队从现在的规模裁减一半的计划。

关于这一计划的讨论至少可以回溯到1942年秋天。据悉，那时候陈诚将军就积极主张裁减军队。外国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员也曾提出这种主张，外国官员在同中国朋友进行非正式交谈时也予以默许。

有好几项论据可以支持中国裁减军队。

1. 装备、训练、医疗和给养标准可以更易于得到改善。至少对很大一部分军队来说，在这些方面中的很多方面，目前的标准之低是惊人的。一支规模虽小些，但吃得好，训练和装备好的军队，当会比目前营养不良、装备不足的乌合之众，具有更大的战斗力。

2. 可以减少目前对勤劳的中国人的无谓消耗。抗战七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土地。这数以百万计的人过去没有有效加以利用，现在也没有。他们无所事事，他们的队伍因疾病、营养不良和逃亡而变得大大削弱了。他们的人数之多使他们成为

* 这里所提备忘录是指1944年3月16日题为《五花八门的消息》的参考备忘录。该备忘录不知去向，因此，本书内没有刊印。

他们所驻扎地区人民的祸害。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如果把很大一部分军队遣散回农村，他们对国家会发挥更大作用。

3.大大裁减军队除了能帮助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生产水平这一经济价值外，还能够节约预算支出，从而可能缓和通货膨胀。

4.从政治上来说，裁减军队的好处可能是非常重大的。农村普遍动荡的两个主要原因是残酷的征兵和征粮。裁减军队可以减少这两个方面的不满。

5.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此机会解除那些忠诚或能力有问题的司令官的职务，并裁撤这样的部队。

尽管有这些证据，就中国具体情况说，可能还有一些原因，使得看来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规模作激烈的裁减。

1.征兵可以得到法定的好处，其中包括：底层的保甲长可以惯常地为免征而收到贿赂（有时年年从同一个人得到贿赂）；部队指挥官可以让受雇服役的新兵开小差，以再次受雇服役，而这些指挥官则分享他们的卖身钱；负责征兵的军官从每个新兵那里得到大量馈赠；军官克扣新兵的粮饷等等以饱私囊，而使新兵饿馁致死。这种恶劣的作法是很普遍的，到处都可以听到怨愤声。在中国的制度下，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1943年，在西北地区一个新兵的价格是9000元，1942年秋，在饥荒遍野的河南，甚至也要4000元。^{*} 农民陷于绝境，他们甚至宁愿出卖他们的土地，也不愿意当兵，因为新兵的悲惨处境使人们认为必死无疑，这种情

^{*} 数字显然有误，谢伟思在前面有关河南饥荒的报告中，说一个新兵要2千元。

况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变化。这可能造成了另一个与征兵长期进行下去有利害关系的阶级：拥有资本的乡绅和商人希望购置土地以弥补通货膨胀之害。

2. 另一个障碍是谁的军队应予裁减的问题。中央政府可能最感兴趣于裁减各省的旧军队。但是，这些军阀的势力主要依赖于他们的军队。抗战迄今，中央政府一直以改编、调赴前线作战以实行隔离和损耗等办法，来减少他们的实力。这些办法只取得了有限的效果。这些军阀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是很微弱的。如果采取激烈行动，他们可能自行其事来招兵买马。对中央政府在各战区的主要长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程度可能轻一些。这些司令官都眼巴巴地盯着委员长离开舞台以后的将来，他们在各自的战区培植自己的势力，使自己成为半独立、半自给的都督，中国人普遍称之为“新军阀”。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至少他们可以说，他们一直坚持在广大的游击区对日作战。

3. 最后，毫无疑问，如果中央政府不能裁减这些潜在的反对势力，它也不会考虑裁减自己的军队。归根到底，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于它的军事实力，这一切归结起来是如下事实：中国的不完全的统一，持续的权力斗争，普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

中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的生命很不值钱；贪污腐化成风而且根深蒂固；经济一向被忽视而且不懂经济；权力来于军事实力，而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尺是人员的多少；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向不为他们的统治者所关心（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可能除外）；在这里，基本的、压倒一切的考虑是权力斗争。

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的国家之前，看来没有任何希望来裁减“中国的祸害”——它的军队。那个时间还很遥远。

军阀和伪军

正如前面的报告所指出的，由于存在大量旧式军阀军队，而这些军队对蒋介石的忠诚又是大可怀疑的，因而国民党的军队受到很大削弱，蒋处理这些军队的办法是相当典型的：把他们调离他们的家乡基地，送到前方同日军作战，以消耗他们的实力而使中央政府的军队取而代之。作战最英勇的部队莫过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统率的桂军；但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援，中央政府把美国的军援都贮藏起来给自己的部队了。其他军阀的部队都走捷径：投降日军变成伪军，或者就地与日军言和。谢伟思写了好几篇报告，阐述各种各样的军阀战略，他的报告既像学者的研究和分析性作品，也是坦率的政治报告的范例。

在各种军阀军队中，最为人知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统率的桂系军队。1945年3月，桂军的实力消耗到最低点时，谢伟思开始着手写他的报告，他综合了他在战争最后几年中累积的材料，以及1943年陪同一位美军工程师到广西勘察联接中国和越南的公路时，在广西旅途收集到的材料。因此他能够指出，蒋介石这样做也许能加强他自己的力量，可是却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一支更能作战的、爱国的军阀军队的支持。

蒋介石对桂系的处理

1945年3月21日

美亚文件：1434—39页

概要：桂系的解体，桂系领导人政治上被巧妙地分开；桂系军队被派到前线作战，但得不到充分的补给，而且远离家乡；而日本人的行动也肯定起了作用。这就是蒋的手段的一面镜子。蒋企图利用这种手段，通过削弱其他一切派系来增进自己的势力——他把这叫作团结。但是，这实际上增加了不团结，而且丧失了进行最有效的作战努力的可能性。概要完。

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进攻后，在中国现代史上爆发了空前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热潮，全国都重新集合在蒋和中国政府周围。一切敌对的集团都捐弃前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

那些急忙提出要为蒋和国家效劳的人——和他们的军队——之中，有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他们一直是蒋的老对手。全国都为他们从此忘掉他们长期以来的宿怨，而向他们致以敬意。

可是，看一看桂系这一爱国姿态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是有意思的。蒋是否忘记了他对这些老的——也可能是将来的——对手的不满。

* * *

广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中，李宗仁地位高于白崇禧。李被指派

率领部队去前方，而地位较低的白崇禧却被授予副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较高职位。

这一职务不直接统率部队，可是接近“核心”。因此，白大受鼓舞，以为可能真的会飞黄腾达。这样，他就成了总参谋部政治的一个参与者——显然是一个弱者，忝居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之列。他们曾经想，“如果领袖遭遇不测，”他们可能就会成为幸运儿。

这样，作为桂系顶梁柱的两个领导人，就被分隔开了，而且在他们之间制造了摩擦。打那以后，人们一直不把李、白看作是伙伴。

在中国军队中，桂系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是比较好的。他们早期同华北军阀、蒋介石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中，表明他们曾经是优秀的战士。因此，他们在前线——但是在扬子江以北远离他们本省的地方——总是有幸被置于重要战斗阵地。他们在台儿庄和徐州战绩辉煌，但自己伤亡也很重。

这就勾画出了典型的对待地方军队的图象——把他们调离他们的基地，同其他部队掺合在一起，把他们置于由于他们是“外来人”因而不能与之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的居民中间，并且派他们充当对敌作战的突击队。

但是，桂系的历史并未到此完结。

1938年秋，汉口显然难保了。他们看到他们将会被切断与本省的联系，因此，广西军人向委员长要求准许他们撤到长江南岸。他们从这里可以通过湖南与本省联系。他们还可以从南、北两面抗击日军的进攻以保护广西。可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

* 何应钦是蒋的参谋总长，在1944年11月前，还兼任国防部长，胡宗南和陈诚都是黄埔系的头面人物和国民党军队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战地指挥官。

相反，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驻留敌后，并在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表面上看来，他们在这里会处于威胁汉口后方的地位。而实际上所以要据守这一地区，是因为在30年代初的内战时期，这里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重要中心，而且共军已有迹象表明要卷土重来，以便最终控制所有日军占领区……

将领们别无选择，而只能率部队驻守，并要设法维系住部队。但是，在有可能时，他们也通过与占领区作生意或“克扣”军饷搞自己的好处。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军心涣散。

被迫生活在几乎荒无人烟的相当贫困的地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并不好，也不能期望是好的。苛征暴敛和过度的征兵，使人民无意于生产，并把军队视为他们的敌人。

处于困难的环境下，得不到给养和装备，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都不断下降。开小差的不断增加，使得维持部队都很困难，还谈得上什么战斗力。

下级军官只要有就会就开路。南去的人也有少数慢慢回来的。他们的遭遇和态度一点也不能缓和人们的思乡之情。1943年我在广西时，曾碰到几位下级军官，后来混得很熟，他们都强烈反蒋，并抨击中央政府。

在这同时，中央政府控制了广西。它马上取消了行之非常有效的农民自卫队制，这一制度本来是要使每个身体合格的人接受军事训练，而且在抗战开始前不久的反蒋时期，是桂系补充兵力的重要来源，农民自卫队的武器被政府收缴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桂系军队不管是在北方（李宗仁在那里当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还是在广西，都以在补充兵员和分享中央政府的补给方面“关系不好”而出名。1943年底，广西明显要遭受公开进攻了。

因此，毫不奇怪，这种不满发展成了在广西省省会桂林成立了一个以李济深为首的叫作“西南集团”的组织。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把李济深调离委员长桂林行辕主任的职位，而“晋升”为军事顾问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设在重庆，级别虽高，却无所是事的机构。李以各种理由拖延履新，在桂林坐以观变。西南地区的反对派运动蓬勃发展。

1944年初，日军对湖南和广西的威胁增加。但是，蒋对李济深和中国最善战的将领之一、第四战区（包括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心怀疑虑，可是他与李关系密切。蒋甚至对薛岳*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声望也心存疑忌。

白崇禧被派去收拾烂摊子，完成不可能完成的挽救广西的任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因为白的故乡是广西，是一个合适人选，实际上是因为他已投靠重庆阵营，被认为“可靠”。失掉他自己的省份的过失不会促进白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完成的。而且做不了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他的司令部从未予以正式命名，增援部队很少，很慢。

美国的司令官们对局势之严重都感到吃惊。可是中央政府说它有足够的部队和补给。把装备运给薛岳的努力受到阻挠，虽然时间来不及。当日军的攻势最后威胁到铁路终点站独山的时候，数以万吨计的未用过的装备不得不加以破坏。

不管是真是假，作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由日本人来为蒋清除他在西南的反对派，他是不会感到遗憾的。……

李济深和他的一部分人，实现了他们制定的南撤到广西——广东边境的计划，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击区。在著名的十九路

* 湖南省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总部设在省会长沙。

军指挥官蔡廷楷的军事领导下，游击区正忙于组建一支新军，并企图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工作协议，学习他们动员人民的方法。它同重庆的关系是实际上的独立关系。

这个新的集团现在希望得到美国的供应。从战略上看，它占据靠近海岸的地带，在日军的后方，接近交通线。对我们来说，军事上完全有理由给他们以援助。蒋现在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预料，他将继续……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北方的处境是不愉快的。他的第五战区损失惨重，1944年春日军在沿平汉铁路发动的攻势中，把五战区切割为二。他的部队被消灭并不奇怪，因为补给很差，士气不振，并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驻守和平汉路以东大别山地区的一部分部队，已被完全切断了联系。

尽管有这些“守门犬”部队，五年来共产党人还是能够重整旗鼓，并且稳步向汉口周围扩展。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现在情况是更糟了。平汉路以东整个地区已处在日军新战线后面，根据共产党人的定义，现在已经是他们开展活动的合法地盘，大别山的李宗仁部奉命制止共军的扩展。他们至少作了半心半意的努力，有些零星战斗发生。当李部进攻一支共军时，有一位美国军官正同这支共军在一起。……

日军进攻广西打破了西南集团，使一部分人从事独立的反蒋游击战争，这种发展使蒋介石更容易采取他的下一步行动。李宗仁失去了政治基地，变得更衰弱了，也没有必要予以安抚了，中国人士说，他不久就会遇到麻烦。

他们说对了。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并且被以类似的方式“晋升”为委员长汉中（陕西南部）行辕主任。名义上，这个职务权力更大，因为一般认为它意味着管辖好几个战区。实际上，它毫无意义，因为它不直接指挥

任何部队，前方军队接受重庆的命令。

* * *

蒋现在可以感到舒服一些了：桂系看来已经完蛋，但是完了吗？一个省丢掉了。该省的人民和士兵都极感愤慨。以李济深为首的自由派，学习共产党人的作法，在日军后方蒋介石力不能及的地方组织人民抵抗运动*。这要加以认真考虑。

蒋可以向他自己祝贺说，由于巧妙地瓦解了——日军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进一步推进了“团结”。可是，结局是真正的团结吗？

* * *

蒋介石手法的这一例证是有趣的，不是因为它是如此赤裸裸和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性结果，而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他对四川军阀、东北军、冯玉祥部，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一手法。

至少自1927年以来，蒋就一直奉行这个总的政策。由于他自己力量不足，他企图用这种办法在中央政府之外的各集团之中和之间保持均势。一旦某一领导人被剥夺了军权或政治实力之后，他就会被晋升到毫无意义的高一级的、但没有实权的职位。

这种彻头彻尾地、恶毒地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法，看来是蒋介石能够作的唯一选择。中央政府由于本身力量不足，从其狭隘眼光看来，它唯一的希望就是削弱——使其保持软弱和不团结——一切反对派集团。对蒋来说，“团结”显然意味着控制。

不幸，这种政策的代价是巨大的。全国不能在这种基础上真心实意地团结起来。没有任何人比中国人更精于此道了。这对抗

* 李济深组织游击战争抗击日军的计划，从未形成大气候，但这些计划导致他与蒋介石的最后决裂。1947年他逃到香港，呼吁结束国共内战。这导致国民党把他开除出党，1948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己任主席。孙逸仙夫人任名誉主席。共产党征服全部大陆后，李作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统一战线组织中任职，直到1959年逝世为止。

战造成的后果是，它使地方集团确信，只有傻瓜才会在对日作战中去牺牲他们的部队和放弃他们的政治基地。

对于同日本正在进行浴血奋战的美国政府来说，中国战场成了一个屡遭挫败的战场。这些挫败有许多都是由于中国军官率部投敌，转而替日本人作战。重庆政府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一再提到这一现象，而且引证事实和指出具体人名来支持他们的说法。自然，日本人可以把这种叛投说成是中国人越来越效忠于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迹象。共产党人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说明：他们说，国民党蓄意指使它的前线将领叛投日军。他们的这种说法是贴切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有一项宏大的计划，要在中国被占领的地区部署一些反共部队。在日军投降后，这些部队就可以防止占领区落到共军手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是又一个例证，说明国民党更着眼于将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而不是注意当前的对日战争。谢伟思承认结局可能正如共产党人所指出的。同时，他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就国民党和军阀军队变成伪军的事，写了下面这篇引人入胜的报告。

中国军队领导人愿意当“伪军”

1943年11月3日

国家保密件

据中国共产党人说，现在在中国至少有60多万伪军，大部分在东北各省。其他可靠的中国人士认为，至少有50万。这个数字

还在不断增长，部分是由于在被占领区进行征募，但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的部队一批批地叛投日军，有时甚至整师、整军投敌。同盟通讯社*最近报道了好几起这种事例。

名义上来说，这些部队是投向了中国人，这就是说，在南京的（汪精卫）“中国国民政府”或者华北政务委员（王克敏）**。自然，实际上他们是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有日本军官监督他们，他们与日军协同作战；他们协助日军守卫交通线和担负警戒任务。他们之中有很多部队被编组为“皇协军”。他们的任务无疑是帮助日军驻防和扼守占领区，以减少在这些方面所需要的日军。可是，这种用处是有限度的：日军还要警戒伪军。

中国军队自愿效力敌人自然使中央政府的宣传处于尴尬境地，这种宣传企图使全世界看成象俄国一样，是一个正在与外来入侵者进行殊死、英勇战斗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宣传一贯地缩小伪军的人数，掩盖他们的性质，把他们说成是“满州人”，“朝鲜人”或“台湾人”。举例说，参与1943年6月鄂西攻势的非日籍部队，就被说成是上述那些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有如此多的大部队叛投了日军，因此，很明显，这些伪军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帮助打破了伪军不是中国人的神话，他们经常报道说，有些曾被认为投靠其主子成了“汉奸”的伪军，又反正到中国方面。

由于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为世人所知，中国的宣传不得不采取某些变通说法。通常采取的方针——举例说，我曾听到重庆政府电台英语节目的广播——是：国军陷于孤立无援（通常是在华北），受到日军猛烈进攻，经多次浴血反击力求突围，可是，中央政府的援军和补给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在弹尽粮绝之后，

* 日本的官方通讯社

** * 日本人在华东和华北建立的伪政权

受困部队别无他择，不得不向日军“放下武器”。一个通常的修饰词是，他们不得不投降是因为他们受到日军的背后进攻，我在一次广播节目中还听到大力赞扬庞炳勋将军“英勇”战斗。他率领他的整个集团军投靠了日军。广播清楚暗示，此事责任在于中国的盟国，因为他们未能向中国提供足够的飞机。

可是，这一报道没有能够解释对西方人来说难以理解的不愉快的事实，即中国军队不但投降了，而且变成了汉奸。共产党人对于叛变行为的观点，同大多数中国人相比，更接近于西方人。他们曾经公布了一份58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中央政府的将军及司令官。他们投靠了日军，现在正在统率着伪军。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投敌都是得到承认，并且是众所周知的。

实际上，除了变成伪军之外，看来还有好几条道路可以选择。共产党人声称——没有证据驳斥他们的说法，在大致相同的地区作战的他们的部队，没有一个成为伪军的。

第一条选择是，如果中央政府的军队处境困难，他们可以与共产党部队合作，或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共产党人说，他们对此表示欢迎，而且从来没有拒绝过这种合作。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们实际上用这种合作的办法，援救过中央政府的部队。

其次一个选择是，可以采取共产党部队的作战方法，以小股部队同当地人民密切合作，进行极其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共产党部队采用这种办法，使自己能够在6年多的时间里，在同一个地区存在下来，并坚持某种形式的抗战。

第三种选择是，如果继续作战已确实成为不可能，就干脆缴械投降，当日军的战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采取这些作法？为什么整个大批部队显然是准备好了似的投靠了日军？

中国人的通常解释——很多中国人都相信，他们希望外国人

也相信——是，这些伪军仍然是忠诚的；他们只是吃日本人的，用日本人的，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起而反对他们的主子，并重新回到中国怀抱。这种说法对不喜欢作不必要的牺牲的中国人和深谋老算的中国人来说，是投合他们心意的。但这只是偏袒的解释，而且太过于简单了。

共产党人的通常解释是，大批部队整个投向日军，是中央政府的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在抗战结束后重新取得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华北游击区的控制权。共产党人指出：（1）中央政府现在没有能力在华北日军后方地区保留部队。因此，一旦日军撤退，整个华北就会由共军来占领。中央政府的部队变成伪军后，就可以进入这一地区。一旦日军撤退，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队就可以继续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日军现在在华北套在脖子上的同一个绞索。（2）中央政府的军队变成伪军以后，他们就不再因为与日军发生磨擦而受到消耗，相反，他们能够壮大自己以准备内战，日军不仅容许他们得到一切装备，而且他们可以驻守在较富庶的占领区。因此，在共产党人看来，这种“大批的伪军化”是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为反共而进行的特殊的合作。因此，共军一有可能，就向伪军发动行攻。

共产党人的担心是有一些根据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战争结束后，伪军将与中央政府的军队合作，共同消灭共产党。他们承认现在与伪军有接触，并暗示这种合作业已存在。无疑，很多中国人都预期战后会有所和解，包括大多数现在的伪军将受到宽恕；他们实际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伪军来打共产党人。*

也许还可以争辩——虽然只是建立在纯理论的基础上——

*当然，这种希望和预期被证明是很有根据的：事实上，大多数伪军都参加了国民党在对日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反共内战。

说，日军愿意接受这些安排，其理由如下：日本人已预见到在中国最后的败北。他们对共产主义怀有最大的恐惧，他们宁愿在中国存在一个国民党政府，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同一个纯粹是共产党人的政府相比，可能比较软弱无力，而且更愿意同日本人合作。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共产党人变得强大到足以推翻国民党政府，或者建立一个单独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华北——自然是日本最感兴趣的地区。这样一种事态发展会对日本特别不利，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俄国支持或者与俄国密切联合的话，而这一点看来是很可能的。因此，日本人帮助国民党，使其能够成功地对付共产党人，对自己来说是会大有好处的。给予这种帮助还可以指望从中央政府得到较好的缔和条件，并为战后同中国的合作——从日本人的立场看是必要的——奠定基础。的确，反共而不是进攻重庆，现在已成了日军——当然也有伪军——在华北的宣传的主题。伪军在反共方面比中央政府的军队更积极。

然而，对于“伪军化”的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种解释太一般化，而且过于深奥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可能是对的，但并非全都如此。就国民党而言，在华北建立一支最终会被国民党所用的反共军队，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态发展，而不是国民党勾结日本人策划的一个深谋远虑的阴谋。因此，上述解释只是更多来说明它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分析其原因。

那些饱富经验的政治观察家，愿意坦诚讨论这些问题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些背景因素，看来这是符合实际的。这些因素可以简短概述如下。

总的说来，把旧的地方“军阀”的残余部队派赴前线 and 前沿孤立地区，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固定政策。这一政策是要达到两个目的：（1）保留训练和装备通常都比较好的中央政府自己的军队；（2）消灭瓦解这些异己军队，他们过去曾是对国民党权力

的威胁，将来可能还会构成威胁。确实，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这些变成伪军的大多数司令官和大多数军队，都是军阀时代的余孽。很多是于学忠统率的东北军的残部，他在中国各地辗转十多年，还有很大一批属于国民军（一度由冯玉祥将军统率），例如庞炳勋和孙连仲将军，其他如齐燮元和石友三，则属于旧的地方军阀集团，他们都出身绿林。

参考一下这一背景，他们愿意变成伪军就更容易理解了。

首先，这些军队的司令官以及他们所统率的士兵，都不愿意再继续进行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无望的战斗。他们不是日军进攻的对手，这些军队领导人近几年来名义上虽然站到了中央政府一边，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变成真正的国民党的人。相反，他们过去都同国民党打过仗。下层军官从未受过坚强的政治教育。如果是从军阀时代过来的那些人，多是来自流氓地痞和社会渣滓；而新征入伍者，则是被迫服役。如果是自愿兵，他们签名应征是舍此而别无生计。再不就是出身绿林。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多少民族感，也没有坚苦卓绝战斗的热情。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不信任国民党，怀疑中央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他们充当牺牲品。

其次，谈不到与共产党人合作，因为这些军队的领导人过去都有强烈反共的经历。地方军阀追求个人的权力和财富，他们通常都与当地的地主乡绅阶级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不断受到共军的进攻。军阀和共产党人不能合流——即使面临着同一个敌人。

第三，他们不采用共产党人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作。这些军队领导人军事水平一般都很低，没有受过训练，不按游击战的方针来思考问题。他们所统率的军队也不够坚强有力。更有甚者，由于他们对人民的态度，他们无法得到胜利进行游击战所必需的人民的支持。他们都是些雇佣军，旧时代，驻守城

市，过着悠闲的生活，而且脱离人民。到贫困和人口稀少的山区和湖沼地带进行艰苦的游击战，对他们来说一点也没有吸引力。

最后，他们所以愿意变成伪军，并且必要的话，愿意为日军卖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雇佣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他们军饷少得可怜，给养和装备都不足。对于那些远离中国主要后方、物质上处于孤立无援地区的军队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军队的领导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高官厚禄的许诺。向士兵们提出了增加饷银，改善伙食和给予更多武器的建议。不但如此，他们投靠日本人后还可有机会戍守较大的城市和较富庶的地区——都在日军占领之下，从而可以过较好的生活。他们帮助和追随日军，还可以有机会进行抢掠。举例说，一位中国作家，在描述鄂西战斗时曾报道说，伪军的抢掠比日军还厉害。在山西的艰苦战斗地区辗转几年的传教士也谈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士兵们愿意追随他们领导人变成伪军，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除了优厚的雇佣条件外，这些军阀部队都是“个人的”部队，他们只依附于他们的领导人。

当然，这些军队没有投降和变成战俘，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对日军来说，投降是不会被接受的。一大批无所是事的战俘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他们要求士兵能为他们干事。但是，实际的投降可能甚至双方都未曾考虑过。在军阀时代的中国，没有投降这回事。如果一个军队领导人确定他已处在失势的一方，或者觉得他能获得足够的益处，他就会率领他的部队投向另一方。在中国，情况并没有很快发生变化，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司令官通过做生意或者更直接的渠道与日军或日军控制下的伪军进行接触，一旦达成满意的安排——可能以军事上加以消灭作威胁来支持这种安排，依附关系就改变了。

如果这是对军队伪军化的主要解释的话，自然就产生一个疑

问，这些军队，如象中国人所期望的，不管是在起而对日作战或者作为打破共产党在华北的控制方面的一支力量，究竟会有多大用处。

答案可能是，使他们愿意变成伪军的因素也降低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价值。他们是雇佣军，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对国民党的事业三心两意。

作为一支抗日的力量，必须认识到，日军并不是如此愚蠢，以至容许他们（伪军）变得强大。因此，他们的装备仍然很差，而且被编成较小的部队分散到各地。他们可能期望重新回到中国方面，但这只会在日军的败北已实际到来的时候才会发生。

作为一支反共部队，必须记住，他们的领导很差，部队的素质很低。他们的领导思想上可能愿意进攻共军，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们的军队是他们谋取权力的基础；他们不愿意看到那些军队被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消灭。至于士兵们，他们现在像过去一样，对于艰苦的战斗毫无热情，他们与受过良好训练和政治教育、得到人民支持、为生存而战的共产党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抛开他们在中国局势中所注入的复杂因素不算，他们在执行卫戍任务中对日军提供的相对小的帮助和他们作为日军的爪牙所进行的抢掠，使很大部分中国伪军可能无足挂齿，60万这个数字，不是像看上去那样可怕。

有好几个中国军事领导人同他们所面对的日军达成了局部和解，而没有成为公认不讳的伪军，其中最著名的是山西省长期以来的太上皇阎锡山。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关切他在战时与日军进行的交易，因为阎控制着紧邻边区东部的地区。

1945年春谢伟思在延安的时候，确定无疑地证实了阎锡山确实同日军实行了合作，与此同时，甚至他还保留着他在国民党军事结构中的地位。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交易

1945年3月20日

美亚文件：1427—30页

概要：共产党军队缴获的文件和被俘的阎锡山军的将领对一位外国观察员发表的未经检查的谈话，确切无疑地证明阎与日军保持着关系，中央政府无疑知道这种情况。概要完。

所提到的我在1944年8月左右写的那份报告，*报道了山西省主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两者都属中央政府管辖）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和共军之间的冲突。在那篇报告中，我提到共产党指责阎同日军保持着密切关系。

共产党人声称拥有的证实他们所说阎与日本人有交易的文件，在我离开延安之前实际上还没有送达延安。它们被借给了斯特勒上尉以供拍照之用，据悉，副本曾送交野战司令部。有人告诉我，这些文件中包括有被缴获的阎的军官和日军司令官之间来往电函的原件。这些文件涉及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冲突和谈判，而且清楚表明阎与日军之间存在一项协议，允许阎的部队到某些特定地区作战，包括向同蒲路以东扩展地盘，这样就会使他们同已经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共军发生冲突。据说还有一份用正式的日军

*这一报告所署日期为1944年8月19日，标题是《共产党人对阎锡山将军的指责》，见美亚文件767—76页。

密码写成的全面协议的副本，但是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可资证明。

除了这些文件证据之外，还有被共产党军队俘获的阎锡山第61军一位少将（一星将军）的谈话。他是在1944年春随军穿越日军占领的同蒲铁路时所发生的战斗中被俘的。这位军官最后被送到了延安，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而且享有几乎是完全的自由——也许是由于他愿意承认他的错误。在他逗留延安期间（后来由于他的家属受到威胁，他被允许返回阎锡山那里），他会见了密歇尔·林迈可女士，当他获悉女士的父亲从前是山西省政界和军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后，他拜访了她和她的丈夫（燕京大学的前英籍教授，1941年12月7日逃出北平），拜访时气氛很好，最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这位军官谈得相当尽兴，且“毫无拘束”。谈话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林迈可先生形容这位将军是一位明智、坦率和真正爱国的人，年约30多岁。他认为他的谈话是坦率和诚实的。下面是他的谈话的要点。

1941年夏秋，日本人曾试图说服阎锡山出任华北政府的首脑。这是在中国军队在中条山（晋南）遭到毁灭性损失和德国进攻俄国之后。中国的局面是阴暗的。阎对日本人的建议作了认真的考虑，因为他预期日本会进攻俄国，轴心国会很快取得胜利。

（我记得大约在这段时间里，在重庆有很多谣传，对阎究竟站在那边表示怀疑）。可是，阎犹豫了一阵子。同时，珍珠港事件使中国的前景变得终于看好了。

于是，日军对阎军发动了一次不大的战役，虽不是很严重，但足以吓住他，并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军队造成重大损失。1942年春的这一战役，是日军与阎军之间所进行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战斗。

在实行了军事惩罚——并没有投入太大的兵力——之后，日

本人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得出结论，对阎来说，公开投靠不是有利时机。因此，他们建议进行秘密合作。他们的算盘打对了，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一协议仍然是目前关系的基础。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避免发生敌对行动，只在特定地区活动；阎抵制共军对他所属地区的任何蚕食；他通过派驻太原的一位代表与日军保持联系；阎的属僚参加山西省的一些傀儡组织。现在，山西省有23个伪县长实际上是根据这一协议而任命的阎锡山的人。

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阎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贸易公开进行，阎能够从太原得到他所需要的某些物资。山西的日军司令官实际上还拜访过阎锡山（1944年6月，阎在会见一批外国记者时承认了这次会晤，但是，他辩解说，这是因为他和这个日军司令官是同一所日本军校的毕业生）。日本人还对这次拜访拍下了照片，显然是想在阎公开成为傀儡时供宣传之用。阎知道会作某种形式的宣传，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拍照时穿了一套便服。照片的副本后来被弄到了重庆，蒋介石要阎作出说明，阎回答说，照片上可能不是他，因为自从“抗战”爆发后，他就只着军服，而没有穿过其他服装。

1944年1月，重庆作战局局长，也是山西的一个老军人徐永昌将军到达阎的司令部（徐此行当时在重庆为众所周知）。徐建议阎军调往山西中南部，中央政府然后派兵从潼关以东渡过黄河，两支军队形成钳击之势，以收复中条山。

阎锡山同意了。但是，强行移防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作要越过日军占领的同蒲铁路。这会违背他同日军达成的谅解，而且会招致报复——这会使事态发展不可想象。因此，他就把事情提交了日本军方，理由是这样就能够夺取当时在共军控制下的土地。与此同时，他自己装得好象他服从中央政府的计划。

日军显然并不担心中央政府从河南向北进军，因为他们已经

在策划在河南的攻势，因此，日军同意阎的计划，并对要由阎军占领的新地区作出了具体安排。

然后，阎于1944年1月16日到20日召集了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被俘的这位将军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说明了这一计划，并即着手准备“进攻”。

阎的第61军被指定担负这一任务，实际上，直到3月它还未准备就绪。“战役”很快以滑稽的作战方式开始了。为了看上去像个样子，并给人以“强行”越过同蒲路的印象，61军计划在夜间越过铁路，并制造一些虚假的战果。可是，日军另有想法，坚持要该军白天过铁路。因为在大白天日本军官可以欢迎他们的中国兄弟，并且在他们穿越日军占领区时给他们以食物慰劳。他们没有放弃拍照的机会以纪录下中——日合作的这一热烈场面。

阎军接管新地区时还涉及解除一些日军据守的据点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又被驳了“面子”。他们曾要求进行一些装模作样的战斗，然后日军撤退。可是日军坚持要以同样文明礼貌的方式——同样给以慰劳和拍照。

阎的部队在临汾地区一越过铁路，就与共产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可是，八路军人数较少，且兵力不集中。在人数大大占优势的61军面前，不得不实行撤退，在这次战斗中，这位提供消息的人士被俘，当时他正指挥着一个团。

（最近在阎锡山军控制地区度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位美国军官报告说，不准他访问同蒲路以东的部队。他看到了阎与日军之间互相勾结的其他证据，并得出结论说，阎希望掩盖这一事实，即不经日方同意，是不可能越过日军据守的同蒲路来维持这些部队并向他们提供补给的。）

这位军官说，阎与日方的卖国交易在阎军的年轻和爱国的军官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是，他们无能为力。阎实行专横的独

裁统治，要求每个人都要宣誓效忠于他，其中有一项规定是，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吞食鸦片自杀。他还采用严厉的秘密警察手段，无孔不入地派遣特务。举例说，军官们的马弁、勤务，都必须由阎派遣。这些人在专门的学校受过训练，并且要向阎报告他们的主人的情况。阎的整个组织到处都是这类东西，结果是造成人们互不信任。他还采取一种由来已久的作法，即实际上以其下属的家属作人质，来进一步加强对下属的控制。

整个局势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现象是，阎一直与之作战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军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这支军队都是在他的统率之下，因为他是第二战区的头头，而朱德只是副手。虽然朱德在延安的总部的唯一牌子上写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总部”，可是，他与他的司令长官之间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对中国局势中的这些细微末节给予了过分的注意。所谈到的这些情况确是比较次要的，可是它们具有代表意义，而且它们所反映的情况具有根本意义。就这一具体事例来说，它们是如此真实，以至不能加以忽视。阎锡山的立场是如此明白，即使是最宽大为怀的人，也不能认为重庆不知道这种情况。

既然明白了阎所表明的那种态度和重庆跟它的同谋关系，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基本问题，以及内部的权力斗争优先于击败外来敌人这一事实。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我们在反轴心战争中的中国盟友，却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老牌法西斯独裁统治政权，这是一件使人尴尬的事，也是所有美国人都宁愿看到的事。由孙中山在1911年建立、自他1925年逝世后就由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政府、军队、秘密警察、报纸、学校和许多重要的经济机构。蒋在1927年对共产党发动了血腥镇压，从而使孙中山建立的与中国共产党结盟的统一战线遽而结束。在以后的10年中，蒋聘用德国顾问，进行了无情的剿共战争。后来，蒋自己的将领在西安扣留了他，强迫他重新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在后来的两年中，抗日统一战线执行得比较好，共产党从他们在华北的根据地集中力量展开游击战争，而蒋介石则在华南“以空间换时间”，慢慢撤退到了他的战时首都重庆。后来，在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冲突之后，蒋的军队在1941年1月进攻并消灭了新四军直属纵队，打死和俘虏各2000多人，新四军军长叶挺也被俘。虽然共产党在重庆继续保持着—个规模不大的办事处，并经营着一份受到严格检查的报纸（即重庆《新华日报》—译注），这一事件却标志着任何真正的统一战线不再存在了。

统一战线的结束影响所及，远不限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对手的存在，曾经使各行各业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其他不满分子自由表达他们的政

见。在1941年以后的年月里，发表不同政见越来越困难了，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倾向在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而在宣传领域最为明显。这一节是谢伟思在驻重庆大使馆任“三秘”时所写的关于国民党中国的宣传机构的无标题长篇报告的有关简短“背景”材料。

关于自由中国* 的宣传、心理 战和道德教育机构的备忘录

1942年7月10日

对外关系：1942，203—5页

II 背 景

要叙述中国的宣传和有关的工作，就要对近期的政治史和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加以简短回顾，要以此作背景。

这些因素中首要的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使它垄断了一切宣传，甚至是军队内的宣传。教育工作带有明显的宣传标志**。新闻受控制。一切宣传都具有政治特征，而且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延续国民党的地位。

其次一个有关因素是由于“统一战线”破裂而产生的局势。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与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言和，发展为

* 指国民党中国——译注

** 可以有理由把教育部称为最重要的、无空不入的宣传机构，无数的公开言论证明了这一点。教育部长陈立夫最近在对敌占区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就强调对青少年进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看来不直接属于本报告所论述的范畴，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它通过对教科书的审查和对初等、中等及在较低程度上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而表明它自己对它的任务、它的强烈的政治和国家主义的特性和它的影响的概念。（谢伟思原注）

抗日战争初期的真正的、显然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抗日战争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凝聚力。进行了认真的努力来唤醒人民和团结人民，作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日军占领区和靠近占领区的地区展开游击战。在这种自发爆发的热情抗战的工作中，中国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大多数都是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起了重大作用。许多人，甚至包括政府内部的人，在回顾这一阶段时，都认为那时政府是很起作用 and 有效率的。

由于无需细加论述的原因，大约从1938年秋政府从汉口迁出前后，出现了一个反动，国民党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显然疑虑重重，对他们和左翼分子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对新四军的进攻使这种镇压达到了顶点。这导致了目前互相猜疑和近乎敌对的局面。其结果是扼杀了好多过去曾经进行过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宣传工作，并使国民党的宣传带有了强烈的反共偏见。对国民党的某些派别来说，反对共产党已经成了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从这时起，反日宣传和对日心理战的生气与活力，已经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普遍的厌战情绪和经济困难造成的影响。经过5年战争之后，士气民心 and 热情都无可避免地低落了，首都现在处在远离前线的地方，而前线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战斗。交通、运输极端困难，难以得到供应，甚至纸张和印刷现在都成了大问题。通货膨胀使得各种费用大大增加，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曾一度能够或多或少进行工作的许多机关，积极性大大降低，再不就是变得死气沉沉。

不久前的一个新发展大大影响了在被占领区和海外中国人间的宣传工作，这就是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上海和天津的外国租界，并攻占了香港和“南海”的一些城市。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国民党津贴的报纸和广泛的宣传活动与秘密谍报活动，这些活

动中，有一些可能被视为是对日军及其傀儡进行的心理战。在日军占领这些地方之后，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马上被逮捕了，再不被迫逃离了，结果。占领区的工作，公认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第五个因素，在这里所以要提一下，是因为它增加了得出一个明确概貌的困难，就是中国人爱设立一些架床叠屋的机构，而又不明确规定它们的职能，或者说统一对它们的管理。我们发现，几乎政府的每个部和较重要的党组织都有自己的宣传或发布部门。尽管政府结构本来就很复杂了，而随着战争的进展和新形势的产生，在现有机构之上，又增设了新的机构，而且常常是一些名目不清的机构。举例说，最近建立的全国总动员委员会有一个“文化处”，大概是要倡导和统筹宣传以推动全国的动员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官僚机构的不断地膨胀看来增加了混乱，分散了责任，降低了主动精神和效率。

1943年6月，谢伟思乘卡车从重庆到兰州途中，度过了一段最丰收的时间，他看到并记录下了写在房屋和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和口号。他就此写出的报告虽然很长，但都是很准确、精练和引人入胜的。对这些标语、口号的内容加以分析，确实是一篇政治科学的作品。国务院对谢伟思的这篇报告给予了少有的高度评价之一“极好”。

从西北地区墙上的标语 看中国的宣传

1943年7月5日

档案页：800.20293/6

……(概要)第一节论述墙上标语在中国的重要性及所以如此

的原因。第二节是按主题分类的150条标语的名单。第三节是各种标语在主题和地点上的相对频繁出现，并且指出，除在甘肃省外，过去两三年来，这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已经减少。第四节专门谈到从事这种标语宣传的团体五花八门，其中提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这一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五节是初步试图对收集到的标语作出估价和分析。它指出：（1）所有的宣传都被国民党的党组织所垄断，但是许多标语中暗含有存在着对立面；（2）普遍使用的标语看来对人民没有号召力；（3）明显强调政治主题，很大一部分标语鼓吹领导原则、种族主义和党的至高无上；（4）相对来说，不怎样强调战争，论及战争的标语也略而不提世界大战，并且不采用一些合乎逻辑的宣传口号；（5）标语有时互相矛盾，含义不清；（6）不断使用一些旧的和没有想像力的标语，看来表明党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无效和糟糕的趋势；（7）某些主题和类型的标语的经常出现，暗示着国民党所面临的问题继续存在和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如：地方主义，各地的动乱，种植和私藏鸦片，回民的不满，反对征粮、征兵。

A. 说明

1. 为什么要研究标语

国民党一向很强调在墙上刷标语。这是在同俄国人合作时期开展的一项宣传技术。

除了它的简单明了、到处可以看到和经常背诵这些优点之外。这种办法看来特别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文字本身可以构成适于作标语的简练的短语，在我们看来，中文有极其广泛的内涵可

*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的“三项人民的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类似于纳粹的希特勒青年团或苏联的青年先锋队。

以作恰到好处的表达，而且这种方法在初等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就像在对群众宣传中所作的那样），把一件事物简化和凝缩为简短的警句，一再齐声朗读，直到学生能够记住为止。这种办法甚至在成人学府中也可以使用，例如在为党的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在重庆举办的中央训练团。另一个例证是中国人喜欢格言和谚语。最后，报纸比较少，而且发行有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报纸、戏院，新书和其他印刷品也很少发行。

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和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没有阅读能力，也许有人认为更宜于多搞招贴画。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受到限制，尤其是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很多宣传思想很难用招贴画来表达。中国的纸张质量很差，招贴画不能保持长久。没有相应的印刷设备，而手绘招贴画太费工费钱，且质量很差。另一方面，中国人很重视书法的形和美以及中文的含意。而且，一般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阅读能力，但是他天生的好奇心也会使他去探问刷在他房子墙上的，或在他每天必经的道路沿途突出地张贴着的那些字的含意。

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到处刷满了标语，而图画却很少看到，一般只有简单绘制的委员长像，或者一个大兵的像。在全国某些地区，面朝道路的几乎每个空墙上都刷上了标语，它们被刷写在城墙上，公路旁的岩石上和农舍四旁上。在西北地区，有时用红纸条写下来贴在前门的两旁（通常是引用一些古诗词或成语以示给房主带来好运道和财气）。在很多地方，人们垒砌新墙或盖新房时，都被要求涂沫一块粉壁，以供刷写标语。……

2. 包括的地区

列举的所有标语都来自四川、陕西和甘肃。1942年夏天到秋天我在这一地区旅行时，作了少量记录，然而，大多数标语是1943年6月5日到25日我从重庆到兰州时沿途所见，这次行程路经成

都、广元、褒城、双石铺和天水。只有极少的两、三条标语，非亲眼所见，而是由外国人向我提供的，这些外国人的中文知识是靠得住的。……

B. 标语分类

（这里接着是谢伟思所看到的150条标语的单子，并且说明了它们的常见度。这些标语的主题是从“服从领袖”、“服从最高领袖蒋介石”之类到反共标语“消灭卖国贼”，明确警告“种植鸦片者杀无赦”，或者温和地劝人们“每周至少洗一次澡”。）

C. 标语的分布、常见度和刷写日期

一般说来，在主要公路沿途，城镇的主要街道和大城市的郊区都可以见到标语。在远离公路的较小的村庄和农村地区，标语较少，在有些地方，则几乎看不到。

（谢伟思然后叙述了具体地区标语所采用的形式和刷写的日期的不同。）

很大一部分标语是在沿途所经各省看到的，虽然在某些具体地区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标语的数目可能超过这些标语，如像那些涉及鸦片和征兵问题的标语，但是，考虑到整个情况，这些标语还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标语。最普遍的一类包括下列一些：

服从领袖；拥护政府

服从最高领袖蒋主席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忠于党；爱国家

统一理想，统一意志，统一力量
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反攻；建国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好男要当兵
好汉要当兵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D. 刷写标语的机构、团体

最早的标语一般都不署名是那个单位刷写的。可是，署名的情况后来越来越多，现在几乎都署名了。

这些署名说明，刷写标语以作宣传的团体五花八门。在集镇里，看来大多数标语都出自地方党部（党的领导机关）之手。但是，在公路两旁和有军队驻守的城市里，很大一部分标语都是军队的党部或者有关单位的政治部刷写的。在村庄里，多是由当地村政府或保甲组织刷写。一个引人兴趣的变化是，特别是在县城里，很大一部分新标语都是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刷写的。到处都这样显眼地署上刷字单位，看来是对团本身的一种宣传，其数量之多似乎意在说明团的壮大和活跃。……

E. 总的评价和分析

把这些标语和有关材料的数量加以研究，就可以得出几种看法，把它们加以分析并对它们的效用加以估价。

1. 国民党垄断了标语，但透露存在对立面

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所有标语都是由国民党的机构——不

是地方的就是军队的——刷写的。任何其他党派不容许刷标语。举例说，甚至像西北公路局这种显然非政治性的组织，为了促进运输而刷标语以资宣传，也是由该组织的特别党部来进行。社会部的农村合作总社可以刷标语号召建立合作社，而却不允许“中国工合”这样作。

在特殊情况下，对立意见的标语确实出现了。举例说，最近在甘肃日益活跃的“土匪”在攻克一个集镇后，刷写了攻击中央政府政策的标语。我在沿线的马营看到少数残留的这种标语：“欢迎减轻人民负担”，“赶走中央军”。但是，中央军重占该镇后，马上就把这些标语毁掉了。

因此，没有反对派的标语，除了“服从领袖”和“实现三民主义”这类标语之外，没有宣传其他政策的标语。

然而，有意义的是，从许多标语中都可以看出暗含着遇到反对，或者在国民党所鼓吹的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主义。举例说，“蒋主席是中国的唯一领袖”，就意味着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实际上还存在别的领导人。“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是救国的唯一主义”这类标语也同样如此。

可是，这种对立面从来不指明。国民党是唯一被提到名字的政党。人们可以说，共产党从来不值得提名字。但是，在川北广元到褒城地区，这个规律存在唯一例外，在那里，反共标语仍然可以看到。^{*} 这些旧标语能够被允许保留下来，这件事本身就颇有意思。它们没有被除掉不是由于没看到，这一点可以由“统一战线”以后时期刷写的一两条新标语所证明，这些标语就刷写在那些没有触动的旧的反共标语的旁边。

^{*} 共产党在1934—35年曾占领这一地区，旧的反共标语无疑是在后来国民党重占该地区后写的。

2. 缺乏群众号召力

这种对宣传工作彻头彻尾的垄断可能不利于提高国民党在这方面工作的质量。从技术上来说，除了中国大多数人不能阅读这一事实之外，还可以怀疑的是，国民党现在所使用的这些标语口号，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影响人民群众并使他们理解和接受。

绝大多数标语都是文绉绉的形式和语言，而且普遍采用说教和武断的腔调。鉴于一般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受教育不多和缺乏政治意识或民族感情，因而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一点也不打算去作说服、解释或个别解释的工作。……许多标语是这样一类的内容：“完成国防科学建设运动”（不巧这一标语正是刷写在一个不大的村子近郊的一家农舍的墙上，而这个村子可能至多也只有一两个人会对这一标语的含意有点知识或了解）。最不实际的莫过于在川北一个小山包上的一座房屋的墙上，竟然看到用英文大写字母刷的标语：“军队需要你”。

有关征兵的标语占重要地位，而且形式多样，有些标语试图发出合理的号召力。例如：“建国先要建军；保家先要保国。”但是，大部分这类标语看来很难期望对一般人会有什么号召力，这些人面临着被强迫入伍的可能性以及在中国入伍后会带来的困难。有好几次，我曾听到属于苦力阶级的中国人窃窃私议，对一个流行的标语所表达的思想表示强烈的不满。这个标语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然，这同普遍服兵役的民主观念是直接相抵触的）。

另一个重要的类型是反对种鸦片烟的标语。但是，这些标语的腔调是威胁性的，而且显然不打算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些标语中最常见的是：“种鸦片者杀无赦”。

一个外国人可能注意到标语缺乏对群众的吸引力，它们不使

用吸引人的、押韵的或双关的词语。这方面，当前美国的一些口号可作例证：“宁尽义务，不受奴役”、“请您交税，击败轴心”。由于在中文中一词双义的情况很普遍，而且读音数量有限，从而更易于使语言作到押韵和有韵律，不使用这些词语就更使人惊异。

另一个对一般读者缺乏吸引力的证据是，某些刷标语的机关喜欢用现代式的字体或花体字。这是某些较为西方化的学生最近的一个怪癖，即摹仿现代式的西方书法。只是出于标语刷写者的荒诞的设计，为了适合于设计的形式，常常把字写扭了。这使我们一行中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大惑不解，他们承认不得不根据标语的内容来辨认这些字。这种胡乱写字的现象在四川最常见，在甘肃则很少。

因此，把中国标语的效用打折扣之后，似乎无需作更多评论了。然而，有几点是有意思的。

3. 强调政治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各类标语的多样化和常见：

“服从领袖”

“民族至上”

“党至高无上”

“拥护（中央）政府”

“反对卖国贼”（在国民党的词汇里，任何一个其它政党的成员都是卖国贼。）

在68—69页所列一般“普遍看到的”标语（这就是说，整个沿途到处都能看到）中，可以看到，每11条标语中，有6条主要是政治性的。

这些标语中某些不同部分的相对先后次序，可能有重要含义。举例说，“服从”，是一个强制词，几乎总是和“领袖”用在

一起；而“拥护”是一个弱些的词，总是和政府并用。不但如此，“服从领袖”这一词组，总是放在“拥护政府”的前面，因此，显然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有同样严格顺序规定的例子是：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完全忠于党和国家

忠于党；爱国家

最后一个例子特别使人感兴趣，因为它在军营和司令部墙上最常见，几乎无一例外。举例说，在这种官方建筑的入口处通常都有的大影壁上，人们最常见到这一标语。人们可以说，这一口号是那些一般口号中的佼佼者，因为在匾上或木制的镜框上经常可以看到它。后者镌刻着由像委员长这类高级人物亲笔书写的这一口号，给予得宠的下属作为奖励。在军事建筑物上广泛使用“忠于党；爱国家”这一口号，自然意味着军队是“党的军队”，而不是国家的军队，士兵的首要天职是忠于党。

有些口号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外国模式，例如：“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后者是希特勒纳粹德国通行的口号一译注。）

4. （“第二个重点是关于战争”，这一节很短，从略。）

5. 矛盾和含糊不清

我问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一口号中，民族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就是中华民族。但是，我提出质疑说，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中提到汉、满、蒙、回、藏五个

民族。他表现惶惑……

6. 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显然无效和越来越糟

……国民党未能提出新的、具有创见性的口号以保持人民的关切和适应战争中的变化情况，再加上前面刚提到的这些别的论据，看来证实了这一结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无效，越来越糟糕。

7. 标语口号证明内部存在问题

作为一种对群众的宣传，国民党的标语口号除了其效果存在疑问之外，值得玩味的是它们还证明了政府面临着内部问题。从这些标语口号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与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者所描绘的大不相同的图像。这些标语口号涉及的某些问题，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者避而不提；另外一些问题则不承认其存在。

这些标语中最重要的是那些谈论征兵和鸦片烟的标语，其数量之多证明这些问题继续存在。

像“拥护中央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法律法令”这类的标语口号，显然是针对着继续存在的地方主义而发。……

涉及征粮的标语口号，则倾向于证实征粮计划受到反对的报道。……

“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扰民”这一标语，暗指着群众间普遍存在的对军人的看法。

随着战争的拖延，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无效和它的思想意识的不民主性质，就越发显著。这方面一个小小的迹象是戴季陶（即戴传贤——译注）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

一篇发言，这次会议是在1944年春为筹备一次重要的中央全会而举行的。戴是国民党右翼的领袖。他早年的政治生涯曾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全心全意的奠基成员，而从20年代中期以后变成了一个刻毒的反共分子和中国儒家和佛教传统的卫护者。他一生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是委员长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

戴季陶的佛教国家哲学

1944年5月15日

个人底稿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重庆曾举行过几次非正式的预备会议，讨论与蒋要召开的中央全会有关的问题。

据报道，头两次会议讨论了党和政府事务，除了孙科*在会上随意地发表了他认为需要进行改革的意见之外，据悉，没有其他使人感兴趣的东西。

在5月初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由于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某些发言，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戴获得了党的元老的地位，虽然这对他来说是很不适当的。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并且越来越埋头于中国历代老政治家的著述和其他遗训的研究，据说他对蒋有很大影响，并且被普遍认为是蒋的政治导师。（还可以从一个稍为不同的方面说一下，他还被普遍认为是委员长最大的儿子的父亲，这个儿子是他们两人留学日本期间共用的一个日本青年女佣

* 关于孙科见原著111—112页

** 关于院的说明，见原书99页脚注。

所生。在戴先于蒋离日回国后，这个日本女人后来就嫁给了委员长。)

戴对委员长和国民党保守派的影响，显然是他的发言引起人们兴趣的原因（我从五处消息来源听到了这一点）。据报道，他的发言的要旨是：

“民主制归根到底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形式。任何形式的政府要想成功，必须具有动力和指导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佛教和它的三位一体的原则学到很多东西，三位一体就是佛祖，圣典和僧众。我们的领袖象征着佛祖，三民主义体现着圣典，我们的党组织象征着僧众。领袖是最高的理想，全党必须服从他，全国人民必须追随他和尊敬他。”

* * *

如果这确是反映了委员长的思想的话，那末，迅速朝民主制前进的前景，就不是光明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对这类东西的反应是感到失望。但是，它也许多少有助于说明国民党某些集团的反动性，从而推动政治分野的划分。孙(中山)夫人的评论是：“戴早已是僵尸”。

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并不意味着蒋介石中国没有政治冲突。这只是意味着，冲突只会在党内发生。在战时的重庆，不乏想进行激烈的政治内讧的派系，其中最突出和强大的是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的“C、C集团”。他们是蒋介石的浙江省同乡，与委员长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陈其美的遗孤，这个集团的势力主要来自它对党的官僚机器、学校（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和宣传机构的控制。它公开宣扬的思想是维护和恢复中国的文化，而其一党专制的策

略只能被视为是分毫不差的法西斯主义。

其他几个集团有力量能在特定的领域向C、C集团挑战，只要委员长想在各相争的派系之间保持力量平衡的话。政学系里有一些资深的官僚，控制着经济部和大部分重要省份的省主席职位。虽然他们也是保守的和强烈反共的，但不象C.C.系那样反动名声昭彰。可是，由于他们的势力基础更多是在政府里而不是党里，因此，他们常常发觉自己在对党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方面，软弱无力或者意见分歧。在军界，一个最有权势的集团是黄埔系，是由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一些以前的学生组成。这些较为年轻的、有些还是很有能力的军人，如像陈诚，常常发现他们与蒋介石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有矛盾。（参看谢伟思关于“青年将领集团”的报告，116—118页）

最后，围绕与蒋有人际关系的一些个人，还形成一些派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要算是宋子文和孔祥熙了。宋子文是上海商人查尔斯·琼斯·宋的儿子，在美国哈佛大学念过书，他的三个姐妹是孙逸仙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宋子文精于金融财政事务，这使他成了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正像下述报告所透露的，他的独立的不受管束的天性，常常使他与蒋介石发生不和，从1940年起，宋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最初任蒋介石驻美国的个人代表，后来又任外交部长。在这同时，对财政、金融事务的控制，转到孔祥熙手里去了。

孔祥熙是委员长的另一个联襟，孔子的直系后裔，他在战争最后一年下台之前，一直是重庆最有权势，却最不孚人望的人物。在西方受过训练的许多财政、金融专家认为

他是最无能的，可是他却把越来越多的经济机构置于他的支配之下。

谢伟思的良好处境，使他得以记录下来孔的活动。他与美国财政部代表索罗门·阿德勒同住一房，楼上是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冀朝鼎。下述报告论及孔的和论及宋子文的一样多。这份报告对蒋介石通过孔企图控制经济和垄断金融、贸易和开发机构的方式描写得很成功。

宋子文的失势

1944年3月7日

档案页：893：00/15330

中国政坛上最近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宋子文的戏剧性的黯然失色。这件事肯定影响到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大多数这种突然的、不可预料的政治变动发生时，都只能“在家庭内部”作说明。但是，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窃窃私议，因为不确切知道引起这一事件的原因。

把各种谣传拼凑在一起，就可以相当具体地说明委员长和宋之间大概发生了破裂。这些消息（可能很不完整）可以归纳如下：

1. 蒋和宋一向就难以彼此相处；蒋独断专行，而宋直言无忌且意志坚强。他们在这之前曾多次吵过架。例如：1933年两人在发生激烈争论后，宋辞去了财政部长职务，在这次争论中，蒋责备宋没有能为当时的剿共战争筹集到足够的款项，并且最后打了宋一记耳光（这是谣传，但普遍认为是真的）。

2. 宋获得他现在的外交部长职务，是由于他被认为态度强硬，足以从美国获得承认、金钱和物资供应。他的这些任务完成得不是很成功，至少是不足以使蒋感到满意。此外，有消息说，他的手法使他在华盛顿的人缘不好；至少有两次他承担了不愉快的任务：警告委员长，美国对要向中国共产党采取行动的任何威胁反应不利；他还被指责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没有注意消息灵通的美国舆论有关中国的玫瑰色幻觉的令人迷惑的描写。

3. 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宋独立性太强，不讨蒋氏夫妇喜欢，后者宁愿把外交事务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因此，喜欢由“意志薄弱”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还有消息说，宋回到重庆后受到蒋的责备，说他未能使中国参加对意大利的媾和。宋回答说，他既未接到指示，也未被授权。对此，蒋反唇相讥说：“在其他问题上你一向能采取主动的。”

4. 不但如此，作为外交部长，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宋采取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这给他造成了一些有力的敌人。首先，他反对派遣熊式辉军事代表团去美国（政治预言家认为这是政学系企图插手对外关系领域），并进行暗中破坏以促其失败*。其次——就其对家族关系的影响说，可能更重要一些——是他建议蒋夫人不要访美，而在访美成行之后，又不予协助，并一再告诉蒋夫人，她停留太久会不受欢迎，应该回去。

5. 最后，宋子文触怒了蒋，并使孔祥熙和其夫人（一般说来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提高警惕，因为他苛刻批评中国处理经济问题不当，提出（可能是推理的）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大权独揽的人。一条广泛流传的消息说，在最初发生裂痕之后（显

* 1942年熊被派往美国任军事代表团团长，他的任务是为中国军队争取更多的美国援助，并尽力促使美国改变其“欧洲第一”的政策。他未能成功，于1942年12月被召回。

然是1943年11月)，家族在十二月下旬安排了一次会议，希望在会上能取得和解。不幸，蒋要宋陈述他对处理经济问题的意见，宋回答说，经济缺乏有效管理的一个原因是机构太多，每个机构都没有权力，有时还互相掣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机构，并赋予足够的权力，以处理一切经济问题。蒋反击说，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据传宋子文可能是这个机构的头头）会打乱整个政府结构，是不符合政府组织法的。对此，宋反唇相讥说：“你一向能够改变政府组织法的，只要你愿意——比如你决定要当总统——的话。”据传，这次会议的结局是蒋举起一只茶杯向宋的头部砸去，自然，任何马上取得和解的希望也就放弃了。

* * *

可是，我不认为任何这种消息，或者甚至所有这些消息加在一起，就足以说明这种事态发展的真象。

首先，虽然大多数消息都是关于宋留任外交部长的——这是允许他保留的唯一职务，即使这样，他已被降低到一个显然没有权势和没有事做的职位。

其次，自从分裂发生后所产生的大多数回击是发生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机构中。而这些回击……无例外地是降低宋子文对这些机构的控制，而把它们置于孔祥熙之手，这就意味着，在蒋介石看来，孔祥熙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出头露面或唯命是从的人。

把最近的人事变动综述一下，就可清楚看出，对内对外经济的控制已集中于孔祥熙之手。

1. 在中国银行董事会最近举行的几年来的第一次会议上，控制权已从宋子文手里转到孔祥熙手里，会上增加了好几个董事，孔祥熙当了董事长。名义上被认为是宋子文的人的贝祖贻虽然保

留了下来，但他被认为是一个随风倒的软弱人物。在这之前，还从孔祥熙早已控制的其他机构，如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调了一些人到中国银行。特别重要的，是宋子文的亲密帮手、中国银行负责人事工作的头头霍亚民的辞职。宋子文作为外长在华盛顿访问期间，给委员长的许多密电都是通过霍转交的。

中国银行是中国政府银行中年代最久的、资力最雄厚的银行，也是被指定的外汇银行和对外贸易的金融代理机构，还是中国现代工业最大的投资者，它是宋子文在中国的势力的主要基础。

2. 中国的国防物资局已乱糟糟，显然已成了一个政治皮球，预料要进行改组。谣传可能置于中央银行或成立一个新部——供应部——的控制之下。一般认为，孔祥熙的人郭某可能出任新部头头。负责在重庆的工作的宋子文的人陈庸孙，谣传可能开路。他否认他正要辞职。但是，有一件事反映了他的前途未卜：我们驻重庆的租借法代表团最近来能与他进行任何业务接触。

中国的国防物资局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给予中国的租借法物资都要通过它，它使宋子文控制了所有的美国军用物资援助。重要的问题是，战争结束后它是否还能够分享对美国物资援助的控制。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迄未获得解决。

3. 中国政府的一切现汇采购最近已置于中央信托局管理之下，这个机构由孔祥熙一手独霸。

4. 孔祥熙还通过蒋廷黻等控制了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的利益。

5. 简单进一步谈谈战后经济合作问题。孔祥熙与C. C. 集团共同控制了出席国际劳工会议的代表团。他自己控制了出席世界粮食会议的代表团。

6. 在国内领域，宋子文的主要残存利益之一是他的广东银

行，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也遇到了麻烦。这家银行重要的香港分行的经理邓某不久前被戴笠*逮捕，下落不明，传说已被处决。

广东银行是主要负责侨汇业务的银行之一。

展示一下孔祥熙完成的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囊括一切的控制，可以指出，他已经完全控制或居于主要控制地位的有：

银行业

中央银行

货币发行银行和政府财政代理

中央信托局

中央银行的业务代理

交通银行

（主要由孔祥熙控制）

农民银行

（蒋是名义上的，孔是实际上的头头）

四行总库

（实际上的头头是刘攻芸，他名义上是政学系的人。但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被置于这一地位，一般认为是孔的胜利）

工商银行

此外孔祥熙还控制了一些较小的私人银行

政府对外贸易公司

华昌贸易公司

（头头被认为是孔的人）

环球贸易公司

复兴贸易公司

（它在1942年吞并了富华贸易公司，现在垄断着中国主要原料商品的对外贸易）

工业康采因（名单可能不全）

全国农机公司

（新成立的公司，主要由孔祥熙和财政部控制，垄断脱水水果、蔬菜，还垄断中国现代农机的制造，是美国现代农机制造商的唯一代理人，并取得美国的专利权）

湖南工业发展公司

西北工业公司

中国工业公司

（炼钢和轧钢）

孔祥熙还以在其他许多公司中拥有重要的股份而闻名，他通过财政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各省的开发公司，这些公司现在几乎是中国经济开发的一个普遍特点。（政府在这些控股公司中拥有主要股份，与重要私人资本合伙经营，这些公司与日本在满州和中国被占领区建立的开发公司之间的类似之处，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政府各种专卖局（都是由财政部在1942年成立的）

食盐

烟草

食糖

火柴

这类专卖局中还可以包括

中国茶叶公司（垄断出口）

中国植物油公司（意欲垄断出口）

税 收

最后，必须承认，在一个征税并不总是根据法律行事，而且通常是可以随意执行的国家里，税率、甚至税

的缴纳都可以视谈判结果而定，因而孔对所有私人企业拥有很大的惩罚和歧视权力。

* * *

根据我对在经济控制方面最近的发展趋势作的这些调查得出的结论，请允许我提出两点主要以详细证据为基础的假设：

(1) 宋的失势主要因为蒋介石和孔祥熙不想让他参与或控制中国地平线上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机会——在中国战后的恢复和工业化中，与美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英国合作，并得到它们的援助。

由于财政金融机器、政府采购机构、贸易公司（进行易货贸易的基本物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租借法援助都控制在孔的手里，因此，他对这种外国经济援助的性能和用途的控制，看来是绝对的。

(2) 下决心逐宋使其不能分享战后经济援助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以宋为一方，以蒋、孔为另一方之间，在中国经济发展应采取什么型式的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

宋和中国银行都以主张采取一些美国发展经济的道路而闻名；发展大规模的私人资本企业，在利润上给以鼓励，政府不加控制，给以尽可能的自由。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粗略描述的经济计划的型式，主张政府指导经济发展，这究竟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固然可以争论，但肯定不是自由企业。国民党的经济学家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

信条，重工业和那些“在性质上天然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由政府发展，轻工业留给私人资本。（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一般是最需要外资的企业）最后，孔祥熙坚持不懈地建立垄断公司和政府控制的工业与贸易康采因，表明了一个类似的倾向。虽然目前的垄断企业，例如烟草专卖局之类，是作为“战时的措施”而成立的，国民党的宣传却鼓吹最好是变成常设机构。预料战争结束时这些机构不会被取消。这种由政府来垄断企业的最新一个组织是全国农机公司（前面已提到）。必须把这看作一种迹象，预示着孔祥熙试图推行的一种发展型式。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资本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举例说，一般认为，最近关于建立一个保险业垄断组织（将为孔所控制）的建议，已经被放弃，因为担心在国外引起不利反应，可能也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把握能够独立经营它——而不是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垄断组织的想法已被永远放弃了……（这里，谢伟思还研究了宋子文被逐的一些可能的、次要的原因。）

* * *

联系这些问题，并部分视上述两种假设的有效程度，仔细研究一下宋失势和孔越来越得势可望产生的影响，是适宜的。我初步认为，这些影响可能如下：

1. 丢掉宋，蒋可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企业和金融界中，都不享有很大的信用。
2. 可能从过去的大力强调得到外国经济援助，转向寻求政府贷款。私人资本可能被吓跑。
3. 中国银行和租借法的效率可能受官僚主义之害。这一点已经变得明显了。在宋控制下，这些组织以办事认真和效率高享有盛誉。宋虽严厉，但他以高薪招引了一些干员。

孔的组织，甚至中央银行，都是机关。孔与燕京、奥伯林基督教青年会等这种组织的许多关系，使他成为中国的谋求职业者的第一号目标。像一个可靠的政治家一样，他从不失诺，但他所控制的组织中的职工效率低，冗员多。

4. 在这种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的日子里，宋可能发现在与蒋和孔的对抗中他的政治潜力提高了。所有这些不满分子现在可能都想找他作领袖。现在看来宋不想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从一位可能是非常消息灵通的人士处得到的下述消息，说明他可能觉察到这一点：在宋第一次与蒋破裂后，他的私人“智囊团”向他提出三种供选择的行动方针：（1）公开宣布放弃他的一切职位，退出政府，从而表明他不同情现政府，并把自由力量吸引到自己周围；（2）设法继续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对于他个人的经济利益来说，这是他最重要的职务；（3）闭门谢客，不言不语。宋显然选择了最后的方针，他的顾问认为这是最糟糕的一条方针。

蒋介石与“皇室家族”

1937年，当中国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已经英勇奋战了最初几个月的时候，蒋介石和他的迷人的、在威尔斯利学院受过教育的夫人，被选为《时代》杂志的“1937年伉俪”。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5月，蒋夫人对美国作了一次胜利的访问，她在白宫逗留了一会儿，在向国会发表演说时，赢得国会议员起立欢呼达四分钟之久。报纸以压倒的篇幅赞扬这位颇富魅力的第一夫人和她的严肃的、坚定的丈夫。

就在蒋夫人向美国总统、国会和人民发出动听的呼吁，要求给予支持的时候，她丈夫在中国正越来越失掉人们的拥护。从把蒋推崇和尊重为抗日的象征，转而对他采取怀疑和嘲笑的态度，人们突然间回忆起了他早年的股票经纪人和流氓帮会分子的生涯。对谢伟思来说，舆论的这一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在独裁制度下，有关独裁者的任何片断消息或者任何谣传，对一个政治报道员来说，都是重要的材料。不但如此，美国显然需要了解委员长的想法，因为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欢迎中国加入四强之列。因此，谢伟思在这一时期发出的许多报告，都是关于蒋介石其人和他的家庭的。1943年9月，谢伟思在给史迪威将军的一份个人备忘录中，分析了一位著名亲美的官员被免职的原因。这是他第一次企图来说明蒋介石内心的想法。

传闻中的交通部长曾养甫 被免职的原因

1943年9月14日

个人保存本

要对蒋介石作一“精神分析”，可能就必须指出他的根本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法西斯型的）和自知要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这种援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含义）之间的矛盾。这种内心矛盾造成的影响在下一事实中突出表现出来。在他与他周围的甚至更为保守和更具法西斯思想的人（如C. C. 系和军界领导人何应钦之流）之间的关系中，蒋是处于守势，后者指责他是“亲美的”，过于依靠美国。

在美国和中国自由分子中间使委员长威信扫地的一件事，是1943年三月蒋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该书猛烈攻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对盟国当时与之进行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却颇少批评，人们对此很不以为然。可是这本书却成了所有国民党党员、官员和学生的必读物，在谢伟思看来，《中国之命运》和另一本被称为是蒋的著作的《中国经济理论》是“融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封建主义和家长作风于一体的权威表达。这些东西是现在控制着中国的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保守派领导人的特徵”^{*}。为了回答中国知识分子、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

^{*} 见“委员长的《中国的经济理论》”一书，1944年6月24日（个人底稿）

1944年1月，《中国之命运》出了修订版，谢伟思根据新版本译出了一个摘要，并附有以下内容简介。

〔《中国之命运》——修订版〕*

1944年3月

美亚文件：409—10页

新版中改动的不多，也不重要，某些明显的事实错误改正了，显然只作了很小的努力来回答共产党人提出的有根有据的批评。在谈到汉族扩大对其他民族的控制时，原来用的“同化”一词，在新版中改成了“联合”。“自由主义”一词在少数无关宏旨的段落中改成了“个人主义”。但是，关于他的种族路线，即中国的所有各不同民族（藏族、蒙古族、汉族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委员长不仅没有为他的立论提出根据，而且力图使他的立论固定下来。举例说，他荒谬地谈到，古老的传说说匈奴人是纯属传闻的黄帝的后代，而黄帝又是汉人的设想的祖先之一。保留了一些强烈的反共偏见未作修改，并且直截了当地断言只有国民党能够救中国。

有些修改显然是要努力消除在提到外国在中国的侵略时最具冒犯性的东西。可是，大多数这种修改只是取消了对这个或那个具体目标的提名，或者是换上另一种说法，而且并不改变这些词所在的段落的含意和重点。修订本还附录了蒋介石在签署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后发表的相当温和的讲话全文。

* 印出的谢伟思备忘录没有标题和备忘录的日期，V·F·梅斯林少校的封面电报日期是1944年3月25日。

修订本所附地图有所修改，表明中国对缅甸北部、包括胡冈谷地，拥有主权，原版和修订版还都表明，香港，自然还有整个蒙古（包括唐努图瓦）和西藏，都是中国的。

新版还把琉球群岛*列为属于中国，并且是中国生存所不可少的领土。

令人惊异的是，面对着受到的普遍批评，该书作出的修改竟如此之小。它仍然执拗地、狭隘地、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努力对历史作一特殊解释：外国侵略造成了中国的麻烦和过去一百年来未能前进。由于在科学上没有可以鼓吹民族主义的东西，它就大谈其“古代的美德”和古老哲学，大谈其像曾国藩这类的保守分子的光荣和他对现代民主思想的反对。而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则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效忠于满清，镇压太平天国的败类。修订版仍然暴露了中国现领导的《我的奋斗》的面孔。

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该书的翻译和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所作的修改之少表明委员长仍然坚信他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修改之少也可能意味着中国主管宣传的当局将继续认为（当然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该书不宜在国外发售。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外国舆论，和那些同中国打交道有关的人，应该读读这本书。

1944年春，从史迪威将军到罗斯福总统这些美国人，都对蒋介石在收复缅甸和开辟一条较为容易的通向中国的补给路线中，不予好好合作越来越感到苦恼。谢伟思就此又谈到了委员长。他在向国内报告蒋的一篇演说时，最后对演说作了如下解释，并对美国政策提出了下述建议。

* 琉球群岛现在以其日文名字为人所知，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一系列小岛，包括冲绳岛。

报道中的委员长的观点

1944年3月20日

美亚文件：406—7页

中国一团糟，看不到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前景。经济危机继续发展和恶化。国内的骚乱日趋活跃和增长。与所有盟国的关系也疏远了。

中国仍然是蒋介石当家。虽然我们可以和其他人——孔祥熙或者何应钦——打交道，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实质上不过是唯蒋之命是从的人。

确实，我们要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恶化承担部分责任。但是，整个这个烂摊子要由蒋介石，而且只能由蒋介石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蒋的行动却使人看来他是不可信任的。他不是与我们全力合作以打赢战争，我们遇到的是“积极的不合作”态度。军事义务没有履行，建设工程延期，重要的财政金融谈判没有什么进展。派观察员从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获取军事情报这一简单要求，都遭到拒绝。

虽然蒋知道，我们一定要打赢战争，他的命运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对外关系以及军事和经济上完全依赖着美国。如果美国不予支持，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

对目前这种显然是暧昧不明的局面的解释，在于蒋的背景和局限性，也在于我们同他打交道中的失败。

蒋青年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于了解他的手法是重要的。作为一个股票经纪人，他学会了在情况看来对他有利的时候进行投机。他还从他与黑社会帮会分子的接触中学会了运用恫吓和敲诈。

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精于传统的中国人的讨价还价手法和玩弄拉一个、打一个的手法。

蒋所干的每件事都显示了这种痕迹，他依靠其在人与人之间和集团与集团之间玩弄均势的高超技巧，以一个军界政客而不是一个军事指挥官的投机取巧和依靠于一支帮会性的秘密警察，取得和保持了他在中国的地位。

蒋期待美国替他打败日本，并在这一过程中给以外交上的支持来巩固他在国外的地位；以财政援助和改善与补给他的军队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蒋和国民党现在的根本考虑不是对日作战，而是继续内部权力斗争，想望如何消灭共产党和几乎肯定不可避免的内战。

蒋认为，用威胁恫吓的办法和利用我们在与他打交道时表现的软弱和不一致，他可以不理睬美国要他从上述想法中猛省的努力。他认为我们对他承担了如此多的义务，以至他可以“坐享其成”。

于是，这就出现了关于日本的新威胁的警号，关于经济崩溃迫在眉睫的叫喊（不幸，根据是真的，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措施），而且一再要求给予空前大规模的贷款和其他援助。*

因此，这也使我们在与蒋打交道和要求他履行诺言时遇到困难。美国大使的话没有份量，因为国务院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而且不管怎样，大使的话不能代表白宫，他不害怕史迪威将军，因为史迪威不能证明他得到国防部或白宫无条件的支持。

如果蒋所依赖的美国在确定要求蒋采取些什么行动方面痛下决心，并坚持到底，他是会合作的。除非总统明确我们的政策，确定我们的要求，并且明白无误地把这些东西告诉蒋，否则，他

* 1944年，蒋要求供予10亿美元贷款，作为他参加缅甸战役和修建成都机场的代价。

将坚持其目前的方针。

总统可以直接或通过得到充分受权和完全支持的代表这样作。这些代表可以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他们要密切配合行动。

这可能被认为是积极参与中国事务。但是，除非这样做，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很有用的盟国。而这样作了，我们就可能拯救了中国。

作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小城市和国家首都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而在国家首都（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称为陪都——译者注）之中，重庆是拜占庭政治和行政秘密的混合物。因而谣言的洪流源源不断，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这些谣言就成了衡量舆论的重要标尺。当谣言的主题是关于委员长或他的家族时，这就加倍地正确。例如，1944年春天，关于蒋介石的私生活和他与其夫人及姻亲的关系的一连串谣言，开始流传。作为一个注视政治的人，谢伟思有责任把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加以报道，并分析一下它们的含意。

蒋家庭内的纠葛

1944年5月10日

个人保存文本

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因此，使他与夫人的关系至少说也是处于紧张状态。传言是如此之多，看来必定是出了问题。

按通常情况来说，关于政府领导人私生活的这种谣传，不会

被认为属于政治报道的范畴。可是，在中国情况不是如此，与事情有关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他与他妻子家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这种关系由于委员长与宋子文之间关系紧张已受到削弱。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陷于分裂，在中国和海外产生的影响都可能是严重的。甚至，如果当前的情况逐渐为国外所知——几乎肯定和必然如此，也会使委员长和夫人的威信受到巨大损失。

* * *

消息普遍认为，委员长是在夫人逗留美国期间搞到他的新欢的。他在性生活上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有人说，现在的夫人是他的第三位妻子。也有人说是第四位。据传，在上海当股票经纪人时代，他还是一个寻花问柳之辈。

关于这位新欢的身份，有各种不同说法，其中主要是：

她是陈洁如小姐，是委员长与夫人结婚前的姘头，一般认为她已得到一笔钱去养老，不再与闻人间烟火了；

她是陈立夫的堂妹，相当年轻美貌，由陈立夫在夫人逗留美国期间介绍给蒋，以作为一种并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努力来巩固他自己和C.C.集团的地位；

她是（有些消息说是另一个女子）一位美丽的福建姑娘，经政学系介绍获得了委员长的欢心，政学系企图以此来玩弄其裙带政治。

可是，相当普遍的看法是，这位女士已经身怀六甲，再有两个月左右，委员长就要作父亲了。

关于她的去向的消息，又是众说纷纭。有消息断然说，她被遣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孩子去了；另有消息说，她住在委员长的南岸公馆里。还有一项消息，看来像是有些根据，说她住

在离重庆6英里的九龙坡机场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对于有两个女人这一说法的解释是，第二个女人——陶小姐、乔小姐或者姚小姐——是委员长的长子经国的朋友，并且多次受委员长的邀请赴他的“行宫”。

这些消息的广泛流传和被人相信，以及在流传过程中添加的一些妙趣横生的补充，至少说明夫人的不得人心（中国人普遍把她的奢靡挥霍作为笑料）以及对她和委员长的敬重的下降（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试图否认这些消息，或者拒绝传播这种丑闻）。

这些奇闻轶事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夫人现在谈到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夫人不满委员长只是在要会见“那个女人”时才把他的假牙装上。

有一天，夫人走进委员长的卧室，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并打中卫士的头。（卫士想像的对这种女人之间纠纷的说明，英文译文不地道。）

委员长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的一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

* * *

所有这些消息都可能不过是恶意的造谣。但是，一些表面的迹象可以被解释为至少说明委员长和夫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

自打从美国回来之后，夫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她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呆在一起。

她回避在社交和公开场合露面。她很少去看委员长，偶而一起露面时，也非常冷漠。

夫人身体欠佳：她抱怨皮肤发炎，医生诊断认为是神经紧张所致。她回避摄影记者。在近距离内看到她的人指出，她脸上皱

纹很深，看来神情忧郁、愤懑。

* * *

如果所报道的这些情况属实，夫人无疑已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有着自己的骄傲，有自己清教徒的宗教信仰（被普遍接受的一些消息说，过去有几位政府官员被突然撤职，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有机会得以提请夫人注意她们的丈夫的不拘小节的行为），而且她知道这将会对她的威望产生的影响。

可是，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权势之柄对宋氏家族来说是如此重要，他们（孙夫人是例外，但对孔祥熙夫人说，则更加重要）将尽一切可能阻止公开破裂，而且她将放弃她的自傲，而来顺应局面。

批评委员长的人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他的基督徒信仰和新生活运动不过是口头上的道德，而另一方面的迹象却说明，不要太久，他终将会成为一个旧式的“军阀”。

五花八门的新闻

在被派驻史迪威总部而驻节重庆期间，谢伟思常常没有具体的职责或任务去履行，而成了一个猎取各种政治新闻的巡回记者。每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编写并发出报告或备忘录，然后，就利用下午、晚间和吃饭的时间会见中国新闻界人士；外国记者团的成员如西奥多·H·怀特，根瑟·斯坦因或布鲁克斯·阿金森；或者中国官员如蒋廷黻等。谢伟思常与蒋玩桥牌，蒋后来出任国民党中国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谢伟思的官阶不够高，不能同高级官员直接接触，但是，在大使同外交部长谈话时，他常常跟随大使作记录或者写备忘录。有时他也能有幸对冯玉祥或孙逸仙夫人进行重要访问，这两人都对委员长持批评态度。他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专家，因而与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的人员也时有接触。

可是，谢伟思的最大部分消息都是来自中国报界人士和下级官员。通过他新建立的颇为广泛的接触网，他能够搜集到重庆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珍贵传言和消息。这些消息他都在一系列备忘录中加以报道，他称之为“五花八门的新闻”，这些五花八门的新闻和另一篇关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争吵的短篇报告的摘要搜集如下，以多少说明战时重庆的风情。

1944年4月4日

个人保存文本

从许多人士那里都获得消息说，几周以来，委员长一直处于

极端紧张中，有些消息甚至说他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人们普遍认为，使委员长忧心忡忡的问题是：国外越来越强烈地批评（中国人渴望知道外国报纸上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当然，这些文章在中国没有发表）；与美国军方的关系，包括军队的开支；关于汇率的谈判；史迪威将军提出的问题（这一消息是围绕委员长与史迪威会谈后勃然大怒的事）；以及新疆局势*（据信委员长每天都为中央政府用卡车向新疆的军事增援进展缓慢而大发脾气，而由于委员长命令不经他的同意不得发表任何消息，因而中国官员对新闻发布事持诚惶诚恐的态度。

1944年5月12日

个人保存文本

可能的人事变动

这类传闻是如此之多和形形色色，以至难以理出头绪和对它们的可靠程度加以估价。许多谣言代表主观的想像或合理的推想，其他的则是某一位人士的支持者放出的试探气球，而另一些则可能是他的敌人为断送他的机会而散布的。实际上，由于委员长对党处于控制地位，这些谣传意义不大。人事变动通常不通过投票表决——而且在会议结束之前，委员长甚至不加宣布。

因此，这些谣传就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主要表现了党内斗争的动向和派系之间的对抗。

当前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受到几乎所有派系的攻击。和他一起成为攻击目标的是他的妻子和妻妹蒋夫人；可以预料，关于夫人由于有了一个对手而在委员长面前失宠这种恶意的闲言碎语的广为流传，一定有某一政治动机。对孔不满是由于他的势力太大了。甚至在1942年12月的中央执委会会议上支

* 参看本书120—28页“新疆局势”。

持他的C. C. 集团，也转而反对他。与此有关的谣言还有，孔将放弃财政部长职务，他将放洋，如果他不下台，四个院的院长扬言要辞职*。孔祥熙实际上已要求辞职（面对批评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姿态），但是，他的辞职看来不像会被接受。对委员长来说，他是太重要了。因此，谣传现任粮食部长徐堪将出任财长一说可不予置信。蒋夫人在国内政治上起的作用看来将比以前小了，而且她可能出国去度一个漫长的夏季假期。

1944、5、15

个人保留文本

据悉，在“四川本地人士”中间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是，委员长将在即将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辞职。一直相当不断地有消息说，委员长健康状况不佳。还有可能，而且只是勉强地以政府在国内外受到批评而反映出对他缺乏信任为理由，作出一个姿态。很难想像，除了姿态之外，还会有更多意义。关于这种打算辞职的谣言在战争初期是不可能出现的。有意义的是，这是表明委员长威望下降的一个迹象。

1944年5月26日

个人保存文本

本市（重庆——译者）现在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火柴专卖局和中央信托局为纪念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10周年，专门发行了一种火柴，火柴盒和火柴本身质量都比通常的火柴好得多。火柴盒正面是孔祥熙的非常精美的头像；背面是他的语录。这种火柴（只分送政府机关，不出售）被人们普遍叫做“马屁牌”火柴，其含意是指中国人口语所说的“拍马屁”，意即“无耻地阿谀奉承”。这种火柴盒成了爱好收集者的抢手货。

* 五个院是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设立的，孔本人是行政院代理院长（蒋介石是名义上的院长），其他四个院是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

1944年6月28日

个人保存文本

前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被任命为教育部行政副部长是很有意思的。赖琏被自由主义者和教育工作者认为是C.C.集团政治打手中最狠毒的人之一。他不享有一个教育工作者或学术领袖的任何威望。他在西北大学的任职造成了很多有自由思想的教授被解聘，学校的败坏和学术水平的悲惨下降。他的被任命说明C.C.集团正在得势，而且是沿着相同的方针，只不过是又一次。

1944年5月23日

个人保留文本

为华莱士（美国副总统）的到达所作的准备工作，显然是要继续进行大规模驱赶乞丐和街道上的流浪儿。我看到警察在驱赶、追捕这些可怜的孩子，在最后两天上午，我看到用绳子缚成一长串一长串的孩子被赶出街道。

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

如果说谢伟思的报道中对国民党的批评看来有些超乎寻常的话，那末，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经常到各地旅行，这使他非常了解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蒙受的苦难。此外，当他逗留在重庆的时候，他了解到对蒋介石政权存在的大量不满和抨击。他对国民党的消极评价肯定不是他一人所独有。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评价正是反映了东道主中国人的批评。

当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州度假和在华盛顿汇报工作4个半月之后，而于1943年春返回中国的时候，对国民党政权的这种批评已更趋明显。他返职不久，即与他的朋友《大公报》记者高集进行了两次长谈。《大公报》是重庆最畅销的报纸（有中国的《纽约时报》之称），在重庆政治中，它是政学系的机关报。高特别关切重庆的失败主义和士气、民心的不振，以及蒋介石和国民党保守集团继续表现出有兴趣单独对日媾和——这种媾和的表示在1943年初特别明显。

中国新闻界人士对中国目前局势的关切

1943年5月25日

档案页：893.00/15048

《大公报》的一位工作人员5月15日在一次长时间的私下谈

话中发表意见说，国民政府对其在战争中将来的作用这一问题正在走向危机。他相当详细地提出了如下论据：

早先中国人怀有的盟国尽快战胜日本的希望，已被普遍怀有的颓丧和泄气想法所代替，一般认为打败日本和在中国结束抗日战争可能还要4年。不管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中国人现在感到他们已被排除在战争的全面计划之外。他们已不再抱希望能够设法改变显然已经决定的基本战略，即必须首先打败德国。

这助长了一种想法，中国必须自谋出路。

政府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不可能即使照现在的办法再抗战4年之久。

经济局面正在迅速解体。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物价管制是纯属失败。至少三个省发生了饥荒。

为抗议征兵、拉伕、苛捐杂税、征粮和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是经济恶化和普遍厌战情绪的反映——而引起的农村骚乱，在几乎每个省的某些地方，都已达到了武装起义的阶段。

军队的素质和士气，已大大恶化。现在既不能有效抵抗日军的进攻，也不能弹压农村的骚乱。许多军队处于半饥饿状态，开小差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军队投向日军和汪精卫。（他提到最近率部投向日伪的将领有孙殿英、孙连仲、庞炳勋；部队损失已尽而寄寓重庆的有于学忠和鹿钟麟。）

靠薪水过日子的政府官员和教职员工，人心进一步涣散。很多人发现不可能靠薪水收入维持生计，不是随波逐流贪污腐化，就是弃职从商。越来越多人听信汪精卫的宣传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回到了沦陷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这意味着回到了他们久已被隔开的家。

未能得到美国很多物资援助一直存在强烈失望情绪，对于得到足够的援助以便真正能够帮助即使在目前有限的规模上继续努力作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幻想。阿诺德将军*关于为保持为数不多的500架飞机在中国作战所需物资吨位(一个月7.5万吨?)的谈话，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使遥远的、仍在未定之天的(鉴于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和印度的总的局势)滇缅公路的重开，也不会对中国摆脱军事困难有多大帮助。

从俄国得到援助——不管是对日本发动进攻的方式还是通过西北公路给予大量物资供应的方式——的希望，也已熄灭了。

人人都知道，整个经济机制依靠于四川继续取得较好的收成，可是，迹象表明，今年的收成将低于常年。

上述种种可以被称为国内局势。在国内局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必须考虑国外局势。

汪精卫正被赋予更大权力和威望。显然，所有中国沦陷地区现在都将至少在名义上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正获准组建一支比较大的军队。

未能受到有效反击的日军，现在正因中国的自我力量抵消而得势。它发动的即使目标有限的战役，也以其驱散百姓、焦土政策以及夺取粮食供应而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日军现在在鄂西和湘西的攻势直接威胁着重庆。如果重庆陷落，政府看来

* 亨利·H·阿诺德将军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官，1943年2月访问中国时，对于利用空军在中国来打败日军可能遭遇的困难，向重庆政府作了一个清醒的估计，而陈纳德将军等人则主张这样干。

好像没有安全的、能有效行使职权的地方可退了。

在这个时候——日本以军事威胁作策动，汪精卫诱以优厚的待遇，并利用重庆士气人心的涣散和悲惨处境——日本提出了受欢迎的缔和条件。日本人释放吴开先*时采用的方式和重庆接受他的到来这一事实，肯定说明他带来了这些条件。他发表的关于他知道这些条件（据说东条英机接见了她），但是拒绝了向重庆政府提出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就像那些说他在重庆已经隐退，与各界没有任何会晤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一样。他在重庆住在朱家骅**的公馆里。据传，这些条件共有7点，但内容不详。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一个具体时刻，这些条件的设计，肯定会对中国政府有很大的诱惑力。

在这种局面下，政府面临两种抉择：与日本妥协，或者实行内部改革，以改善政府，制止目前的恶化趋势，并使继续抗战成为可能。

目前政府的组成使它不能进行改革。它代表着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委员长不懂经济事务，宋氏家族和孔祥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政府自己要依靠而且是来自于地主——军阀——投机商阶级。它派遣轰炸机和军队去对付农民的起义，这不会有益而只会有害。这表明了它对处理目前局势的方法的概念。要真正致力于继续抗日战争和改善农村的情况，首要的工作是要重建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合作，采用共产党的方法来动员人民，同时改善经济管理。但是，这是现政府中那些坚持不懈反共的领导人决不会跨越的门槛。政府当前的领导人，即蒋周围的一些现在政府的领

* 吴开先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在被日本秘密警察逮捕后，成了重庆政府和日本人之间的秘密信使。

** 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党内的重要保守分子。曾留学德国。朱被人强烈怀疑有亲纳粹思想。

领导人，大多数都是潜在的投降派和反西方分子，他们宁可不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而是更乐于同日本妥协。委员长可能被逼到这样一种处境：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被迫采取妥协行动，再不就是引退。

在5月22日与同一个人进行的第二次长谈中，他又谈到了原来的主题。他说，盟国在突尼斯取得的彻底和突然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委员长的地位，以至吴开先与和谈问题已被弃置一边。但是，他认为总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在中国人眼里，盟国能够采取些什么行动以尽快拯救中国，还要等着瞧。与此同时，日军在湖北采取的行动具有更大威胁。和平条件可能会仍然受到考虑——或者由蒋来利用它们进行讨价还价，施加威胁，以换取盟国出面支持他……

〔这一报告的其余部分谈到高集认为政学系是国民党实行改革的唯一希望。同时，他承认，政学系没有什么可取得对政府的控制权的可能性。〕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幻想。1943年4月谢伟思返职重庆时，对这一点感到特别强烈。知识分子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被领导集团的浅薄思想和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恢复儒家思想的倾向大大激怒，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儒家思想。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知识阶层被认为是当然的治人者。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感，被认为是国民党失败的生动的微象。

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和文化控制的不满

1943年6月2日

档案页：893.00/15038

在我从美国返任后，我发现中国知识界对委员长本人和国民党当前实行的新闻检查和文化控制的不满，是更加强烈和直言无讳了。在同许多中国朋友交谈中搜集到的故事和事例，最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在以威斯巴所著《日本的秘密特务》*为脚本的中国电影拍完后，放给委员长看。他指示电影中表现满州游击战争的部分要剪掉，因为那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影片的其他部分，进行了重拍，以显示办公室的墙上挂有委员长和孙中山的像。这一重拍工作是在中美文化关系协会各办公室里进行的。……

一位很负盛名的剧作家最近写的一出很受群众欢迎的戏，在观众如潮的演出期间，被下令禁演。问题的起因是，剧本描写了一个基层医院里的正直的、富有理想的医生和护士们，赶走腐败无能的管理人员，而由他们自己接管了医院。这出戏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含意，可是，委员长却说，这是对中国官员的攻击……

新闻界人士对禁止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的消息都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对外事方面的新闻发布和评论工作不健康的集权所致。受禁忌的主题有：国内政治；对政府物价管制措施的批评性讨论意见；灾荒未得到充分救济的议论；现在遍及许多省的农村的骚动；有关共产党问题的任何议论；对贪污腐败和工作效率不高的责难；转载国外评论中国的言论。《大公

* 为日本人效劳的一个前意大利特务耸人听闻的丑闻暴露。

报》在因为发表有关河南饥荒的文章而被勒令休刊后，甚至也不再想惹事生非了。……

我在去年夏天出差途中接触了一些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教授，他们直言不讳痛恨陈立夫和教育部，实际上，每个人对在他们的学校里玩弄政治阴谋都啧有烦言。我有好几次听到人们以饶有兴趣和取笑的态度谈到“新的C. C. 故事”。这些故事一般都是关于教育部未能把它的人安插到一个想望得到的位置上。……

知识界对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尖刻反应，在有关这本书的报告中已作介绍。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公然说他们没有读过这本书。另有人指出，“对于一个在日本只受过第二流教育而后来又在上海当股票经纪人的人来说，人们也只能作如此期望了。

新任宣传部长张道藩不学无术，没有任何威望，是一个公认的封建主义者。这就是说，在文化上，一个只会向中国古代看的人。

知识分子对被要求参加中央训练团——一个政治训练班——作出的反应是感到尴尬，并表示明显的不高兴。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在“毕业”后发表评论说，课程是“皮肉受苦，头脑轻松”。他和一批在训练团结业的人嘲弄那里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他们（都是成人，而且级别和职务都很高）所受到的孩子般的对待，有时没有按要求的规格整理床铺就要被大声点名，讲课都被归纳为几句简单的口号，并且一定要背熟。一位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在追述一次讲课时笑言道，在课堂上，受训人一再被纠正，因为在讲话中不准用外来语，例如最通用的“密斯脱（先生）”、“密斯（小姐）。”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是，在提到委员长时用“密斯脱蒋”，而不是通常习惯的头衔“主席……。”

人们对陈立夫、张道藩以及其他的人，如孔祥熙等，力图使中国退到孔教时代极为不满和厌恶。因为他们认为孔教是一种阻止中

国进步的愚民势力，他们把这些努力看成是国民党根本的反动性的证明。他们不喜欢目前的一种倾向，即事必引用晚清孔教学者，如曾国藩和张之洞——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的著作。人们普遍说，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复兴死去了。

1944年初，谢伟思对最出名的抨击国民党及其反共政策的人士之一进行了两次拜访；这就是孙逸仙夫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要是名誉上的）。“她非常孚众望，她几乎是众目所仰。到重庆的很多重要人物、将军等等，通常都要想法去拜访她，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引见的话。”另一方面，她没有可能对中国政治施加多大影响。“她在重庆不大出头露面。人们可以到她的住处去拜访她，但是，这样作时必须愿意接受盘查凌辱。人们认为她被隔在篱笆外面。”下面是谢伟思关于这两次谈话的备忘录的摘要。

与孙逸仙夫人的谈话

1944年2月14日

档案页：893.00/158282

2月10日下午，我应约拜访了孙夫人。同我前四、五次碰到她时的情况相比，她是更加直言不隐而且显然是近乎怒不可遏了。……

她说，最近“有几个团体”邀请她访问美国。她没有说出这些团体的名字，我得到的印象是，都是些救济团体，特别是支持她在中国的工作的那些团体，例如保卫中国大同盟在美国的对应组织。她曾想接受这一邀请，并希望能在3月初启程。可是，她

被明确告知说，不许她出国。

她认为，她被拒绝出国是她的家族和国民党的高官们对英国工党杂志《雷诺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作出的强烈反应。这篇报道说，她曾致电美国的一些团体，说明了对共产党人实行的封锁，并且要求取消封锁以使医药和其他物资能够送到共产党人手里，从而使一切中国人都能获得同等机会进行抗日战争。在重庆获得这篇报道的文本后，吴铁城、何应钦、张治中*分别拜访了她。她把他们的谈话称作幼稚的说教，他们谈话的主旨就是责备她“散布无根据的谣言”，“乞求于外国人”，“家丑外扬”等等。她承认，她曾经就封锁问题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她指出，人们从来都知道，她和她的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的看法主要是关心于使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得到救济。她提到，她的家庭受到“很大打搅。……”

孙夫人与她自己的家族和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衡量国民党与自由派之间的关系动向的标尺。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当谈到她致力于取消对共产党人的封锁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悦时，她以一种不屑的口气暗示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我不能行动。”

与孙夫人的讨论

1944年3月5日

档案页：893.00/15320

1944年3月4日与孙逸仙夫人的谈话札记。

* 这些人的职务分别是：国民党秘书长，国防部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当我应约到达时，宣传部长正在拜访她。我一到达，他马上告辞了。我向她表示致歉，她笑着说，这是一次费力的谈话，已经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宣传部长带来了2月14日一期的《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的中文译文，文章中引用了她写给美国朋友的信，宣传部长谈话的主旨是说她向国外散布了有关中国国内问题的不真实的恣意散布的谣言……（《时代》周刊引用的话也就是《雷诺周剂》所报道的和前一电报中提到的那些话。）

宣传部长还力图说服她就她已经同意发表的关于孙中山诞辰的一篇广播演说，接受一个妥协方案。这篇演说是应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之邀而写的，是美国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计划的一部分。在她接受邀请以后，她被要求提出她的演说词的文本以供审查批准，她提交了演说词，可是被大加删改（她把这归罪于宣传部长）。于是，她拒绝发表演说。她向我说明，她愿意修改某些攻击性的辞语，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由于她原来接受了发表演说的邀请，宣传当局将难以说明她为什么又不发表演说了。部长的使命未能完成，她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孙夫人强调这件事要保密。）……

在谈到最近谣传宋子文被禁闭一事时，她笑了，并且说，如果他被禁闭并加以审讯，那倒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澄清气氛。我提出在对任何一个人进行审讯之前，至少要提出起诉，她回答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谈话时的态度给人以明确印象：委员长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责难。她继续说，如果她和宋子文被关在一起，那才好呢。

她心里显然有可能被禁闭的想法，因为她在谈话中后来又提到这件事。她说，孔祥熙很为她忧虑，他曾对她说：“如果你继续乱说一通，他们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她回答说，她欢迎。

谈话中两次提到戴笠。谈话不久，她问（与上面谈到的事并

无多大关系)我是否知道戴笠很不高兴。我表示不知道,她解释说,他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征税和缉私不再归他管,他失掉了很多收入。

后来,她提到她的一位女秘书(即廖梦醒——译注)的哥哥被关在江西集中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廖承志。他的父亲叫廖仲凯,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由于这是一名门望族,因此这一案件被众所周知)。她继续说,戴笠现在利用重庆的一些防空洞作监狱,最近一件事把这给揭露出来了。被关在某一防空洞中的一位犯人设法给他的一位有影响的律师朋友递出了一张纸条。这位律师就去见戴笠,戴笠矢口否认有这种监狱,可是,这位律师穷追不舍,坚持要探监,戴笠无奈,说这是下级所为,他不知道。……

在谈到(监察院长)于右任赴成都一事时,她说,他两年来一直想辞职,并且说,像于右任和冯玉祥这些自由派,心情不快,但无能为力。当问到白崇禧是否也可以属于这一派时,她以颇为令人惊异的强烈语气加以否认,但是,没有加以说明。……

毫不隐瞒对蒋介石政权不满的一位中国官员,是立法院院长、孙逸仙之子孙科。从1944年起,孙科就开始奉行一种明显地批评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显然是企图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可以取代蒋的自由派。

“孙科不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人们说不准他究竟想干些什么事。但是,他想使自己成为左派、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发言人。他这样作究竟是因为他看到俄国的上升,并且认识到中国必须和俄国打交道,还是有其他原因还不清楚,孙有一个自由派的名声。但是,他也是一个风向计。因此,他的看法是重要的。”

1945年2月,孙科对保罗·林伯格上尉发表了一次谈

话。林伯格以前是一位教授，当时在G-2（情报）工作。他的父亲曾任孙逸仙的顾问，因此，与国民党有很好的联系。孙科关于应该如何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的想法，几乎与谢伟思的看法不谋而合，谢伟思发回了与林伯格谈话的这一简短备忘录。

孙科博士的观点

1945年2月17日

美亚文件：1347页

1944年9月8日，林伯格上尉拜访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鉴于国共谈判又陷于破裂，林伯格上尉所报告的孙科的谈话，有几点是使人感兴趣的。

“委员长寄希望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以此使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而把中国人民撇在一边。因此，责任最后落到了美国人身上，美国是有力量改变局势的唯一因素。

“孙博士认为，关于美国给共产党和游击队以援助的问题，如果只是告诉委员长而不是请求委员长同意，就会比作其他任何事情更易于使委员长同他们（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否则，委员长将会继续坚持，虽然在法律上看是正确的，但却意味着要把整个华北和华东拱手让给伪军和日军的那些条件。我插话说，这可能正是某些领导人所希望的——即伪军至上，如此便能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实行与汪精卫政权的合流，孙博士对此未发表意见，只是苦笑一笑。”

一位受过战火洗礼而现在没有什么权力的军人是“基督

将军”冯玉祥。据说在二十年代他的显赫时期，他曾用消防水管的水龙头给他的部队实行洗礼。冯是一位身材魁梧、满身乡土气的人。他远远处在重庆领导集团圈子之外。他的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在政治上说没有任何意义。1944年中，冯玉祥邀请谢伟思和保罗·林伯格去会见他，显然是企图引起史迪威总部的注意。当时，史迪威和蒋介石正进行他们之间的可能是最后的决斗，据谢伟思了解，冯急于表示他支持史迪威的主张。

访冯玉祥将军——需要改善 中国军队的状况和领导

1944年6月6日

个人保留文本

冯玉祥将军昨晚通过秘书邀请林伯格少校和我今早与他共进早餐。

人们知道，冯将军认为他是美国的友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某种代言人。冯将军派来邀请我的他的秘书，第一次使我们知道了有关成都机场事件的消息。这次事件是因对修建机场征用的土地未能按期付款而引起的*（见1944年2月11日我的备忘录），因此，我确信他发出共进早餐的邀请必定有某种动机。

事情发展证明，这一动机就是要说明，除非作出某种努力改善中国军队的处境和领导，中国就没有能力继续抗战，这关系到

* 谢伟思2月11日的备忘录这里没有印出，但可参看2月16日关于同一个问题的备忘录，见书本26—32页。

联合国（编者按：原文如此）的事业，而除非美国对委员长施以压力，中国军队的处境和领导就无从改善。

冯将军是步步深入地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说明了他为推动向政府自愿捐助的运动而进行的努力。他说，人民是爱国的，问题是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信任；他们只被命令如何如何，而未能以合乎人情的语言向他们说明需要他们的参与和帮助。只要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所在，他们是乐于帮助，不管是用金钱还是自愿劳动——他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接着，他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他说，这一切批评都是正确的、善意的。除极少数人外，所有中国人都欢迎和赞赏这种批评。

从这一点起，他接着又阐发了中、美友好关系这一主题。他说，特别是现在，我们是作为盟国战斗在一起，我们的利益紧密相连，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就是另一方的胜利或失败。他说，美国在中国并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战斗。如果美国不是拒绝了牺牲中国的利益并放弃其帮助中国的决心的话，珍珠港事件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美国作为共同事业中的一个朋友和盟国，理应极为关切中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

但是，中国军队的状况已经演变到这种地步，不进行大力的改革，就不能有效地继续作战。

责任主要在于军队的现领导。过去，大多数指挥官都是行伍出身，他们熟悉士兵和上级军官，由于他们来自普通战士，他们能够赢得士兵的尊重和服从。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新一代的军官和指挥官，不是来自普通士兵。他们从军校毕业后，都设法当参谋或在机关工作，然后，经过一段短的时间，通过人事或政

治关系，进参谋学院（陆军大学）。然后，再经过一段短时间，就变成了战地指挥官。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作战，对作战没有兴趣。由于他们对手下的士兵没有接触和同情，他们不能有效地统率其部队。

这种腐朽的制度在上层军官中造成贪污受贿和腐败成风，士兵饿死，而他们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经商，对在当前存在的征兵和新兵所受对待的可怕情况下可能造成的人命问题，漠不关心。他谈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四川送 2000 名新兵到湖南，竟需要 1000 名士兵、军官和伙役等等沿途押送。但是，这 2000 名新兵沿途逃跑了 500 名，死了 500 名，到达时生病的 500 名，只交了 500 名能够入伍的人。而护送的队伍在后来回到四川时，1/4 的人不见了。

这些军官不懂得如何领导；他们可能学过一些书本知识，但他们是“门外汉”。由他们来管理军队，新兵的生命会继续被视若草芥，他们将继续挨饿和逃亡，战士会继续痛恨他们的军官，而且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战。对于这样的军队，枪炮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中国有不少素质好的军官和指挥官，他们作战勇敢，战绩卓著。但是，他们不是受到奖励和提升，而是受到压制。那些有关系的年轻人和在新制度下毕业的人超越了他们。这些人中有李宗仁、冯治安、刘汝明（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人，我没有听清他的名字），这些人坚持在前方作战。他们都是很好的部队领导人，但是得不到承认。像汤恩伯等这些新制度的产物，从来没有在基层呆过，与战士没有任何接触的人，他们的履历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唯一能够实现这种必需的改革以使中国军队获得真正领导的人，是委员长。但是，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也没有那个中国人可

以告诉他。能够并且有权利向他施以压力的唯一外界力量是美国。因此，他希望史迪威将军和作为美国代表的驻华大使能够作出坦率的、强大的努力，促“委员长改变心意”。这种“委员长的回心转意”是中国和中国有效参与我们共同事业的唯一希望。

他既没有直接、也没有推论式的暗示，如果“委员长的心意”不能改变，应该怎样作。这肯定并不意味着冯将军对委员长的领导厌倦了。他所抨击的是委员长周围的人。有意义的是，他既没有谈到副总统华莱士即将进行的来访，也没有谈到国共僵局的状况。

冯将军以极其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作了这一阐述。他说，虽然他将坚持他的这些信念，但他宁愿不要加以宣扬。他要求应该告诉你*、史迪威和大使，并且明确同意可以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渠道范围内传布他的观点。显然是要努力说明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把一张名片给林伯格少校要他转交你，另给我一张要求转交大使。（此报告林伯格少校已阅，他表示同意，不再另报。）

说明：

冯以强烈抨击何应钦著称。除了汤恩伯以外，他虽然小心地避免对任何人作点名批评，但他的论证的逻辑是，这就是对何的抨击。受到何提拔的人大多数都是陆军大学——何的宠儿——的毕业生。

对重庆领导集团的批评并不都只限于口头的。1943年下半年，一批青年将领着手策划采取某种行动，以促进政治局势的改变。这一计划的细节迄今仍不清楚。看来是要效法西安兵谏的榜样，扣留委员长。谢伟思就这一计划写了好几份

* 显然是指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伦少将。

报告，这里印出其中的一篇。

青年将领集团

1944年2月10日

个人保留文本

下述报告是继前此的一个备忘录之后提出的，那个备忘录谈到中国军队内部一个集团的形成和暴露，这个集团想给委员长施加压力，以求对政府实行一些重要改革。

《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根瑟·斯坦因在10天前访问冯玉祥将军时向他问道，当前有关这个军官集团的传闻是不是真有其事。冯将军反问道：“你听到些什么说法？”于是，斯坦因把有关这件事的传闻重述了一遍，（他说明是从好几位可靠的中国人士处听到这一消息的），他说，举例说，这个集团想在昆明扣留蒋介石，要求撤销何应钦、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职务，后来，有16位将领被逮捕和处决。冯将军仅作了如下评论：“你的报道基本是正确的。”

今天，我向孙逸仙夫人提到这件事，询问她对国民党某些人士力图把这归罪于共产党人有何看法。她说，她知道存在这样一个集团，它引起“最高层”（显然指她的妹夫和委员长）很大的不安，“一大批人”被捕，但是，他们对未能彻底破获这一组织还感到不满足，因为这一组织扩展非常广，包括相当大一部分军队，实际上，这是一次未遂的政变。她说，企图把此事归罪于共产党人是可笑的，因为这一计划从精神到目的都是彻头彻尾“法西斯主义的”。她还说，如果国民党相信它自己编造的故事，即共产党的阴谋在军队中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它现在就不会愿意同

共产党人进行谈判了。

怀特（卢斯出版公司）对这件事作了如下解释，他说他的消息来自“可靠的高级黄埔人士”。“何应钦将军一直在努力仿照德国的榜样，在整个中国军队中建立一个总参谋部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总参谋部（何应钦领导）的代表在他们所在的部队中，将或多或少处于向战地司令官发号施令的地位，即使战地司令官的级别可能更高一些。为了实现这一点，何应钦一直在任命他所控制的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建立这一体系的企图在军队内部，特别是在同何应钦不和的如陈诚等人统率的军队内部，制造了摩擦，参谋军官发现他们自己不能有很大作为（可能他们认为他们已得到何应钦的默许），于是决定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当前的阴谋是由陆军大学第9期的16名学员发起的。他们已全被逮捕了。”这一消息在某些问题上与其他消息是一致的。也有些不一致之处：张治中将军没有指明何应钦是反对的目标之一；有些人士说，陈诚应对计划的暴露负责。可是，从所报道的动机看来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黄埔人士也可能不是没有偏见的。

这些报道已使这一消息的来源扩展到10多位重要的非共产党人士，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了“面子”关系，可能不会正式承认军队中存在这种不和。可是，有意义的是，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的。

外交问题：中苏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人们都已经看清楚，盟国的胜利已属必然，而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关键问题，将会涉及盟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亚洲，中国、美国和俄国必须学会一起生活。显然，中苏关系具有关键重要性。

国民党对苏联的政策已几经反复，每次反复都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密切相关。从1923年到1927年，由于斯大林向国民党供应军火和派遣顾问，使国民党人能以在多年军阀混战后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这一时期国民党同苏联是亲密的盟友。在1927年4月蒋发动反共政变后，苏联顾问被赶走，国民党的政策受它的领导人的刻毒的反共主义所左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蒋在西安被扣，这时才打开了统一战线的新阶段的大门。1937年8月，也就是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烽火之后，中苏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接着，签订了由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财政协定和军事协定，根据后者，苏联派出200名“志愿兵”执行对日空中作战任务，并派出500名苏联顾问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当美国还在继续出售废钢铁以喂养日本的战争机器的时候，俄国显然是中国最好的盟友。

1941年，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新四军事变标志着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同俄国人的关系也同等的变坏了，顾问和“志愿人员”撤了回去，以准备应付预期中的德国的进攻。而一

待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卷入了战争，重庆就觉得再也不需要俄国的友谊或支持了。

重庆和莫斯科之间会发生齟齬的一个重要地点就是新疆。这是一个人口稀少中亚省份，境内多山和沙漠，与苏联和外蒙有着漫长而未经明确标定的边界。从1933年起，新疆一直由军阀盛世才统治着，他与苏联密切合作。尽管盛采取了某些严酷的警察措施，但由于同俄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在开采油田方面得到俄国的援助，这个省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盛从苏联大规模的军援中大饱私囊。对该省的主要的非汉族居民和常常反汉人的居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新疆不要受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到了1942年，由于俄国人专注于其西线的局势（指欧洲战场——译者），而美国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于是盛转变立场，而与重庆结盟，很快，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官员涌进他的首府乌鲁木齐（迪化），伴随他们而来的是新的苛捐杂税，通货膨胀和同俄国的贸易濒于断绝。不久，引起了非汉人居民的反应，在蒙古边境上爆发的一次哈萨克人的地方起义，很快演变成一次全面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中，所谓的俄国的（很可能是蒙古的）飞机轰炸了驻防在新疆——蒙古边境上一块有争议地区的中国军队。重庆政府试图要美军派遣观察员去调查轰炸造成的损失，从而使他们卷入这一事件。这时候，谢伟思受命准备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一报告是谢伟思就新疆事件所写的一些备忘录中的最全面的报告。报告表明，他确实很担心蒋对俄国奉行一种灾难性的对抗政策，他建议美国不要卷入这一冲突，这是他提出的被华盛顿明智地接受了少数建议之一。

新疆的局势

1944年4月7日

档案页：761.93/1771

很明显，中国人虽然很关心轰炸事件和新疆的局势，但是，他们对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仍然是莫衷一是和犹豫不决。

国际宣传局的一位官员，4月5日晚间在同一位著名的外国记者私下谈话中承认，塔斯社消息*和其他报道总的说来是准确的，有助于表明是中国方面挑起事端。他明确表示，中国军队越境进入了外蒙。他解释说，中国采取这些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俄国与英、美之间的关系已趋紧张，加剧这一紧张符合中国的利益。他指出，新疆的中国当局随时将他们对这一事态的看法充分通报那里的英美当局，并已作出努力，提请英、美两国政府关注。最后，中国方面准备了一篇长篇声明，当塔斯社的强硬和显然是官方授意的文章发表而首先表态时，差一点在重庆发表。

* * *

把整个这一问题解释为中国想使联合国（编者按：原文如此，恐是盟国之误）内部的关系复杂化，甚至，虽然这种解释是来自被认为相当可靠的中国人士之口，也很难被认为是充分的。中国的动机实际上可能有几个方面：

1. 中央政府希望建立对整个新疆的无可争议的控制。

* 当这一事件在三月间爆发时，中国立即指责俄国进行了侵略，苏联在四月三日打破了沉默，由塔斯社发表一篇长文，指责中国入侵蒙古领土，并郑重声明信守与外蒙的互助条约，制止中国的侵略。

新疆的恢复是中国领土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稍为不同的观点看，这种统一等于是封建帝国主义，国民党认为，要胜利完成统一就要与时间竞赛，不能等待到俄国从其西线危机中充分恢复过来而再次设法把新疆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的时候。

建立这种控制涉及几个方面：

(甲) 建立对全省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在这方面，重要的显然是新疆最北部阿尔泰山主要分水岭以北的地区，新疆和外蒙都声称这一地区属于它们。……

(乙) 摧毁像哈萨克之类顽固的、基本上是独立的少数民族，哈萨克居民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就是争议的阿尔泰区，他们过去长期生活在那里而不受政府控制。

(丙) 克服当地继续存在的反对中央政府控制现象。新疆人口的多数不是汉人，中国人在那里的控制一直是不牢靠的。据报道，当地平民对当前中国人企图重新确立控制并不热心。举例说，有消息报道，发生了一些骚乱，中央政府运往新疆的一些新的汉人移民在骚乱中被杀死。可以认为，造成这种骚乱的原因是，新疆的可耕地有限，而一向从事农业的中国人侵占和破坏了当地游牧居民赖以维持生计的草地。……

2. 中国人可能希望试探一下俄国的政策。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一点是重要的。

(甲) 关于外蒙。国民党认为，外蒙终将肯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作为国民党公开宣布的使命的一部分，它决心恢复中国的自由和领土完整，使外蒙终将复归中国控制……

〔然后，谢伟思研究了中国人声称对外蒙拥有主权的法律的。〕

历史的和道义的根据，他最后估计了蒙古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因此，发现这样一点并不奇怪，蒙古人，像西藏人，可能还有新疆的非汉人居民一样，痛恨和害怕汉人，决心保持他们的独立。

(乙) 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国民党认为，共产党人过去受到苏联支持，将来可能还受到支持。他们认为，俄国在外蒙的政策趋于强硬可以视为一种迹象，表明俄国有兴趣和意向于共产党人。

(丙) 关于俄国在新疆、满州和整个中国的计划和最终参加远东战争问题。举例说，俄国是否打算在战争中起友好帮助的作用，她是否不打算谋求自己的私利，她是否愿意她的邻国是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强大、独立和友好的中国，因而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且不对中国对诸如外蒙这类地区享有实际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主权的要求，提出争议。这些都可能引起争论。

3. 现在的中国领导可能希望在国内外挑起反俄情绪。

国民党政府和其他许多中国人患有恐俄症，把俄国视为——确实潜在的——比日本更大的敌人。这些人历来的、显然不可动摇的习惯是，利用一方打击另一方，因此，他们不愿看到英、苏、美加深了解的迹象。而欢迎它们之间出现分歧和不团结的迹象。他们期望得到当政的英国保守党和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的反共情绪的支持。……

4. 政府寻找机会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并以此转移人们对在其他方面的失败的注意。

这自然是来自上述第三点。如果国内情况不妙（当前在中国情况必然如此无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一个外国替罪羊来转移人们的注意。政府曾企图以大肆宣扬的收复新疆和开发整个西北的计划来激励人心；现在它可以宣称，这方面受到了俄国的威胁。如果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人拉进这个画面，那就更好了。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突然之间明显出现的一些谣言，说什么苏联、日本、中共之间已取得谅解；中共和日本人之间已作出安排，为共产党提供去外蒙的走廊；共军和中央政府的军队在豫北发生了战斗；苏联空运武器给共军。这些消息来自许多方面，包括最高层的官员。但是，迄今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任何事实根据。……

说新疆局势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这种解释可能被认为是太武断了。而且，很可能是，盛世才由于失去了他从前的主要支柱——俄国的军队和空运——而被削弱。面临着中央政府日益加强的控制，他确是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忧虑，因此，自行其是，甚至愿意以对可疑的哈萨克人进行征讨来为自己找麻烦，并企图在公认的与外蒙有争议的地区建立自己的边疆。正如我3月22日的备忘录中所说过的，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认为，盛是在委员长的直接命令下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战略上是为了将来可能对外蒙施加压力。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面临着内部的麻烦和战争努力的停滞的中国，正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专注于边陲问题——西藏、西北地区的开发，缅北地区的地位，以及甚至与印度支那和泰国的边界。还有一点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同俄国的关系已不断恶化到紧张的地步：俄国从新疆撤回援助引起了争吵和恶感，俄国的飞机和卡车在中国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俄国的军事顾问已不再受到欢迎或受到咨询；贸易和易货贸易几乎停止，俄国人声称中国人没有履行诺言；企图作出的运输安排迄今已陷于

失败；中国人的反俄情绪越来越直言不讳；而且，如像前面曾经提到的，中国人抓紧时机设法从反俄角度利用当前的事件。

认为中国人至少是对使他们和他们的盟国同俄国的关系复杂化缺乏关切，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用他们急于要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为理由加以驳斥的。我不认为这是实际情况。一般中国舆论出于希望迅速打败日本，愿意俄国早日参加战争。但是，我认为国民党领袖只是口头上谈谈这种想法而已。相反的，如果像我们必须设想的他们专为自己打算的话，他们宁愿由美国打败日本。他们希望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友好，并反对扩大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根据同一个推理，国民党害怕俄国真的参加击败日本，因为这样将会给俄国以在远东事务中不可否认的发言权，并且将会大大提高她的威信，大大增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美国在太平洋力量的增强和我们对日战争的顺利进展——目前正是这样——中国政府将会越来越反俄。

这些可能就是中国人在新疆的动机。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 * *

为向新疆派进大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已经准备好借口。用武力可能慑服任何无组织的地方抵抗活动，打破新疆境内的诸如哈萨克这种少数民族集团。他们还能够保证——可能经过一段折冲和挽回面子的时期——最终把盛世才赶走，而代之以中央政府提名的人选*。可是，他们不一定有能力使中国声言的有争议的边界固定下来，因为外蒙古人，即使没有苏联的直接参与，看来拥有足够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还存在一种危险，即中央政府的军事控制，可能证明是自食恶果的行动。在新疆激发叛乱，不是占人口

* 谢伟思的这一预言是有先见之明的，1944年8月，盛被调到重庆政府的农林部任部长。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原编者注）

很多的穆斯林居民因不满而自发起来，就是通过俄国纵容和支持的如像神秘将军马仲英这类的领袖人物。据报道，10年来俄国人一直把马“保存起来”，以供这种可能终将出现的用场*。纷纷谣传马（仲英）出山了，胡宗南将军最精锐部队之一，中国第42军被十万火急地尽快派往新疆，这都表明了中国的关切心情。据报告，甘肃的全部卡车都听从调遣，用于这一目的。

俄国的政策——至少是对外蒙的政策，看来要受到明确的考验。显然，俄国人打算支持外蒙，使这个国家不受外来干涉——换句话说，就是在苏联影响之下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俄国人玩弄的这一花招使某些阶层的中国人和外国舆论相信，俄国在中国和东亚怀有阴谋。但是，如果说中国人期望得到英、美积极支持的话，他们迄今却一直是失望的。外国新闻界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美国表明，它不希望使其与一个重要盟国的关系，在可能是中国人挑起的、看来是一次边境事件的问题上，趋于复杂化。我们已拒绝上钩，即由美国派出代表，有限度地参加中国人主持下的对事件的调查。……

这一事件的发生，而且如果中国领导人坚持其目前的方针，这种事件很可能以其他形式重演，因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对中苏分歧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同苏联和中国现政府的全面关系。

我们必须关心俄国人在亚洲的计划和政策，因为它们必然会影 响我们在这个地区的计划。可是，当前我们在亚洲同俄国人的关系，同我们在欧洲同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相比，仅仅居于从属部分。在欧洲，我们正致力于联合国的全面战争努力和战后的通

* 谢伟思再一次作了十分准确的预言，1944年11月，爆发了一场全面叛乱，只是在苏联领事提出调解建议后，叛乱才告停止。这次叛乱，只差没有攻克乌鲁木齐了，国民党从未能够重新控制丢给反叛者的地区。可是，看来马仲英没有卷到叛乱的中心去。（原编者注）

盘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弄清楚俄国人在亚洲的目的是什么。要获得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材料，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态度和所得到的人们支持，进行仔细的第一手研究。但是，在确定我们在亚洲对俄国的政策时，我们应避免被中国所左右。我们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将会招致主次颠倒。

至于目前的中国政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看到的是令人遗憾地没有表现出政治家气度。蒋介石的政策（或者说没有政策）正在加速经济的崩溃和增强国内的不满。在这样一个时候，他仍然坚持积极的反苏政策，这只能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冒险主义。死皮赖脸想破坏联合国内部的团结，而且这种愿望是认真的。但是，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蒋可能不自觉地以其对内对外政策促进俄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因为这种政策照目前的形式执行下去，将会使中国变得过于虚弱，不足以充当可能的抗衡俄国的力量。蒋这样作可能是自掘坟墓；不仅华北和满洲，而且像朝鲜和福摩萨（台湾——译者注）等民族集团，都被赶入苏联的怀抱。

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都不愿意使自己在亚洲处于同俄国直接对立的境地，也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中国一部分地区或全国拥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

使这两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中国目前反动政府的支持，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表面上，都不要超越经过仔细计划和控制的，只能用于对日军事作战的援助。在这一限度之外，给以外交的或其他的支持，都会鼓励国民党继续执行目前自杀性的反俄政策。这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掌握着不仅控制华北，而且控制内蒙以及满洲的钥匙——相信，我们是站在另一边，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于俄国。最后，将会使俄国认为（即使她现在还不这样想的话），美国的目的是与她的目的

相反的，因而，她必须以任何可能拥有的手段保护自己：换句话说，扩大她的直接势力和影响。

因此，重要的是，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明确下述目的：

1. 避免以任何方式卷入中苏关系；避免一切看来是对中国的无限制的外交支持，特别是对俄国也是一样；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限定在直接用于对日作战范围之内。

这可能涉及到不要轻易对战后的援助和经济恢复作出慷慨的许诺，除非这种援助和恢复预示着是在中国国内令人满意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2. 对中国共产党和自由派集团表示同情的关切，设法使共产党军队参加对日作战。

我们这样作可能会促进中国的团结，并推动中国踏步不前的战争努力。一般说来，自由派人士已经认为，他们的希望在于美国。共产党人，从我们对他们知之不多的情况看来，对美国也是友好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下一步是必须实行民主；同美国实行经济合作，是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唯一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种善意和影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3. 运用我们对国民党的巨大而尚未利用的影响，促进中国内部的团结。这种团结的唯一可能和持久的基础是不断进行改革。

对我们来说，没有理由惧怕运用我们的影响。国民党知道它

依赖于我们；它不会转向正有接近毁灭的日本；也不可能想像它会转向共产主义的俄国；大不列颠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兴趣会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促使国民党中国把它的内部搞好。

在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不是统一在国民党现行的武力和威胁政策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起重要作用，但是，很有可能，这样一个民主的、统一的中国，自然会倾向于美国，而美国由于其同情的美德、地位和经济力量，在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外国大国享有更大的影响。

1944年的危机

1944年，蒋介石中国看来将要真地陷于崩溃了。农村发生了饥荒和骚乱，高赋税、残酷的征兵政策和通货膨胀引起的不满日益强烈。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其他小党派的成员、甚至某些政府官员和军官，都纷纷发出抨击。这一年年初，发生了青年将领的阴谋案，然后，美国新闻界进行了越来越强烈的抨击。不久，新疆事件使中苏关系遭遇危机，史迪威想要中国派兵参与收复缅甸和打通中缅公路的战斗，如在开罗所承诺的那样，但却再三遭到蒋介石的阻挠，中美关系一点也不友好了。但是，造成最动摇人心的影响的，是1944年日军攻势取得的惊人胜利。这一年年底，中国已经丢失了华东的所有机场，而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即现在的京广铁路——译者），使其南北全线贯通。许多人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从1939年到1944年，中国战场是稳定的，或者说大部分是沉寂的，这种印象并不是很符合实际的。1944年2月，谢伟思在一份简短的报告中，对国民党丢失土地的规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甚至在1944年的攻势之前，国民党就已逐渐地，但确实地把一些土地丢失给日本人和共产党（虽然在丢给共产党的时候，国民党宁可把它看作是丢失给了日本人）。

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逐步扩大；中央
政府拒绝承认某些地区的自由中国人
游击政府

1944年2月11日

档案：740：11 Q.W./3760

1. 在中国政府发言人最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根瑟·斯坦因（《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要求说明日军在战区省中占领了多大面积，他得到了一份概要报告。他希望这份材料能够补充另一份类似的材料，后者是他从同一个中国官方人士得到的1939年到1942年日军占领的情况。所有这些报告都列了表格，谈的是1939年1月到1943年10月这一时期的情况，附有一张纸的概要说明。

2. 这些数字表明，自由县的数目不断减少，虽然减少的速度不快，而大部或全部处于日军占领之下的县却相应增加。由于这一时期的开端是1939年1月，即广州和汉口陷落及日军完成对中国内地的入侵之后，日军占领区的这种缓慢增加，显然说明了它在逐步扩大和巩固占领区。1942年1月到1943年10月期间，日军的扩展主要是在浙南和皖南把占领区向前推进。然而，从华北来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旅客承认，在华北，日军靠其封锁战术和把解放区周围的封锁线向前推进，也取得了缓慢进展。

3.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政府发言人在他的统计数字中略去了河北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那里很活跃）。这显

然符合政府的宣传方针，即共产党军队不足道，而且并不抗日。在回答为什么略去河北省不谈的问题时，这位发言人明确回答说，河北省像满州一样，完全处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不是战区。

4. 实际上，河北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人的控制之下，虽然是在共产党人的鼓舞之下，而不是中央政府的鼓舞之下。举例说，一位英国难民，历时一年半，经过冀西很有组织的政府地区，于最近从北平到达重庆。同盟社最近报道说，在冀南、冀东和冀西发生了好几起对共军的小规模进攻。

5. 中央政府自愿放弃其某些最有宣传价值的材料——长时间建立的共军游击区，班威廉先生（英国传教士、教员）通过这一地区，从深入到离北平30英里的地方逃了出来——是一个迹象，说明两派之间现在存在的不和。

12个战区省中有关县的行政管理情况

	总县数	自由县 (A)	部分被占县 (B)	大部分被占县 (C)	完全被占县 (D)	完全被占县 (E)
1939年1月	924	622	41	223	17	21
1940年1月	924	499	41	334	34	16
1941年1月	924	473	31	327	30	63
1942年1月	924	459	33	324	49	59
1943年10月	924	422	36	351	45	70

这些省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译注）。“河北和察哈尔（今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译注）因特殊情况来被列入。”

(A) 完全被敌人占领。

- (B) 县长仍在县境内办公。
- (C) 县长不在原县城办公，但从别的地方行使某种控制。
- (D) 县长已把县府迁到邻县，但对他原来的县仍然发挥某些影响。
- (E) 县长在县内已完全失掉一切影响。

1944年4月，日本发动了在中国的最后攻势。它先是横扫饱受饥荒之害的河南，打通平汉铁路（即今京广铁路北京到汉口段——译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河南的中国军队34个师被全部消灭，日军在汉口进行休整，准备继续南进。然后，到5月下旬，日军重新发动进攻，意欲最后打通粤汉铁路（即今京广铁路汉口至广州段——译注）全线，并攻占衡阳、桂林和柳州等地的华南机场。史迪威将军早就警告说，如果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应为第13——译注）不能变得充分有效，切实给日军以重创的话，日军就会很容易地占领这些机场。当然。史迪威将军的警告是正确的，而陈纳德声言他的飞机将保护他们自己的基地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蒋介石宁愿听信陈纳德的诺言和寄望于美国空军，而不是像史迪威要求的那样对中国军队进行改革。在下面的报告中，谢伟思叙述了蒋给自己造成的灾难的程度。

虽然日本的攻势最后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不像谢伟思描述的那样严重，他却反映了一些有资格的经济学家的估计，并且也反映了重庆的总的心态，确实是“一片绝望和大难临头之感”。人们一度真的担心日军会挥师西向，攻占重庆。甚至陈纳德自己的吹鼓手，为了力求得到大量从驼峰运来的补给，也“以最具灾难性的措词描绘局势。他的助手约·艾尔索普常到重庆去，没有什么人比约·艾尔索普更绝望和悲

观的了：他用他惯用的启示录的手法说，‘末日已经到来’。”

日军在中国东南部的重大攻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

1944年6月2日

美亚文件：554—56页

中国政府发言人在5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一份声明说，日军目前在湖南的攻势是企图占领粤汉铁路全线的开始。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在不安地揣测这一战役。随着战役的真正发动，当前中国人的心态更加变得惊恐不安，有些中国人甚至怀疑，重庆政府能否经受得住日军真的“把中国一分为二”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致认为，后果将是最严重的。

日军的真实意图是要攻占粤汉铁路全线这一看法不管是否成立，现在看来明显的一点是，日军正在进行一次远超出通常“训练演习”规模的重要战役。我们可以设想，他们的目标是占领远到衡阳的这段粤汉铁路，赶走铁路沿线两侧的中国军队，摧毁美国在那一地区的空军基地。看来很可能这些目标会实现，因此，需要紧急考虑这些情况将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经济影响

1. 湖南和江西盛产水稻的地区将要丢失。不管这种丢失是长期的，或者仅仅是暂时的，其影响将是巨大的。自由中国的四大粮仓是四川、河南平原和湖南与江西的湖区平原，河南已经沦陷。湖南必须帮助宜昌周围的军队和两广地区的一部分居民得到

支援，江西要向华东的中国军队提供给养。

2. 贸易将被掐断。这不仅影响从湘赣地区运进来的货物（棉花、茶叶、苧麻、瓷器），而且也影响来自被占领地区的非常重要的贸易。这一前景会立即影响到重庆的市场，趋势表明，货物被囤积起来，市场上商品越来越少，物价在上涨。

3. 将有大量的难民从战斗地区流向更加缩小的自由中国地区。

4. 类似的情况是，中国军队的被迫西撤将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军队仰赖越来越小、越穷的地区来维持，其结果将是，余下的自由中国的农民的赋税和征兵负担更加沉重。

5. 中国货币在日军占领地区将毫无用处，因而将西向流入自由中国，更增加了那里已有的货币流通量。

6. 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加速自由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增加那里的经济困难。

政治影响

1. 这些进一步的失败，中国军队明显的没有战斗力以及孤立无援感觉的增长，这一切所招致的，将是士气民心更加低落。

2. 失去这两个重要的基地地区，将使中央政府被削弱，保有这两个基地，迄今一直使中央政府能保持住使地方势力处于受控制之下的力量，那怕只是对他们的生存施以威胁。

3. 由于中央政府的被削弱，地方势力的实力和独立性将相对地有所加强。云南、四川，广西，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势力，将会更加利用中央政府对他们更大的依赖而谋取自己的利益。

4. 政府的全面削弱和威信扫地，以及越来越无力对付经济危机的加剧，这些情况将激起普遍的不安。这一因素与地方集团越来越增长的独立性相结合，可能引起地主乡绅集团等加强反对

中央政府力图扩大，或者甚至保持在税收和地方行政方面的控制权。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将给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阶层以打击。政府效能将受到损害，而且，可以预期，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抨击和反对将会增加。

5. 要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更小的地区内维持大量军队，必须增加税收和征粮，这会使农村的不安大大增加。在像云南、贵州、广西这类相对贫困的农业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紧要。甚至是在四川这个政府仍然保有的唯一真正富庶的地区，农民们已不时明显表示反对苛捐杂税；在某些地方，已接近暴力抵抗苛捐杂税的边缘。将会招致不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需要越来越多的壮丁以重建被击溃的军队。四川现在是最后的巨大人力储备地，一如征税一样，征兵已引起初期的骚乱。

结 论

日军在中国东南部的这次重大胜利造成的影响，自然必定加重在河南的长驱直入（见5月12日备忘录——未付印）造成的影响，而且，在一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是累进的。因此，丧失河南富庶的农业基地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在湖南和广西的丢土失地而加剧了。

全盘加以衡量，日军的这些胜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如此多方多面，而且可能是如此重要，以至顺理成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会垮台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政府虽然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原因而四分五裂，而且这种分裂还将大大加速，甚至虽然只剩下了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和甘肃，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但是，这个政府必将被凶猛的通货膨胀和必须与地方势力折衡以及农村地区持续的反叛威胁所削弱。它的衰落看

来会加剧，而它的垮台虽然还不会很快到临，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无需多说，作为一个能起作用的军事盟国看，这样一个政府的用处和潜力都是非常之小的。

政策建议

1944年3月，罗斯福决定派其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驻重庆大使馆接到通知，访问安排在6月下旬进行，那时史迪威将军正在缅甸，看来不会回去会晤华莱士。可是，华莱士在访问时可能要求陆军总部向他汇报情况，于是，谢伟思开始起草汇报稿，几经易稿之后，并吸取了在重庆的同事们们的建议，谢伟思的备忘录已逐渐具体化。可是，它看来像是他过去3年从重庆和战地发出的全部报告的概述，另外加上了他自己对美国政策提出的建议。

这一报告从未有助于实现它想达到的目的。虽然在华莱士到达时把报告交给了他，他的繁忙日程使他没有时间研究——即使他确实阅读了。可是，报告已通过惯常的国务院渠道送达华盛顿。谢伟思的备忘录到达时正值导致史迪威被免职的危机发展到严重关头。他的分析看来是特别贴切中肯的，报告被广为散发：战时新闻局和战略情报局作了复制，并通过他们的官僚机构予以散发，还通过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进行了散发。虽然他的建议只有少数被采纳，但国务院表扬谢伟思提出了“及时的、透辟的分析和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1944年6月20日

谢伟思：200-15页

I 中国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甲、日本人在中国采取的是政治和军事并重的战略，这一战略迄今已显然取得成功。

日本有两种可供取舍的选择：

- 1) 它可以把中国打到屈膝投降。但是，这将需要大量的作战和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而且这样作还存在一种危险，即驱使国民党实行真正的人民动员，从而使得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且可能像在华北已经形成的那样，使得日军的任务更加延长，耗资更加巨大。
- 2) 或者日本可以对中国保持使它被慢慢扼杀的压力。建立在巧妙地利用傀儡汉奸，洞察中国内部持续的斗争（包括国共之间的摩擦）和洞悉蒋希望由其盟国在中国境外为他打赢战争的基础上的这一政策，其优点是，只要国民党领导人认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就不会采取为强化战争所必需的措施。从而将会消除对日军侧翼的任何现实的或眼前的威胁，而且可以以相对少的花费来实现这些目的。

日本作第二种选择是押宝在国民党的行为将完全像过去一样。像日本过去的许多赌博一样，迄今证明，这次赌博是经过精

心计算的。中国因慢慢地窒息，而正在痛苦缓慢地死去。中国现在对日本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如果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中国就不能够成功地抵抗决心占领我们在华东的出击基地的日军的进攻。

乙、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10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

中国面临经济崩溃。这一点正在招致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人心涣散。这是日益增长的政治不稳的主要原因之一。委员长还在失去这样一个中国的支持，在抗日战争的头两年，面临着凶暴的侵略，这个中国团结一致，形成了新的、没有预计到的力量。内部的弱点越来越严重，团结的进程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1) 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

2) 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和管制措施不能贯彻执行，处于无效状态。政府越来越难以征集到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庞大的军队和公务人员。

3) 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

4) 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

5) 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广为发展，而且正在加强。危险日益增强：过去时有爆发的抢劫和农村骚乱，规模可能扩大，而且具有政治动机。

6) 地方集团彼此之间，以及其他不满的集团之间，正互相结合起来共谋发展，正在积极巩固他们的地位。在中央政府日益

削弱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增加的力量迫使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新的政治按抚措施。

7)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正象1943年底发生的“青年将领阴谋案”这一重要事例所表明的那样。在更高层，战区司令官们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正在产生新的“军阀集团”。

8) 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

9) 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看来它没有能力用吸收新鲜血液的办法使自己重新获得活力，而且它的保持不变的领导表明了越来越采取舵岛政策和失去了现实感。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为了对付这种情况，领导正转向借助反动的、不得人心的陈氏兄弟集团（指陈果夫、陈立夫——译注）。

10) 委员长表明同样丧失了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而且越来越加强了狭隘的保守观点。他的日益发展的自大狂和把自己装扮成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先哲”——举例说，象他的经济学著作和《中国之命运》所表明的——这一倒楣的努力，使他失掉了许多在中国享有无可争议的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敬重。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抨击，越来越公言不讳。

由于河南的挫折，局势恶化和内部紧张的这些征兆一直在增加，而且，如果象现在看来很可能的那样，日军部分地，或全部地从中央政府手里夺去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情况将会进一步激化。

国民党面临着它所遇到的这种严重危机，将不再是中国社会

中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将不再起它过去曾经起过的作用。它过去对现代中国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丙、国民党不仅证明了它没有能力改变它的行动所造成的崩溃；相反，它的政策正在加速危机的发展。

某种厌战情绪必然会在中国产生。而且，在极度的通货膨胀冲击和在国内外都处于软弱地位的明显迹象纷呈的情况下，必须把国民党的政策视为已经破产。……

1. 在国内政治战线方面，国民党领导人对永远保持他们自己的权力的考虑高于一切，结果是反动至高无上。

国民党继续无视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伟大政治运动。委员长的文章和党的新闻机构表明，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民主改革一词的含意。……

相反，趋势还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通过对政府官员进行强制性政治集训，强调军队的政治性质，实行思想控制和在党与政府机构中加强甄别，国民党正在加紧致力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运动，虽然这样一种政策在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

国民党表明，一点也不打算放松它现在的权力所赖以保持的一党独裁的控制。它不仅不想抛弃或减少警察国家——形形色色、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组织、宪兵等等——的形象，而且在继续加强它们，作为维持国内治安的最后手段。（不幸，对这些最重要组织，如借鉴于德国的盖世太保之类的组织的加强，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定责任。）

国民党一心担忧共产党日益强大和潜在的威胁，担心他们会赢得人民的普遍拥护，而国民党由于自己的本质，是不可能争取到这种拥护的。因此，它一方面口头上虽然说要同共产党进行谈

判，以应付国内外的批评，同时，却坚持那些只会导致内战的政策和计划。它这样作表明它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国民党在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状况是如此虚弱，没有外来的援助，要取得成功是很可疑的；这样一场内战将加速解体过程，并使混乱发展；将妨碍进行有效的对日战争；唯一得到好处的当前是日本，最终是俄国。为进行内战而作的准备工作包括有同现在的中国傀儡政权结盟，后者对中国将来的团结和民主预感不安。

2. 在经济战线上，国民党不愿采取有效行动，抑制会对地主—资本家阶级造成损害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要对官场的日益腐败负直接责任，这种腐败是使得不能进行合理的努力以改善财政状况的主要障碍之一。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大规模的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所有这些都是由那些或是在党内有强大势力，再不就是有亲密的政治关系的人进行的。

它拒绝解决中国的一些带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诸如：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过高的租赁费，毁灭性的高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冲击。

3. 在对外战线上，国民党一步步疏远其盟国，表现出它的愚蠢、自私和没有远见。

国民党坚持讨价还价、恫吓和敲诈勒索——与它的具体情况极不相宜——的策略，而且不能坦诚相交和全心全意合作——它自己的利益要求实行这种合作，因而它正在疏远中国的最重要的盟国——美国，它已经疏远了它的另一个主要的潜在盟国苏联，它对苏联的态度，就像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样，是没有道理的、短视的。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不负责任地发布报道说，苏联与日本已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容许日本军队撤出满洲。

国民党是在这样的時候纵容这种形势发展的，即它的生存从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要仰赖于外国的支持。但是，国民党乱来一气的对外政策，不仅危及它自己；有迹象表明，它急于在美、英、苏之间制造不和，在为了战争迅速取得胜利——任何胜利都是一样——而要求实现最大的一致，并尽量缩小分歧的时候，这种手法无异于破坏联合国（编者按：原文如此）的战争努力。

4. 在军事战线上，国民党看来已决定让美国来打赢战争，它自己为了各种实际目的而避免积极参战。

它现在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允许由我们自己花大钱在中国建立和使用空军基地……

它未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给予它的装备，就像它未能有效使用俄国早先给它的装备一样。运到中国的装备经常未被运到前线。据悉，在有些情况下，被囤积起来，或转用于非军事目的。……

它还把军事合作同不相关的财政要求联系在一起，这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敲诈。……

对美国为了搜集有关敌人在中国的重要情报而进行的努力，国民党继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时还加以阻挠。这种态度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说明，中国情报机构答应进行的合作其结果令人失望（我们为这些情报机构尽了很大力，花了很多钱）；不顾签订的协议，继续阻挠美军观察员访问实际的战斗前线；坚持不容许我们与共产党地区发生任何接触。……

在国民党自己的战争努力中，一个有害的、腐败的征兵制度使得只能选择那些不够格的人进入军队，并把他们保留在军队里，因为合格的人和最强壮的人都能够规避服役，再不就是花钱赎买或者开小差，食不果腹和饱受虐待使得国民党大部分军队的战斗力受到极度的损害，在人民心目中，服兵役等于是被判死刑。与此同时，它拒绝接受下述建议，即军队应缩编到能够得到足够给养、医药照顾、训练和武装的规模。它把这种拒绝托词于唯利是

图的政治考虑——集中力量用于在中国继续存在的权力斗争，因为最后是以军队的多少来决定权力的大小的。

为了同一个原因，它拒绝动员其士兵和人民进行中国能够有效从事的唯一的一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争。也许我们的参战会使国民党的问题简单化。由于害怕国内的力量——它自己的人民——像害怕日本人一样，国民党现在设法避免同日军作战，以便集中致力于自己的权力长久不衰。

国民党听任自己军队的处境恶化到什么程度，由最近在河南的失败表现了出来。这次失败不仅仅是由于缺乏重武器，也是由于士气极糟，士兵处境悲惨，得不到人民——他们一直受虐待——支持，缺乏领导，军官中因为同被占领区做生意而普遍存在腐败现象。

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些明显的迹象，即现在的国民党领导，除迫不得已外，已不愿再对日作战，那末，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它可能甚至设法防止使中国成为对日本陆军进行大规模战役的战场。这有助于说明国民党为什么继续与日本人和傀儡明来暗往。因为，国民党可能希望防止日军坚决的进攻，以保持它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拯救实际上是它所有官员的故乡的华东地区，保持它在沿海各城市固有的经济、工业基地。

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这就表明了国民党领导——就是指委员长——方面，玩世不恭地无视战争不可避免的延长会对美国的生命和资源造成更大损失。

丁、国民党的这些明显自杀性政策在国民党的构成和本质中可以找到根源。

鉴于上述种种，提出如下的问题就是很中肯的了：国民党为什么丧失了它的领导力量；为什么它既不愿自己积极对日作战，

又不愿同在华美国军队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为什么它再也没有能力团结全国。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该党当前的构成和性质中找到。从政治上说，美国的一个经典的、明确的描述显得越发正确了：国民党是一个保守的政治集团的聚合体，这些集团主要关心于保持他们自己的权力，排除一切异己，而他们自己之间又互相争权夺利。从经济上说，国民党是建立在农村乡绅地主、军人、政府官僚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以及与政府官僚有密切关系的商业银行家这一狭隘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在战时实际上已经缩小。国民党已不再能够赢得中国工业家的明确支持，而过去它曾一度得到这种支持。由于日军对沿海城市的占领，中国工业家作为一个集团，经济上已大大受削弱，因而政治上也大大受削弱。

对国民党的这一分析同上面提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国民党已丧失了它的领导资格，因为它丧失了与这样一个国家的一致，而且也不再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通过战争的实践经验，政治上正变得更加觉醒，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国民党的自私的缺点。

它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因为不更多依靠人民和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像战争初期那样，使全民族力量都发挥出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通过党的改造和更多的政治民主来实现。这种民主采取什么形式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真正接受民主哲学和采取民主态度；外来侵略的威胁已不再足以激发中国人民，现在，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重新唤起他们的热情。发展民主对中国继续抗战来说虽然是带根本性的，但是，在国民党当前的领导人的心目中，这将会从根本上危害党的权力，因为这会意味着，保守集团将被迫放弃他们一心一意维持的垄断。与

其如此，他们宁愿使战争保持其目前不死不活的状态。这样，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目的，而正在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

国民党无法统一国家，因为对它的支持来自经济上最保守的集团，这些集团希望中国保持经济上和社会上落后的农业社会，这些集团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虽然他们煞费苦心口头大谈这个目标。他们还致力于保持这样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鼓励特权，反对现代的中央集权……

戊、国民党当前的政策看来是肯定要失败的。如果这一失败的结果是中国的崩溃，其后果对我们当前的军事计划和我们在远东的长远利益，都会是灾难性的。

——国民党现在的政策看来是肯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政策与国内的强大力量为敌，而且迫使中国走向毁灭。既然这些政策对我们不利，也无助于中国进行有效的战争，其失败本身不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灾难。出于前面提到的许多理由，我们宁可欢迎国民党垮台，如果在它垮台之后马上能够成立一个有能力团结全国，并帮助我们对日作战的进步政府的话。

但是，危险在于，在国民党统治下，目前的趋势和恶化可能导致突然崩溃，从而在中国造成一个真空，这就会消除在最近将来利用中国军事潜力的任何可能性，因为日本人及其傀儡可能以比一次重大军事战役小得多的代价占领这一真空，它还可能使得从中国侧翼发动进攻和继续从中国的基地进行作战变成不可能。因而战争将会延长，并会更加困难。

这种崩溃还会在中国开创一个内部动乱时期，这种动乱会推迟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出现时间，而这样一个政府是远东稳定和有序的先决条件。

中国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财产，但将来会

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

己、然而，在中国存在着反对国民党领导集团目前倾向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如果给他们以机会，可以避免势将发生的崩溃。

这些集团对政府和负责政府的党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包括有：

爱国的年青军官

小商人

政府官僚机构中的很大一部分下层职工

大多数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授、学生和自由职业者阶层

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分子，他们在像孙科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下，构成一个相当大的少数派

各小党派和某些集团，其中如像救国会，就享有很大威信

中国共产党以及

无可计数的，但越来越不稳定的农村居民。

这些团体的总数及其影响，会是巨大的。一位国民党官员最近承认，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如此广泛，以至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但是，这些集团的大多数是涣散而没有组织的。像农民一样，他们可能只是对他们现在的处境盲目感到不满。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如果有任何信仰的话。可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利益，因而倾向于联合起来改变现状。自然，这种觉醒和聚合受到国民党以其各种可能的手段加以反对。

随着情况更趋恶化，有可能出现这种危险，这些集团中的某些集团，可能盲目地自我行事。其结果可能使混乱局面更加严

重。一次军事政变——这种可能不能忽视——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其结果可能发生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相类似的某种事情。但是，当前形势的更加微妙和不可救药，会使这一事件本身更易于被国民党内部最反动的势力、日本人和傀儡所利用。另一种可能性是，爆发比迄今为止更大规模的，无组织的和破坏性的农民起义。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某些少数党显然正企图与地方军阀同流合污，这些军阀都是中国政治中最反动、最不讲信义的人物，也是死硬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人物。

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所有这些集团都一致认为，中国今天的基本问题是实行政治改革以走向民主，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够恢复战斗意志，统一国家，消除地方军阀主义，解决共产党问题，制定可以避免崩溃的经济政策，组成一个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民主改革是解决中国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所有重要问题的关键。

显然无可怀疑，中国在短期的将来（为了进行战争，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加以考虑），可能长期也是一样，实现国内和平和真正统一的希望，既不在于现在的国民党，也不在于共产党，而在于国内自由分子的民主联合，其中包括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共产党人，这些人以他们自己的言论和过去的行动说明，他们愿意合作以重建统一战线。……

Ⅱ 鉴于这一正在发展中的危机，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

不可能准确预言中国当前的解体能够持续多久而不致引起国内局势的突变和严重影响对日作战。但是，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我们是否能经受得起袖手旁观和听任这种发展继续到几乎肯定会引起灾难性崩溃的地步，或者我们是否希望从法理上和实际上尽

我们所能，制止这种发展，我们需要制定一项现实的对华政策。

甲、国民党和蒋介石深知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而且将不得不吁请我们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解体过程发展到失去控制的时候，国民党将会转向我们，要求在财政、政治、军事上给以救援。国民党对这种依赖知之一清二楚，明白而正确地说明了它为什么对美国的舆论和抨击非常敏感，国民党——尤其是委员长——知道，我们是唯一不谋私利，而且中国能够指望的强大盟国。

向我们提出的请求，除了那个明显的、已经陈旧不堪但仍然有效的纯属情感的理由之外，还会有很多理由。他们过去说过，将来还会继续说，他们早就可以在他们所谎称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了。他们过去声言，而且还将再三声言，他们的抗战和拒绝与日本妥协，拯救了俄国、英国和我们，而无视这样的真情实况：由于我们自己拒绝与日本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妥协，才招致了珍珠港事件，而且在我们尚未准备就绪之前就卷入了战争。他们抱怨说，他们得到的物资援助与其他主要盟国相比太少，而忘记了他们打的仗也少，给予他们的物资没有派上用场，而且他们没有能力使用他们所要求给予的某些物资。最后，他们曾经设法，而且将会继续设法把他们的困难归罪于我们。其办法是，曲解美军在中国的经费支出造成的后果，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整个悲惨局面中，美军的经费支出不过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

但是，不管这些要求如何牵强附会，如果我们断然加以拒绝，可能会引起一些难办的后果：

- 1) 我们可能目睹中国陷入一个内部动乱时期。我们在中国战场的战争努力将被迫中断，远东的不稳定局面将会延长，而

且可能引起俄国的插手。

- 2) 我们会被中美两国大部分舆论责难说“放弃了”中国，而我们对中国的崩溃一直是至少应负部分责任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自己为自己招来这种责难，因为我们曾想使自己不仅与中国，而且与国民党及其政策站在一起。）因此，避免与国民党过于紧密地站在一起，可能是比较好的大胆办法。
- 3) 在中国危急之际明确丢弃它，会使我们丧失国际威信，特别是在远东。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国民党的条件来挽救它，我们就会是在扶植——但也只能是暂时的——一个一蹶不振的政权，这个政权以其目前的构成和纲领来说，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不管是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只能获得一个短暂的喘息，以待最后结算的日期到来。

因此，很清楚，我们的利益所在就是要避免发生这样一种局面：迫使我们在这样两种难以咽下的选择中作出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

乙、国民党对我们的依赖可以使我们施以重大影响。

情况正在迅速发展，因此，委员长将不得不要求我们继续给以支援并增加支援。像他现在那样虚弱，他不能够——越变得弱就越不能够——拒绝我们可能对中国采取的任何协调一致的，积极的政策，或对这种政策施以阻挠破坏。所有的牌都对我们有利。我们的影响如能明智运用，会有很大作用。

丙、我们面前有三个总的选择：

- 1) 我们可以放弃中国，认为它一无希望，把它一推了之，不再过问。

- 2) 我们可以在委员长提出要求的时候，继续向他提供支援。
- 3) 我们可以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付诸实行。

丁、我们在三者之间的抉择必须根据我们在华的目的来决定。

美国如果有一项非常可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就能够在下列方面起重要的，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

- 1) 激励中国在远东积极参加战争，从而加速击败日本。
- 2) 防止中国的经济崩溃，并带来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并加强战后有秩序恢复的可能性。
- 3) 能使中国从战争中脱颖而出，在战后的东亚成为一个主要的、稳定的因素。
- 4) 一个进步的、独立的、民主的中国，将使我们赢得一个长远的、可贵的盟国。

戊、我们应该作第三种选择——制定协调的积极的政策。研究一下中国当前局势的背景和我们对华政策的恰当的目的，这一点就清楚了。

必须从当前的军事理由反对第一项选择——也是为了明显的长远的考虑。它会使我们失去宝贵的空军基地和在日本侧翼的阵地。采取这一选择会延长战争。我们经不起丢开中国不管。

第二项选择的结果不言自明。迄今为止，如果说我们有一项对华政策的话，那就是一直在执行，并正在继续执行的政策。我们给予中国的大量财政援助，被胡乱花掉了，如果说对缓和通货膨胀和阻止经济崩溃产生了任何效果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给予的军事援助肯定没有用于加强中国的对日作战努力。我们的政治支持被国民党用来实现它自己的自私目的，和推行它的短视的、毁灭性的政策。

因此，第三种选择是我们能够作的唯一的现实选择，假定第一种被摒弃的话，援助中国和向中国提供咨询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中国自己必然会要求援助和咨询。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是在使援助能起作用的安排下给予援助，或者，我们是否仍以目前互不通气和不加思考的方式给予援助。过去，有些时候看来好像我们的右手不知道我们的左手在做什么。没有一项一贯的协调的政策，继续援助会是白费力气。不管是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会得到可以看到的好处。这只会已经在使我们伤脑筋的问题之外，继续制造新问题；我们不会得到任何补偿，除了那些无关痛痒的短期的权宜之计。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随意的援助，可能对短期的权宜之计有好处，但可能不足以挽救局面；即使有这些援助，中国也可能继续走向崩溃。

己、这种积极的政策应该是政治上的。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像过去那样，无视具有军事含意的政治考虑，或者我们是否要学日本人的作法，借助中国国内更强大的现有政治力量，来完成我们的军事目的和长远的政治目的。

我们必须想法帮助使目前走向崩溃的趋势逆转过来，并且唤醒中国不再在军事上无所作为。这一点只有通过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的进程才能实现。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我们的作用必须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谨慎地运用我们的影响来实现，迄今我们没有自觉地、有计划地运用这一影响。

民主改革不一定意味着要推翻委员长或国民党。相反，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有远见的话，他们的地位会得到改善，中央政府的稳定会得到增进，中国内部已经存在的民主力量将会加强，国民党反动的集权趋势将受到遏制，一个多党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可能会出现。可以肯定，委员长和国民党在这样一个政府中会

继续起主导作用。

无需多说，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中国国内的力量来实现，并且取决于国内的力量。不能由我们或者任何其他外国来强制实行。由我们授意“民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会把我们置于受责难的地位，日本人和反动分子都会加以利用，指责说这是“帝国主义”民主。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出办法，间接地、有时是不动声色地施用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明，我们是赞助并严肃关切于民主的。

在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已非常强烈。我们可以确信，随着我们的态度变得明确，和我们希望中国自己应当成为实行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将会出现不断的进步。

Ⅲ 这一政治政策的执行固然在某些方面会遇到困难，但却是可行的，并且能用许多方法加以贯彻。

甲、在行使这一政策时需要外交技巧，不要冒犯真正民族主义的强大潮流，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几乎所有各界中国人的特征。要把它同国民党的沙文主义区分开来。……

乙、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有效协调一切有关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政策和行动。

目前美国政府机构——国务院、国防部和某些新成立的独立性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使得每一家都不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减弱了美国的影响，而现在正是最需要这种影响的时候。

必须认识到，我们同中国打的一切交道和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有政治含义。根据拟议中的政策，情况更是如此。为了求得政策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协调是绝对必须的。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华盛顿和重庆都有明智而有力的指导。

由于涉及到广泛的问题，在重庆负责协调行动的合理人选显

然是大使。同样，在华盛顿的相应人选可能是国务院中国司司长，后者将为总统或者一位负责的内阁部长而注视着全局的情况。自然，要采取明确的行动，有赖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以及在中国工作的其他机构的代表之间，在华盛顿和前方不断进行密切的磋商。

丙、既然我们能够采取的一切措施不应同时运用，因此，就要仔细选择先后和时机。

有些措施是简单的、马上有用的。另一些应待到采取初步行动之后。还有一些会是更加强制性的和直接的，这些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民党是否顽固拒绝改变其道路。我们在运用我们的影响时，必须既避免过分，又避免不足。

丁、在执行这一积极的政策时，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消极的措施

1) 停止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娇惯”：

限制租借法案

削减对中国军官的训练

中断对中国军队的训练

在财政谈判中采取更强硬态度，或者停止运送黄金

这些限制性措施中的任何一项或全部，在委员长和国民党在进行军事作战、装备使用和训练供应、财政问题上合乎情理、或者允许我们出于军事需要，有同共产党地区建立接触的自由等方面，变得较为合作时，都可以加以改变。

2) 停止在国际上和在美国国内树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威望。这种“面子”在中国只会起支撑这一政权的作用，而且会强化它当前的政策。在战争的早期阶段，我们把中国列为“四强”

之一是为了一个有益的目的，并作为对日本人的种族宣传的反击，但是，现在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我们的对华态度中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而放弃空谈一般原则，将会被迅速理解，而不会引起反感，即这可能被认为是针对英国人的。我们可以说清楚，值得赞扬的时候，将给予赞扬。

3) 停止根据善后救济总署之类的方针，作出给予无条件和慷慨援助的许诺。救济总署是一个战后对外给予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的组织。我们可以无需十分清楚地说明，当中国表明值得给予援助的时候，我们随时准备给予援助……

4) 中断我们目前同中国秘密警察组织实行的积极合作，这些组织支持反动势力，拥护同美国的民主宗旨和理想背道而驰的东西。这种合作在中国越来越为众所周知，其结果是有效地加强了盖世太保之类的组织，使寄希望于我们的中国自由派感到迷惘和幻灭，并且削弱了我们在促使进行民主改革时与国民党领导人打交道的地位。

2. 积极的措施：

1) 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和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可以表明我们对中国民主和团结的关切，和对国民党现在的军事、财政金融和其他政策的不满。

2) 我们应该接受国民党一再提出的提供咨询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常常不是真心实意的。

3) 我们应该运用各种实际可行的手段，没法对中国舆论施加我们的影响。战时新闻局除履行其发布美国战争新闻的现有职能外，还应该宣传民主作为一种长远的政治制度和帮助进行反独裁战争的价值。我们应当努力设法通过广播和其他的直接手段，加强在中国传播美国的建设性批评……

其次是积极扩大我们的文化交流计划……

其他非直接有关的方面是，在新的地点增设美国驻华外事代表处（因为每个代表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扩大美国影响和与中国自由分子及留美学生进行接触的中心）；精心教育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要他们以自己的榜样和对中国人的态度引起对美国和美国所支持的东西的好印象。在美国和中国军事人员之间建立起密切接触的地方，如像缅甸，民主影响就明显增加了。

4) 我们应帮助教育美国舆论，要对中国采取现实的，但是建设性的同情态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非官方的方式，向认真负责的政治评论员、作家和研究工作者提供可能有的背景材料。

5) 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各小党派和共产党人保持友好的关系。为要求和应该得到最大的效果，可以用公开的、正大光明的方式进行这一工作。这种工作所包含的意义，会很快被中国人理解。

在这方面进一步的措施是可以宣扬自由分子，譬如某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包括：如有可能，考虑给他们以特别的荣誉或奖励，邀请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或其他团体以示表彰，邀请到美国旅行或讲学。这方面一个极为有影响的行动就是由白宫邀请孙逸仙夫人来访。

我们应该挑选公认具有自由观点的人，代表我们参与战时新闻局、文化交流和其他方面在中国的工作。

6) 我们应该继续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关切。其中包括与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保持联系，沟通双方之间的隔绝的情况，继续力促派观察员去华北。同时，我们应当强调华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管是在获取有关日军战斗序列、空军实力、气象报告的情报方面，还是在获得有关空袭材料和战果估价、被击落的空军人员的隐蔽和救护工作的情报方面，都是一样。我们应当考虑，对日军的积极战斗，最后必将推进到华北，因此，有一个援助共

军和游击队，或者是与他们合作的问题。如果我们以紧急军事需要为理由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赞同的反应，我们就应当不惜一切派遣我们的军事观察员。

7) 我们应当考虑训练和装备中国的地方部队和其他军队，条件是我们能够满意地认为他们将对日作战。

8) 我们应当继续催促——如果必要的话，坚持——派美军观察员到实际战斗的前线。我们应该敦促，可能时帮助改善中国士兵的处境，特别是在待遇、服装、给养和医疗方面。

9) 我们应当宣传政府负责官员的谈话、声明，表明我们关心中国的团结，并说明我们对国民党把美国租借法案的物资用于内战这类问题的态度。举例说，有意思的是，副国务卿威尔斯关于美国关心中国团结一事致白劳德的信，被国民党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禁止在中国发表*。

当然，这个计划远不是完善的。决策机构还可能想出其他措施，而且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有些措施还会相应产生。

戊、这些措施大部分都可以逐步进行。

举例说，像所建议的各种消极措施，以及发表谈话、声明和从其他方面影响中国舆论的工作，更其是这样。制定一项鼓励和关注自由分子、小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的活动计划，顺乎自然地分阶段地加以推进。

己、所建议的计划不包括在互不协调和只是在部分有效的方式下执行的尚未完成的措施。

主要需要的是，要有整体安排、一贯的动机和有计划地开展我们已在进行的活动，现在这些活动中有些可能是无意识进行

* 1942年10月12日，萨米来尔·威尔斯就美国的对华政策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伊尔·白劳德一份备忘录，白劳德曾指责国务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白劳德把这一备忘录公布了。对外关系：1942年，248—249页上刊印。（原编者注）

的。举例说，我们要设法保持同自由派集团的联系；我们已表示希望派观察员到共区；我们已有一个不大的文化交流计划；战时新闻局已有几次设法宣传美国的民主理想。

庚、这个计划只构成对中国事务的极为有限和极为间接的干预。

必须承认，所建议的这些措施中，有一些会涉及对另一个主权国的事务的超乎常情的关切。但是，它们还不至于达到侵犯中国主权的地步。如果我们要使租借法案的援助以中国进行更好的战争努力为条件，中国也有自由拒绝接受附有那种条件的援助。我们不至于走得那样远，象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常作的那样。举例说，我们显然不会提出给国民党的反对党以积极援助或津贴，如象俄国人对共产党所作。

进而言之，中国政府将会看到难以反对。中国人已滥用他们的自由，由林语堂这类的人发表声明和文章在美国进行宣传。林语堂持有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官方护照。他们通过林语堂进行“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自由地批评美国的政策和领导人。他们曾企图通过蒋夫人、卢斯、威尔基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在美国政治中兴风作浪。他们曾经，而且将继续享有自由，以我们在中国试图采用的同样方式，努力去影响美国的舆论。

史迪威危机和“需要现实主义”

1944年秋，中美关系因对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这个人和他的作用发生的争论，发展到一个严重的转折关头。虽然罗斯福总统一直极力主张把蒋介石包括在“四大”盟国之列，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尽力给了蒋相当大的“面子”，蒋在会议上的举棋不定和在会后几个月接连提出的给予贷款、飞机和超乎需要的增加军火供应的要求，使总统对蒋的感情大大冷淡下来。4月3日，由于蒋拒绝把他的美国训练和装备的约克部队（YOKE forces）（即李弥部）投入缅甸萨尔温前线的战斗，罗斯福断然告诉他说：

在萨尔温，你们对面有一个师固守。你们在西线的推进除非取得胜利，不会有所帮助。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有利时机，一年来我们一直在装备和训练你们的约克部队。如果不把这些部队用于共同的事业，我们在运给装备和提供训练方面所作的紧张的、大规模的努力，就是没有道理的了*。

两周之后，也就是在美国发出中断租借法案的供应这一明确威胁之后，中国人终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了缅甸战斗。但是，到了仲夏，随着中国部队在日本的中原攻势下陷于瓦解，

* 见查尔斯·罗曼努斯和里莱·桑德兰著《史迪威的统率问题》（华盛顿：陆军部，军史司，1958），310页。

罗斯福决心提出最有力的补救措施。7月6日，他写信给蒋说：

日军在华中的推进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局势，不仅危及贵国政府，也危及美军在华的部署。这种局势使我得出结论，如果要挽救局面，就必须立即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我认为，当前存在的严重局势要求向一支单独的力量派出代表团，以协调所有在华的盟军力量，包括共产党军队*。

总统不理睬众所周知的蒋对史迪威的反感，继续说，“我知道，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击退当前威胁着中国的灾难和执行我们打败日本的全面计划。”

问题现在明确了，可是蒋玩弄了韬晦之计，力劝罗斯福派一名个人代表巴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来安排史迪威新司令部的日常工作。赫尔利到达中国时，谢伟思已在延安。可是，当罗斯福7月6日的信被面交委员长时，他曾充当译员。因此，他知道，在史迪威的权力和责任的问题上，美、中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他所不知道的是，在这一争论中，赫尔利已慢慢转向蒋的一边，而且问题已不是史迪威的权力的问题，而是史迪威是否继续留在中国的问题。直到10月9日，谢伟思还不知道这一情况。这时候，赫尔利的助手、谢伟思在北京一块学习中文时的老朋友E·J·麦克纳利上校到达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谢伟思和美国军事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向麦克纳利追问重庆事态发展的详情。“他说，问题不是指挥权，而是史迪威是否要继续留任。委员长扯他的后腿，并且要求把他召回去。啊，见

* 出处同前，383页。

鬼。戴维我和对此都大为激动：看来这是一种极大的愚弄，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一直未能充分了解情况。但是，由于问题已不是指挥权的问题，而是史迪威本人去留的问题，……他一定会有被砍头之感。我坐在那里怒不可遏，大骂不止！可以说，由于我们被完全蒙在鼓里，麦克纳利的炸弹造成的影响就更加巨大。”

谢伟思的报告是一份最强烈请求制定一项新的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报告。后来在华盛顿读到这一报告的友人都感到震惊，甚至有些担心。“很多人都对我说：‘天哪，谢伟思！我读了你的报告，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可是，它将会给你招来很多麻烦’。”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1945年11月，当一年前刚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戏剧性地辞去其大使职务时，他就特别援引这一报告作为“外事专业人员”的一项阴谋的证据，说这些人希望“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而是要引起它的倒台。”* 众议员华尔特·周以德和其他人，后来重新检起了这种责难。这种责难还构成了五十年代初期麦卡锡的指控的基础。

这项报告是致史迪威将军本人的一份备忘录。谢伟思是以史迪威政治顾问的身份行事，并且敦促对蒋采取强硬的谈判立场。在议论国民党政府的可能垮台时，他确实没有鼓吹它崩溃，甚至没有预示它会垮台，他只是争辩说，我们不能出于害怕国民党垮台，而减弱我们的谈判立场。其次，谢伟思所建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什么很激进或很新的东西。美国在与蒋打交道中的“现实主义”，一年来都在加强。史迪威的看法与谢伟思的看法十分相似。总统本人在开罗私下会

* 《泰丁斯年鉴》 1984页

晤史迪威时曾问他：“你认为蒋能支持多久？”而当史迪威表示怀疑委员长有能力抵挡住日军持续的攻势时，罗斯福回答说：“那么，好啦，我们应该找另外某个人或一批人来（把战争）进行下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谢伟思深信，即使国民党政府真的倒台，也不会意味着中国抵抗运动的崩溃。他的这种信念是以他在中国各省和战地的长期经验为基础的。他认识到，即使重庆政府垮台了，各省和地方的政府和军队，还会继续抗战。自从1911年清帝国结束之后，中国从未真正统一过。1944年，即使在美国对高居领导地位的委员长的充分支持下，中国也没有真正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说，重庆政府的存在甚至妨碍了战争努力，例如，蒋阻挠给象薛岳这样的省级指挥官运送补给，后者在湖南对日军的攻势进行了殊死抵抗。因此，正是谢伟思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运行非常熟悉和富有经验，使他能够提出这些建议。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听取；而在中国呆了不到一个月并且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赫尔利，发言却居于主导地位。史迪威甚至还没有接到谢伟思的备忘录就被召回国了，并且正在回国途中。

在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中需要有更大的现实主义

呈：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

1944年10月10日

美亚文件：1014—17页

1. 作为供职于你的参谋部的政治官员，过去我曾要我就我

* 见巴巴拉·W·杜其曼著：《史迪威和美国的在华经验》，（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1），第410页。

所见自由申述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虽然我在延安对重庆和华盛顿的事态发展只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我深信你不会对我在附上的备忘录中继续采取的坦诚态度有所责怪。我认为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该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2. 当然，明显的是，你不可能按照所建议的方针独立行事，因为中国的局面和应付这种局面所必须的措施，既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又有长远的政治意义；两者不可分开。由于这种相互关联和由于在中国的行动必须在更高的层次采取，所以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部门之间必须取得一致和互相支持。但是，不作出明确的决定并由总统来强制执行，这也是无效的。

3. 请将此报告的副本象通常一样转送美国驻重庆大使和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场司令部，希通知戴维斯先生*。

备 忘 录

我们同蒋介石的交道显然是继续在不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他是我们的事业所必需的。为了战争的进行，也为了我们将来在中国的利益，是我们采取更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正处于危机中。最近的失败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用，而且将加速正在到来中的经济灾难。在以建设性的办法应付这些危机方面采取消极的无所作为态度，在实现民主团结方面顽固不愿意放弃追求自我利益，以及蒋本人在国民参政会和双十节

* 谢伟思从延安发出的大多数报告，都是作如下分发：第一份不是送给史迪威就是送给重庆的G-2；第二份送给美国大使；第三份送给派驻在中、缅、印战场美国陆军总部外事处的高级官员约翰·P·戴维斯；总部通常驻在德里。在下述报告中，谢伟思关于分发的脚注被删掉了。

的讲话，都是国民党领导破产的充分证明。

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

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党依赖于美国的支持以维持生存，而我们对国民党却没有任何依赖。

我们在军事上并不需要国民党。它已丧失了华南的空军基地，并且不能坚守任何海岸线。不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必须有一个政治基础——，不管我们提供多少武器，它的军队都不能有效地对日作战。但是，它不会容许进行那些改革，因为对日作战与它维护自己的不民主政权的愿望相比，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另一方面，不管是国民党或任何其他中国政权，迫于中国人民的感情，都不能拒绝美军利用中国领土对日作战。而国民党的态度阻止了使用其它力量，如象共产党或各省的军队，这些军队同国民党士气涣散的军队相比，当会更有用处。

我们不必担心国民党投降或反对。国民党和蒋将紧紧依附我们，因为我们的胜利是肯定的，并且是他们继续当权的唯一希望。

但是，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不会中断它与敌人通常保持的叛变性的关系，而只会鼓励它继续播种将来内战的种子，勾结现在的傀儡政权，以求最终巩固被占领领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抵抗力量。

我们不必担心国民党政府垮台。中国的所有其他集团都要求保护自己和抗日。在任何一个其他集团领导下的新政府，都会比现在反动控制下的政府更愿意（同美国）合作，更能够动员全国。

实际上，由于继续只支持国民党，我们就会阻止改革和政府

的民主改组，而这一点对于重新激发中国的战争努力是绝对必需的。在我们的支持的鼓励下，国民党会继续执行目前的方针，从而越来越失掉人民的信任，并且变得越来越无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由于被我们置若罔闻和被排除在政府和联合进行战争的行动之外，将不得不以更明白的反对态度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无需以国际政治的理由来支持国民党。采取权宜之计，把蒋的地位抬高到“四强”之一的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日本的失败显然已成定局，它的大东亚宣传已不起作用。我们不能期望现在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能成为在远东与苏俄、日本或英帝国有效抗衡的力量。

相反，蒋的地位被人为地抬高，只会使他更加冲昏头脑。一个民主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的范例，同目前的政权相比，在亚洲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反宣传。这个政权甚至在象《中国之命运》这类书中，也沉缅于巩固少数民族（如西藏和蒙古），“收复失地”（如象“南部半岛”），保护众多海外移民（如象在泰国、马来西亚和东印度群岛之类地区）的“权利”以及民族纽带这类的理想。最后，现在的国民党长期掌权只能意味着一个衰弱的、不统一的中国的继续存在——国际上插手远东事务的一个肯定的原因。实现稳定的关键是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我们无需认为蒋代表亲美的或民主的集团，而去支持他，不管是现在还是战后，在中国具有重要性的所有的人和其他政治集团，都会对美友好，向美国寻求救国之道。

事实上，蒋已经丧失了绝大多数在美国受过教育、具有民主思想的自由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控制着党而且是蒋的主要支柱的陈氏兄弟、军事和秘密警察集团是中国最沙文主义的势力，现在国民党的思想，象在蒋自己所著《中国之命运》和

《中国经济理论》等书中所表明的，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根本上都是排外和反民主的。

最后，我们必须认为，我们无需对蒋感恩戴德。他周围都是些自私和腐败、无能而又阻止下情上达的人。蒋自己在与我们打交道中，一直是机会主义，把贪得无厌的要求和不履行诺言，欺骗和讨价还价，恫吓和敲诈勒索并用，蒋一直不抗日，直到他自己的人民起来强迫他抗日。他一直想要我们来拯救他——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征服他自己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他在我们值得被利用的时候就“使用”我们。

我们似乎忘记了蒋是一个东方人；他的背景和眼光都有局限性；他的地位是靠玩弄政治阴谋家的极端投机取巧和顽强而机敏的经纪人的技巧而建立的；他视和善和奉承为软弱可欺；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武力手段，而不相信理智。

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以两项论据为指针，第一，不持强硬态度，就不能期望与蒋打交道会成功。其次，不考虑反对派力量——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我们就不能期望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南斯拉夫已有例在先，而且这个例子越来越适用。只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讨论，对于谋求中国的团结和在迅速扩大的沦陷区利用中共军队和动员那里的人民，是不切实际的，就象摒弃铁托，企图通过米哈洛维奇和在伦敦的彼得国王的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一样。

我们不应被中国有崩溃的危险这种呼吁所左右。这是蒋的一贯的阴谋。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垮台，但中国的抵抗运动不会垮。可能有一段混乱时期，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最后带来的好处会超过造成的混乱。这种危机本身会使改革更趋紧迫——同时，还会增加我们的影响的份量。时间会推进危机，而不是缓和危机。

我们不应让蒋转移我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把时间浪费在应该由谁出任美军司令这种无益的讨论上。这显然是遁词。

只有一个人按经历有资格出任这一职务。而事实是，没有一个洞悉中国情况而又关心美国利益胜于关心蒋的利益的人，会使蒋感到满意。

我们应该结束那种虚伪的托词了，说什么中国是统一的，只能与蒋谈判。这就是把王牌交到蒋的手里。

公开宣布总统的代表访问了共产党首府延安会具有任何中国人——至少是委员长——不会忽视的意义。如果这只是一项未经实际磋商的表示，其效果甚至会更大。但这不应当仅仅是一种表示：举例说，我们必须筹划一旦必要时使用共产党军队，而且不能完全按照国民党的条件来筹划。

最后，如果这些措施都不成功，我们就应该使我们同中国的谈判不再完全秘密进行。这种作法保护了蒋，并且是自动放弃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

如果蒋对美国采取阻挠和不合作的态度，中国舆论会转向强烈反对他。我们不应该被比较少数的国民党死硬分子所欺骗，他们不代表人民。国民党经受不住这样的情况：公众认为，美国正在考虑撤销对国民党作为中国抵抗运动的领导者而给予它的支持和承认。

和从前相比，在蒋的纸牌游戏中，一切大牌都更加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是我们开始运用这些牌的时候了。

第二部

共产党地区

旧秩序变了，让位于新的。

——丁尼生《亚瑟王之死》

从1941年谢伟思被任命到驻重庆大使馆工作之时起，他就作出了一个明确而有意识的决定，集中精力于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同他们的关系。“这是一个一般专业人员的决定。为了在外事处崭露头角和得到提升，一个人就必须写出值得重视的报告。那就意味着要找到一个特别胜任的地区，并集中力量去干。由于我不是一个能够专注于那个地区的经济学家，而又十分厌恶许多人散布的亲国民党宣传，因此我认定我能够恰当而妥善地处理的关键性的国内政治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1937—1939年间，经常有外国人访问共产党地区，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许多时间都是工作在统一战线的首府汉口。汉口沦陷后，特别是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国民党的封锁切断了直接来自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和游击队根据地地区的大多数消息来源。谢伟思还是尽最大努力继续得到有关共产党的消息，采取的办法是：和穿越共区来自沿海省份的难民交谈；询问住在西北地区的边区边沿的传教士；阅读重庆出版发行的、虽然经过严格审查而常常还是能够提供消息的共产党报纸；搜集重庆知识分子中间和新闻界的流言以及口传消息；和跟重庆办事处人员交谈。这样，谢伟思就成为一个十分通晓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而且通晓对日作战一旦结束，就可能重新爆发内战的人士。但是，他也深知迫切需要获得共产党地区的第一手消息。

1943年1月，当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时，他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从重庆归来的第一位外事处官员。他发现国务院与外界完全隔绝：“西班牙青苔垂挂在枝形吊灯上。”他近来到西北和河南广大地区的旅行使他深信：国务院对国民党持乐观的看法毫无根据。因此他写出了下面的备忘录，

这一备忘录被国务院远东司有权势的元老史坦利·霍思贝克读后退回，旁批为：“荒谬可笑”，“可笑”和“散布诽谤”。

国 共 形 势

1944年1月23日

对外关系：1943年，193—99页

经过18个月，在重庆和穿过中国西南以及西北的旅行，获得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对中国国内的政局，特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日益增长的裂隙，必须给予最仔细的研究。

“统一战线”肯定是一桩已经过去的事了，而且只要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和国民党的领导层在内政和军事上仍然执掌着权力，就不可能对统一战线复活的可能性感到任何乐观。形势远不是改善，而是日益恶化。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在宣传，对军民的政治灌输，以及秘密警察与宪兵活动中，反共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给“共产主义”下越来越广泛的定义下，那里不仅对任何事物进行严厉的镇压，而且好象要出现一种甚至与任何民主政府的表面形式都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现在已经不再是探求内战能否避免，而是它能否拖延到对日作战胜利之后了。

这种不团结的危险和含义是显而易见和影响深远的。从军事上说，当前的局势，对中国进行任何有效的作战努力都是巨大的障碍。局势恶化到打内战会引起灾难。所以，形势对我们自己击败日本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一大批比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从对日本人的积极战斗中转而封锁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甘肃、陕西)，用多重的碉堡建立起了牢固的封锁

线，并且这些大量的部队正保持着武装备战状态。更南面（湖北、安徽、苏北），战线犬牙交错，冲突时有发生，而且还在继续。这些战斗已经打了两年多，看来国民党部队采取了主动。

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却极度需要一切补给，但被迫使用大部力量去防御它认为是来自国民党的威胁，从而丧失了机动性。双方都承认，1942年春天国共关系极其紧张。共产党人相信，只是由于日军入侵云南，那时才使他们免于遭到进攻。此外，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朋友都声称，国民党正专心致力于加强控制可以进入共区的中国的那部分地区，而不是去打日本。国民党阵地的加强，自然将会帮助它重建那时将对它开放地区的控制。这种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旦时机到来，就夺取共产党的甘肃、陕西根据地地区。这一行动取得成功，定能削弱共产党军队，而国民党则更容易最后占领共产党的游击区。为了支持其论点，共产党人指出：在很多极端的国民党出版物上展开了要求立即取消“边区”的宣传运动。另一种因素有时也预示国民党想早日挑起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因为从国民党的观点看，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不使中国成为俄国的积极盟国，除掉共产党人是可取的。

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通过这些部队控制着的土地，可以得到进入内蒙古、满州和日军的华北基地的通道。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会使他们的阵地的战略重要性提高。这一重要性主要是潜在的，但是，最近来自山西的艰苦战斗在继续进行的报道显示出，共产党军队仍然是一支使日军生畏的军队，以至激起日军进行周期的“扫荡”。1941年夏天，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强化的反共宣传运动反映了这种情况，虽然人们不应忽视，日本的宣传强调了反共角度，是为了投合中国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或许有的“通敌”份子，以及国民党的保守派。日军在山西的这一活动和在那里遇到

的困难，与其他大多数国民党——日本战线的按兵不动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除去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外，局势的政治含意也是危急的。假定说公开敌对暂时可以防止，但是日军的最终失败和撤退，将使国民党仍然面对着在华北大部（甘肃东部、陕北、山西、察南、河北、山东、苏北和皖北）地区盘据的共军。此外，共军将能进入由于日军从绥远、热河和满州撤退而遗留的真空地带，在那些地区现在已经有了某些共军的活动。在中国的其余地方，他们将会得到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同情。这些人为数不定，但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而国民党却害怕他们的影响，还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地区成功地保持着任何地下组织的影响。国民党各种秘密警察机构之庞大及其活动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是，共产党人的最大潜力和为什么现在对他们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完全奏效的原因之一，可能由于他们在华北日军后方控制着农村地区。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找不到他们，而共军显然能够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我有一份描写了“共产党控制着的华北”的国民党秘密出版物。刊物讨论了和共产党斗争的办法（例如：用现在实行的封锁办法），得出结论说，如果共产党人不“合作”（即屈从于国民党的完全主宰），就必须把他们“消灭”掉。我希望把这份小册子翻译出来，作为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里将要推行的政策的官方示意，这本小册子看来是有意义的。正象某些有思想的中国人所思考的那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是合理的：这些游击区的人民，在经过几年政治教育，而且必须认定至少已部分“苏维埃化”之后，是否会和平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国民党控制，这个控制是在这样一种精神下，利用军事力量与政治压迫、秘密警察以及宪兵力量实施的。这些已经成为国民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且正在不断得到强化和扩大。

我认识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例如大公报已故著名编辑的侄子），认为内战的可能性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现在比他们过去远为强大，过去他们在华中同国民党军队战斗中打成平手达10年之久，如果事实证明，他们在游击区成功地赢得了人民支持的话，他们还会更强大些。他们指出最近的许多例证说明，共产党成功地渗透进反对派的中国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并进行思想灌输；并且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是否这不会招致抗战的延长，并且有可能使国民党或任何一方取得胜利成为不可能。毫无疑问，在一般无党派的中国人心目中，对重开内战的想法存在强烈的厌恶之情，而且国民党对它征来的士兵的忠诚和作战能力也确实感到难办。

确信内战终将爆发导致上述这些中国人产生疑问，究竟美国是否充分、现实地考虑过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美国说来，给国民党政府大量军援，是否对中国有利，或者对美国自己有利。按过去的经验判断，这些军援不可能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而是可能用于内战，以使用武力强行“统一”全国。这些中国人也在猜测，可能派到中国（为了支持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军队的立场，假如发生内战的话；并且他们还想知道俄国会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如果那时她已经成为对日作战胜利中的一个伙伴。

但是，撇开这些疑难的含义，也不能否认中国爆发内战，或者甚至在日本被打败后目前僵局的持续存在，都将极大地妨碍和平状态的恢复。这种情况使中国不能有秩序地大规模恢复这一事实本身就严重、有害地损害美国的利益。即使一次冲突得以避免，国内已经严重的经济极度紧张持续下去（在这种事态下很可能是如此），也会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内战，这一经济崩溃自然可能更严重。

也有这种可能，经济困难可能使有厌战情绪的、超额应征入伍和赋税过重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宣传的肥沃土壤，从而导致发生一场超越民主主义的革命，而这种民主政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声称要寻求的。这样一种共产党政府，在美国看来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这也是可能的，即令美国不曾为所谓的在物质或外交上支持国民党而招致共产党人的仇恨，这种共产党政府决然会更加倾向于同俄国人友好、合作，而不是更加与大不列颠和美国友好、合作。

基于这些理由，因而努力阻止中国国内政局恶化，并且如有可能，促进某种改善，看来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共产党人自己(周恩来和林彪与范宣德谈话，和1942年11月20日签署的文件)认为，外国(显然是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可能是使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的唯一的因素。他们承认，外国关于中国内政的建议，不管怎样委婉地提出，都很难取得成功。可是他们相信，把外国官方和公众的有见地的意见予以反映，对国民党领导层中较有远见的分子，如蒋委员长，定会产生某些影响。

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几种建议。其中之一是，在我們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在我們对中国的宣传中，强调世界大战的政治性质：民主反对法西斯。这包括，反复重申美国希望看到真正民主在中国得到发展。还应当向国民党示意，我們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和关心。

另外一个建议是，对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要给予某种承认。美国可干预到底，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终止，中央政府给予18集团军以供应。共产党人希望，能够明确规定，在美国的对华援助中，共产党军队能得到恰当的份额。

另一种使国民党知道我们对形势关心的办法是，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我不曾听到共产党人自己提出这种建议。可

是无疑他们会欢迎这样的行动。

这种访问有很大附加的好处，使我们得到有关共产党方面情况的全面、可靠的信息。举例说，可能使我们对下述某些有关的问题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共产党人是怎样信守不渝地实践了他们的统一战线诺言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的结构如何？政府“共产主义化”的程度？它是否显示了任何民主主义特征或可能？它是否赢得人民的一般支持？它和国民党中国政府的情况对比如何？共产党怎样处理人民的这类事项的，在诸如征税、征粮、服兵役和强制劳动等方面，和国民党地区比较如何？共产党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对盟国事业可能有什么价值？为了继续抗战，他们怎样处理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和经济资源开发等问题，怎样进行对敌贸易？游击区人民的动员和觉醒是否已经达到支持一场真正的游击战所需要的程度？

没有诸如此类的知识，很难评价互相矛盾的报道，并作出经得起深思熟虑的判断。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现在得不到有关共产党地区情况的消息。我们得到的情况都是已经过时的几年前的东西，而且无论从范围和可靠性来说都是有限度的。卡尔逊*原来是一位军人，并且中文知识有限。大多数能够访问共区的新闻记者，看来都有一种倾向共产党人的偏见。他们也囿于语言限制，不能长期呆在共区。

我提议，最适合于访问共产党地区的美国代表，是外事处中文科的官员。可以派一、二人去。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要要求他们根据一次短促的访问就写出一份报告（在这种访问中，他们会受到官方导游的影响），而是要求他们应该有充分时间熟

* 伊文斯·卡尔逊少校，美国海军陆战队，过去在中国。

悉情况，并亲自进行逐日的观察。

延安和重庆之间有邮电联系，共区各部分之间也有类似的联系。因此，官员们不宜与大使馆脱离接触，而且如认为必要，可以定期写出报告。

边 区 生 活

在谢伟思关于派遣外事处官员去延安的见解产生效果之前，竟然等待了18个月，但他，特别是约翰·戴维斯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在他们被指派在史迪威总部任职以后，他们在美国武装部队内得到了支持者，这些人急于想利用共产党在日本战线后方建立的广阔游击根据地，搜集对日作战的军事情报，和营救在战线后方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此外，史迪威和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在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有效合作的努力屡遭挫折之后，渴望探索协调美国和中共军事努力的可能性。为了作到这点，他们需要得到对共产党军事潜力的第一手估价。重庆政府固执地拒绝考虑进入共军地区的一切请求，一直到1944年春季，它才允许一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这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新闻界定会发现，边区的生活象国民党自己的宣传所一再说的一样悲惨。一旦委员长对新闻界去延安的请求作出让步，他就很难拒绝美国军人同样的进入。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问中国时提供了一个机会，直接向委员长陈述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去延安的问题，虽然一开始蒋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华莱士却坚持不懈地努力以求得批准。副总统在重庆的最后一天，委员长终于允许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因为它的目的地是中国的“叛乱”地区，它很快就得到一个代号“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一起

飞抵延安。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干燥的黄土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比自然环境的变化（他在以前去西北旅行时曾经看到过）给人更深印象的是，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气氛的变化。震慑于日本攻势下的重庆的灰暗气氛，与延安的这种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形成全面的对比。不但如此，在谢伟思在中国漫长的经历中，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外国团体的一员，与满怀真诚合作意识的中国人一起工作、生活、吃喝和休憩。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和意气相投的，和在重庆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重庆，官吏们和外国人保持着一种客客气气的距离，只能在十分正式的安排下和他们打交道，并且对他们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疑惧。谢伟思在他从延安发回的第一篇通讯中描述了这种气氛的变化，描述了这个新中国。

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

第1号，1944年7月28日

对外关系：1944年，517—20页

尽管我在延安才呆了6天，鉴于有通邮之便，而且其未来难卜，因此尝试记录下一些对共产党边区的初步概括印象，我觉得似乎是可取的。

虽然我们到这里时间还不长，我已经有机会和许多中国朋友见面、谈话，会见了在共区已经住了一些时候的3位外国人，而且还要会晤大多数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此外，我有机会参阅了

几位外国记者的经历、印象和笔记，他们已经在延安呆了6周多，这一期间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去访问各方面人物并收集情况。

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人进入到像共产党边区这种地区（关于它，人们听到过许多说它完美无缺，但是是第二手的报道），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所支配而不由自主。我的感觉是，事物总不可能像描绘的那样美好，然而在某个地方必定有“希望得到的东西”。

因此，有趣的是，我的初步印象——和观察组其余人员的印象一样——是极其讨人喜欢的。外国记者，至少两名记者（武道和福尔曼*）的印象同样是如此，在他们来到延安之前，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能称他们为“亲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魔力似乎仍然在起作用。

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变化。正像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军官所写的：“我发现我自己在不断尝试去找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

气氛和差异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明显的。

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

* 穆理士·武道是在重庆政府情报部工作的美国雇员，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身份到延安来的。哈理逊·福尔曼是伦敦《泰晤士报》和《读者文摘》的摄影师和记者，后来出版了关于到延安旅行的一本书《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纽约：亨利·霍特公司，1945年）

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

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

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

妇女不仅实际上穿着同样的衣服（裤子、草鞋或布鞋，常穿俄式罩衫），而且她们举止平等友好，也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她们的开朗和一点也不神经过敏，一开始几乎令人紧张不安。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亲昵举动。在重庆公园里或寂静的街道上看到的一双双痴恋男女，像旗袍、高跟鞋或口红一样，在这里看来是没有地位的。

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学和各种党的训练学校。但是人们对这些学生，普遍有一种成熟和严肃感。据悉，他们很少有时间去闲逛，他们大多数人都通过努力工作而求得深造，总的说都是为了党。这些人都是自愿来的，他们希望工作和过极简朴的生活。

这些学生来自中国各地，许多来自游击区域的前方根据地，并且事实是，一个人在会见了全华北各地政府和官员后，给他们的感觉是这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某种神经中枢。学生们不断谈论，回到农村去或到前线去，以继续干他们的工作。

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

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的计划具有实际意义。不种田的人，就干如纺线之类的活计。每天早晨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女大学生邻居们在窑洞外坐在纺车旁纺

纱。

与此同时，他们用许多时间来进行交谈和讨论。还不断开会。

就党领导们来说，显然有很多闲暇。有人获悉，他们完全不插手管理工作，并且不担负耗费时间的日常工作。

人们并不谈论战争一结束就“回上海去”。他们自己准备在这里安家落户。

对中国的其余地区，采取一种对那里的情况既关心又寄予某种同情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条件要比这里坏得多。

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化工作上也表现出来。他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戏剧和音乐吸取了当地农村人民民歌的形式。交际舞包括了本地的民间舞蹈。

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而娱乐却受到鼓励。这方面的一种形式就是刚才提到的交谊舞。在我们到达之后为我们举行的晚宴上，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以极其自然而又民主的态度参加了跳舞。

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是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我们注意到，大多数服侍我们的苦力都在读报。

当地形势并不紧张：人们进城时看不到警卫，山上没有警卫森严的碉堡（如像1943年在兰州很明显看到的那样）。在农村人们听不到任何土匪骚乱或滋扰闹事。

我们看到一群人整队在公路上行进，没有武装押送。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新征的兵。

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

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在华北国民党地区旅行过的外国人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担心有人在交朋友的掩盖下来讯问我们。我们的译员随叫随到。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我们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记者们不受新闻检查。

领导人们给人以极好的个人印象。军人的形象、举止都像很能干的军人。从总的说来，同他欠佳的照片上所够够想像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

总的感觉是泰然的自信、自尊。叶将军*谈到共产党军队的武器时大笑起来。“但是”，他说，“我并不为之辩解，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用它们来作战。”一切事情都脚踏实地、相当好地进行着。

在怀疑论者看来，延安总的气氛可与一所很小的教派学院，或是一次夏季的宗教会议的气氛相比。有一点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和有意识的情谊。

最初的几天里，我有少许这样的感觉。后来，我发觉自己同意一位曾经长期呆在中国的记者的话，当时他说，“我们来到陕北群山之中，想去发现最现代化的地方”。

我现在认为，进一步研究和观察将会证实：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

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

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

* 叶剑英，八路军总参谋长。

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密切，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国民党的宣传始终强调共产党边区的所谓贫困，并且试图用经济封锁以确保它的估计仍然是准确的，因为陕北是以中国罕见的贫穷地区闻名，而且封锁意味着一定会使这一地区丧失如棉花这种通常急需的进口货，所以谢伟思前往边区时，预期会看到一种相当绝望的经济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封锁不仅没有使共产党人垮下来，而且毛泽东等人看来似乎是很感激封锁的，它激发了一场生产运动，它使边区事实上达到了自给自足。边区政府向谢伟思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而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迈克尔·林迈可和美国医生乔治·马海德这两位在共区生活了好几年的外国人，他们都能证实他们在延安居留期间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根据这些来源，谢伟思写了如下报告。

关于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经济形势的札记

第6号，1944年8月3日

美亚文件：729—33页

经济情况的改善

有关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过去两年经济得到改善。

这一事实在边区到处可见。我直到目前所得到的只是很片断的统计材料（将尽快报出）支持了这一事实。事实证明：军队给养有了改善；党政工作人员伙食和服装比以前好了；当地医院里营养不良病例几乎完全绝迹了，而三年前这类病例是为数众多的。

经济形势的改善，对这个重要共产党根据地的士气民心 and 普遍安定具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据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外国观察家说，共军士兵的身体状况3年前是很坏的，而现在却好极了。

据来自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报道，那些地方经济条件也有类似的改善，虽然改善的程度可能要小些。所以总的结果是，不论在参加对日战中或抵抗国民党的压力下，共产党人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力量总的都一直在增长。

改善的因素

广泛的改善得力于大自然条件：过去两年收成一直很好。今年的预兆也是极好的——根据中国人的估算可达到九、十成年景，高出正常年景很多。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共产党的鼓动和领导下，地方政府发起了一次极其强大而广泛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运动。

国民党封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也是迫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封锁而不得不采取的：封锁只允许奢侈品通行，而严格禁止一切共产党人短缺和迫切需要的商品进入共区。这包括过去边区不生产的商品，例如棉花、纸张、大米、食糖和火柴。

在1940和1941年，封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被包围和孤

立在极端贫困和不发达地区的共产党人，发现他们那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问题摆在眼前：是发展生产达到合理的自给自足的程度，还是最后面临投降的困境。一些共产党人现在说，封锁迫使他们采取英雄主义的措施，从而帮助他们得到最后巩固。否则决不会采取这些措施的。

生产运动

生产运动因而成为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花费的心血而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有共产党的宣传人才都动员起来了，而他们的领导人运用其聪明才智想出了许多新的应急办法。这些领导人不得不应付和江西内战时期有某些相似、但却不那样危急的形势。在实现增加生产目标的专心致志和某些增产手段的应用中，这里的气氛使人联想起曾经读到的五年计划时期的俄国。

生产运动的有利环境

这一地区的一些自然条件对生产运动的胜利实现极为有利。由于上一世纪伊斯兰教徒起义的蹂躏和20年代饥荒的结果，人口锐减，大量可耕地也荒芜了，全边区人口仅有150万。黄土土壤肥沃，而且易于耕种。据了解，棉花和水稻，虽然过去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次达到可观的程度，但在有些地方仍适于种植。

当地居民是这次生产运动的有用人才。1934年陕西的这一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式的政府，进行过一场土地革命。人民夺得了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地主都逃走了。所以那里的人民具有独立创业的传统；而且既然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对增加生产就有更大的动力。最后，那里还有大批军队和党的工作人员可以投入生产运动。

增产措施

第一和最重要的一步是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以弥补人力之不足。无论从理论上或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这意味着每个男人和每个妇女都要参加生产。运用了强大的宣传运动和教育强制。群众集会、讲演、演戏、标语口号和其它可以想到的每一种宣传媒介都采用了。对当地“二流子”阶级的残存者则实行特殊的强制办法。当社会谴责证明无效时，就采取更多的直接了当的手段。对游手好闲的懒鬼，就强迫给他们挂上牌子，如此等等。

每个政府和党组织，都订出达成食物和棉布生产自给的目标。甚至对中学和大学也适用。幸运的是，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耕种。体魄健壮的人可以种田。姑娘和妇女学纺纱，织布。每个教职工和学生一天至少劳动两小时。

守卫边区的部队，被安顿在他们新开垦的土地上。

〔谢伟思在这里列举了一系列的促进纺纱、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树立“劳动英雄”，鼓励移民，等等的具体计划。〕

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中国工合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各种合作社，3年内从不到30个增加到343个。在这个小小的地区内，其它合作社总数增长到800个以上。大约有34万人都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某些合作社。在这一发展中，政府为大多数合作社提供了大量资金，往往并不要求付利息。

劳动合作社（或称变工队）的举办，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根据古老的，被摒弃了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变工队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批人组织起轮流耕种每个人的土地，通过联合活动，他们干得比个体劳动更有效、更快。于是他们把节余的时间用于共同开垦新地活动，得来的产品由大家平分。

生产运动的效果

〔谢伟思注意到：生活水平提高了，主食也有所改善，从吃小米改为吃白面。〕

边区过去不生产棉花。去年生产了，织成棉布达到需要的一半。今年的棉花生产，可望满足2/3的需要。缺少棉布是边区最大的、独一无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军队事实上实现了自给。至少有一个旅（边区部队的1/5）实际上今年已经向政府交了一批余粮。这就是说，它的生产已经超过了自己的需要。

根据政府报告，它的收入的70%来自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生产。这是通过给这种生产以帐面价值，并相应记入政府帐下估算出来的。

以实物代货币赋税降低了约12%，大大低于中国其他地区。

经过大量的研究，火柴、肥皂和其它日用品，现在全用当地原料制造。总的来说，产品的质量是极其令人满意的。

一项重大的成功是，发现当地生长的一种无用的野草可以用来造纸。于是纸也不再成问题了。

通货膨胀……实际上在全体居民生活中不是一个重大的因素。政府的薪俸阶级，党校学生和公务人员都部分自给了，并且得到必需品的供应。

从一切外貌看，商业繁荣，市场兴旺，而且许多建筑工程正在施工。

生产运动的缺点

不应设想生产运动已经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或者说不再存在尚未解决的困难了。

生产的惊人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支援而其后果是钞票发行量大大增多和通货膨胀增大。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种趋势似乎已经得到抑制，并且边区货币与国家货币相比，正在显示出增值的明确迹象。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

另一持续的、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缺少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各种设备。……

人们承认，有时过度热心的狂热和以高压推动的生产运动，加上缺乏经验，会造成某些混乱和一些产品的质量低劣。例如，在早期阶段，个人往往志愿请求去生产不可能实现的高定额棉线，产品由于质量过于低劣而毫无用处。随着不断取得经验，此类问题正在消除中。

结 论

尽管有这些小的失误，基本事实仍然是：生产运动已经取得全面的，甚至是惊人的成功；其结果是，边区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并且正在改善中。

这些状况以及造成这些情况所大力执行的政策，同国民党中国的状况和政策对比是太明显了，无需加以评述。

对于一位知道在国民党中国许多地区农村里土匪横行的战地记者来说，共产党地区里全无匪患是一个值得加以分析的现象，不存在盗匪活动看来足以证实，共产党声称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基础上得到人民的支持。这里印出谢伟思论述这一题目的报告，删去了在其它电讯中已经描述过的、共产党改革的细节。

共产党在肃清盗匪活动方面取得的成就：
共产党的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有力证明

第37号，1944年10月2日

美亚文件：963—67页

1. 附上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在其控制地区处理盗匪活动问题取得明显成功的备忘录。

2. 备忘录摘要如下：

概要：一切报道都说明，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形成显著的对照。共产党人将他们对中国这一古老难题的解决归功于：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消灭了许多匪患赖以滋生的封建基础的民主改革，和动员全民组织起来支持战争。不存在盗匪活动的事实，看来是这些说法的真实性的具体证据。概要完。

备 忘 录

1. 一切有关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局势的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未提及匪患。不管消息来自共产党的报道，或是来自穿越共区的外国人的报道都一样。……

最近的一位旅客是美国空军陆战队的巴格略中尉，他的飞机在太原附近被击落后，他被游击队员搭救了，于是他和八路军一起，用了3个月的时间，从晋中旅行到河北阜平，而后到达延安。巴格略中尉被问及土匪问题时感到吃惊，他说他没有听到有

人提起过诸如此类的任何匪情。

2. 没有盗匪活动的现象,过去几十年和当前中国其余地区,关注中国情况的观察家都有着直接的、浓厚的兴趣。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普遍存在动乱不安的时期中,盗匪活动在这个国家的差不多每个地区都时有发生。共产党现在控制的、包括陕北在内的某些地区,过去在这方面一直都是特别臭名远扬的。……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相形之下,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远离战线的地区,盗匪活动显然还在增多。过去3年里,我通过公路周游了四川、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我发现所有这些省份里盗匪活动都是旅游者主动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共区内不存在匪情看来还有一层深长的意义,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国民党地区盗匪蜂起的原因是:反对残酷征兵;苛捐杂税和征粮造成的贫困;存在大量逃兵和食不果腹的士兵;歧视土著居民或少数民族(诸如贵州苗族,甘肃回族);人们普遍憎恨暴虐和腐败的政府。

4. 最后,处置盗匪问题取得明显成功看来意味深长的是,因为国民党企图用军事镇压消灭盗匪活动的方法好象未取得基本的和持久的成功。

5.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兴趣之后,我同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有: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将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博士。他们所叙述的在他们各自地区里处理盗匪活动问题的方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面是适用于各地区的一个概括的摘要。

6. 战争中受共产党控制的大多数地区,在被占领时期,都处在盗匪横行的、混乱和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7. 共产党应付局势的办法可分为四大方面：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组织，民主政体，最后采取直接行动。消除匪患固然是当前的重大问题，然而它并不是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采取这些措施，为的是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彻底进行战争。盗匪活动的歛迹是自然的，而且是附带的结果。……

8. 取得某一地区的控制之后，共产党人就立即动手去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首先就是减少农田的租税和利率。……

9. 另一重要的进程，就是经过深入细致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进行群众动员。这一工作是置于抵御敌人和支援战争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盗匪活动显然成为一种不爱国的和叛逆的行径。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或更多群众组织的成员：人民自卫队、农民救国会、民兵、青年先锋队，等等。……

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消灭了原有的“民团”^{*}，而代之以新成立的民兵。后者是在自愿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人民的真正自卫组织。另一方面，民团常常是有钱的地主，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从二流子和秘密社团中征募来的。这些农村里的恶棍实际上都是些职业盗匪，他们的两手策略是：对那些愿意出钱以免受抢劫的人进行敲诈勒索，而抢劫那些家住较远或不愿支付保护费的人。……在共产党的制度下，继续保持这些地主的半警察、半盗匪、勒索强夺的民团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事了。

10. 第三个进程是民主化，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既然这种政府是土生的，它能更好地与民众保持接触，并能识别和处置不法分子。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或不公平的政府……

* 是传统的、士绅控制的、当地的民团。

11. 最后，随着稳定的民主政府的创建，就能采取强有力的、直接了当的行动去对抗仍然存在的扰乱治安分子。……二流子之流，迫于种种压力，首先是社会的，然后是法律上的压力，都去从事生产劳动了。如果需要的话，军队和民兵可以动员起来，并无情地动用起来，去对付那些拒绝在新秩序中合作的，或试图从外部进入本区的任何残存的盗匪。这些外来的团伙分为“敌军”或“伪军”。镇压工作中重要的部分是细心保护提供情报的人。对被俘盗匪的处理是一个有趣的侧面新闻。他们在村民群众大会接受公审，并在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承认了他们所犯的罪行，并答应改邪归正。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只受到微不足道的惩罚。只有当他们证明不可救药时，他们才会被处决。

12. 巴格略中尉，一位完全陌生、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被问到他认为他所报告的没有匪患的原因是什么。他略加思索后回答道：他“不认为，当每个人都支持军队并忙于战斗的时候，那时还会有盗匪活动”。对于一个看来以前不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的人说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反映。但这并不足以深刻说明人民支持并参加战争的这些条件——差不多可以顺便地说，匪患消除了。

我提醒一下，唯一满意的解释是共产党的解释，并且我们可以接受，即没有匪患是共产党所说的走向民主政治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很好的证明。如果说，共产党人只不过表明在对付匪盗灾害方面有一套办法，其它无所作为，那么，他们却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延安和重庆明显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正如在华盛顿，看一个人桌上是否摆设有玻璃水瓶，地板上是否铺有地毯，或门上是否挂有名牌，你就可以断定他的官阶了。国民党对于等级和声望上享受特权是非常坚持的。如果你是大使馆的二秘，你可以跟政府外交部美国司的处长谈话，而不能和部长谈话。”延安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或朱德，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顺便到美国人住处访问，而且一聊就是几小时。这种接触也不只是社交活动。

“如果你想办什么事，你到参谋长那里，他同意了，于是事情就会办到，而且办得很快。你不能想像何应钦会用叶剑英的办法来办事。这一对比是可笑的。何应钦：一身精心缝制的军服，腰身合体，熨的平直，完美无疵，浆得笔挺。一个自命不凡的矮子，夸夸其谈。叶剑英：纯朴，宽大的衣着，很直截了当，很豁达大度。你现在回到中国去，可以看到同样的坦白无私和直截了当。”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总的印象

第21号，1944年9月4日

美亚文件：832—36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一个集体，给人总的印象，可能是值得某些关注的，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且确定无疑的是，美国将来处理中国局势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我1944年9月3日写的第20号报告曾提到这一点。报告标题为“美国需要有一项对付中国共产党兴起所产生的问题的政策。”（见美亚文件：318—21页）

对这样一个集体的人物进行探讨，必须以和他们长期结识并进行仔细研究为基础。我在延安只呆了6个星期，不能说有这种基础。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内，我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好机会，和从来没有这样多的、正聚集在延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和谈话。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有10多年未能聚会在一起了。这些人的名单见于我写的1944年8月27日第15号报告中。（见美亚文件：293—294页）

关于这些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履历和独特的“名人录”材料正在汇集中，将在稍后送出。在这里，我仅仅试图总的叙述一下：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一个集体给我的初步印象。写共产党领导人会更容易些——肯定比写国民党领导人更容易些，他们当中缺少某些突出的个人特征，而且他们似乎只显示了许多共同的特性。当然应该理解，勾画出来的图像不能妄想适合于每种情况。

要对共产党领导人作一番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一概括了解至为重要。党的23年历史中，几乎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战斗，不仅影响了其领导人的态度和性格，它们也有助于决定能生存下来并上升到领导地位的那些人的风格。没有这一背景的知识，是难以理解这些人的。

第一个印象是青春年华。他们现在差不多都是40多岁；少数是30多近40岁，他们在20年代初期是大专学校学生或陆军军官学校学员，那时在中国和欧洲都处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动乱时期。

由于年轻而精力充沛。作为一个集体，他们都是些活跃而称职的人；没有一个人看来是不坚强的、不结实的或懒散的。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见了；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这些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舒服的生活。他们有的在“地下”工作，有的经历过内战和“长征”。他们全部都参加过极端艰苦的战争或游击战，而且好多人都负过伤，其数目多得惊人。

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体质上，也表现在智力上。具有高深学历的人占比例很大。许多人读完大学在欧洲深造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合乎逻辑地获致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在长年的争辩和讨论中度过学校生活，而且他们毕生致力于使其他人相信他们还不广为人知的事业的正义性。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依我看，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事业。因此，它在中国的发展中经历了许多阶段，没有完全被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统治过——像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那样。

这些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是极其多面的。政治、经济、教育、宣传和文化，对他们说，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学科门类。除这些之外，他们为了生存还被迫熟悉军事科学。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一个军人，或者是某一方面，如经济方面的专

家。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许多高级司令员都是政治委员出身，反之亦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在极端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下，成功地面对过组织独立的自给自足政府的难题。

他们都是些具有无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不坚定的人早就离去了。那些留下来的都确信，他们在为某种值得做的事而继续战斗。他们的真诚、忠心和决心都是非同寻常的。

这种坚定的信念给了他们以信心、某种自豪和坚强的自信。他们不为怀疑自己或他们的总的政策所困扰。他们既不为过去而表示歉然，也不为现在而谄媚地寻求你的好感。他们既恳挚又友好，但不言行于色地急于给人一个好的印象。他们好像知道，他们已经度过艰辛的岁月，完成了令人钦佩的事情；而且他们以一种泰然却又明确的方式表现出，他们深信他们正处在获得胜利的高潮中。

因为缺乏更合适的词汇，可以把这一切特点概括为一个词：韧性。人们都认识到，他们具有耐心，他们在这方面受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将会妥协，如果这确定是符合党的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话；当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奋起战斗；并且他们可能会是严厉和无情的，如果必需的话。人们都会感觉到，畏惧或个人利益，都不会加以考虑的。他们的勇敢是无容置疑的。

在相识中产生的一种有点未曾料到、然而却是强烈的印象是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实践精神。他们可能就一些外来的、不实际的理论从事于激昂的、年轻气盛的辩论的日子已经悠悠过去了。纯粹的幻想家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或者消声匿迹了；留下来的人必须是实干家。坚定而普遍保持着的信念是，检验每件事都要看它是否在中国行得通。要他们从事于他们认为是“无益的”纯理论讨论，那是很难的。其反应是：“不要自寻苦恼”。

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常作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于一般的目标和政策，而是对于为了达到目标而实施的特殊措施和政策——对于为什么他们过去遭到失败，或是现在想做而没有做成。这种严格的检查是针对政策，而不是针对个人。这种检查是在党的一切高级干部之内，通过极其自由的讨论来进行的。但是也愿意接受来自党外的建议——事实上，它们是现行的几种基本政策的一种起源。

这种政策考虑是建立在客观、科学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领导人的大多数都具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们的观点给人以现代人的印象。例如，他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就和我们的了解很相似。他们的思想组成上没有玄想的谬论，不空口赞扬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美，不曲意附和僵化的教条。事实上，人们很少听到议论三民主义或其它主义。对于说中国国情“不同”，基本经济规律这里不适用，或者说“外国人不可能了解中国”等观念，他们付之一笑。

一旦一项具体措施或者政策发现是失败的或是不适合情况的，而经过讨论产生出看来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替代措施或政策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承认失败，作出改正，顺应情况和愿意改正。在每一个领域都很明显——军事战略、征税、土地政策、教育、群众组织、推广现代戏剧和舞蹈、中国文字试行罗马拼音。当他们发现采取的措施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因而不能取得成功时，就取消或者改变这些措施。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贯井然有序。这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思想是合乎逻辑的。有一种强烈的组织意识，发表演说直截了当的，并且容易听懂。进行重要谈话时允许你作笔记。你要拜访的人喜欢事先知道你想讨论些什么问题，他们好作准备。作出的决定都写成文字并加以确认，以便不致产生误解。那里普

遍存在着一种认真的气氛和高效率。每一项任务都有专人负责。办事情不像人们在中国所习惯的要费那样多的扯皮和唇舌。

在和这些人会晤和打交道中，人们会被他们的诚实和坦率所感动。没有“旁敲侧击”。假如他们不知道某件事，就说不知道。假如他们允诺了某件事，毫无疑问它定能而且将会办到。

这些人中好像有着一种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团主义。个人野心如果有所表现的话就要加以克服。没有一个人给人以“政客”的印象。他们是在一场斗争中升到高位的，而斗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创建了一部政治机器、玩弄诡计或是利用有利的个人关系，而是依靠实际的成就。

在他们彼此之间和对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上，他们的态度是平等对待。身份地位并不重要。党内同志间的关系似乎是真诚的。对高级领导人看来很尊重和赞扬，但并不存在阿谀奉迎。生活、衣着和行动都很简便，没有矫揉造作。

人们对这些人的正直和诚实不会想到去提出疑问；他们廉洁奉公是显而易见的，财富对他们可能是无用的——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隐匿起来。假如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们早就可以转奔他方了。

这一切可叫做积极特征。也有一些可称为消极的特点。

人们都得到一种自愿消除个性痕迹的感觉。大多数人都不愿谈论他们自己，并且很少听到一个人提到他自己的经历。没有自夸。他们大多数人都表现沉静，并倾向于保留。这是能够预期到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专心致力于满足个人的野心，而是奉献于一种忘我的事业的进步。

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这可能是共产主义思想训练和纪律造成的。但它必然也是，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一事

实：共产党没有必要变成一个象国民党一样的垃圾箱。持不同政见的那些人已经自动离开了他们。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被赶出了党。那些留下来的人看来确实是思想一致的。

这里也值得提出的是，那里似乎缺乏幽默感——在那里幽默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言辞。^{*}笼罩一切的精神状态是冷静和严肃。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他们整个一生致力的一直是斗争；这并不奇怪，他们不觉得消闲是舒适的。很明显，共产党人自己看来也承认这一点；打桥牌和跳舞这些社交娱乐活动现在则受到鼓励。

鉴于他们的履历，人们本来预料会有的一种情况，却出乎意料地不存在，即显然没有报复情绪。确实，他们对于国民党竭尽挖苦之能事。但这明显不是出于个人的动机。他们很少谈到私人的和个人的恩怨。举例说，人们的一个共同的经验是，你要问到一个人的家庭情况，会得到他平静的、实事求是的答复：他已经有15年不复得到家人的消息了，再不就是他的妻子、小孩、父母和兄弟都被国民党杀害了。这种对个人感情的抑制，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党的政策，现在这个政策要求同国民党合作，并建立统一战线。这部分地也出于对长年累月的艰苦内战的憎恨和厌倦：复仇心理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和平愿望和得到一次拟定出他们的纲领的机会（任何一个人人都得出强烈的印象：这些人不愿发动一次内战）。最后，这是上面提到的那种韧性特性的一种反映：个人利害将受到克制——“过去的事，算它过去了。”

^{*}对那些熟悉毛泽东或朱德乡土的幽默感故事的人说来，这一观察可能似乎有点奇怪。谢伟思的意思是说，共产党人可能在讲述过去有趣的故事的同时（“他们觉得很滑稽的是，谈到过去当他们的脑袋上都标上价钱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正在追赶和绑架传教士的时候），并不曾轻松地讲到过重大的政治问题（“你们不能用关于他们与俄国人的关系去戏弄他们”）。

论 结

人们得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这一印象——和使我联想起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7年里曾经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40年代，中国没有那一年目睹到和平。在整个漫长而饱遭破坏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一直同在地平线上徘徊的内战魔影生活在一起，只是等待国际战争结束，就可重启内战。早在1943年1月23日他写的“论国民党——共产党局势”的备忘录中，谢伟思对这一灾难性前景的关切就表现出来了，后来在他从延安发回的许多电报中还可继续看到。

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如果内战爆发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它就会破坏在大陆上进行有效对日作战的一切可能性。即使内战拖延到战争结束，双方都认为不可避免的或值得一试的一场内战，意味着双方为了即将到来的摊牌，也都宁愿保存其实力，而不愿用之于抗日。已经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隐藏起大量美国武器，不用于1944年日军在华中进攻中去打日本。也有一些显然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使得美国——特别是像谢伟思这样一个在中国，度过那么漫长岁月的人——急于想拯救这个国家免于另一场血腥战争的蹂躏。最后，谢伟思深信，在一场内战中共产党人肯定是胜利者。鉴于美国长期都只支持国民党，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会对美国产生友好的感情。

如果要避免内战，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协商。自1937年统一战线创建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不时进行谈判。新四军事件之后，使双方聚合一起的努力暂时遭受失

败。双方的武装冲突增加了。1942年10月，林彪参加了中共驻重庆常任代表周恩来的工作，企图和国民党达成一项暂时妥协。没有取得进展。1943年，随着两党之间关系明显加剧，林彪和周恩来6月返回延安。一时间，好像国民党至少决心立即挑起冲突。但是，蒋介石9月间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告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问题纯属政治问题，应当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大大促进事态缓和下来。

1944年5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又名林祖涵)，经西安飞重庆，以恢复和国民党谈判。选择林而不是级别更高的周恩来作谈判代表，表示中共怀疑国民党是否愿意达成一项真正的和解。同样意义深长的是，共产党现在的建议比在此以前的建议明显地更加强硬了。1942—1943年，林彪只向国民党当局要求4个军、12个师的编制，1944年林伯渠却要求6个军，18个师。因为1944年共产党军事实力继续迅速激增，共产党人的谈判姿态也相应变得强硬了，谢伟思从延安发出的电讯，反映出共产党政策的逐步强化。开始，他写道，中共的“自我克制政策”，一月以后，他宁愿说共产党人“拒绝”与国民党“妥协”。

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某些最初的真实迹象，见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当时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这些记者中的许多人都是谢伟思的密友，他们允许谢摘用他们的访问札记。有几位记者担心，从重庆发出的报道，会受到国民党检查官的扣压，而他们又急切地想把这些新闻发出去，谢伟思在电报中转发了他们的访问记，还有他自己写的两篇访问记。这是他从延安发出的最长的稿子(28张印刷页)。由于许多材料都重见于谢伟思本人后来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的谈话中，所以记者和谢伟思同周恩来的谈话在这里有很大删节，还有，这些访问记包括关于国共关系的重要声明和有些章节是重印的。谢伟思和林彪的会谈，全文编印于此。

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见解

第3号，1944年7月30日

美亚文件：690—717页

1.下面是电传的和著名的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进行的访问和谈话的备忘录。

甲、7月14日，毛泽东会见冈特·史坦因。

乙、7月18日，毛泽东会见莫理士·武道。

丙、7月28日，周恩来与谢伟思的谈话。

丁、6月25日，朱德将军会见史坦因。（未付印）

戊、7月8日，朱德将军会见史坦因。

己、7月15日，朱德将军会见武道。

庚、7月21日，朱德将军会见爱泼斯坦。

辛、7月27日，林彪将军与谢伟思的谈话。

2.人们认为，这些与现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的谈话，其中大多数是私下进行的并且未作记录，为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中国面临的大部分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提供了权威和最新的概述。

〔甲〕

1944年7月14日根舍·斯坦因采访毛泽东笔记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23年历史中，没有改变其根本的或基本的

政策，由于国内阶级或政治集团的组合或分化，曾经有过表面的变化。

这个基本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由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民族独立、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革命。

国民党实行了1927年的“清党”，因为共产党坚定地实行体现在孙中山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这一新民主主义纲领。国民党害怕了。

我们被迫上山。我们的游击战由小变大。这期间，我们实行了苏维埃制度，但是在一种民主政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基础上。我们不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相反，我们保护它。我们仅仅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将它分配给农民，于是农民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土地。我们不曾组织集体农庄，因为在中国那是不可能的。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口号。华莱士（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译者）在最近的中国之行中也谈到这一点。……

过去7年间，我们一直遵循（蒋介石）委员长指示的分工：国民党负责处理前线正规作战；我们负责敌后作战。实际上，中国有两个战场：前线和敌后。我们曾规劝农民不没收土地，地主减租，以便争取地主到我们抗日斗争中来。三三制*也是为了团结地主和资本家抗日。

我们旧的没收土地的纲领——修改后从而使地主也分得一份地——在那时并不坏。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集中在要求得到土地上。孙中山鼓吹它。但是在战争年代不合适了，因为地主想

*也以“3个1/3制”（或“三三制”）闻名，依此地方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人占1/3，国民党人占1/3，无党派人士占1/3。

抗日，而没收土地政策可能会把他们赶到其它阵营去。农民看清一个简单的真理，即减租既可使地主继续存在下去，又会帮助孤立日本人。抗战初期，在某些地区没收土地的一些经验教训使农民认识到，这个政策到头来损害了他们。实行一种地主在地租上让步和佃农保证缴纳地租的政策，终于导致了成功的、真心诚意的合作。这个政策不仅切合时宜；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政策。

这个政策最初是由下级党组织中的人员提出的。后来被采纳为一项全党的政策。如果中国已经民主化了，并且有一个议会的话，这一政策可能会成为全国遵行的法律。如果减租政策在全国得到实行，这自然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他将仍然是落后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一个措施。然而，在民主制度下，会有办法去考虑所有制的和平、逐步转变的。譬如说，地主也许能够把投资转移到发展工业上去。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设想出种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

没收土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它取决于国内和平。可能伴随内战而来的是，群众自己起来彻底没收土地。

自然，在内战中会出现野蛮行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懂得了宽容的可贵；懂得哪些政策是错误的，哪些政策是正确的。“人的经验是实践的辩证法”。实际上，私有制的原则在苏维埃时期的农村中受到很好的保护。仅仅少数患幼稚病的同志才想建立集体农庄。但因为农民反对，这些事例都纠正过来了。在城市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商品只征税一次。根据获利多少实行累进税。许多情况下不征税，以便扶持贸易的发展。因为我们需要开展贸易，少数激进的同志在孤立地区对贸易抽税过重，因此终于遭受损失。不仅没收商人的货物，而且没收他们的利得，那无异于自杀。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

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我们三个不能改变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团结。

国民党现在坚持要我们裁减军队而华北群众不答应。如果我们的军队被裁减了，就会无人去坚守阵地。

战后军队复员必须按6个国民党士兵对1个共产党战士的比例执行。

中国的1.9万个乡村的人民，应选出1.9万个村政府。然后根据孙中山的想法，上面的政府将或按直接投票选举，或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选举和公职人员应该不分是否党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意味着，民主政治就是政府属于人民，不得为少数人所把持。如果我们遵循孙中山的政策，问题是很简单的。

.....

战争结束之前，国民政府不大可能完全崩溃。

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我们决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设法制止它们发生。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

讨论设一个同盟国最高司令还为时过早。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建立盟军司令部，而只想要外国顾问。我们愿意要，但盟国必须首先得到蒋介石的赞同。.....

〔乙〕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对莫里斯·武道谈话摘要

……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自1943年7月边区周围情况出现紧张以后，国民党部队没有大规模进攻。但封锁边区的部队一直继续不断采取破坏和骚扰行动。从1944年1月到4月就发生过此类事件73起，平均三天两次。

共产党没有任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意图。我曾向中国记者说明，我们真心诚意希望国民党取得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共产党。……

我们曾经批评过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中国的状况。并且我们相信批评，而且经常不断地、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唯一的限制是，批评必须有站得住的理由。1943年7月之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两党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后来发生了（国民党军事威胁的）7月事件，因此我们在7月、8月、9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1943年9月，国民党11届中央全会主张同共产党之间的争端应以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起直到今年5月，我们克制住不批评。最近我们提出批评是因为下列原因：第一，我们的军队（这里是指国民党军队——译者）未能积极作战以抵抗敌人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的批评远为尖锐激烈，并指出中国停止抗战的危险。他们谈到崩溃的威胁和衡阳的失陷会导致战争的延长与牺牲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大后方（国民党地区）报纸的批评也是很强烈的。我们提出批评出于国家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但是国民党新闻界继续不断地对我们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我们是杀人凶手、纵火犯，说我们和日本人签订了秘密协议。和他们反对我们的言论相比，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一直是很有礼貌的。……

1927年国民党贯彻执行“清党”，把共产党人赶出军队、党和政府。1927年4月12日，开始解散工会。清党以后便开始打内战。大多数国民军都被派去围剿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和政治工作制度也废除了；随之而来的是士气低落。

1937年共产党——国民党合作恢复了。抗战初期就看出它的实际效果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恢复了。国民党军队里不容许有共产党人工作，但是，许多青年人在那里进行政治工作。人民的爱国主义活动和群众运动，虽然受到种种限制，还是允许发展。所以头两年里，国民党的士气还是比较高的。武汉沦陷以后，日军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他们转而主要攻打共产党部队。他们对国民

党采用诱降政策。国民党宣称，共产党人企图与日本言和。但是日本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不说这类的话。反之，他们却公开说，共产党军队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接着，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就通过遏制共产党的决议。从此以后，反共气氛便致使1937—1938年的协议失效。不仅共产党，而且还有人民都不能不面临迫害和镇压。在军队中，民族主义的政治教育受到严重损害；民主教育削减到零。不仅如此；军队中还进行了大量的反共教育。结果局势恶化了；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坏了。

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我们必须追溯问题的根源，对国民党说，它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持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丙〕

1944年7月28日约翰·谢伟思关于和周恩来谈话的报告

我于7月27日上午，应邀访问了周恩来将军，大约花了3小时同他进行了私人谈话。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的周恩来，在延安通常被称为“副主席”。然而很明显，他唯一的正式职位或党内职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常务委员会委员。人们都知道，他在党的政治会议中的影响仅次于毛泽东，

而且如果共产党设一个外交部长，他一定是最可能的人选。在重庆已和他相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在开门见山和真心诚意基础上进行的。详细报告太长，我只写出可能感兴趣的详细要点。

我提到，早晨重庆广播播出了政府发言人（7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声明，说国共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周显得感兴趣的样子，他指出国民党6月5日在对共产党5月22日的建议（由林[伯渠]同一天在重庆提出，被国民党代表拒绝，于是随后林用书面形式送出）的答复中提出的条件，使得不再有达成协议的基础。共产党人发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拒绝承担任何政治义务（除关于“战后”的空洞许诺外）；要求共产党军队限制在10个师（10万人），其余（37万人）通通解散（即令他们据守着抗敌疆土）；还有，共产党军队现在据守的、超过被认可的土地（可能是黄河故道以南的全部土地），应交给中央政府（虽然过去已经证明中央政府无力据守这些土地，而现在它更无力把军队运进这些地方）。

在国民党提出必须进行多次谈判这一条件之后，事情就明显了。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派遣适当授权的代表到延安同高级共产党人举行谈判，国民党拒绝了。接着共产党人建议林伯渠返回延安以备咨询。那时国民党却使用种种压力阻止林离开重庆。

事情很显而易见了：国民党不会作出合理的让步；达成妥协已不可能；而且说国民党参加谈判主要是利用它得到他们宣传上的好处，并且是做给外国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看的。他在这次和以后好几次谈话中，都提到国民党是完全不现实的。……

1944年，国民党有两种选择：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寻求妥协，或者继续拖延。第一种选择即使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会损失什么，而从宣传观点看却会得到好处。

在国民党人的脑子里，拖延意味着终会导致冲突。国民党希望战争结束时它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用它重新组建、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共产党军队一举歼灭。

共产党人不欢迎拖延解决他们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因为共产党人唯一的目标是迅速击败日本。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和全国动员。因此，他们不会同意放弃他们在实现这些目的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假设国民党宁肯拖延而不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共产党人也不怕它，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正日益强大，而国民党却日益衰弱。还有，因为如果国民党坚持沿目前道路走下去，它不可能动员人民给以它所需要的支持。

我们转而谈到国民党中国的状况，在周以令人沮丧（但并不特别新颖）的措辞描绘了那里的趋势之后，我就是否有崩溃的可能性询问他的意见。他在答复中打比方说，国民党中国更像一个结核病患者，而不像一个患霍乱病的病人，会继续不断地衰落；但是不会突然爆发或崩溃。（他喜欢用结核病作比拟词，以后还用过。）

〔这里周接着对日军当前攻势目标作出估计。〕

如像承认形势令人沮丧一样，周认为还会变得越来越坏，而委员长在采取果断行动之前会安于现状的。他强调说，委员长除非不得已是不正视问题（如1936年西安事变）的；他是随风倒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周围尽是一些难以相信的愚蠢的、二流人物（他举出的许多事例之一是，蒋选择“无头脑的”商震为驻华盛顿的军事代表）；他所受教育和对诸如民主政体和经济学的理解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虽然如此，周仍然坚持说，希望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很小；委员长将会“觉醒”，并大大转变态度。可

是，如果委员长明年之前不改弦更张，那就会“太晚”了。

〔然后周谈到他认为国民党应当实行的改革。〕

我向周请教，美国在帮助中国方面能做些什么。他认为，报纸的评论和批评，即令不为当权者所喜欢，但仍然是有影响的。然而一个使人感受到我们影响的甚至更好的办法，可能是通过高级别的个人接触，华莱士的访问是很起作用的；当孔祥熙访美时，我们应当利用机会竭力作好他的工作。我们将会发现，孔祥熙在这方面远比宋子文更为有用。

我记得朱德曾向斯坦因探讨在中国设盟军最高统帅事，我问这是否可取或可行。他作了极其坚定而有条件的回答，他说，这种意见的时机还未到来；我们必须等到美国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到达中国和反攻已实际在望。统帅必须是美国人，并且完全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假如得到中央政府同意的话。

关于现在的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的可能性，周说，这种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欢迎的，但是，除非有一次激剧的改变，定会遭到中央政府的反对。不管怎样，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因此，美军观察组获得允准是一座里程碑。（和谈话的其它部分一样，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周谨慎小心地承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至少是委员长的潜在的领导地位。他显然并不期望我们会立即着手执行一项直接援助共产党部队的计划。）

周对许多题目都感兴趣：华莱士的观点；美苏关系；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的报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进展；美国将来

对日作战的战略观点。他拒绝接受我的见解：即中国内部局势的恶化和我们海军实力的迅速增长将会减低中国战场陆地作战的重要性。他的意见是，在中国和满州的日军仍然必须加以击溃。看来他认为，苏联最终会参加远东战争，但避而不作表态。……

〔戊〕

1944年7月8日朱德将军

和史坦因谈话摘要

（谈话曾获准发表，但后来朱德将军取消了这一许诺。）

“为了对日反攻，必须把中国战场置于一位盟军最高统帅之下。……我毫不犹豫地说，为了全面统一我军于蒋介石委员长之下的利益，建立一个公正的同盟国之间的统帅部，对中国与盟国，对胜利与战后和平都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人民将会欢迎建立一个盟国之间的统帅部，并且如像我们自己一样愿意全心全意与它合作。事实上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因为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仅有的两个目标和盟国的目标是同一的——那就是，尽可能最快地取得共同胜利和民主。他们将不会认为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事情是‘丢面子’，正像英国人民不会介意设立一个美国高级指挥部一样。他们认为有必要由盟国之间指挥对日作战，并且认识到中国高级指挥部没有能力指挥现代化的盟军。

“由蒋介石委员长在真正民主改革政府政策的基础上，彻底改组政府军队，并在重庆和延安之间充分谅解的情况下，采取公平措施，平等对待中国的一切军队，自然会有很大帮助。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仍然不过是一个希望而已。即使一旦这一愿

望如果成为现实，建立盟军最高指挥部的紧急需要仍然存在。它应该真正是统率一切对日作战的盟国指挥部。……”

〔庚〕

1944年7月21日I. 爱泼斯坦
的朱德访问记摘要

爱泼斯坦一开始介绍了共产党军队和它活动地区的情况。他接着描绘了朱德，我发现，他抓住这个人的不摆架子、纯朴和友善的性格，描绘得颇为得体。

“朱德他本人是一位身体结实，步履迟缓，58岁的仁慈大丈夫，满头浓密的黑发，宽阔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大而安详的眼睛。他的头脑之清晰，几乎总使观察者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他的外貌一点不使人联想起刚强的战地领导人，和某些指挥世界上最大胆、最悲壮的军事战役的战略家。倒不如说，他像每个人的父亲，在一天长时间艰辛而又满足的劳动之后，怀着无拘束的宽舒心情弯着身子归来，并且带着安详的微笑和成熟的朴实无华的智慧，闲谈着他从漫长的阅历中如此熟悉的那些事物，听来这好像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在答复爱泼斯坦提出的中国当前的军事局势和其改善的可能性时，朱德说：〕

中国局势的改善，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的改变，包括在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机构。……从军事上说，应该停止当前的打内战的思想灌输，以便一切军队都只有一个目的——打败敌人——而且军队中的特务制度应予废除。在这些条件

下，同时盟军在两个前线（“正规”战线和敌后战线）在装备上给予援助，我们就能够巩固阵地，而且可以在敌人的前线和后方同时举行反攻。……

我们的游击队如果得到适当的装备，就能够对敌人造成比同等当量炸弹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在地面部队装备得到充分改善、足以与空军部队协同作战并使这种合作产生效果以前，空军战术运用，在与目前的地面部队配合作战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辛〕

约翰·S·谢伟思1944年7月27日

关于和林彪谈话的报告

昨天晚餐上，我碰上了18集团军115师师长林彪将军。他回忆起1942年11月和1943年5月我们在重庆的会见，当时他在那里徒劳地企图解决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磨擦。

林将军带着某种激怒谈到那些浪费岁月的往事，并且不加渲染地指出林祖涵正在遇到同样的经历。他叙述国民党对达成协议毫无诚意，接着讥刺地提到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军队必须大大裁减的要求，说这无异于帮助日军把华北和华中游击区拱手让他们。

1937年取得平型关胜利的共产党部队司令员林彪将军继续说道，前方报告说明，华北日军的战斗素质过去两三年大大恶化，今年共军作战取得很大胜利；假如共军得到更多、更好的武器，它完成的战绩更会大得多。

我被招呼去会晤另一个人，我们的谈话持续不超过10分钟。

谈话好像值得报告，理由有二：

1. 我们迄今会晤到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都很小心谨慎地避

开直接恳求给予武器装备。他们好像都有意识地不给人以“乞求”的印象。他们都避而不谈“坦克、飞机和大炮”这一点很明显。林将军的谈话，与我听到的希望得到武器的明确谈话非常接近。

2. 我的印象——得到已在延安呆了6周并采访过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新闻记者的经验的证实——是，军事领导人比诸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文职领导人，更加直言不讳地讽刺、批评中央政府。目前“党的路线”好像是避免直接批评委员长和国民党。有消息说，在使军人和这项政策保持一致方面有时发生困难，并且已经有过几次“惩戒”。这种文、武态度的分歧，1942年林彪在重庆时是明显的，恰如现在分歧是明显的一样。

谢伟思关于共产党——国民党关系的第一篇分析性报告，是解释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一次很初步的尝试。这一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与迈克尔·林迈可和冈特·史坦因的多次谈话为基础写出的，后两人在边区呆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一方面，这可能是谢伟思就中国共产党所写的最为推理性的，毫无说服力的文章；另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这一事实，即共产党人宁愿采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无疑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譬如建立一个使他们有能力控制自己地区的联合政府。在所有共产党领导人中，毛泽东是一个在他的生涯中一直最倾向于采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人，并且在1944年，他看来渴望继续这项策略。谢伟思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第5号，1944年8月3日

对外关系：1944，562—67页

虽然在共产党地区有许许多多重大的政治课题（诸如他们政府的结构，他们的政治纲领，和他们对人民的政治灌输）要进行观察研究，而迄今我哪怕能够有很少的机会加以研究的、最为迫切的、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对待和国民党分歧的态度问题。

在我7月30日写的第3号报告中，附有一项和林彪将军一次谈话的备忘录，我在评论这次谈话时指出了，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对待委员长和国民党的直言无隐和明显的不调和的讽刺，与文职政治领导人的较为温和，保留的态度适成对比。

看来在政策问题上毫无疑问控制着军事领导人的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政策依旧是：坚持统一战线，全面动员以对日作战；放弃任何纯属共产党的纲领；和承认中央政府和委员长的领导地位。这一态度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在毛泽东最近几次对记者的谈话和周恩来7月27日同我的谈话中，有关的备忘录也和我的第3号报告一起递送了。

共产党这个公开说明的政策显示了一些异常。例如，人们一般都认为，任何政党的推动力是政治权力斗争。就一个共产党来说这更应该是正确的，至少从理论上讲它的性质是革命的。既然这样，当它的力量显然在增长，并且面对着中国局势明显地、严重地恶化，而国民党和委员长的领导能力日益成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共产党要坚持执行一种自我限制的政策呢？确实，国民党

为了使它放弃统一战线而搞了大量的挑畔。而且看来国民党中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它的领导下，能否继续有效抗日已成疑问，因而共产党完全可以有理由为自我行事。对共产党人来说，不是举行群众大会，也不是提议出兵保卫西安（如象在6月中旬发生危机时那样），而是希望或甚至为国民党失败和崩溃而努力，这不是更合乎逻辑吗？

因此，问题就自行摆了出来：共产党人对此项政策（指统一战线——译者）真诚吗？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真诚的。除去1943年7月至9月，他们严重地认为他们处于国民党进攻的危险中这段时间外，他们不曾谈到强烈反对国民党。公正的观察家从来不相信共产党进攻政府部队的说法。但是却有国民党进攻的事例。国民党同在游击区的伪军甚至日军关系的记录，经不起仔细检查。共产党军队坚定地遵守内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悲剧式的方针——虽然某些观察家相信，国民党要打败他们如果不是不可能，一定也很困难。他们绝不允许提出任何这样的建议，说中国可以一分为二，或者说他们可以保持如华北的一部分地区，多少保持独立。延安墙上的宣传标语（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很久就写上了）呼吁两党团结抗日。有报道说，军事领导人批评中央政府时措辞过于毫无保留，已被要求缓和他的言论——类似的情况是，某些党员因为超越党的路线，提倡诸如建立集体农庄这样的改革，成为“左倾分子”而受到惩戒。最后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甚至国民党也未能有更大作为，而只是进行一些无力的、不能令人信服的宣传，声称共产党人企图煽动或利用国民党中国农村的不安，或者说在他们的华北、华东军事作战地区之外，有大规模的共产党活动。

那么，怎么解释共产党的这一政策呢？在最近的将来，比如说在今后几十年中，他们期望在中国取得什么地位呢？

我意测，共产党的政策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党的领导人阐明的（就我所知，虽然从未对任何一位外国观察家作过全面阐述）以理论根据为基础。第二种解释是从实际政治考虑产生的，这可能太挖苦人了，完全受到那些领导人的反对。我觉得二者都有某些道理。而且二者看来都表明，党是处在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的领导层和强有力的纪律指导之下。

共产党政策的理论上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这样说的含意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这种解释，对他们说来，意味着经济社会要经过一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也意味着，不能绕过这种自然发展的顺序。要尝试这样做定会招致灾难，并且会违反他们战略上的基本原则。

因此照他们看来，不能从中国目前初级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和至少经过受调节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

所以，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立即废除私人资本——因为在中国仍然差不多还没有资本主义。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现在还没有无产阶级。它并不意味着农庄集体化——因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还不足以克服他们耕种自己土地的原始个人主义的愿望。

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为

他们的政治上先进的政党的存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这样去领导和指导经济发展，以致使导致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弊端得以避免。问题在于要使经济革命赶上政治革命，并和步子上走得更快的政治革命齐头并进。他们希望通过实行民主去防止对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剥削和有利于阶级革命的需要。他们寻求通过有秩序地、渐进地解决中国的基本的土地问题的办法，消除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通过鼓励建立诸如合作社这类组织，他们能够用一种适合于缺乏资金、现代工业和交通工具的国家的办法，来帮助发展生产，同时教育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通过鼓励私人投资办法，他们能够增进国家财富、提高生活水平，但同时通过民主管理办法避开强大的私人垄断组织弊端，而这类弊端在纯资本主义国家里却不断引起问题。

目前共产党政策的一切方面看来都很适应这个框架。例如，用减租代替过去的没收政策，这不仅有助于保持维护地主利益和团结一切集团支持抗战，而且用限制他们土地投资获利的办法，也帮助使工业投资对地主——资本家阶级具有更多的吸引力，在陕北边区，这一政策已经并正在收到实效。

这样，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在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但它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目的。这种民主将是一种渐进的——或一般称之为激进的——型类。经济发展将部分是社会主义的，部分是私人的。第一种对第二种来说是基本的：所期望的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

因此，这种长远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决定了共产党人当前对国民党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主体制，他们主张多党参与政治。他们相应地寻求和国民党妥协，并且希望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有一天会起来使这一妥协成为可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拒绝利用

看来是眼前有用的机会去寻求推翻国民党。因此，他们寻求避免内战；即使长期斗争后他们取得胜利，国家的发展将会因时间的损失和资源的破坏而受到挫折。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认为，如果他们被迫放弃他们朝着民主目标已经取得的进步，那么，和国民党达成的值得想望的妥协也会白费了。因此，他们一方面接受挑畔和辱骂，同时，他们在原则上决不让步，因为作出这些让步就会违背他们的长期政策，并且也是在追求终极目标中的一次倒退。

出于这种见解，共产党成了一个追求有秩序地民主成长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举例说，如像在英国正在实现的那样——而不是一个煽动立即的、暴力革命的政党。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政党，不是寻求及早垄断政权，而是追求它认为是中国的长远利益的政党。他们把这个放在唯物主义严格解释基础上，看作是“理想主义的”政策，这种严格解释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自然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之前，企图强制这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那是违背唯物主义原则的。

共产党政策的实际的解释

共产党正在做的和正在提倡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也都能从实用观点加以说明。这都是从这种假设出发的，即共产党事实上正在追求权力，这一目标提供了其政策的动力。这种解释可以用异乎寻常的非常简洁的形式表达如下。

共产党人积极支持战争，因为这给他们以机会去动员、组织、教育人民，并创建和训练一支高效率的军队。

他们选择在日军战线后方地区作战，因为在那里他们相对地免于受到国民党的干扰。

诸如放弃没收土地之类的政策，都是有用的暂时变通措施，

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战争和在他们的作战地区赢得人民的一致支持。这在其它地区也有强大宣传号召力。

他们拥护民主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号召力，而且是一根很好的打击国民党的大棒。他们理解，群众的支持必须成为他们在任何力量较量中对付国民党优势装备的主要武器。

他们的民主要求，他们在敌后战线从事游击战和他们公布的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由经济政策，在唤起外国同情和赢得外国支持上也是有用的。他们认识到，这种同情和支持，至少一个时期，对战后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将是必需的。

当前，时间有利于共产党人。随着中国其余部分形势日益恶化和国民党变得更加虚弱，共产党人无论相对地说或绝对地说，都变得日益强大了。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说，没有必要采取积极步骤去利用国民党中国的局势。他们可以从容地休息、等待。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时间将会使国民党走向崩溃，使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那时，他们可以视条件可能，自由地马上或逐步转向他们的共产主义纲领。

评 论

在对共产党政策的两种解释之间很难作出明确的选择。可能是，两者的某些部分都是共产党战略实际的构成部分。共产党将军们的好战使人倾向于接受第二种解释。甚至共产党人在公共关系和宣传方面几乎是过分的机巧，也使人不致对他们产生怀疑。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或者在当前的战争结束后避免打内战的显然真诚的打算，却很难适应于第二种解释。而且，共产党领导们感人的个人品质，他们表现出来的真挚，他们的纲领的一贯性和逻辑性，至少使我倾向于一般地接受第一种解释——即共产党

人把他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放在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随之而来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在分析了共产党的“自我限制”政策后不到两周，谢伟思写了论共产党——国民党关系的下一份专电，特别讨论了两党的谈判条件。共产党的条件已在周恩来的一篇声明中清楚说明了，声明发表在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这里印出的只是谢伟思对周的声明的译文所作的简要概述报告的一部分。这份报告所以特别有意思，不仅因为它强调了共产党“强硬和冷酷无情”的立场，而且还因为它显示了不平常的不拘形式和坦白直率；不久共产党领导人以此对待谢伟思；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拟议中的声明的内容和发表声明方式时他正在场。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声明

第9号，1944年8月14日

美亚文件：739—746页

1. 附上的是周恩来将军关于当前国共谈判现状的一份声明

的译文（未付印——原编者）。这份声明发表在1944年8月13日的延安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这是谈判的全部历史，又是两党主要分歧点的明晰的概述。

周恩来的作者身份，和声明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最显著位置上，都足以显示声明的重要意义。此外，8月11日，当周将军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决定发表这一声明并商定声明总的内容时，我碰巧在场。有趣的是，他们摒除了这样的建议，即通过对延安的外国记者谈话的方式把声明发表出去。……

5. 周恩来将军声明的强硬语调和其他近来公开发表的材料，诸如指责阎锡山将军正在跟日本人搞交易（已分别作过报道），和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论衡阳沦陷（见我写的8月13日第8号报告）（未付印——原编者按），至少表面上看来有迹象说明，共产党对它和国民党谈判取得成功不是放弃了希望，就是不再感兴趣了。但是共产党领导人自己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承认成功的机会看来微弱，但是坚持说，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国民党只懂得一样东西——武力。所以在努力讲道理之后，现在又到了采取强硬和无情态度的时候了。这一策略，与持续不断的争议和讨论相比，有同国民党领导取得谈判成功的更多机会。（这是几位共产党人发表意见的要点，他们包括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将军，今天下午我和陈毅进行了一次私下的谈话）。

我自己意见如下：共产党人会高兴与国民党取得和解，但只能在非常接近他们自己的条件的基础上。他们已经确信国民党不会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或想法满足他们的条件。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设法“抢在”国民党“之前”，以防止国民党造成共产党人要对未能达成协议负责的印象。

9月间，共产党人公开透露了造成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问题。首先是由林伯渠（林祖涵）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发表的演说中透露出来，然后是由《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改组重庆政府成为真正的联合政府（有意思的是，同样一个问题也使越南谈判拖延了这么久）。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人将他们的军队置于重庆指挥之下。共产党拒绝这样做，直到他们在重庆政府中得到真正有效的发言权和民主选举的地方政府得到保证为止——他们知道民选政府会在边区和游击区给他们以权力。由于谈判在那一点上陷于僵局，共产党人决心向公众披露他们的条件，并在这过程中对国民党加以痛斥。

共产党评国共谈判和需要改组中央政府

第30号，1944年9月21日

美亚文件：882—883页

1. 附上两条新闻（只有第一条，很短的一条在此间印发——编者）译文，它们在1944年9月20日延安出版的共产党报纸《解放日报》头版占据显著位置。这两则消息同一天在延安英语新闻广播中播发了。

2. 第一条新闻谴责国民党禁止发布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中央政府的提案。在写稿之日，在延安还没有收到林祖涵在国民参政会上声明的全文*。然而此间认为，大使馆已

* 全文见书末附件——译者

经得到了。

3. 第二条相当详尽地重述了共产党的论点，即国民党并无真诚的愿望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合理的和解的愿望，以利抗日战争。文章谴责国民党玩弄诡计和遁辞，和宁愿削弱国家的实力，即使这有助于敌人也罢。接着文章继续提出意见说，国民党要求军政统一，说这是它的唯一目的，而不实行政府和高级指挥部的全面改组以保证统一是用来增进国家利益和帮助战争的进行，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

4. 全篇文章措辞强硬。其用意是在看来国民党想要保持的级别上继续进行不必要的谈判，来处理有限的未决问题，诸如给一定数量的共军部队以供应。从表面上看，共产党的声明等于拒绝与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和解并和它进行军事合作。

5. 没有必要设想，共产党人一定会坚持这一不妥协的立场。然而，他们相信，国民党内要求改革的内部压力和当前不能令人满意的处境，是把这项提议加以公开的有利时机。这是共产党报纸第一次用明确的措辞讨论改组政府和高级指挥部。如果内部的不满持续下去而国外反应又不利的話，可以预料，共产党的压力将会继续和加强下去。

6. 这一直是明摆着的，国共两党就国民党提出的方针进行的谈判，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共产党人也从不期待（或打算）谈判会得到成功。改组政府的建议在延安产生的影响，取代了对谈判的注意力，并使谈判进入幕后。现在一般认为谈判已无实际重要意义。

7. 延安领导人对国民参政会五人小组的即将到来，看来持一种既表满意，但又不兴高采烈或寄以过高期望的一般态度。他们指出，五人小组在返回重庆后能否有什么成就，全看委员长的态度，这方面迄无任何一点令人满意的改变迹象。换言之，这不

是由于应由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负责的情况缺乏了解。

附 件：

(延安) 新华通讯社 9月20日英语广播

(译自 9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延安，9月19日电：——国民党宣传机构，就林祖涵同志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党——共产党(Kung chan tang)*关系的报告发布了一种粗制滥造，大肆窜改和歪曲的版本。举例说，原来的演讲中要求改组国民党的现存独裁政府为中国各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以利团结和抗战。但是这整段全被《中央社》删掉了。林祖涵讲话全文一经收到将立即予以公布。

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的态度的一个有趣的迹象是：10月10日中国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在滞留中国的年月里，谢伟思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怎样发动游行的专家。1942年秋天，温德尔·威尔基访问西安时，他正在那座城市，那天一早，他就跑到街上去，听到老百姓抱怨保甲长强迫他们参加游行。他曾看到当地宪兵怎样教老百姓鼓掌欢迎来访的美国人。他们的工作显然做得不错，因为威尔基对中国人感情的“自发流露”留下很深的印象。

* 在1944年的一个短时期内，部分地为了回答外国人不断提出的建议，他们在英语广播中放弃了采用带刺激性的“共产党”（缩写为CCP）而改用了罗马化的中文名字：(Kong chantang)。

因此，当谢伟思在他的一篇经过删节的报告摘要中，把延安的庆祝活动称为“我在中国曾经看到的、组织得最好的、有各种人参加的……国庆节活动”时，他是有很多根据作这种比较的。从某种政治观点来看，对国民党的相当公开的揶揄，显然是有深远意义。但是，他的报告也是延安一个假日的一篇饶有趣味的记事。

延安庆祝双十节

第42号，1944年10月11日

美亚文件：1021—24页

从8号开始，各公众团体和政府机关就在大街上搭起传统的中国式庆祝节日的临时牌坊。这样的牌坊大约有20个，足使延安的3条大街大添光彩。主要政府机关的大门也类似地打扮了起来。

旗帜当然飘扬在商店和政府建筑物上。（延安是一座满城旗帜飘扬的城市。每星期天，都照例把旗子高悬起来。旗子当然是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党旗。而且也不用共产党的红旗。）

10月9日晚上和10月10清晨，全城简直都贴满了标语口号。标语都是手写的，大多写在彩色纸上——一般是红纸或绿纸。这些标语的一些特点是有代表性的，值得一提。

1. 主题都是谈当前的或具体的问题。它们明确谈到目前的局势，多数都谈到当前的战局，国共谈判，或者改组政府的建议。

2. 在方针上的总的类似，表现出明显的授意或指导。同时，在实际形式和用辞上则各具不同特色，标语口号很少雷同的。

3. 此外，标语来自许多方面。许多团体都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每个政府和党的机构负责它的邻近地区，每一商店都能贴出一、二张署名的标语。很多商店悬挂出写有标语的灯笼。但并不是家家都这样作，这一事实看来说明并没有强制。

4. 当直接谈到当前局势时，总的语调不是煽动反对国民党。没有哪个口号近似“打倒国民党”。也许最接近的是：“停止假民主，实行真民主”。自然，极大量的标语口号呼吁出版、言论、人身等等自由，都含有批评国民党的意思。其他口号呼吁承认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然而，并不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还有一些标语涉及战争的更广阔的方面，要求与美国、苏联和英国更密切合作（总是用那个先后顺序提到，可能是官方指示的顺序）。没有标语提到共产主义，但有些标语要求“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统一放假一天。天气晴朗，满城充满真正的节日景象。街上满是人群，引人注目的是人群中有着为数众多的农民（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农民甚至是否知道有个庆祝会是值得怀疑的）。妇女和儿童穿着“节日盛装”，确实那就是总的气氛。显然不是警察努力强迫商店庆祝节日，象我在某些城市里看到的那样。许多商店停止营业——门前贴着标语，但有些商店开了门，并与欢度节日的群众做了大量生意。

这天，整天不断地有来自各机关团体的宣传队在街上举行小规模的游行，每个宣传队以小土乐队为前导，后面紧跟着一伙人群。

有一个宣传队携带着几幅巨大的、标明太平洋和中国战场形

势的地图——着重说明国民党疆土损失和游击根据地最近的发展。

另外两支宣传队中有当地民歌（秧歌）演出队，它们在公众集会地方表演了群众喜爱的歌舞节目（有现代宣传情节）。

还有一支宣传队有三位演员，分别扮演孔祥熙、何应钦和国民党二陈系的政客。这些人物一出现，那里就是一片放声哄笑，看来群众对其含意并不缺乏理解。“孔”是一个胖子，在相应地方塞进一个枕头化装得更肥胖些，他身穿一件中国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黑色园帽（一个商人的标记），肚子上钉满100元纸币。

“何应钦”的穿戴活象一个日本军界的纨绔子弟。国民党小官吏代表二陈，穿着常见的国民党制服，头戴古老的便帽，装扮得很象一个恶棍。

有些游行队伍沿途散发油印传单。这些传单受到热烈欢迎，散发传单的人，往往是姑娘，被人群包围起来。我得到的一张传单可翻译如下：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支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

“130万在华日伪（卖国贼）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但他们每天都遭到挫折。”

谁应该被取缔？

谁正在胜利地抗击？

王家坪宣传队，10月10日

这天，虽然计划举行一次真正的大规模露天群众大会，但是

因为最近的连绵降雨延迟了秋收完成而取消了，改为到处都举行集会。

上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总部举行了正式招待会，所有政府、军队和党的重要官员都出席了，应邀出席的还有军事观察组、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客人中有两位上了年纪的蒙古人，据说他们来自鄂尔多斯地区。

下午在有一千多座位的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我们没有被正式邀请出席，但我被告知，如有兴趣欢迎参加。我真的去了，在后排的群众中找到一个座位。很明显，与会者都是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有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两类人——当选任职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占总数的40%。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典型的商店老板或老农。座席好象没有作特殊的安排，各方面的人都混坐在一起。很有意思特别值得一提，坐在我旁边的青年人，外貌上看象是党的工作人员，煞费苦心（用极其友好的方式）使人确信，有些老农知道讲话的人是谁，和大体上正在讲些什么。

讲演者的上面，象往常一样悬挂着邱吉尔、斯大林、孙中山、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画像。（确切地说，顺序可能不准确，但一如既往，孙中山居中。）讲演者身后是两面交叉的巨幅中国国旗。

会议开始仪式很简单。主持会议的边区政府民政局扼要地说明节日的意义后，他请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将军讲几句话。

朱将军的讲话是一次非凡的表演。他是一位心胸宽广，不露锋芒而又步履迟缓的男子汉，长有一张宽阔、愉快而又强壮的农民的脸孔。他作了一次完全即席的讲演，没有任何激越或雄辩的效果，几乎都用谈话的方式，用老百姓的单纯而又直率的土话，充满朴实的直喻和俗谚。他提到的事情，都是老百姓熟悉的过去30多年的历史，他不谈理论和各种主义，而代之以这时期里群众

自身的经历。听众聚精会神，显然，他完全吸引了听众。他以不动声色的幽默——机智而不尖刻，揶揄嘲讽国民党，使全场听众纵情大笑。他讲到袁世凯竭力想做皇帝遭到失败，曹锟、段祺瑞、吴佩孚*等人如果不是名义上的话，实际上都试图干同一勾当，然后，他回到正题：“并且如果蒋介石不警惕的话，他将会发现自己会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听众的笑声“完全淹没了他的话声”。

下一位发言的是周恩来将军。他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说稿，显然是要使这篇演说成为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中国当前内部问题的一篇重要政策声明。讲话使用了明确而直截了当的语言（显然不是周用过的来自群众的语调），但是它的发表虽然避免了戏剧性，却略为有些郑重其事和不自然，而且没有象朱将军看来一点也不费力就得到的那种热烈的反响。听众聚精会神，不时鼓掌。但是，这些鼓掌更象是有组织的，由听众中穿制服的（政工人员）那些人带头的。周将军演说辞的内容在我10月14日的第44号报告中已经论述**。

最后一位发言的人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在重庆期间任代理主席的李鼎铭。作为一位富裕地主（他现在仍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政府小官吏，和内战时期跟共产党军队打仗

*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2——1916）（应为：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译者），他在试图走上皇帝宝座失败后死去。曹、段、吴都是军阀，在袁死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短时期中徒劳地企图在北京政府中树起自己的最高权力。

** 未付印。谢伟思在他的周恩来演说词概述中，把这一声明说成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新的强硬政策。声明指出：“必须停止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必须建立有各党派和团体参加的真正的国民政府。这应通过召开紧急国民会议来完成。不赋与改组和控制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充分权力，这一联合政府就是无用的。不能解散积极抗日的部队和政府。我们有权要求，这些部队应当获得与其抗击的敌军成比例的一部分外援。”（见美亚文件，第1069页）

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组织者，他的背景令人发生兴趣。我没有听完他的讲话，由于他年高声弱，而我坐得又远，难以听清他的话。但是，他开始讲话的主题是“你们不能继续愚弄人民了”，这是指的国民党。

边区政府设宴招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和其他外国朋友，象头天晚间在总部举行的舞会一样，这很难说成是总的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在晚间，举行了许多集会和戏剧演出。在商会的大露天剧场，上演地方戏，在演出开始前3小时，观众就携带自己的板凳，有些人带着毯子，向场地涌去。在八路军总部礼堂里，为大量观众放映了美国新闻纪录片。至少在其它三个地方还有正规的戏剧演出。

包瑞德上校和我随着朱德将军一起去看戏，那是根据著名剧作家郭沫若的现代戏改编而成的歌剧。虽然是历史戏，却跟中国现在的局势有着明显的关系。反派角色是一个国君，他按兵不动，拒绝用自己的大量军队攻打敌人。剧中英雄人物是一位受人民爱戴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关怀国家安危的大臣。他遭到阴谋暗算，被贬为战地指挥官，他接管军队击溃了敌人（因而拯救了国家），只是返师时死于暴君之手。

党报《解放日报》自然为这一天动用了大量的版面。发表了社论和几篇专稿，有一篇是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撰写的，它指控国民党忘记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理想。我建议，社论会值得大使馆作为共产党宣传的有力作品加以译出。

周恩来在10月10日演说辞中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谈判立场之同时，周和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私人谈话，强调表明了他们相信没有希望早日和国民党达成协议。十分明显，两

人都察觉到时间对他们有利，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地位只会变得更强大。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 谈中国国内形势

第43号，1944年10月12日

对外关系：1944年，636—40页

1. 几份副件是1944年10月9日——12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备忘录。

2. 概要：他们两人都反映出信心，和宁愿等待他们认为会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不可避免的事态演变。他们相信，任何美国可以澄清中国局势的决定性压力，必须等到总统选举有了结果之后。目前委员长顽固坚持他的立场，没有立即取得和解或建立全国性政府的希望。共产党军队将继续注视日军向新地区的推进，并已经进军豫东。毛泽东和周恩来看来不同意共产党人是否应有限度地参加不是建立在彻底改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府。概要完。

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备忘录

1944年10月10日

昨晚，毛泽东和他的妻子出席了在总部举行的小型临时舞会。他们两人都兴致勃勃，一再一起跳舞，并和出席的多数人跳。联想起他平日的文静和举止持重，他的舞姿只能说是愉快的。

晚会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舞会间歇中顺便走到我旁边就座，并开始了持续约20分钟的谈话。

他一开始开玩笑地就美国对中国批评美国给予的援助太少作出的答复向我致意，当我表示莫名其妙时，他说明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公报”（见我10月10日的第41号报告*）。我坚持认为必定有某种误解，国务院不可能发表这份所说的声明，而且并无其它迹象说明我们正在对国民党采取这样一种强硬方针。

他把话题转到国共关系，他承认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

我问他共产党打算怎办，他回答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锻炼。”然后他表示，纵然美国会对国民党施加一些直接压力，妥协也会拖延到总统改选之后，因为，是总统把蒋扶植起来，所以他不会使蒋丢脸的，否则，可能激怒“中国之友”，并使对华政策成为一个政治皮球——直到选举平安度过之后。他笑着问谁当选的可能性大。

他变得严肃起来，重复他以前讲过的话——共产党人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摩擦，因而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他又笑着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

我认为，真正决定共产党政策和未来的是日本人：日本军队占领的领土越多，就使国民党越发困难，而共产党则变得更加强大。他承认这有一部分是对的，并且说，共产党人定将“收复国

* 未印发。谢伟思在他的报告中解释说，共产党的短波收音机收到一份国务院外事局发布的广播公报，并把公报对国内报纸社评的摘要，误认为是国务院的正式声明。经谢伟思过问之后，《解放日报》印发了更正并表示歉意。（见美亚文件，1017—20页）

国民党丧失的每一块领土”，而且他们的部队已经从北、南两方面向豫东挺进。他明白表示，如果国民党在中国东南部的控制陷于崩溃，共产党军队也一定会进入那个地区。但是他坚持说，共产党军队不同国民党争夺它现在仍然控制着的领土。他们一方面承认，日军摧毁国民党可能意味着最终会对他们有好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好处将被盟军对日作战立即产生的不利所抵销。因此，共产党人寻求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的合作，深信这是胜利进行抗战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然后询问卡斯伯格少校（军医官——译者）最近旅行得到的印象。我谈到他已经注意到军队和农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实际合作。他的回答是：“那是当然的。如果我们不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不会呆在这里或者活到今天了”。从这点开始，他进一步开展话题，谈到盟军在法国取得胜利时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重要性，这种支援包括：提供情报、侦察以及对敌进行破坏。这种人民支援，如果美国部队在国民党领土上登陆或作战是得不到的，可是共产党地区动员起来的民众能够提供这种援助。

我又回到国共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即国民党最终可能会愿意邀请几位共产党领导人去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职位，也许是担任内阁部长。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没有用的，二陈系和其它保守的国民党派系会仍然全面控制着基层政府机构，而共产党在这个基础上参加只会帮助国民党欺骗中国人民和外国舆论。共产党参加必须以彻底改革和政府改组为条件。

他返回到共产党愿意等一个时期的想法。这时他讲到南斯拉夫，说时间最终证实米海洛维奇只与德国人作战的说的虚伪性，说铁托曾不得不帮助人们认识米海洛维奇的动机和行动，说共产党人也有许多确凿的证据证明国民党与日伪军勾结，说他们

一直不公布这些证据是希望国民党会愿意和解、合作，但是说如果国民党最终确定无这种意愿，这些材料总会被公布出来的。我询问共产党人怎样会知道什么时候和国民党和解已不再存在希望，他不愿置评，只说“时机尚未到临，还有一线希望”。

和周恩来将军的谈话

1944年10月12日

周恩来将军顺便非正式来访，留下来吃中饭，饭后谈了好长时间。谈话的大部分都是一般问题。但下列各点可能是饶有兴味的。

他分析了委员长10月10日的演说，认为这是长时间来蒋作的最反动、最不让步的演说。第一点——“不能以常规标准来判断中国，因为她是革命的国家”——目的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批评。第二点、第三点——“没有中国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和“我们自己仍然有充分的实力”——是针对外国的批评讲的。第四点——“关于团结和内战的谈论是敌人和汉奸企图阻挠我们取得胜利”——是指向共产党人的。他指出，演说中不承认得到外援，不提国内政治问题（除了明显把共产党人列入汉奸之类以外），和不提及民主或政府改革。

他认为演讲辞标志着委员长的态度最近又强硬化。他举出了四点迹象作为这个看法的根据：（1）近来有消息说，最近将来可能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可能是讨论与共产党人和解和政府改组问题——一事已烟消云散了。（2）据报道，委员长试图——通过吴铁城——钳制孙科的咀。（3）虽然10月2日宣布国民参政会调查委员会一周之内将赴延安，可是他们离开重庆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4）最近有好几起事例说明

内部检查加强了。

他认为，眼前不存在国共谈判取得成果的希望，也不存在所许诺的改组政府的希望。

他说，在决定下步行动之前，共产党人会“等待一两个月”。到那个时候，总统选举可能会使人看到一项更明确的美国政策，而且日军向桂林和柳州的推进不是取得成功，就是陷于失败。如果那些城市失守了，日军继续前进，要求国民党实行改革的全国性压力就会大大增加。

他提出，委员长的政策继续放在短期基础上（这一政策现在寄希望于德国在一、二个月内将被击败），那时美国将进攻菲律宾，日本的推进——中国人民关切地注视着——将会转移到中国沿海紧迫的事变上去。他认为，《大公报》关于开辟“第二战线”（在沿海登陆）的社论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

关于共产党可能在一个很有限基础上参加现政府这一个假设性问题，他重申了10月10日演说辞的论点，政府必须全面改组，新政府必须享有改组并控制高级军事指挥部的权威。然后，他回顾了他自己和其他反对派人士接受国民党政府官职的经验，那意味着有职无权，毋宁说是套上个笼头。然而，他继续说，共产党人将会仔细考虑任何建议，并不一定就是拒绝它，即令提出的（共产党人的）参加，也甚为有限。他举了国民参政会的例子。共产党人了解，国民参政会不过是一个招牌，并无权威，而且给他们的席位与他们的相对实力不成比例。但是他们接受了，因为参加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的意见被人们知道，并且也是一个走向（他们希望的）合作参加国事的小小契机。（周恩来将军的态度，与毛泽东的颇为断然的声明很不相同，除非彻底改组，共产党人不会参加。）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

1944年，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不倾向于同垂死的国民党作不必要的妥协。正如谢伟思的朋友和同伴约翰·戴维斯所说的，“共产党人将在中国立足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而是他们的”。*事情就是这样，准确地弄清他们过去和将来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是极为必要的。

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策的迹象，主要来自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和答记者问，其中几篇上节中已经印出。所幸的是，谢伟思在重庆的日子里，就集中注意共产党事务了，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他不是陌生的。在重庆的时候，谢伟思常和周恩来晤谈，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位私人朋友。“总的说来，我喜欢中国人。我爱这些人民，显然他们有些人也爱我。自然，他们把我看成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但他们意识到我对他们的观点真正地感兴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的观点。我从不企图说起话来俨然是一个共产党人，或者给他们以我过去是一位共产党人的任何想法。从来没有人作出把我当作是一位同志的任何暗示。但是，他们显然得出结论，我是一个相当公正的政治记者。另一方面，我不单纯是一个报纸的记者，这种记者仅仅是坐下来写出别人说的一切。我们交谈时，互有来

* 见约翰·戴维斯备忘录：“共产党将接管中国吗？”《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中国671页。

往。我说明自己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因此，他们不是单纯地把我用作一个传达他们意见的记录器。他们也有机会了解我的看法，而我的看法和大多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联合政府，被很多美国人，无疑还有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策。当然，这些自由主义的同情心，是在50年代终于导致我们落入陷阱的东西之一。”

总之，谢伟思被共产党人明确地认为是迪克西使团中的主要文职官员，是一位应该与之探讨政治、外交事务的人物。在正式宴会上，谢伟思通常都会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另一旁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旁边是包瑞德。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即欢迎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的晚宴上，谢伟思和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谈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希望美国继续在延安派驻外交性代表机构

第2号，1944年7月28日

对外关系：1944年，522—23页

1. 信内寄上的是1944年7月26日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一次谈话的备忘录。

2. 毛泽东主席表示希望国务院有一位代表常驻延安，甚至在美国军事观察组可能撤走之后也驻在那里。他说明，提出这一希望的理由是，国民党进攻共产党人的最大危险时机，将会在对日敌对行动停止后很快到来。

3.在表达这一希望时，毛主席推理地同意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声明，即他们相信，美国在共产党地区的观察员将会证明是防止国共两党公开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备忘录

1944年7月27日

在昨晚为我们军事观察组举行的晚宴中，我坐在毛泽东主席旁边。宴会前后都没有机会进行私下谈话，但是进餐中主席跟我讲了许多个人的意见。

他重复了在这以前的一段讲话，即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他很和蔼地又对我参加军事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将军和董必武先生那里知道我对中国政治很感兴趣，并且听说我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

他说，他了解我是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一位顾问，可是还仍然和美国大使馆保持着某种联系。我确认了他的话，并且补充说，为了某些他能理解的理由，我在这里名义上只以军人身份工作，虽然我可能撰写的关于政治主题的报告都要由大使过目。

他问我是否会长期逗留这里。我答复说，我从属于一个主要在此间从事研究和调查的小组，不能肯定回答我在这里留住多少日子；但是我们希望将会发现我们总部的代表派驻延安是值得的；并且这些代表中可能包括有文职顾问。

他问我，国务院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我提醒说，这有许多实际困难——第一是在这一地区里美国人为数甚少。他同意，但是又说，他提出此问题，是因为在抗日敌对行动停止之后美国军事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这时正是国民党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他说，据他了解，是华莱士副总统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才派出我们这个观察组的。他并且询问以前是否作过其它努力以求得到这种允许。我暗示，我有许多问题想在他有空的时候和他探讨，虽说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公事。他善意地笑了，并且说，在我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的。

然后我问起重庆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没有进展，而且国民党目前不让林祖涵回来。

谢伟思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为时短暂，理由很简单。虽然他主动提出在延安建立一个美国领事馆的问题，毛显然没有很大决心使自己对美国来一次重大的和睦表示，毕竟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反帝政策而声名昭著的。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根本的是，当他打算和他知道在战后的太平洋会占优势的强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需要得到全党坚定的支持。因此，毛搁置了和谢伟思的任何及早的会谈，而邀请谢伟思和他“先认识认识。”

当谢伟思正在熟悉之际，和双方互相作了一定程度的观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举行了一次不为谢伟思或迪克西使团其他任何人所知的会议，会议在8月18日产生了一份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题目是《关于外事工作》*。这是份党内文件，是供可能和迪克西使团成员接触的地方干部使用和向他们介绍情况的。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迹象，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主动与美国交往方面的严肃认真和真心实意。

* 这一秘密指示被俄国人的《远东问题》杂志1972年3月第1号发表了，184—187页。

指示认为，迪克西使团的到来，标志着“我们参加统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开始，和外交工作的开端”。它指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动机主要是军事的：搜集军事情报和援救空军飞行员，但是，“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以后就有可能建立文化的、然后是政治的合作”。指示然后叙述了会受到欢迎的合作形式：军事上（“盟国的军事人员和武装部队可能进入我区土地”），政治上（“我们欢迎派遣外交使团到我们边区来”），文化上（“我们欢迎他们在延安设立情报资料和政府新闻通讯社的分支机构”），宗教上（“我们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边区”），和经济上（“在遵守互利原则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国际资本投资和技术合作”）。指示最后谈到和美国人接触中必须遵守的一些方针。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主动，同时“避免要求”提供军火和武器装备。干部要“注意谨慎和表现直率”。最后，“盟军应受到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必须力戒过分奢侈，同时避免冷漠”。

一旦毛使共产党接受了和美国亲善的政策，他就决心和谢伟思进行谈话。8月22日毛传来了话，第二天就举行了会谈，从谢伟思的报告看，毫无问题，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企图和美国在战时和战后时期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毛建议谢伟思立即飞回重庆把他的报告呈给大使，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他认为这次谈话有重要意义。不幸的是，谢伟思坚信毛泽东的主动表示的实质和意义会很快得到重庆和华盛顿的赞赏，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不是很有根据的。这份报告直到9月28日才从重庆发出，直到10月24日华盛顿才收到。

访 问 毛 泽 东

第15号，1944年8月27日

对外关系：1944年602—14页

1.附件是1944年8月23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谈话的一份备忘录。因为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这份备忘录必然是一份概要，但这份概要是根据谈话记录写出的。

2.毛主席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如果现在就运用起来会是决定性的，而且美国的政策也相应对中国人民有极其重大的关系。所以他想知道那个政策是什么，或者看来将会是怎样一种政策。他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等问题。他认为，如果在战争时期不能实现民主，内战将不可避免。

3.具体说来，毛主席想要美国支持一个建议，即通过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参加的会议，建立起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

4.这次会见是毛主席主动提出的，并且由他来主持谈话。他态度友好，不拘礼节，并且我相信他谈话直率。可以肯定，他的陈述是直截了当和给人启示的。我认为，这些陈述是我们迄今所得到的共产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全国性事务中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和计划的最明确的示意。

5.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人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必须就他们将来的行动方针作出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聚集在延安，不仅有党中央和军事机构的，而且还有根据地和野战

军的领导人。他们包括：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司令员，领导晋东南野战军总部

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陈 毅：新四军代理军长

林 彪：八路军115师师长

杨秀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

罗瑞卿：八路军野战军总部政治部主任

朱 瑞：共产党山东党委书记

这个名单不完全，只包括了比较知名的人。当然，这也并不包括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诸如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明，刘少奇，朱德和叶剑英，他们象通常一样，现在都在延安。

6. 这些人来到这里显然和美军观察组到来无关——有些人从1944年3月起就在旅途中了，那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会来到延安。当我们问及有影响的领导人空前集中的问题时，共产党人仅仅说，他们在这里开会筹备反攻。

7. 虽然不愿透露有关这些会议的性质的详情，很明显，共产党人正在考虑下列有关的问题：

- (a) 国民党的日益削弱和国民党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
- (b) 中国战争最后阶段可能的发展；
- (c) 在这些最后阶段里和紧接着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战略。

8. 与这些问题相关联的问题是，目前打算和国民党谈判妥协的努力。共产党人现在实际上已放弃了这种希望（如果说他们曾经有过这种希望的话），即无需外界对国民党施加强大压力，谈

判妥协就会取得成功。日军的军事压力，看来还不足以克服国民党的反共主义。

9. 还有一个有关的问题是，如果国民党正在走向崩溃，或者如果它在战争结束时处在能够咄咄逼人的反共的地位，共产党就要改善自己的地位以防不测。这对共产党参加作战可能有影响。他们不会停止战斗。但是他们可能更关心于直接扩大他们的控制区，而不大愿意在盟国的全盘战略中牺牲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举例说，这可能决定共产党人是否把他们的作战扩大到平汉铁路（现在国民党已不再直接控制这一铁路）以东地区，（见我的1944年8月4日第7号报告第一节，未付印——原编者按）；或者他们是否会试图利用日军粤汉线战役，以重建他们在华东南的老根据地。这两次扩大，都可以为肯定有助于对日作战作辩护。但在当前形势下，它将会意味着和国民党发生更多的摩擦，并且更走向实际内战状态。因此，必须考虑的问题是，究竟这是否可取，美国是否希望和支持共产党采取这种有力的行动。

10. 共产党人认为，就对所有这些问题来说，最根本的是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我们有能力支持国民党并使之保持政权；我们将决定中国战场的战争发展；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制止内战并迫使国民党朝民主政体前进。这些美国政策将决定，究竟共产党人是否必须单干并照顾自己；或者究竟他们是否可得到生存的保障并参加民主中国，从而在战争中全心全意合作。共产党人需要我们的了解和支持。他们渴望不做出任何疏远我们或有损于那种支持的任何事情。

11. 因而，对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目前最不为人知的问题——是美国的政策。这种靠拢美国的倾向是清楚的。为了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共产党人并不期望苏联将能在中国起重大作用。并且他们相信，为了中国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一致，这

种俄国人的参与比起美国来应是第二位的。

1944年8月3日和毛泽东会见

（短暂的一般寒暄之后，毛泽东说，他愿意谈谈国共关系问题。下面是他讲话的要旨。）

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从1922年到1927年第一阶段，两党有过合作，这使北伐胜利和国民党当权成为可能。但一旦国民党取得政权，它就设法垄断这个政权；它转而反对我们，并力图消灭我们。结果是第二阶段——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内战。第三阶段是恢复合作的阶段，这是日军入侵迫在眉睫所推动的。这个不稳定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三阶段的合作，不是国民党高兴或乐意参加的。国民党接受它，从来不是真心诚意或全心全意的。迫使国民党接受合作的因素有五个：

1. 日本的进攻
2. 外国舆论的压力
3. 共产党人的持久的力量——在西安发挥了作用
4. 中国人民的心愿——抗日
5. 国民党内部的弱点——这使它不能打败我们。

战争的结束（而且甚至在走向结束的过程中）将带来这些力量的重新组合。

日本的失败将会消除这些因素中最强有力和最积极的因素。

共产党人比以前更强大了。这方面可以说，他们争取团结和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加强大了。但是，只要国民党处在目前模式

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力量的加强会使国民党更加决心去消灭它。这只能作到某种程度：如果共产党军队太强大了，国民党就不敢进攻他们。但是，国民党领导人都是些如此紧抓权力不放的人，以致他们可能进行长期冒险。

中国人民仍然是沉默的和在政治上受压迫的。国民党使得他们这样。自由主义者、学生、知识分子、政论家、报界、小党派、地方集团和现代实业家（这些实业家曾感到幻灭，并且在国民党官僚主义的工业化中看不到自己的将来）为数众多。但是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不统一，并处于无权地位。蒋用刺刀和秘密警察对付他们。

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明确特性或纲领的乌合之众。在它内部的自由分子集团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没有凝聚点，没有进取的政纲。假如他们真有了这些，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也无法接近人民群众。国民党居于支配地位的领导人虽然分属于互相排挤的派系，但他们都反共、反民主。他们是在自私的、使他们自己的权力永续不衰的目的下结合在一起的。

单单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

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说来，它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有重大关系。

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虽然我们知道，照现在的状况说（假定国民党得不到外援），最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

利益。人民不会长期甘心受制于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而它现在显而易见地存在于重庆和西安，并且它在如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之类的书里，预示得更加咄咄逼人。如果人民战斗，共产党人必定和他们一起战斗。

所以，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相应地关切三个全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有没有可能退回到原来的孤立主义和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美国人会不会闭起眼睛不管外界的问题，并让中国去自作自受呢？我们共产党人觉得，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种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关于美国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我提的。所以我用最明确的措词加以澄清，说我没有正式受权，我的答复都只是纯粹个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意见。

（关于上述各点，我谈到了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和特殊的关切；我们没有因战争破坏而引起的国内重建的问题；相反，我们大大膨胀了的经济和我们更多地着眼国际，会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国外寻求贸易和进行投资；因此，看来我们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或不关心中国；我表示怀疑，不论我们国家由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会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有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世界上的前途？举例说，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要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

是否关心，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蒋介石是由一个政党、国民党的仅仅90个党员选举为主席的，这些人自己也不能有效地宣称代表该党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党员。甚至希特勒更有理由宣称是民主国家。他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并且他有一个国会。美国是否认识到目前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的事实？然而重要的问题是，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是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在中国实现民主，从而改进这种形势。

（我引证了美国关于中国统一和我们总的希望各国都取得民主发展的许多官方声明，并说明了在美国报纸最近的批评文章中，这种明显的倾向至少占舆论的重要部分。）

显而易见，国民党必须革除自身弊端并改组它的政府。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不可能希望它去打一次有效的战争。即使借助于美国使战争获胜，接踵而至的肯定是混乱。

政府必须扩大其基础，包容一切重要的人民集团。我们并不要求实行充分的代议制的直接民主，这会不现实。而且在国民党主持和控制下，这只会是一个空洞的骗局。但是能够 and 应该——立即——做到的是，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不能象过去一样，这些代表都由国民党选派。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好的合格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包括共产党、一切小党派、知识分子集团、新闻界、学生、专业集团、合作社中心社、劳工和其它群众组织。

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为了实际的政治原因，可以事先取得协议，委员长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

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

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政府必须直接对大会负责。大会的职能和权限可能和英国下院的职能和权限多少相似。

临时国民大会还将完全负责筹备充分的民主立宪。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那时它会交出其权力而不复存在。

美国政府是否愿意运用它的影响促使国民党实行这一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提出这项建议并积极支持它？

（毛主席提议说，这件事很重大，值得我去重庆一行向大使提出。我说，会充分报告大使。我还表示，我们从重庆其它人士已经听到过这个总的建议。）

（随后在8月26日，我在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获悉，共产党政治局正考虑向国民党提出这项建议。他们的建议将以下述一点为根据：国民党在目前的国共协商中，以共产党的民主要求“太抽象”为理由，拒绝讨论这种要求。）

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是否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它是否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吗？如果中国爆发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对共产党会持什么态度？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器来打内战，（美国）正在做些什么？

（这些问题，特别是所提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形成了我们深入一层谈话的框架。我回到本题，又提出了一些问题以进一步详加讨论。）

（关于对共产党“援助”问题，我指出问题还不明朗，而且，无论如何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共产党人自己还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

在1936—1937年我们共产党人接受国民党条件建立了统一战线，因为来自日本的外来危险威胁着这个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

人。为了抗击日本，10年没完没了的互相毁灭的内战必须停止。即使内战虽非我们启衅，我们却率先停止了它。还有，外国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它们不支持我们。但是统一战线不是完全单方面的：国民党也允诺实行政治改革——他们没实行。

我们支持蒋介石并不意味着支持专制政治；我们支持他打日本。

我们在以前不会提出这个承认的问题。在正式意义上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这会是第一阶段。这可能是唯一必须做的事；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

但是假如说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必须有美国政策的第二阶段。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冒险和美国发生冲突。

现在我们可以撇开不顾美国供应的武器可能被国民党用于将来打内战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想到历史会重演。民国初年，列强只承认北洋政府，很久以后才看清楚，唯一能够宣称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是广州政府。在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南京政府才得到承认。目前中国国内局势正处于变化之中。情况还不明朗。但是可能发展为某种相似的局势。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吗？

（我提醒说，撤销对一个没有直接采取不友好行动的政府的承认，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背着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显然是不可取的；最后，还有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这一整个敏感的问题。）

美国已经插手了它的军队和供应所到的每个国家。这种干预可能一直都不是有意的，并且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不过这一点一直是真的——仅仅是以美国影响的存在而干预。美国坚持把

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作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干涉”（毛对反对这个词加注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意义）以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它。

我们并不要求停止给国民党部队一切援助。这不会有损于战争。国民党会崩溃，美军在中国登陆将遭到更大困难。

（周恩来在以后的谈话中沿着有关的方向发挥了以下主题：

（1）只给国民党武器确实是意味着内战；（2）我们一定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日本可能试图通过“诱降”蒋介石结束战争。这将对其他盟国的一个骗局，并且实际上会是以日本的愿望为基础的妥协，日本希望保存一个脆弱的国民党，而不愿有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3）确保中国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和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给国共双方以武器。）

（我提出了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施加影响的问题，对向蒋发“指令”表示怀疑。毛泽东强烈反对我的看法。）

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美国的境地。看看河南发生的情况，湖南正在发生的情况，再看看广西正在出现的一切迹象！很可能下一个是云南了。再看看经济形势！蒋已经走投无路。

蒋介石是顽固的。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匪徒。为了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事实。我们已经从经验中懂得这一点。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不要对他的威胁和恫吓让步。不要让他以为你害怕；否则他会用他所长。美国在对付蒋方面作得非常糟。他们听任他无限度地敲诈勒索——例如，说什么无力继续抗战啦，需要讲和啦，这是他取得5亿美元贷款和现在派孔祥熙代表团赴美恳求棉花援助的策略。棉花！我们是在对日作战

还是不在对日作战？难道棉花比子弹更重要吗？我们边区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也使我们不能从中国有棉花的地区得到棉花。但是我们经过努力，很快就能够自给了。对国民党说来，这会容易一百倍，如果他们是一个有经济政策的政府，他们会自己生产它的。

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

美国目前的地位与珍珠港事件刚过时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有任何需要或有任何理由去扶植、照顾和安抚蒋了。美国可以告诉蒋，为了战争他应当做什么。美国人给蒋的援助可以以使他满足美国的愿望为条件。对美国人来说，另一种施加美国影响的办法是谈美国的理想。每位美国官员会见中国官员时，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可以多谈民主。象华莱士那次的访问，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应该安排更多的机会。孔在美国的逗留不应该浪费掉。

在华的每个士兵应当是民主的一个活广告。他应该同他所遇见的每个中国人谈民主。美国官员或军官应跟中国官员或军官谈论民主。最后，我们中国人就会考虑你们美国人的民主概念。

（我提醒，把我们的军队用作政治宣传力量是不容许的——并且我们没有与中共对部队进行思想灌输和指导这样工作的政治部相应的组织。）

但是，即令你们美国士兵不积极宣传，仅仅他们的到来并与中国人接触就有一种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欢迎他们留在中国。国民党并不如此。它想隔离他们，使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现在在前线有多少美军观察人员？我们乐意把你们的人带到任何地方去。国民党害怕大批美国人在华会产生影响。他们惧怕美军

登陆仅次于他们惧怕俄国人参战。

美国人的存在从消极方面说也有好处。如果美国人分布在广泛地方，他们对国民党会有有一种约束力，会使国民党更难挑起事端。昆明就是一个例子。昆明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争取自由的一个中心，因为国民党不敢在这样多的美国人众目睽睽之下，逮捕学生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相比之下，西安美国人很少，秘密警察就不受约束。

美国期刊上对国民党作的批评是很好的。其影响不会立即显现出来。有些时候，批评甚至可能暂时产生不好的反作用。但是，如果这是公平的话（国民党将会知道是否公平），它会引起国民党踌躇不决和思索——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援助。

最后，你们美国人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一次接触都是愉快的。当然，我们高兴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因为它会帮助打败日本。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说你们的到来的首要重大意义是（或者不是）其对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是没有好处的。

（我注意到，他强调美军在中国登陆的重要性，而我暗示讲，战争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胜利，而一次登陆是不必要的。）

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但是日军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更不用说满洲了。

假设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国民党作为政府——没有能力成其为政府的政府——将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和中国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们是内线；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

如果要实行和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双方的这种合作，重

要的是要允许我们两支军队在分开的地区作战。国民党太害怕和我们一起活动了。他们唯一关切的事是遏制我们。如果我们驻守在分开的地区，美军可以看到差别：我们拥有人民支援，能够战斗。

（我询问，如果国民党不克制或者被说服进行改革，是否就会象他说的那样，公开的内战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主观上讲，国民党现在的领导人决心要消灭共产党。他们怕我们，为了同一原因，他们也怕人民。客观上讲，有几种因素——谈话开始时提到了5种——限制着国民党。其中最强有力的因素——日军——将从画面中消失。另一个因素是外国舆论，它强大，因为它在国民党外并独立于国民党。但是，现在它是不可预测的。国民党仍然期望国外的影响会站在它一边。

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你了解我们和我们地区的情况愈多，这类借口的价值就会越小。

所以国民党可能采用间接的进攻方式。很难为它的进攻设立或划定一条线。

但是，如果国民党破坏我们在各边区已经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夺走人民新取得的民主权利，人民会起来抵抗并要求我们援助。

国民党行动的另一个方面将是借助伪军。伪军将会投靠国民党——声称他们始终是“爱国的”。国民党那时会使用伪军据守日军撤退的城市和地区。他们会煽动伪军进攻我军并制造摩擦。

（周恩来顺着这条思路进而表示，这是可能的，惯于搞欺骗的日军向蒋军投降的一部分，会将他们的武器移交给伪军或国民党军队，条件是要用来消灭共产党。）

（这乍一听好象可能有些牵强附会。唯一可能的注释是，卷

入这种局面的部队如此混乱复杂，而他们之间的仇恨又是这样强烈，以至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事实是清楚的，甚至对国民党也一样，即中国的政治倾向是有利于我们的。我们坚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真正伟大、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员。宣言今天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它不会很快就过时的。即使国民党真的陷于崩溃，我们仍愿意坚持它，因为它的总的政策是好的，适合于中国国情。我们做过的每桩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个条款，在这一文献中都可找到。

自然我们并不佯称我们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仍面临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难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而且我们正在打击它们。我们欢迎提意见和批评——不论来自美国人、国民党或者其它任何人。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修订我们的政策，使其更切实有效。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地区你能领会到这种差异——人民精神抖擞，兴致蓬勃，友好待人。他们有着人情的流露。他们已从致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问他为什么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不大考虑俄国。）

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的战后建设，都完全决定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

不仅如此，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中国已经够混乱了！不管怎样，即使国民党要求，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些影响是建设性的和民主性的。苏美在中国不会有可能的冲突点。俄国只要求有一个友好的、民主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党”这个名字可能不会使某些美国商人放心。毛泽东笑了，并说他们曾经想到改变名称。但是说，如果人民都知道他们，那就会不担惊受怕了。）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减租是从旧的80%—70%—60%减到法定的（国民党法律从未实施的）37.5%。即使这个数字我们也只是想逐渐实行，因为我们不想把地主赶走。我们的利息限制在年率10%。这不算过激的——虽然它比通常情况低得多。

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看我们在这里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作了些什么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致力于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谈到的“国防工业”。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

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

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在延安住了两个多月，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进行更多次交谈之后，谢伟思准备坐下来写出自己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分析。重要问题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以共产党地区那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为根据，他论证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离开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正在强调“中国的”特征；他们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然而他提出警告，说“这并不排除他们重新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攻下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这样干的话。”这是一个悲剧性地未被理睬的警告。

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和美国的倾向性

第34号，1944年9月28日

美亚文件：939—46页

1.附件是一份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现行政策的备忘录，因为这些政策影响并暗示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对苏联和美国的动向。

2.备忘录可概述如下：

概要：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一度有过的对苏联的倾向看来是一件过去的事了。共产党人努力使他们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他们正在实行民主政策，他们期望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和工业化，首要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外授来实现。他们相信，美国，而不是苏联，将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经济援助的国家；并且认识到，为了效率和吸引美国投资，对美国的这种参与给以很大自由是明智的。概要完。

3. 结论，即共产党领导人自己不断发表的谈话，就是对中国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的更重要。自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为，中国同苏联保持亲密、友好关系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关系不牵涉美苏利害冲突问题。

4.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美国的明显、强烈的倾向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一般的预料相反，这可能由于太过于强调党的共产主义名字了。除了认为美国将会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强国，并且美国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国以经济援助的国家这些可以被称为实际考虑的东西之外，这也是基于共产党人的强烈信念：中国再不能处于分裂状态。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这并不排除他们再转向苏联，如果他们为了在美国援助的国民党进攻下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影响其对苏美态度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甲、政治方面

1. 企图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更中国化

在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几年发表的重大理论讲话中，明显力求避免盲从地把俄国共产主义照搬于中国。强调要研究中国自己的现实。

共产党内最强大的理性运动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从所给予的重视看，三大歪风中最重要的是主观主义，据解释，它包括教条的搬用不适于中国现有情况的外国理论。宣布为正确的态度是“客观”——在对实际事实和真实情况进行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理论。这次运动的总的效果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剔除共产主义，至少是在关于中国眼前的未来方面。

共产党人这种言论的例子为数甚多。也许最重要的就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一次讲话，题目叫《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讲话现在收集在《毛选》中，是一切共产党干部必读的教科书。下面是部分摘引。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拎来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以上自《毛选》（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第756页）对照译出——译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告诫我们说：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不凭主观愿望。但是我们的许多同志都直接违背了这一指导原则。

许多同志仅仅是为学习马列主义而学习马列主义真理。虽然他们能大段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然而他们不会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的具体研究中去；他

们不会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产生的问题。

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只知道引用教条，取得学位但没有实际知识，他们实际上是对马列主义的嘲笑。（以上无引号的是谢伟思的原文——译者）

2. 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

在我1944年8月3日第5号报告中，我试图评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要旨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现在的纲领中，除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以外，其余一切都抛弃了。

那种解释根据于非常不全面的研究和共产党各方面领导人的片片断断的谈话。然而，这种解释从1944年8月3日博古（国民党一般叫他的原名，秦邦宪）的一次谈话中得到惊人的证实。博古的评论很有意思，这不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委员会前主席的地位，而且因为他是俄国留学生，在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分析”中被称为的“亲苏派”的领袖。我记录的博古谈话如下：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针。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思想方法。它向我们提供结论和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阶级社会——换言之，个人福利和全民利益。

“但是，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全部移植于中国，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也违背我们的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现在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它的经济仍然是半封建的经济。我们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因为我们至少

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

“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政治阶段和自由企业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

“我们共产党人希望做的就是使中国继续顺利和坚定不移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通过有秩序的、逐步的和渐进的发展，我们将避免迫使马克思作出阶级斗争必要性（在他的社会里）的结论的条件。我们愿意用和平、有计划的革命来防止暴力革命的需要。

“预言这个过程会有多长时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

3. 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民主政体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从理论转向到实际，它只是要求实行民主。从形式和精神看，这都更象美国而不象俄国。

共产党人现在倾向于否认，即使在他们统治江西的早期，他们执行的是共产主义。我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那个时期他们的政府是仿照苏维埃组成的。

1935年8月起，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改变了他们的基本政策。自从那时起——已经9年多了——他们采纳了三民主义（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放弃了苏维埃式的政府，并一直在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基础上寻求一切集团合作。

〔于是谢伟思回到了中共的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在早先发出的电报中已经谈到了。〕

4. 看不到模仿苏联，看不到与苏联有牢固联系的迹象

不仅在理论和政策上，也不论在延安的气氛和日常景象上，

都没有多少苏联影响的直接的证据。除了党内讲话外，很少提到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创始人。在党的机关内是挂有马克思的像，有时还有恩格斯和列宁的像，但为数很少。斯大林的肖像是常见的，但通常和毛泽东、朱德、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像并列在一起。

共产党报纸相当突出苏联的战争消息，但不多于它发表的美国获胜的新闻，更少于它发表的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消息。

在共产党的体制上苏联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可以说国民党也是一样。

苏联的铁锤和镰刀的象征几乎从未见过。实际上，初来乍到的观察者看不到什么可使他联想起俄国的东西，或者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特别依附于苏联，或者如象国民党极端派所认为的，不管怎样他们是苏联共产党人的前哨。

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人正试图模仿美国模式（除了惊人之多的交谊舞会，和对桥牌和扑克的一般兴趣之外）。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仿效任何人。他们强调是中国的。并且在这方面他们力求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搞诸如国民党坚持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不搞在每次周会之前向孙中山（或在任何其他入）遗像默哀，不搞背诵孙中山遗嘱的仪式，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指蒋介石——译注）时无需立正。受苏联鼓动的中文罗马化已经终止。为了普及和发展华北当地的民间戏剧和舞蹈，西方话剧已不再上演，为少数党的干部的演出除外。音乐已民族化。共产党人在每个领域都竭尽最大努力实现民族化，以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东西去影响他们。

乙、经济方面

以下主要是博古的意见，补充了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

1. 共产党人同意中国必须工业化

共产党人，恰如国民党（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坚信中国必须工业化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动机和重点。人们从《中国之命运》一书和重庆目前的许多想法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工业化的首要目标是国防——换言之，是国家的政权。共产党把它放在第二位。他们首先考虑的（至少在他们言谈中）是福利。除非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了，经济或政治进步都不可能有现实的基础。因此，共产党人主张，首先应该大大发展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交通通讯系统。再渐进地、慢慢地建立起一个重工业（或者如《中国之命运》所说的国防）基础。

依据中国将始终主要是农业国的看法，所以共产党人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忽视中国农业资源和问题，中国不具有成为第一流重工业国家的物质资源。

2. 中国目前只有在资本主义经营基础上才能工业化

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仍旧是半封建主义。首要的重大步骤就是要摆脱它。所以不可能立即跨进社会主义，因为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中国人民也还没有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经过一个长时间它也不会到来。现在谈论社会主义不实际。中国前进的下一步必须是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下，必须提供最大的可能的机会在经济上发展这个国家。中国现在的衰弱就是资本主义不发达。

3. 实现这种工业化需要有外援

中国不仅缺少足够的民族资本为大规模工业化提供资金，她也没有足够的工业作为工业化的起点，并且她缺少经验和技术人员。战争结束后将会看到这些情况更加突出。中国会遭受战争造成的毁灭性通货膨胀和混乱与破坏的折磨。很可能，日军在撤退

或被击败之前，会把残留的中国工业全部摧毁掉。

这些情况使中国不可能仿效苏联建设自己的国家。俄国革命成功时虽然落后，她的现代工业基础却比中国大得很多。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低，但是还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低到最低限度。所以，苏联人有可能甚至进一步压低生活水平为工业化筹集资金。但是，即使俄国实现了她的目标，也只是靠着可怕的牺牲。她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把自己的资源用于这项工作的。中国即令她能够完成这样一项非常困难的功绩，也不会用这种强制办法进行的。这样作是愚蠢的。

4. 苏联没有力量给予中国所急需的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战后，俄国的很大一部分需要重建。她自己的建设和继续进行因战争而中断的国内发展将会持续一个很长时期。公布的报告表明，顿巴斯盆地煤矿的重开要花两三年时间。美国商会主席约翰逊关于他在莫斯科会谈的报告透露，战后俄国自己将寻求美国大规模援助，以进口物资和机器。这些进口必须用贷款来筹措资金。

因此很明显，苏联既没有剩余资金，也没有技术人员可以帮助我们搞中国工业化。

5. 美国是唯一能帮助中国的国家

即使俄国有能力（她不会有能力）帮助中国，美国也会是承担最大份额的、理所当然的国家。美国资源是巨大的。资源在战时有大量输出。美国将会有不再需要的工业工厂，可以整个输出。她将拥有投资资金和必需的技术人员。另外，她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美国面向太平洋。西伯利亚仍处于不发达状态。

美国和中国的联系牢固。美国享有中国的一切善意。为了中国的内部统一，美国最好能在这项经济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

其它欧洲国家都从事于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它们没有资金来投资。对英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的，她在中国的大规模参与无论如何不会象美国那样受欢迎。

6. 在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中，应给外国投资以很大自由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最快地发展中国资源、交通和工业，我们必须使投资对外国资本具有吸引力。从道理上说，我们不能期望全由中国受惠。

我们所以对地主和商人采取温和政策，并有限度地减租减息，其道理是为了在统一战线中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这样就可以从经济上加强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实行大幅度减租，没收土地和限制私人企业，我们就会赶走这些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集团，自找绝路，并且削弱我们的根据地。

所以我们必须允许外资得到很广泛的自由。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地区政府的企业还不能有效运转。我们部队的工厂也不如私人经办的工厂那样效率高。

我们相信，重庆创办的官僚资本工业（举例说，全国资源委员会办的企业和孔祥熙的独占公司）证明也是一样。它们可能使孔和其它少数人发财。但是它们都是腐朽的，徇私舞弊和低效无能。它们不是获致这种经济发展的最好手段。

政策建议

毛泽东想使美国改变其只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而代之以另外某种政策的这一明确企图，是在共产党实力和信心日益加强的越积越多的证据之外，又增加了证据。这激发谢伟思提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虽然外事处的一名下级军官是不能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的，但是，谢伟思是一位政治报道员和史迪威的顾问，他的这一特殊地位使他已经提出过一次长篇政策建议（见他1944年6月20日的备忘录*），并且特别受到国务院的青睐。现在他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运动的第一手知识，他要作出比6月20日建议更好的论述，并且敦促美国“承担多少积极一些的作用，来影响中国内部事务的发展。”

六月间，谢伟思曾初步谈到扩大我们的文化关系计划，同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保持友好关系，表明我们对民主的兴趣和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怀”；现在谢伟思直截了当地主张，美国的军事援助不要只给国民党，也要给中国共产党。尤有进者，从延安发出的报告已经很清楚，谢伟思已不是很关注对日作战了，那时看来战争肯定是象由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越岛战役那样地取胜。目前，他关切的是中国内战近乎必然和这样一种危险，即在内战中美国只支持国民党可能使我们陷于一个无望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他力促，我们

* 见本书138—158页，

同国民党的关系应以明智地了解它们会对将来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产生的影响来决定。

美国需要有一项对应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产生的问题的政策

第20号，1944年9月3日

对外关系：1944年，615—18页

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一个重大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显著增长和扩大，这部分地也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结果。目前它控制着华北的大部和华中的一部，并且是那些土地上坚持抗日战争的唯一积极的力量，它声称有效管理着8600万人民，约占中国人口的1/5。这种说法可能是有一些根据的。

这种发展是与国民党虽然失掉活力和在它控制的地区情况日益恶化的同时出现的。这些情况对中央政府贯彻进行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了内部紧张——主要由于国民党惧怕失掉它独占的政权——这造成了实际上等于内战的局势。这对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意志和能力产生了更加消极的影响，并且必将成为美国（更不用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了）所希望的中国统一、民主进步和经济复兴的障碍。

没有外界因素的制止，现在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紧张将导致灾难性的内战，可能在日本被打败——主要由于我们的努力——之后很快爆发。

虽然这样一场内战甚至会大大有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还会受到很有道理的谴责，说由于我们现在武

装国民党军队，所以促成了内战。

这些多种多样的情况可能使美国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积极参与过问中国内部的事务，尽管美国本心不想这样作。我们在中国的影响将来绝不会比现在更大；而世界这部分地区的事变进程又不允许拖延。随着日本战败的临近，危机还会增大。因此对美国说，必须在最近将来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而产生的问题确定一项明确的政策。

无需强调这些问题的细微末节。它们具有极大的和迫在眼前的军事重要性，但是它们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具有高度政治意义。

举例说，我们可以根据共产党军队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他们在击败日军方面显然拥有的潜力，恰当地决定那些军队值得我们积极支援——可能用军需供应形式。

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不顾国民党的反对而直接给予支持。沉着而坚定地施加我们的外交影响，或是国民党自身地位日益严重的明显恶化，可能迫使国民党与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政府分享权力。这大概必须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内。那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统一阵线，目前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将会结束，政府自己就应该把美国援助的一部分给予构成国家军队一部分的共军。然而，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对国民党的态度作这样的改变并不乐观。情况可能是，即令一个名义上的全国政府建立了，国民党还会继续阻止给共军以任何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该坚持给以这种军援？

给共军以任何美国军援，无论是直接地或是用上面提到的某种间接方式，都定会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共军既是一支军事力量，又是一支政治力量。这种二重特性是不能分开的。而且这种政治特性是取消不了的——即使把共军编入国军的话。我们

的支持一般会被解释为表明美国的赞许。而且提高共军的军事效率会使他们要求在打赢这场战争中享有更大份额。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提高共产党的声望，并且最终加强它在中国的影响。

对共产党的这种帮助可能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如此深远的变化，以至足以使国民党会不得不革新它的政策，甚至更重要的是改革他们执行政策的方式，改变它目前的反动领导，从而走向与共产党人合作，这就会导致团结、民主和国家力量的统一。这些正是我们希望会产生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即目前国民党领导——显然缺乏政治家风度而且权欲薰心，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不愿解除其对共党的遏制。如果国民党这样拒绝革新自身，将无异于走向自杀。的确，这将是一个疑问，究竟在这种状况下，它是否能经受住目前战争的危机而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它经受住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我们通过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共产党人才得以防止内战，否则，内战一定会发生。

如果承认存在国民党崩溃——主要由于它自己的不妥协态度——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考虑中国什么力量会起而代之。现在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肯定是共产党，而且在不要很长时间之后，它就会统一全中国。

即使共产党没有机会上升到控制地位，我们必须预期，由于它显示的活力和它赢得的人民支持，它将是具有影响的党，并且是在必将代之而产生的民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使自己只在两种可能性中抉择：（甲）共产党控制全国或（乙）共产党作重要的参与。因为现在问题很清楚，现在的国民党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不可能消灭共产党，而且因为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不会自愿地或有意地给以这种援助。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共产党视为在中国持续存在

的和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

无论实现了哪种可能——控制或有影响的参加，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对美国都有重大长远的利害关系。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制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恰当的政策——不管是我们运用我们的外交影响去讨好它也好，或者我们仍然保持中立也好，或者我们不理共产党，而继续只支持国民党也好——至少应该根据对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来确定：（1）共产党的实际成就；（2）它现在的政策和将来可能采取的政策；（3）它的领导集团的素质和才干。

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和这些成就赖以取得的政治基础——共产党人赢得的人民群众支持，这一事实在已为众所周知。我在第6号（8月3日）、第10号（8月15日）、第17号（8月30日）、第18号（8月31日）*和第19号（8月31日）报告中已经论述了这些问题。包瑞德上校也提出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军队参战情况，它的主要根据地的发展和他们部队和武器的质量情况的报告。此外，还将就共产党在一些具体方面的成就提出一系列报告：共军控制地区民主的多少；他们取得群众支持的方法；他们在军队中的政治运用；他们政府的组织和工作方法；他们的教育规划；他们的法律制度；他们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等等。由于时间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逻辑顺序会有所颠倒，在完成基本的专门的研究之前，交出综合报告。

对所提另外两点的研究，试图在下述报告中进行：（1）分析当前共产党的政策和将来可能的发展；和（2）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为人、特征和突出才干的总的集体印象。

* 第15号（彭德怀访问记）报告以外的其余报告都印出。

谢伟思提出一项甚至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完全是关于援助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问题。虽然谢伟思为采取这一行动列举了一大串军事理由，可是，在这里他再次表明，列举这些军事理由首先还是出于政治考虑。这一政策建议的关键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那时表明走向内战方向，而防止给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或国际关系造成那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内战成为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吸引力的选择：“……我们给予共产党军队以援助差不多一定会使国民党发动一场内战成为不可能。”

美国给中国共产党 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

第16号，1944年8月29日

对外关系：1944年，618—22页

美国陆军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部队合作。迄今这种合作在我方来说是被动的——收听共产党的情报和营救美国空勤人员。这种不彻底的合作取得明显成功，合乎逻辑地应导致考虑更积极的措施。

这种积极的合作，将以我们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他们非常缺乏的基本军事供应开始。还应训练共产党军队有效使用这些供应来支持合作。随着在中国的战争发展进入末期，应计划使合作走向共军与(美国——译者)空军和其他地面部队之间实际的战术合作。

公认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物质支援的实际困难是巨大的。这些困难能够得到克服。但是作出开始合作的决定将涉及军事和政治

两方面的政策问题。肯定无疑，一开始就会碰到来自国民党的强烈而顽固的反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从援助共军中能够合理地预期得到的好处，是否值得我们去克服、或者不顾国民党的这种反对。

我以为这一决定要取决于下列考虑：

第一，政治方面的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情况已有足够的了解并对和国民党的合作有了充分的经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国民党——象它今天的情况一样——是虚弱的、无能的和不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是盲目的，而又彻头彻尾的自私，他们主要关切的是保存他们摇摇欲坠的政权。国民党缺乏人民的支持，而又害怕进行为了得到这种支持所必须实行的改革，它深知它的处境悲惨，士气不振的征来的军队经不起对日作战。但是，以它目前的狭隘眼光来看，它的政权有赖于保存那些军队和它希望我们将会给予他们的装备。国民党没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听任国家迅速走向经济崩溃。它担心在中国境内由它自己或者我们进行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会加速这一过程。

因此，国民党害怕、并设法避免大规模卷入战争而进一步消耗其力量。它想在中国境外为它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对苏联参战的担心，仅次于它对美国军事行动大规模延伸到中国大陆上的担心。

就中国共产党军队而论，情况就恰好相反。战争使他们发展壮大并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他们获得真正的人民支持，并且把华北很大一部分人民动员起来，使他们深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参加这场战争，人民的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给共产党人以机会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的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他们在赢得战争胜利中起到主要的作用，不仅会极大地

加强他们的国内地位，而且也会极大地加强他们的国际地位。为了这些理由，如果不是为了其他更理想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理由的话，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要战斗的。

根据这种背景，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甲）把我们的支持和供应限定在只给国民党，不可能为我们赢得一个能起作用的、全心全意的同盟者。

（乙）否则，就只能鼓励国民党现行的反民主倾向。这一方面可能会帮助国民党拖延其风雨飘摇的政权，同时，值得怀疑的是，只要国民党拒绝进行改革，究竟它是否能把不可避免的内部危机延迟很长时间。它甚至可能怂恿满脑袋法西斯思想的头头们去着手打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只能给中国，给世界这个地区的战后和平和我们在这里的和平利益带来灾难。

（丙）不偏袒地既支持国民党军队，也支持共产党军队，至少会使一支部队，即真心实意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具有战斗力。

（丁）这样的不偏不倚的援助实际上在中国将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国民党将被迫不仅要争取我们的支持，而且要争取中国老百姓的支持。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促使国民党走向改革。

（戊）最后，我们给予共产党军队的援助，几乎肯定会使得国民党发动一场内战成为不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不会看上去象是促进一场共产党挑起的内战；他们的政策是反对内战的，他们向我们要求的武器（与国民党向我们要的完全不同）都是轻型、简易的武器，而不是重型、进攻性武器，并且，如果我们推动国民党进步的政策实现了，内战也就没有必要了。

总结起来：如果国民党真如同它声称的那样——民主而真挚地渴望尽快打败日军——它就不应反对我们坚持的至少给共军以成比例的援助。无需多说，国民党的反对程度，将是测量支持

共产党军队是否可取的一个准绳。

第二，军事方面的

虽说我们还没有在实战区结束战地观察，目前我们了解的共产党军队情况已足以保证作出一些结论了。这些结论已为我们从共军得到的这样合作的结果所证实。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

(甲)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线沿线及紧靠交通线的地区都扼守着战略阵地据点。他们的阵地地图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的说法为他们所提供的情报和他们对美国空勤人员的救援所证明。从这些据点出发他们可以进入主要城市并切断铁路线。当对中国海的控制变得更加完整的时候，这些交通线将会变得更为重要。举例说，如果我们在华南任何地点登陆，或者甚至进攻汉口，他们对向日军进击都会是极其重要的力量。

(乙)共产党部队都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

(丙)他们在有关地区内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大规模和持久地进行这种战斗所必需的。这种群众支持使他们得到一支有用的巨大后备人力，因为这些人自愿的，而且已经受过部分训练。

(丁)他们的物质必需品都是简单轻便的，凭着这些可以长途行军。他们完全认识到，他们不能〔使用〕，并且由于他们的地形和作战环境也不允许他们使用重型和复杂的现代化装备。

(戊) 向共产党军队提供适量的供应不仅会提高他们的作战效能(举例说, 可以使他们能够攻克孤立的碉堡, 或者固守一座桥梁直到完成应有的破坏), 而且还会使他们能够象过去他们所做的那样, 夺取大量日军装备来补充他们的供应。他们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的位置和他们采用的战术, 促进了这种自给。

(己) 给共产党部队的供应的数量, 即使不多, 在阻断交通、破坏工业和供应以及击毙日军方面, 比为了同样目的而给予空军的同等数量的供应, 将会有效得多。空军轰炸不仅耗资大和常常效率低; 由于华北的轰炸目标远离我们有效的基地, 汽油、供应保养和其他装备也耗资巨大。举例说, 在破坏一条日军铁路线并使其陷于瘫痪时, 沿着一长段铁路线展开无数配合一致的游击进攻, 其效果要好得多。如果共产党军队能得到充分供应以进行有效作战, 那末, 日军就必须不仅在铁路线自身, 而且还要在它占领的所有地区加强防守。在这种战斗中, 日军遭受的损失和装备上的花费, 要比孤立轰炸遭到的损失和花费大得多。

(庚) 利用共产党部队去打这种游击战和破坏日军大后方的交通线, 就会使空军能够集中力量去从事其他重要任务。譬如说, 在实行登陆之前,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 可给共军以充足的供应, 并训练他们使用这些东西。在将要进行登陆和已经实行登陆之后, 空军可以专门致力于直接支援, 因为已经装备起来并作好准备的共产党军队, 能够减轻空军进攻和破坏从满州到长江的交通线的任务。

结 论

考虑到这一切政治、军事因素, 我建议, 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第三部

与赫尔利的辩论

注意，注意，世人啊！
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是
一件危险的事哩。

——莎士比亚《奥瑟罗》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谢伟思奉命返回华盛顿，就他在延安的逗留作出汇报，并参加任何可能进行的我国对华政策的讨论。谢伟思路经重庆时，与高思大使作了简短会晤。高思由于蒋介石断然拒绝和共产党人取得任何妥协而气馁，由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目空一切的自我行事而苦恼，他要求谢伟思告诉国务院，他想辞职。于是这两位在中国的高级美国代表、委员长不妥协态度的受害者，走上离去的道路。

很清楚，这是美国对中国和国民党政策的较大的分水岭。对此意识得更清楚的莫过于谢伟思和他在外事处的同僚诸如戴维斯了：“史迪威被召回之后，我真正感觉到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戴维斯和我都认为，把我们自己同国民党绑在一起和屈服于蒋是犯了严重错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定会更加成为另一政策立场的鼓吹者。史迪威事件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惹来祸殃也值得。”

在这些年轻的外事官员引火烧身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刽子手正是赫尔利。谢伟思1944年10月在重庆中途停留时，和赫尔利作过简短的谈话，试图以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事去教育这位将军，但未能成功。他也深知赫尔利对史迪威危机的处理，向罗斯福总统的心腹霍甫金斯进言说，任命赫尔利继高思出任大使，会是一场“灾难”。不幸未受到理睬。1944年11月17日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因此，当1945年1月中谢伟思返回中国时，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知道将会卷入一场和赫尔利的争论中。

我们已经看到构成这次“争论”的一部分文献。赫尔利说，“蒋介石坚持他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队。……”赫尔利信任蒋，但正如谢伟思在他的题为《蒋介石对桂系的处理》的

备忘录中指出的，委员长的政策“实际上增加了不统一”。赫尔利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武装部队的实力被夸大了。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域被夸大了。”然而，谢伟思“根据美国人的直接观察对共产党人声称控制的领土所作的核实”足以证明，我们必须同意，“共产党声称控制着日军战线后方的华北、华东农村地区，基本上是正确的。”于是产生了1945年的危急问题：国共谈判和谈论很多的中苏关系问题。

国共和解的可能性

谢伟思完全记得1944年10月23日和赫尔利的第一次会晤。史迪威刚被召回，未能完成使史迪威和委员长和好之使命的赫尔利将军，现在正试图弥合国共之间甚至更大的裂痕。应赫尔利要求，谢伟思向他汇报了共产党人新的、更强硬的谈判条件，这是后者从延安发出的报告中不断谈到的。“这次谈话象赫尔利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有名的谈话一样：赫尔利谈了57分钟，谢伟思只谈了3分钟。他（赫尔利）继续说，‘不用发愁，我会把双方撮合到一起。他们（共产党人）将会得到美国的武器。那正是我在这里所致力的。……我对这种事情是有经验的。我知道事情会变得棘手，但是我过去做过这种事情’。赫尔利从来没有读过我的关于中共新条件的任何报告，而当我设法告诉他共产党人正在变得很强硬和坚决，并且对他们认为是本质的东西不会作出让步的时候，我实际上已没有可能把话说完。”

赫尔利无视和不能听取专业人员的忠告招致悲剧性的后果。11月他飞往延安，同意毛泽东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条件，甚至他自己加上了几个条款从而强化了这些条件。然后他返回重庆，大谈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而且最后全心全意支

* 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1944年11—12月间中国之行说：“我见到了帕特·赫尔利少将并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他讲了2小时47分钟，而我讲了13分钟，那大概是正确的。”（见1945年对外关系：8页）

持蒋在谈判中的立场。赫尔利报告说，他自己“深信蒋介石个人切盼和所谓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他后来坚持美国只支持国民党，这意味着已没有诱力使蒋妥协，结果是赫尔利的一切努力对弥合两党之间的裂痕毫无助益。如果说又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了。

在整个这一时期里，赫尔利一直安然自若地无视使两党陷于分裂的问题。在他看来，国共两党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真正分歧。在1945年2月，协商彻底陷入困境时，他却在汇报说，“两个基本事实正在出现：（1）共产党人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人，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和（2）国民党的一党、一人的个人政府实际上并不是法西斯，它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和他自己一样的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相比：“在野党想成为在朝党，而……俄克拉荷马共和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仅有的差异是，俄克拉荷马共和党人没有武装起来。”***他似乎全然不理解，如果共产党人必须使他们的军队从属于中央政府的话，那么他们的要求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赫尔利就宋子文对赫尔利和毛泽东1944年11月10日在延安签定的协议草案的反应作了如下说明：

宋子文立即说，“共产党人向你提出了一批货物的清单。国民党政府决不会答应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東西。”然后他指出他在建议案中发现的一切缺陷，其中只有一点似乎稍有价值，那就是共产党人的真正意思是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虽然他们实际要求的是把中国政府

* 见1944年对外关系：699页。

** 对外关系：1945年211页。

*** 参院军事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第82届国会第1期会议，远东军事形势，（华盛顿国家出版局，1951）2920—21页

改变名字（为联合国民政府）。我看这是琐细的事，而且很容易加以修正。

2月中，协商明显地陷入绝境，虽然赫尔利致国务院的报告千方百计寻求“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周恩来十分正确地意识到赫尔利不会准确向华盛顿报告真情，想通过谢伟思转达他对协商状况的关切。

国共谈判的失败

1945年2月14日

美亚文件：1337-38

据周恩来说，国共谈判又陷于僵局。2月13日，在赫尔利大使、王世杰和周恩来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委员长说，除了成立“政治咨询委员会”外，他不会同意其他任何事物。这个委员会由各党成员组成，但在政府中没有权力和地位。

这一空洞而又令人沮丧的提议不为一切反对团体所接受。它容许进行的就是更多的空谈，国民党却不承担义务，它的权力也不受限制。这同共产党的建议大相径庭，共产党建议召开党派间会议，会议有权改组政府和为制宪政府作准备。它甚至比由国民党代表提出作为讨论基础的被荒唐地误称为“战时内阁”的、党派间机构的型式还后退了一步。

由于这次决裂，周打算尽早返回延安，他似乎曾考虑，以共产党人同意参加国民党提议的委员会的办法来表明他们的善意，尽管这个委员会毫无作用。他不愿就筹建共产党各根据地政府、联合委员会的计划表明态度。他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人宁愿再

等待一个时期。

离开重庆之前，他将发表声明，说明共产党的立场。共产党人、民主党派联盟和国民党的民主派（以孙科为首）发表联合声明也在考虑中。这三个团体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和团结，虽然民盟和民主派被排解在实际协商之外。

周相信，蒋并不期望俄国参加远东战争（地方也有谣传说宋子文想到俄国去设法解决悬而未决的和潜在的问题），蒋确信会继续得到美国援助，就象大使在声明和行动中表明的那样；他深受4月五大国会议公告的鼓舞；因此他将继续持拖延态度。假如蒋的国际地位仍旧坚固，那时国民党将通过它5月间的党代表大会，向全国提出根据它自己的条件实行“民主”。

周恩来根本并不意气沮丧。他相信，协商再次破裂澄清了一个主要问题：表明蒋决不会对限制他的权力或根本改变现状作出让步。周认为，破裂的责任明明白白在国民党的肩上，即使在大使看来也是如此。而周的乐观主义反映了共产党对未来的信心。

周拒断签署一个联合声明（他相信这一声明是由大使草拟而由宋子文加以修订的），这一联合声明试图就协商定下乐观的调子。他说，这纯粹有利于国民党，而不能披露事实真相。

一个很有趣的注脚是，2月12日，董显光吁请一位可靠的、很有名声的美国记者，要他在一篇电讯中把这篇说协商正顺利进展而且可能取得成功的声明包含进去。

有势力的国民党政府成员，通常不公开提及他们和共产党人打内战的计划。然而，他们的某些美国支持者却乐意十分随便地讲“消灭共军”。其中之一是陈纳德将军的部下约

瑟夫·艾尔索普上尉，他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声言，一直是既响亮又令人遗憾地很有影响。

艾尔索普上尉的看法

1945年2月28日

美亚文件：1372—73页

艾尔索普上尉常常反映宋子文与其它他很接近的中国要人的情绪。1945年2月24日，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达的下述意见，因而可能颇为饶有兴趣。

过去一直既对史迪威将军又对高思大使很是吹毛求疵的艾尔索普，对近来美国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有所改进而很高兴。他确信，中国将百分之百地合作，“只要他们受到体面的对待。”

我提醒，局势有几个方面——明显感到中央政府的实力被进到华南的共产党部队攻势行动所抵销——对于“坚持进行抗日战争”并不是很好的预兆。

艾尔索普激动地答复道，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这样集中兵力是“幼稚的”，事情比这要深刻些。他解释说，将采用其他办法摧毁日本；美国必须正视的真正问题是俄国的兴起和亚洲均势可能遭到破坏。

我说，然而贯彻执行抗日战争是在华美军指挥官主要关切的事。

他强烈反驳了这一论点，他说，“任何把眼前的目标和个人成名的愿望放在基本长远的美国国家利益之前的美国指挥官，都应该予以撤换。”

他发挥了他的如下论点：

如果我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是苏联的附庸，以为他们真正愿意接受除了完全控制中国之外的任何妥协或联合，或者以为能够使他们转而与我们的利益合作，我们就太天真了。所以，力图在中国求得一项和解，或者力图利用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都是危险和“愚蠢”的。

因此，我们唯一的正确政策就是支持中央政府，给它一切可能有的援助（比现在规模远为大些），协助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帮助它（必要时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统一全国，消灭共产党和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

为了支持中国，我们必须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俄国依赖我们的军事援助，他们希望战后得到经济援助，这使我们能够“把他们收买过来”。同时，我们在欧洲对俄国作出的政治让步和我们接受俄国禁阻我们参与例如在芬兰和巴尔干的战争的意见，都使我们有根据“告诉俄国人他们必须不要插手中国”。

我提出，鉴于他自己确信俄国人在亚洲有所谋划和中国共产党人同俄国人有密切关系，因此，设想俄国人会接受这种禁阻或会被“收买”是不现实的，艾尔索普拒绝接受这种看法。他说，只有我们美国人不知道，国与国间一切关系都是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而且在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中，我们必须始终依靠强权政治。

我提出，中央政府的枪炮可能对付不了在大部分敌占区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控制而产生的群众的反对。他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他认为，我们还不曾运用于中国的“真正能干的美国政治家风度”，会能够使中央政府相信进步自由主义的优越性。

他以为，一旦美国公众了解“真实情景”——即共产主义和俄国统治的危险后，美国公众对于我们卷入中国内战的反应就不

会严重。他承认，“当然，象《新共和》杂志之类将会狂乱起来”。

1944年11月和12月蒋在取得对史迪威的胜利后不久，对他的内阁作了一些重要调整。最值得注意的是何应钦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但保留参谋总长职务），而孔祥熙被撤销了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职务。这样，蒋显然就使自己摆脱了重庆政府中两个最不得人心的人。赫尔利颇受感动。但是谢伟思以更实际的眼光，注视着在内阁级以下对各地方战区作出的种种任命。在那里，他洞察到不容置疑的坚持僵硬的反共模式，而且明显的不是为与中共和解，而是为内战作准备。

委员长最近的任命与公开宣布的 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意图相矛盾

1945年3月22日

美亚文件：1439—41页

概要：最近任命了若干与反民主或秘密警察团体有联系的反动军人，似乎表明在为内战作准备，而且对委员长宣称的民主、和平意图产生疑问。概要完。

委员长和他的支持者不断地辩解说，他真诚希望尽一切可能

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和避免内战；并且说，“应当相信他的良好意图。”

在政治方面，这些意图还没有付诸实行。它们仍然是已经作出过多次的诺言。

从实际行动来说，在最近的一些任命中可以看到委员长意图的一个征兆。这些任命在特征上太类似了，而且为数太多了，以致不能被认为是巧合。从任何观点看，它们都是不祥之兆。

* * *

何应钦被置于指挥中国军队野战军的位置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缅甸和萨尔温江（上游在中国境内叫怒江——译者）地区的各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在美国帮助下在云南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这些部队可能构成蒋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军事武器，而且是他“统一”中国的巨大希望。而中国最大的保守派和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的死敌何应钦，被安置在直接统帅地位，说明了蒋对他信任的程度，也是他们反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集团的一个保证。使美国公众相信：把何应钦免去国防部长职务说成是对美国人和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满作出的让步，这是中国人迄今作过的最漂亮的一次宣传。实际上，何应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位重权大了。

刘峙一直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作为一个战将他名气不高，他的不称职是人所共知的。而他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期间听任下级营私舞弊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是何应钦集团在中央政府中的一个强人，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他的第5战区，由于共产党军事力量向河南和湖北日军新占领的地区发展而变得重要了。

胡宗南已经被任命为新扩大的、很重要的第1战区代理司令

长官。这位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的敌人和长期对共产党实行封锁的人因而得到加强。现在他掌管着从甘肃到冀南的对付共产党人的北方战线。

李品仙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这一战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几乎全被共产党新四军占领的地区。过去几年中，李一直为控制这个地区和共军作战。他可能要继续这样干下去。

顾祝同被任命主持委员长东南地区行辕的工作，统率这一地区的全部中央政府军队。他还保持原担任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他也是一个坚决反共分子（在1941年1月声名狼藉的皖南事变中他是进攻共军部队的指挥官），可能期待他竭力扼制共军在京沪周围的发展，和抵抗可能把那些城市置于共军之手的人民起义。

汤恩伯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黔桂湘边区部队司令。汤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最不妥协的敌人之一。他的部队靠近日军新近占领的、共军正在渗透进去的湘赣地区。国民党认为这个地区特别危险，因为这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汤的政策在他就职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声明中透露出来：人民手中的一切武器都应该收缴起来。

.....

陈策被任命为广州市市长——在该市收复之后。海军上将陈策是戴笠系统的重要成员，香港沦陷前担任戴在香港的代表。他并无民政管理经验，看来也没有特殊才能来对付恢复市政和公用事业这类问题，或者处理救济与恢复这类不可避免的重大事务。陈策被任命的真相是：广州附近存在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中央政府和日本人却一直无法根除它，而共产党人希望从这个根据地出发，取得对广州的控制。陈宣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尽可能靠近广州的地方组建一支游击队——显然是配合美军登陆。陈所

以被任命为广州市长看来是因为他是盖世太保的人。

据悉，汕头市长也已内定，名字不详。

据了解，贺国光已被任命为尚属未来的台湾省的主席。贺将军原任中国宪兵司令，是国民党警察政府的重要人物，而政府的活动都是反民主的和不受法律约束的。因为中国的宪兵自觉地宗师于声名狼藉的日本国家安全组织，看来台湾人民不大可能享有自由自在的民主权利。贺将军不是台湾籍的中国人，甚至不是来自大多数台湾人的“故乡”——福建。

* * *

最近的这些重要人事变动显然倾向于说明下述安排：（1）有着明确无误的反民主反共历史的实力人物和中央政府的心腹人物被安置到一切重要的军事领导岗位，尤其是面对着被占领地区的岗位上；（2）与反动的、反民主的国内警察机构有联系的人被任命负责收复后的大城市和新地区的工作。

与这一趋向对照，还必须提出下述事实：（1）被占领地区实际上是现在被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和将来要与共产党争夺地区的同义词；（2）中国被占领地区的所有重要城市，都受到邻近的共产党活动地区的威胁。

* * *

棋子已布置就绪——显然远不是为了蒋所说的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俄国的作用

这个时代历史上的严酷讽刺之一是这样的事实，那些被诬称听任“苏联侵略”使中国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实际上却是最渴望抵制俄国在中国的影响的人。然而，领头进行诬蔑的人之一的赫尔利将军，却信任俄国人的意图。赫尔利第一次到重庆是取道莫斯科，而离开时他甚至深信苏联人愿意支持美国在中国执行的政策。1945年春回到华盛顿以后，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没有改变他的见解：“斯大林无条件地赞成美国在中国执行的政策，象在谈话期间向他概述的那样*”哈里曼大使就同一谈话提出的报告远不是这样乐观，他认为除非国共关系得到改善，俄国人甚至可能在满州和华北建立傀儡政府**。

然而赫尔利对俄国意图的估计不都是如此不准确，例如，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人就同意了支持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也就孕育了又一次严酷的讽刺：正是因为美国在那个很为有害的雅尔塔协议中赢得很多，赫尔利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时就被引入了歧途。虽然谢伟思和国务院大多数人事实上对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但是赫尔利1945年3月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从罗斯福那里知道了协议的内容。对赫尔利来说，雅尔塔协议用大刀阔斧方法解决了困难问题。尽管他一再断言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赫尔利相信

* 对外关系：1945年，340页。

** 同上，341页。

他们总会服从莫斯科的意志：“我们深信，苏联的影响将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恰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实力被极其夸大了，赫尔利确信，没有苏联的援助他们不会冒险打一场内战。“没有苏联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终将作为一个政治党派参加国民政府”*。这就等于说，期待莫斯科发号施令来完成赫尔利和其他任何人一直未能完成的根据国民党的条件实现国共和解。

谢伟思对雅尔塔会议一无所知，但是他对中国的情况却知道很多。他看到蒋寻求俄国帮助解决他和共产党人的内部问题。显然委员长认错了目标。谢伟思敦促美国“在这些计划上回避鼓励或帮助蒋”，但是，他几乎不可能认识到，恰恰是美国大使赫尔利正在建议采取这种方针。

国民党希望和俄国人作交易

1945年2月17日

美亚文件：1345—47页

现在有消息盛传，宋子文不久将朝拜莫斯科。自华莱士访问以来，类似的有关宋和其他人的谣传，已经听到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好象背后还有点什么事情。

从几个国民党人士获悉，最近有人建议说，要待共产党问题的国际面澄清以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蒋在最近国共谈判中最后所持的僵硬态度，同周恩来的谈话相比，需要作更多解释。周

* 对外关系：1945年，431、433页

恩来说，由于被邀请作为主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他认为得到了“面子”。在1月29日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据报道蒋在讲话中说，因伴随美军登陆而来的供应得到加强以后，过于现实主义的俄国人会不支持这匹“错误的马”——那是指中国共产党人。

因此，显然中央政府实际希望能和俄国作成某种交易。就中国方面说，就现存的或潜在的一些问题达成谅解是可取的。这些问题是：朝鲜、满州和外蒙古的未来；新疆和当地少数民族和边界问题；战后经济关系；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但是，中央政府希望得到这一切东西。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方面给予些什么呢？盛传宋子文将提出和英苏、法苏相似的（中苏）20年条约。

很难看出，在目前情况下，对莫斯科讲求实际的人们说，这项提议会很有吸引力的。仍然可能有若干因素在支持中国的希望。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大多数中国高级官员好象确信，和他们自己一样，美国对苏联既怀疑又害怕。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中央政府肯定得到我们的支持（大使肯定不会为这个看法泼冷水）。可能他们甚至希望和俄国谈判中得到美国的斡旋。最后，他们必定不会看不到戴高乐和俄国签定条约后法国共产党正在缓和它的态度的例证。

这种利用美国的调停和苏联进行交易来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希望，与华莱士提出的善意的但不受欢迎的忠告正好相反：和俄国达成可取的良好关系有赖于首先解决中国内部的共产党问题。

如果说中央政府确实是希望取得成功的话，那它只是自欺欺人。在重庆的俄国人对中央政府很是冷漠——他们公开贬抑重庆，赞颂延安。不但如此，也没有多少可作对等交换的东西：中国人不大可能在新疆、外蒙或满州作出让步。最后，客观条件并

不有利。中央政府和蒋比法国和戴高乐更缺乏力量。中国共产党军队比自由法国军队*更强大——并且在迅速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俄国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作法就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坐以待变。

蒋和他的顾问们的这种希望看来也说明，蒋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虽是一位很狡猾的掮客，而他的政治家风度和对世界其余地方的知识却是极其有限的。这也是普通中国人特征的一个反映：象中国人老于世故一样，他们有一种习惯，当他们碰到一种几乎是无望的局面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正视它，以不现实的和盲目的乐观来慰藉。

避免鼓勉或者协助蒋的这些计划，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

当3月间谢伟思飞回延安后，他对内战迫在眉睫的担心更加强了。特别是和象陈毅那样极愿和谢伟思坦率直言的人谈话以后，事情看得很清楚，中共正公开准备应付内战，对与国民党和解已不抱希望。这场内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无疑是满州。中共确信，苏联总会在满州参加对日战争，它十分盼望并计划把它的部队派进满州，与苏军合作接管控制权。

1944年10月邱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同意在满州参加对日作战。这是可能的，中共知道俄国的这一承诺。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因为他们坚持说“俄国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苏联肯定不会要求在满州拥有任何特权。然而，在雅尔塔，斯大林已经得到美国同意，取得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用权，保障“苏联优先权益”的大连国际共管，和建立苏中合营公司以经营满

*自由法国军队是一支秘密的军队，它在法国被占领时期成长起来，并帮助戴高乐解放了法国。

州主要铁路。雅尔塔协定还规定，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与此同时，如谢伟思在另一电讯中所报告的，中共以为，“外蒙和内蒙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给予公平对待和民族自治，“外蒙与内蒙将联合一起，并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不知道这些如此致命地影响他们自己国家的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正说明苏联一点也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缺乏密切联系，却为赫尔利认为俄国人会在场内战中遏制中共抵抗国民党的希望讲了坏话。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预言

1945年3月14日

美亚文件：1405—8页

概要：中共领导人好象预期抗日战争晚期苏联在满洲参加作战，虽然他们拒绝允许去推测它。他们相信，这并不会引起俄国人要求在满州给予特许或特权。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将是中共控制那个重要地区。 概要完。

1.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或预言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极其困难的。

甲、首先，他们不愿意讨论和预言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条：中国一定不能期望或依赖外国援助。相反，她必须准备依靠她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把日军赶出中国领土。他们认为满州是“中

^{*} 谢伟思的“共产党关于蒙古的意见”，见1945年3月16日，对外关系：1945，284页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绝对无问题的。一个时间最久、又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进军到鸭绿江边。”

强调自力更生是共产党“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坚持认为，要有效进行作战，就要充分动员人民；需要进行政治灌输和承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进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经济改革；国民党专心致志于外来因素决定论，它回避了动员中国自己的资源这个重要问题。

这一论据的根本点是共产党人的这一概念：作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战争，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同时对中国革命作重要的和逐步的推进。根本上是保守的国民党惧怕这场战争的“革命的”潜在性——它意味着要把实行民主和经济改革作为人民抗战的基础。因此，国民党破坏了统一战线，并拒绝实行经过周密计划的措施以最有效地进行抗战，从而变成了“失败主义者”。

共产党领导人把这种逻辑加以延伸，觉得听任普遍期望借助俄国参加战争而不费力地使国家民族得到拯救，会有碍于战争努力和实现其根本的革命目标。

乙、抛开这种理论上的异议不说，共产党人还争辩说，苏联在战争中已经竭尽全力，它在人力和物力上已遭受的损失，使得期望或要求它在远东进一步付出代价是不公平的。除此以外，他们还说，俄国人即使不积极参加，仍然还是通过在满州牵制着大量日军部队对战争作出了贡献。

丙、争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几年来重庆政府顽固的反苏态度，的确不是打算寻求俄国帮助，或鼓励俄国参战。（我打算在另一篇探讨中苏关系的报告中来详述这个问题）

2. 虽然尽管有这些争论，显然中共领导人也预期俄国终将参加这场远东战争。举例说，他们坚持认为，必须考虑俄国是远东

重要强国，她不屈不挠地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虽然由于必要被迫暂时对之妥协，以把她自己从德国更直接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和她将坚持在解决日本战败后的问题上有发言权。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合乎逻辑地要求俄国终将参加击败日本。

3.至于俄国人参战的可能的时间，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还不能作具体的预期，在对日战争进入相当晚期之前，可能不会参战。在打败德国以后，俄国还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向西伯利亚调动兵力和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某些俄国部队，特别是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已赶赴欧洲战场。）并且，如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前，盟军必须在英国建立优势兵力一样，所以这些俄国部队，在进入作战之前必须强大到能确保胜利。由于滨海省和西伯利亚交通线地理上易受攻击，这特别丝毫不能错。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将是速度——日军在满州的部队，由于日本战争机器的总损耗而迅速削弱。共产党人认为，到现在为止，日军因为从满州开赴其他战场而受到的损耗还不很严重；同时，某些部队撤走了，而从日本本土开来的新部队可能取代了他们。

他们指出，不管怎样，即使俄国人1945年4月25日预先通知，俄日中立条约还有一年才到期。

4.苏联参加的形式和地点，象朱德将军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将由红军在北满直接向日军进攻。他们特别提出西北满（或许在诺门坎湖附近），因为这里最利于苏联机械化装备和进攻战术。所设想的其它苏军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路线都被排除了。

甲、他们认为，通过新疆向中央政府的部队提供补给并与其合作是不合乎实际的，因为路程遥远。而且他们确信，俄国人对中央政府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无私合作缺乏信心。（共产党人所说的“无私”意思是集中力量打败日本，而不是用于内部政治问题。）

乙、试图通过内蒙与宁夏或绥远南下去与中国共产党部队建立联系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段路程极其漫长，除了困难的汽车运输外别无其它办法，还因为这条运输线暴露在内蒙东部日军基地的侧翼攻击之下。

丙、向张家口进军以到达北平和天津会引起同样的远离基地的运输和距离问题。而且，和东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师，甚至把满州从中国切断，本身不会达到俄国的任何重要战略目标。满州的日军不会削弱，而且会仍旧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威胁。

5. 共产党的期待——或，可能，希望——看来大约如下：在俄国军队准备就绪参战时（比如说，1946年暮春）局势将会是：

甲、日本本土各岛将受到美军的直接进攻。

乙、满州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完全制空权和制海权下和日本隔离。

丙、共产党部队将大大加强起来，通过：（1）它们目前的迅速发展将持续下去，和（2）某种美国的供应与协作——可能来自太平洋。

丁、中国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可能登陆，即使规模不大，将会牵制日军在华部队，割断日军北——南交通线，并从而把满州从中国孤立起来。

当这一阶段开始时，红军切断北满，然后向南推进。与此同时，共军将开始积极渗入南满。

为了准备这次作战，在过去2年里共军大力巩固他们的冀东根据地，并扩大他们在热河和辽宁南部的游击战区。冀东根据地的“强化”，从几位美国空军人员，包括在北平——辽宁铁路（即现在的京沈线——译者）以东的昌黎附近跳伞降落的B—29轰炸机

上的一名空军人员的获救得到考验。后者被从那里安全地徒步送到延安。满州西南边缘地带的这些共产党根据地对日军的潜在重要性并未丧失，这一点从他们目前的强化扫荡战得到证明。这次扫荡战在这个地区已经连续进行3个多月，而未取得显著成就。

共产党人还派遣了大批政治组织人员（从当地人员中征召来的）进入满州，并宣称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地下组织，而且和过去的“东北义勇军”残余核心取得了联系。在谈到这些组织的详情时共产党人保持沉默，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本人时时宣布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在满州和华北的反共措施和宣传仍然没有放松；并对从中国进入满州严厉加以限制。很有意思的是，现在重庆的大多数东北人看来相信，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范围相当广泛。

据传在满州东南部山区活动的老游击队的残部，可能从西南方面和共产党人进行协同作战。这些小部队靠近朝鲜与西伯利亚滨海省的边界，并可能从后者得到补给。俄国对朝鲜抵抗团体的任何援助，和利用俄国人已经武装起来的朝鲜部队，都可能从同一地区开始，并和这一作战有关。

因此，随着满州战争的发展，红军将对准这个国家的心脏向南推进，向日军主力发动大规模的正面攻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部队和其他附属的抵抗部队将从西南和东南向满州中部活动，破坏交通线，制造骚乱，把尽可能多的日军牵制在后方，以支援俄国正面主力军。

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显然并不怀疑，俄国人将会承认在满州会师的任何中国部队，即共产党部队，并和他们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值一提。

6.关于俄国人在满州要求领土或特权的可能性，是共产党人最为强调的问题。他们坚持认为，因为“俄国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不会再有这样的要求了。但是，俄国人的确希望有一

个将和俄国保持真诚和友好关系的中国，和在商务基础上和不损害中国主权情况下，允许正常使用满州交通和港口设施。这意味着在两国间的或过境的贸易中，不会存在不合理的或严重的障碍。共产党人坚持的这些条件会对两国都有利。

8. 无需指出，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将把满州的控制权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很明显，共产党人深信，通过上面所述的特殊过程或别的方法，他们将会取得控制权。

共产党人完全了解——如同国民党一样——满州作为中国的主要和唯一的、充分发展了的重工业基地的重要性。12年前曾有人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亚洲的斗鸡场”^{*}，论述了最初的日本入侵的意义，现在用这一书名来形容满州，要比那时更真实了。

在延安的逗留接近结束的时候，谢伟思有计划地试图估价一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人之间接触的性质和广度。结果产生了这篇精确而又翔实的报告，指出两个共产党之间看来有接触的，但是明显看出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任何援助，可能也没有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系

1945年3月23日

美亚文件：1444—46页

概要：虽然会被否认，但中国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之间的确存

^{*} 见佩西·T. 易瑟顿和赫舍·铁尔特曼(Percy T. Etherton and H. Hessel Tiltman)：《满州、亚洲的斗鸡场》，manchuria, The Cockpit of Asia (纽约：斯托克斯，Frederick A. Stokes, 1932)

在渠道，而且几乎肯定有某种联系。这可能是通过去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和延安电台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曾接到过苏联的武器。

苏联和延安之间现在不存在交往。最后一架苏联飞机访问延安，那是1942年11月的事了。在此之前，苏联飞机飞来延安平均一年不多于1、2次。所有来访飞机都得到中央政府的允许，并在甘肃西部和兰州的中国机场停降，而且要经过彻底检查。飞行目的是为少数在延安的俄国人员服务，并且不准他们搭载俄国人以外的旅客，或载运旅客个人物品以外的货物。1939年晚期，当周恩来到俄国去的时候（因手臂受伤去进行治疗），他至少乘坐中国飞机一直到兰州。据说，中国在兰州对最近一次俄国飞机的检查花了两天时间。大约有一吨医疗用品被没收了，并且甚至奥尔洛夫医生的主要外科器械也不让运到延安。

国民党制造的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补给的这个怪物确实不存在。任何飞机从外蒙古的基地飞到陕北除了装载返程所必需的汽油以外，要再装载任何大量货物是不可能的。陕北和晋北地区受到美军观察员的全面监视。除掉延安机场以外，没有可供这种俄国飞机使用的机场。最后，在美国人和共军广泛的接触中，不曾发现俄国武器或装备。

现在，在延安有3个俄国人。

其中之一是名叫奥尔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说，他不是正规军的一员，但大约在1938年应召服役。在诺门坎湖和芬兰战争中他曾随军工作。1942年他被准予离职3年，然后于1942年11月乘最后一次俄国飞机飞赴延安。无疑，他是一个忠诚的外科医生。他介绍了一些苏联的新医术，并一直在延安中央医院十分忙碌地作外科手术。

另外两位是塔斯社记者。人们都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字是“郭黎”和“沈平”，看起来分别约26岁和40岁。他们也是从1942年起一直住在这里，是接任以前驻这里的记者的。他们说，他们只有通过重庆并经中国方面检查之后才能发出新闻电讯。然而他们雇用了中国翻译，并且看来采访到不少材料。很难看出，除去经过重庆以外，这样的印刷件，怎样可以通过当地共产党人无疑会有的走私渠道寄送出去。据说他们除有1台收音机外并无其它无线电设备。访问过他们住所的人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无线电技术顾问的、详知当地一切设备的林迈可证实了这种情况。不论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如何，苏联报刊上没有发表过未经重庆检查官通过或未经美国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

这三个人中没有那一位被作为重要人物对待。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仍然讲得不好——并且看不出任何特征说明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似乎和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没有亲密的交谊，也没有被给予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得到的“面子”。事实上，他们除去大的社交场合外都不露面，露面时他们也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

除了一些从象天津这样一些城市逃来的白俄避难者——他们中的大多数被严重怀疑可能是日本的间谍——之外，在这个或其它共产党地区里，显然没有其他俄国人。

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要比在延安的俄国人重要得多。这些人包括中共前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一直留居在俄国，而且可能不能返回中国，即使他们愿意回去的话。他们当中有一度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李立三，和一位赵将军。这些人肯定和俄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联系。

自然，另一个可能的联络渠道，就是通过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和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然而这种联系看来为避免引起中央政

府的怀疑而受到限制。有一位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曾经告诉我，他们接到命令，“不要与重庆的中共人士接触”。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仍然还是经常被邀请参加大使馆的节日庆祝活动。

延安和莫斯科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系确定无疑是可能的。通过收听俄国广播，共产党报纸直接抄收塔斯社新闻。因为在旧金山可以听到延安发射出的广播，可以设想莫斯科也能听到。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无线电交流为什么不会是双向的。

第一个也是据我所知唯一的、似乎是公开承认这种联系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斯大林就最近的苏联建军节互致祝词。1945年3月3日，共产党通讯社公布了斯大林的复电全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于红军27周年纪念节的热烈祝贺！斯大林”。很可能，这些祝词是通过中国政府电台和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发出的。但是，重庆和延安之间的政府广播是这样的慢，这好象不可能。

由于能够进行新闻交换，自然就不必要很多官方的或直接的电报往来。苏联的重要社论常常为共产党报纸转载和评述。这些至少都足以说明党的“路线”。反之，从延安到莫斯科也是一样。

尽管有这一切联系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否认他们和苏联政府有任何“关系”，并且抱怨说，关于苏联可能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们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少。这些声明的第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驳斥它。所存在的联系是两党之间的。而不是政府之间的。我想，存在这种联系是可能的。

1945年的政策建议

虽然1945年谢伟思写的大量报告都对赫尔利政策的前提提出疑问，他一点也不渴望和大使挑起一场公开争论。赫尔利已经安排好把约翰·戴维斯调出中国，并且当谢伟思1月中旬返抵重庆时，赫尔利直截了当地向他发出警告说，如果他“反对”大使，他总会遭受同样命运的。但是一连串事件终于导致谢伟思和几位其他外事官员一起，说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

早在1945年2月，拉蒙德·P·卢登，隶属于迪克西使团的一位外事官员，从延安出发，旅途历时4个月，行程1200哩，穿过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地区差不多达到了北平郊区，然后回来。他此行再一次直接地、第一手地、不容置疑地证实了日军战线后方中共军队的实力。谢伟思在重庆碰到了他：“卢登是一个高大的、言谈直率的、红脸孔的爱尔兰人。他是教会的后裔，一个善于词令的稀有天才和具有伟大气魄人物，这些使他不会轻易被一位新来的象赫尔利这样的爱尔兰老乡所吓倒。他这次旅行回来真的发火了”。

卢登和谢伟思二人被指派为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史迪威的继任者）的参谋人员：他们完全不是赫尔利大使的下级或受他命令的支配。不过，他们知道赫尔利常常反复坚持说，不得有任何战地人员（包括军人或文职人员）越过他提出报告和胆敢提出政策建议。但魏德迈即将返回华盛顿备咨询。因而卢登和谢伟思讨论了中国战争的态势和卢登最近

的旅行所见种种的含意，他们得出结论说，是“把事情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了。当卢登就他这次旅行向魏德迈做口头报告时，谢伟思伴随他前去。这位将军对报告很感兴趣，并要他们写一份备忘录以备他带回华盛顿。结果就产生了下面由两人联署的备忘录，敦促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部队所奉行的政策。

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

1945年2月14日

泰丁斯：1980—81

美国的远东政策只能有一个直接目标：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为代价击败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其它考虑都必须从属于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在抗日战争中把中国有效地动员起来。我们在好几千里哩远的供应线一端的陆上战场作战，越是推进到日军防御内圈，中国人力和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就越发增大。不肯有效利用这些资源，要实现主要的目标将会不必要地推延。

有充分证据说明，对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说，抗日与保存自己的政权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政治上的纷争和国民党期望保存它现在拥有的军事部队为维护其政权之用。委员长的如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意图，一直没有放弃。在目前的中国——那里权力或自我生存取决于军事势力的占有——局势中，不管是国民党或反对派集团，都不愿在抗日中消耗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都怕这

会削弱他们面对另一集团的力量。新近的一例是，对日军攻占汉口——广州铁路线南段未作抵抗，相反，国民党疑心重重地专心致志于阻止其他集团增强力量；见证是对共产党人的封锁。

正如美国官方声明所明确指出的，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把在中国建立政治团结作为中国有效军事动员的必不可少的开端。我们政策的执行没有促进这一公开声明目的的实现。反之，它妨碍了这一目的的实现。我们的政策得到这种不希望得到的和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的声明和在中国的行动使国民党政府确信，我们将继续支持它，并且只支持它。国民党政府相信，它将源源不断获得美国军事的和有关的供应品。这件事，如果说过去的经验是一个前鉴的话，它将仅仅是极其不情愿地进行一点对敌作战，假如果有其事的话。

我们不可能希望这种形势会有任何改善，除非我们了解国民党政府的目的，并且运用我们巨大的影响使它走向国内团结。现在我们应该确信，运用外交手段努力解决国共分歧已遭失败；我们不应该被任何经过讨论而产生的“保留面子”的公式所欺骗，因为没有那一方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没有美国援助，中国的哪个政府都无法存在下去。

在中国，存在着关切政府改革的种种重要势力，而通过政府改革，可以导致团结和积极进行抗战。然而除中共外，所有这些力量都被广泛存在的秘密警察组织所吓倒，并且没有任何坚定的凝聚点。只要我们的政策声明表明我们是现状的卫道士，它们就不能帮助作出任何建设性的事情。

目前，中国局势与邱吉尔首相宣布支持铁托元帅之前在南斯拉夫存在的局势相仿。其声明如下：

“对我们来说，要奉行的最清醒和最保险的方针，就是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决心的考验和从而减轻盟军负担的

情况，来不感情用事地判断他们。现在不是意识形态上选择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岁月”。

由总司令（指美国总统——译者）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的类似的公开声明，并不意味着撤销承认中央政府或停止援助中央政府；那会是既无必要、也不明智。然而，这会有助于使人知道我们准备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它会为一切中国人提供一个迄今一直缺乏的、坚实的凝聚点。这样做在中国内部的影响会是这样的意义深远，以致委员长定会被迫让权，并答应实行统一战线的联合。目前的各反对派团体，不再以保证自身安全为首位的需要，会被争取全心全意地站到我们一边，并且我们会在中国第一次得到一个团结一致的盟友。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由于我们已在这里存在，我们成了中国内部政治的一支力量，并且应该运用这种力量来完成我们的首要任务。尽管在美国公开宣扬崇拜英雄，蒋介石不就是中国，但是，通过我们目前的毫无保留地公开声明支持他占着茅坑不拉屎态度的狭隘政策，我们不必要地使自己脱离了千百万有用的盟友，其中许多人已经组织起来，并处于对敌作战的阵地。必要说清楚，这些同盟者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而是在这个国家里到处都可找到。共产党的运动仅仅是在中国到处都潜存着的一种情况的最明显的体现。其它重要团体都支持所谓共产党人信奉的同样的纲领——土地改革、民权、建立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人是现在拥有组织和力量足以公开推进这样的“革命”主张的唯一的团体。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在中国我们被诱骗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只有一个达到目标的方法。只要有具体证据证明委员长愿意并能够统帅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支持他就是可取的。支持委员长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支持委员长自身并不是目的，但

是现在的政策声明表明我们显示了一种把目标和手段混淆起来的倾向。为了在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方面重新采取灵活的作法，应该立即调整我们的立场。

在卢登和谢伟思为魏德迈将军写好备忘录5天之后，赫尔利和魏德迈就动身赴华盛顿了。谢伟思按照他惯常的作法，向大使馆交了一份备忘录的副本，亲自把它送交给大使馆参赞乔治·艾其森。在赫尔利离开之后，由于艾其森知道赫尔利在华盛顿期间，很快会就对华政策作出重大决定，他判定这是在华职业外事官员们提供他们时局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时机。在赫尔利离职期间任临时代办的艾其森，强烈地感觉到，国务院一直没有从赫尔利那里得到一份有关中国局势的完整而又客观的见解的报告。所以在他的建议下，决定向华盛顿发出一份大使馆政治官员的电报。虽然别人对电报的最后定稿起了一份作用，并且是用艾其森的名义发出的，但是最初草拟这份电报的却是谢伟思。这一事实未加防止而被赫尔利获悉：当他在国务院看到这份电报时，他的反应（后来有人告诉谢伟思）是：“我晓得是谁起草这份电报的，谢伟思。我要给那个狗娘养的一点颜色看，如果这是我最后要干的事的话。”

中 国 的 局 势

1945年2月28日

谢伟思：109--12页

中国的局势似乎正沿着某种无益于有效地进行抗战，也无益

于中国将来的和平和统一的方式演变。

1. 近来美国企图通过外交和规劝办法以帮助中国各党派之间求得妥协, 这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必要的的第一步。团结被正确地认为: 不仅是对中国最有效地进行抗战的要素, 而且也是和平和迅速地出现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要素。

但是, 日军攻势的终止, 通向中国的公路的打通, 迅速扩大的我军重建蒋军的计划, 其他诸如战时生产局的日益增加的援助, 期待中央政府将在旧金山作出重要决定时起作用, 并且相信我们专心致志于只明确支持和加强中央政府, 并把它作为援助其它团体的唯一可能的渠道——这些情况加在一起, 大大提高了蒋的实力感, 并导致了他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和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

这种态度还反映在在未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前, 希望及早解决俄国问题, 当时除了成立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的党派顾问委员会之外, 最后未提出任何东西, 并且在最近的军政要职任命中, 把强烈的反共分子安插在各战略战区里, 并且任命反动分子到高级行政职位上去, 诸如任命陈策海军上将(戴笠的部下)为广州市长和贺国光将军(前宪兵司令)为台湾省主席。

2. 共产党人方面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确定只单独支持蒋; 我们不愿强使蒋采取行动以便能够帮助他们或与他们合作。出于他们所考虑的自卫, 所以他们奉行的行动方针(中央领导人去夏的声明作了预示, 如果继续把他们排除在考虑之外的话)是, 不管国民党名义上的控制, 积极增强实力, 并敢作敢为地向南扩大他们的地区, 直达中国东南部。国务院提到我们2月24日晨9时的284号报告称, 大批的调动和与中央政府部队的冲突已经发生。共军抓住时机, 打算乘由于日军占领粤汉铁路而使华东地区陷于孤立之机, 并在现正在云南组建中的蒋的新军建成之前, 把

自己尽量建成近乎战无不胜的军队，并且，使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即如果我们的部队在中国海岸任何地方登陆的话，我们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们的援助。接近领导的共产党人目前都正在谈论寻求苏联援助的必要性。共产党自己在广播中要求共产党和非国民党人士都要有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并正积极考虑建立一个他们各个独立游击区政府的统一的委员会。

3. 结论看来很清楚，虽然我们的意图一直是好的，我们拒绝除中央政府之外和任何团体打交道或给予援助，从外交上来说是正确的，假设这种局势持续下去，而我们对这一点的分析又是正确的，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的可能加速爆发。即使现在这也是很明显的，我们排除与共产党地区的数量大、进取性强、处于战略要地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人民，以及在东南地区的诸为李济深和蔡廷锴集团的部队合作，这种局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纯军事观点说，也是有害的。如同前面指明的，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局面对美国的利益也是危险的。

除非得到制止，局势足以演变为中国和整个远东战争步调的加剧，并且使不可逃避地解决中国内部冲突变得更加紧迫。时间是短促的，而让事情放任自流下去将是危险的。

4. 如果我国政府高级军事当局同意，和愿意并且能够与日军作战的共产党和其他集团实行某种合作是或者将是必需的或可取的，我们认为，立即和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应该成为美国政策进一步行动的基础。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应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良机。

根据上述军事需要的设想，我们提议考虑的第一步是，由总统以明确的措词通知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向能够有助于对日作战的共军和其他适当的集团进行援助与合作（在目前情况下

不能够包括实际上不处于对敌作战阵地的四川军阀的部队），并且我们正采取直接步骤以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向委员长保证，我们并不打算削弱我们对中央政府的援助（因为运输上的困难，我们给共军和其他团体的任何援助，最初应当是小规模的，并且可能小于对中国的援助的自然增加量）。我们在声明中还必须说明，我们将向中央政府通报这种援助的规模和类型。我们还可以告诉委员长，我们将能够利用我们的供应与合作作制约，限制他们的自行其事和进攻行为，把他们限制在他们目前的地区之内。而且我们可以指出，由我们援助共产党会比他们去寻求俄国人的帮助或直接、间接干涉好得多。

在我们向委员长作出这一声明的时候，如认为可取的话，还可以告诉他，虽然我们规劝各党各派实现统一的努力失败了，而且我们不能再拖延采取进行最有效的作战的措施，但我们认为显然可取的是，我们给各集团的军事援助应以军事指挥的统一和协调为基础；只要认为可行并提出要求，我们准备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调停；虽然我们认为建议应由委员长提出，我们要乐于支持：

（1）组成某种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内阁，共产党人和其他集团在其中应有有效的代表性，并对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分担某些责任，（2）共产党的和其他的某些部队名义上合并于中央政府军，置于由魏德迈将军提名、经委员长任命的美国军官组成的作战指挥部统帅之下，各党派协议，这些军队只会在他们现在的地区内或指定扩大的地区内作战。然而，应当说清楚的是，我们同任何能够协助作战的部队的合作的决定，不应因为中国要完成这种内部安排而延迟，也不应取决于中国是否完成这种内部安排。

我们相信，这样一种权宜之计将会解决中国现在的僵局，并且可以作为朝着全面解决最终完全统一这个问题的初步步骤。最近的协商的结果是，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争端清楚了。委员长和

他的政府，现在不会主动采取会意味着有失面子、有损威望或权力的任何前进步骤。共产党人不得到他们信赖的保证，也不会采取使他们的部队可能被分散而最后被消灭的任何前进步骤，他们目前的力量和未来的政治生存都有赖于这些部队。我们建议采取的步骤将会对两党施以打破僵持所必需的压力，而体现在那两项建议中的权宜之计必将开创具体的军事上的合作；而且作为必然的结果，还有政治上的合作，并且相应地为未来向着统一发展提供基础。

这些提议不会排除政治咨询委员会的计划，它如果被采纳，可以与战时会议和政府共同起作用。事实上，可以预期，政治咨询委员会会大大加强。

当然，声明应该私下向蒋提出。但是要清楚了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旦他拒绝接受声明，就要采取必要的更为激烈的步骤，即发表一项公开政策声明，就象邱吉尔关于南斯拉夫的政策声明那样。

然而即便不使之公开，我们支援共产党军队和其他部队的事实，会很快在全中国被众所周知。我们确信，这在中国会产生深远而令人满意的政治影响。在中国现在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要求实现以和共产党人达成合理妥协为基础的团结和给当前的自由主义集团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然而，甚至是国民党内的这种自由主义集团，诸如孙科集团，和其他小党派，在最近的协商中不是被共产党（他们形成某种统一战线）而是被国民党置若罔闻，而且他们因为感到美国赞助目前的国民党反动领导而幻想破灭和精神沮丧。通过我们建议的措施，我们将会证明我们并不这样受到约束，我们乐于大大提高这些自由主义集团的士气和威望，并且我们愿意通过这些内部势力施加最大可能的影响，迫使蒋把自己的内部整顿好，并为了团结作出必要的让步。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政策会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强烈的欢迎（虽然不为控制国民党的极其微小的反动少数所欢迎），并且将能够提高美国的声望。

孙科本人曾告诉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关于美国援助共产党军和游击队的事，如果只是告知蒋，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这会比任何其他行动方式更可能使蒋介石和他们达成协议。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与其说是互让的事情，不如说是国民党自身的改革。他们还言之确凿地说，美国“不干涉”中国，事实上只能是有利于现在保守派领导人的干涉。

同样，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5. 本电报是在大使馆全体人员中所有政治官员的帮助和同意下拟定的，并经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格罗斯过目。

重返延安

当1945年1月谢伟思返回中国时，国务院清楚说明的条件是，把他派回延安从那里发回报告。可是他被指派到魏德迈处；而魏德迈——部分地为了避免和赫尔利冲突——极力主张他把行期推迟。另一方面，魏德迈不想让谢伟思返回延安，并且甚至向谢伟思作出保证，他要保护他不受到赫尔利的任何反对：“不要发愁。你现在为我工作。你不是在为他工作。”3月初，在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回华盛顿以后，谢伟思得到重庆共产党人士的明确暗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始。因此，他提出了前往延安的请求：

请求授权访问延安

1945年3月4日

美亚文件：1382—83页

I.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几天内在延安开幕。这是10多年来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已为此云集延安。中国目前局势的紧急和紧张——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关切——使这次会议具有特别意义。

II. 至少关于以下各点，可望作出重要决定：

甲、和国民党的协商。目前由于委员长3月1日的毫不妥

协的演说，谈判已经破裂，裂痕已经加深。这次会议可能对共产党今后的路线作出决定。

乙、共产党的军事政策。共产党部队正积极向华南扩张。内战问题日益危险地靠近。共产党的独立行动引起混乱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争夺上海的战斗。

丙、对国民党目前打算仅仅通过它自己的权威实行立宪政府的计划的政策。各小党派领导人说，他们和共产党人将反对这种计划，继之而来的将是革命。

丁、对旧金山会议的态度。共产党人已经要求有代表权。他们是否满足于这一要求；或者他们会否实行当前的一些打算以加重这一要求的份量，这些打算是：

戊、在他们的各游击区另行成立一个政府或者半政府。这样的行动可能使旧金山会议处于尴尬境地，并使中国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己、对美国和俄国的政策。是否如某些消息来源所报道的，共产党人现在正开始转向苏联？

庚、中国战后的经济政策和外国参与。

Ⅰ.此外，会议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获悉：共产党是否完全一致？党外是否有政策分歧？——如果有，在那些方面？是否会有新领导涌现出来？共产党人在城市里有没有任何实力？

Ⅱ.大使馆临时代办同意在这关键时刻需要得到延安的政治情报。他将把我的延安之行看作是定期访问之一。魏德迈将军在回答国务院表示想要得到这样的报告时曾说到这种定期访问。

Ⅲ.我将向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讲清楚我的这次访问只是听听和看看。

Ⅳ.请批准搭下次飞机访问延安，并在那里逗留约两个星期。

谢伟思3月9日返抵延安后，发现当时的气氛和情绪都有很大变化。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年轻些的第二层次的人——对国民党都更加不满和敌视了。蒋介石刚刚在3月1日发表了一篇不平常的严厉批评中共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透露了一项召开1936年国民大会的新计划——这个国民大会是一个纯国民党机构，是1937年统一战线建立以前挑选出来的，这个统一战线多少缓和了一下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共产党人看来蒋的演说是明显的倒退，使他们越发相信，国民党已经无可挽回地决定走一条导向内战的道路。另外，共产党人深信，赫尔利事实上是怂恿国民党走这条路的。

目前共产党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初步报告

1945年3月11日

美亚文件：1390—93页

概要：共产党人把委员长3月1日的讲话（在“宪政实施促进会”上演讲——译者）视为是实质上的宣战。他们已经拒绝参加过去提出的“政治咨询委员会”，并要求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占1/3代表名额。他们预期这会遭到拒绝，那时他们可能着手建立他们“解放区”的联合委员会。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事情得到澄清之前，中共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推迟了。同时共产党军队正在积极加强军事实力，并咄咄逼人地扩大他们的控制区。 概要完。

3月9日下午抵达延安，此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跟陈家康（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陈毅（新四军代理军长）、叶剑英将军（八路军总参谋长）、董必武（中共执行委员和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和周恩来（共产党“外交部长”）进行谈话。

很明显，共产党人已经大大强化了他们的态度。总的气氛是下定了对抗的决心，和期待着最近的将来有重大发展。以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的共产党对自己力量的信心，现在这一点更加明显了。

和解之门还没有完全关死，但是已经差不多了。在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期待中央政府会作出什么妥协。美国的政策和大使的态度对此要负部分责任。人们谈到蒋时大都用贬词，并且看来不再有人愿意把他视为国家必不可少的首脑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已经拒绝参加政治咨询委员会，它是在最近的重庆协商结束时建议成立的。他们提出的理由和道理如下：在周恩来上次（今年1月）重庆之行之前，中央政府建议成立“战时政治委员会”。这将是隶属于行政院的一个政策指导机构，国民党称它为“一种战时内阁”。实际上它的权力是空洞的，并且无权决定与政府改革和向宪政与民主过渡有关的问题。甚至在周恩来到达重庆之前，各小党派的代表已唾弃了这个建议。共产党人立即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因此，共产党人认为“战时内阁”问题早已寿终正寝。

下一步骤是把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的建议，降格为一次“政治咨询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不会有实权，但是至少能够考虑改革和向宪政过渡等广泛的问题。周带回到延安以决定共产党是否参加的就是这个建议。

在共产党还未作出答复之前，委员长发表了他的3月1日毫不妥协和威胁性的声明。在声明中他没有提到“政治咨询委

员会”，而只谈到已被共产党人和小党派拒绝了“战时内阁”。

因此，共产党人认定，蒋又后退了一步，现在甚至不容许成立咨询委员会了，并且决心只在国民党代表大会采取的行动上实行宪政，并且要召开一次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都是战前选出的、而且都是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认为，蒋在讲话中所说将在国民参政会中“讨论”这些问题，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国民参政会的成员90%都是国民党人，并且无论怎样说也是没有实权的。共产党的实际回答是，鉴于蒋在3月1日的讲话中不提成立咨询委员会的事，他们认为这个建议已被抛弃了，因此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就是否参加作出答复。

各党派之间关系中其次一个迫切和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权问题。共产党人坚持说，（美国）大使提出为了使中国代表团能适当地代表全中国，代表团中应当有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他们决心利用这一点。他们要求共产党的代表占1/3，国民党以外的代表占1/3。共产党代表大概是周恩来、博古和董必武（最后，国民党仅仅允许董必武参加代表团——编者注）。如果共产党的参加遭到拒绝，共产党人可能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地区联合委员会”（共产党地区，大部在中国被占区）使事情引起全世界更清楚的注意。这个组织至少是一个半政府性的组织，并且将宣称至少代表1亿人民。

共产党七大已延期以等候这一问题的澄清。可是预期3月底之前大会将召开。同时，共产党的一切重要领导人都在延安，而且由主要人物参加的会议在持续进行。

共产党人直言不讳他们的扩张，并且以双重理由为之辩护，既是为了支援作战，也是“自卫”所必需以防国民党显然要把

共产党人排除在制宪计划之外，并通过内战最终消灭他们。“自卫”是主要的论题。陈毅说，新四军现在实力已发展到30万正规军，并能够轻而易举地扩大到40万人。其他人说，“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将能够占领满州边境到海南岛的整个华东。”他们说，实现了这一点后，共产党部队将会至少和中央政府部队一样强大，那时候受封锁的将是国民党。

共产党人至今还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并强调战后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美国参加。但是他们并不指望得到这样的合作，除非美国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们的言论很有意思。向华东华南扩张的决定是紧接着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后做出的，他们把这件事解释为美国决定支持蒋和中央政府了。（我1944年8月下旬所写和毛泽东以及陈毅谈话的报告指明，这些问题已经在讨论中，决定将根据美国的政策作出。）

总的说来，没有什么事情足以表明，我们最近在重庆作出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分析，在任何重大的事情上存在不正确的地方。眼下的趋势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远离团结。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部队之间在广大地区发生冲突（中共军队承认，他们在广州周围的部队遭受颇为惨重的损失，但是宣称，这些损失远远抵销不了他们在上海地区、皖南、浙江、福建和粤北实力的增长）。看来公开的内战在预料之中——共产党人无所畏惧。例如，他们满意地指出，汤恩伯（中央政府军湘——桂——黔边区政府司令）最近宣布打算“收缴民间枪枝”，说明中央政府不能从过去吸取教训，也不信赖和组织人民，从而干出对共产党人有利的东西。

共产党人向南扩张，除了想要在中央政府的新编军建起之前去反对中央政府，并且在一旦我们在沿海登陆时迫使我们同我们所碰到的共产党军队进行协作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他们没有明言的方面。他们好象预期日军会在华北发动一次强大攻势，以巩

固自己的地位。现在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战斗，就是在冀东、热河南部和辽宁南部展开清除共军阵地的大规模扫荡战。这显然是打算在中国和满州之间建立一条封锁线，并且正以异常的决心残忍进行着。共产党人声称，整个地区不是成了无人区，就是变成了强化治安区，在强化治安区里，全体居民都集中在警卫森严的治安村里——正如在满州部分地区所实行的那样。共军大规规向南移动，不仅说他们越来越决心控制中国本部，而且也可能是设法逃脱日军在华北摧毁共军主力的企图。

某些共产党人的谈话，在一些方面比以前更加坦白直率了。例如，他们说将不得不“在任何可能有朋友的地方寻找朋友”（俄罗斯），如果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话。与此同时，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中国人，不受俄国约束。他们还暗示，他们可能采取与俄国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的态度；如果全世界都反对他们，他们将在所有接近中国的国家中（例如在印度）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然而，这些言论并非出自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之口，并且我相信这些说法大半都是为了制造影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说明共产党人所关切的莫过于他们的继续生存和在中国发展自由，他们仍然相信，实行真正的民主和限制目前的专政，上述事情就可以得到保证。

3月31日，毛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一部分是想弄清楚美国政策究竟如何，一部分是企图说明中共战后所要奉行的政策决不会威胁美国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毛对美国政策的疑惑不解是十分可以理解的。1944年11月，赫尔利曾帮助起草并同意了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条件。后来，在他返回重庆之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

度，成为一个蒋介石立场的强硬和坚定不移的吹鼓手。12月，共产党分别收到战略情报局和美国陆军总部提出的，美国直接援助共产党军队的具体计划。毛和周对美国政府的政出多门迷惑不解，于是作出了很大努力想通过他们两人中一个，或者两人一起访问美国，同罗斯福直接面谈。可是，赫尔利发现了这个想要取胜于他的企图，并且迅速地粉碎了它*。

于是，共产党人深知了这样的事实：在美国政府内部，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存在着意见不一致。他们进而知道，谢伟思可能是支持一项对中共较为友好的政策的人们中的一员。起码他们信任他能正确转达他们的看法，从而毛召见谢伟思，并用最精确的字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想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毛泽东的见解：美国和中国

第10号，1945年3月13日

对外关系：1945年，272—78页

附件是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的备忘录。我认为毛主席的见解的广泛的表述，在中国内部事务这一危急的转折关头，具有重大意义。

概要：毛的谈话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新论点是，说蒋介石坚持贯彻其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计划，而不先统一全国和承认

*见塔奇曼：“假如毛泽东曾经来到华盛顿：试请抉择”。对外关系。（1972年10月）

其他党派，这将会关闭和平妥协之门。蒋会要破釜沉舟。其结果将会是国家的公开分裂。概要完。

同我去年与毛谈话时一样，我相信，美国的政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行动的一个决定因素。就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言，共产党人是愿意合作的。但是，一味支持中央政府和蒋，而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将会促进不统一，而且后果将会是悲惨的。

备忘录：与毛泽东的谈话

谈话开始，毛就我最近的美国之行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对美国官方和公众对远东战争、一般地说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很感兴趣。

然后他颇为温和地发表评论说，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虽然近来在中国显示出来的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但是他不能相信它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几个月以前”他说，“有人对我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歧不过是这样大”。（他伸出大姆指和食指保持大约一英寸距离的状态。*）“现在一定明显了，我们的分歧是这样大。”

（他把姆指和食指尽可能扩展成V字形）

毛从这一开场白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议论，可概述如下。

* 这个措辞和表情都是赫尔利的。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

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其市场，并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它将能够向其它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它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

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

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居民，农民。在中国的4亿5千万人中，他们至少占3亿6千万。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商人、资本家仅仅是上层的少数。农民就是中国。

象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很快就改造好。在未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农民必须为工业化的产品提供实际的市场。

我们有日本的先例。因为它寻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它被迫奉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它没有从解决国内农

业问题着手。

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家和作家（例如《纽约时报》的艾金森——最近发表的《论中国农民》的文章）表明清楚了解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

中国农民的根本要求，是废除租佃制的封建条件和对地主、资本家信用贷款和购买其产品的依存状态。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农民必须得到独立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

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

国民党与全体居民中的农民群众并无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地主集团组成的党，这些集团通过一个保守的和缺乏想象力的官僚机构施行统治。它对改善农民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废除现存的封建主义残余等十分重要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而且什么也不打算做。它不可能做，因为这样做会打击它的主要支撑集团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害怕真正的民主，因而成为法西斯的党。因此，今天就有了这个奇特的封建法西斯联合体——国民党。这是国民党无力摆脱的背景和特征。

它不愿解决农业问题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实行工业化的基础，于是转而走向僵硬计划，国家指导和控制的工业发展的原则。所以，它在国内，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坚实的政权基础，在国外也没有能力创造和俄国与其他邻国保持合作友好关系的坚实的政权基础，它全力贯注于建立“国防工业”，并从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把戏。

这种政策含有期待着将来会发生内外冲突。假如它的这种政

策继续推行下去，国民党的这种期待一定会得到实现。不经过党内革命和出现一个全新的领导层，这种政策不可能改变，在这种政策下，国民党不可能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不可能使国家走向充分民主，也不可能成为远东的一个稳定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民的党。它的纲领——减租减息、累进税、援助生产、创办合作社、从最基层起建立民主政体——正是为了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在一切人民团体的团结，而不是倾轧的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需要的实现，共产党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这些才是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能的保证。

在中国的未来中，正象中国的农民不能被忽视一样，共产党也不能被忽视。国民党想要不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可能给它带来胜利。毕竟，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如同人民大多数都是农民一样。我们为中国人民说话，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并来自人民。而人民是通过我们的成绩来了解共产党的。

可以认为，蒋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达成妥协，因为达成妥协以后，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就必须让出政权，放弃独裁。但是他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

蒋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和他宣布打算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都是他日益走向绝望的迹象。国民大会将是国民党一手炮制的。邀请少数非国民党人士参加大会，是没有必要的，其用意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大会代表都是国民党机器选定的，不过是最徒具虚名的民选，因为这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公开打内战的时候（1936年）选出的。那些代表不能自称代表7年来一直在解放区进行抗日战争和管理着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自称代表重庆控制下的中国的人民。

由这一傀儡大会选举蒋当总统，并使他的政府作为“中国的民

主政府”而合法化，将会是一场闹剧。这样一个机构不打算做点什么事，也不能希望它做点什么事。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这个国民大会将被用作要求共产党服从其权威和放下他们的武器的工具。国民大会没有代表性，而且在敌人还没有被赶出国土之前召开，共产党人和被占领区的人民将会拒绝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接着，共产党人将会被宣布为叛乱分子，公开打内战的舞台也将会布置就绪。

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的这一最新策略——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所具有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发动这场好象很激烈的反蒋宣传运动的原因。这个问题是如此重大，使我们不得不尽可能提高嗓门说话。

国民党内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激增。他们包括民主同盟和附属于国民党的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现代资本家当中的许多人。

但是他们这些人推翻不了国民党机器，也改变不了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宪政”。没有美国影响的帮助，要经过一番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才会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

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宪政将民主地包括、并代表全国各方面。不应坐等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现在它还是团结全国和中国有效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在国家还未从日军手中收复和解放区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之前，蒋就决心要彻贯“宪政”呢？因为他知道人民不会同意。对于欧洲被占领国家，已经做出决定，政府的形式必须等到该国完全解放、人民自己能够决定和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

领导之后才能明确决定。这个政策是公正的，我们赞赏盟国领导人作出这一决定。为什么中国要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而且中国被占领区是一片比希腊大得多的土地！

美国不认识它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它决定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如果他不是得到美国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溃，或者已经被迫改变了他的政策，以团结全国并博得人民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美国不干预中国！你们是作为中国的最大盟国呆在这里的。你们在这里的存在是巨大的。

美国的本意是好的。赫尔利大使到延安并同意了我们的5条基本意见时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他知道罗斯福总统有同样的想法，他不可能赞同这些意见。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毫无疑问，蒋的动机和不光明正大的花招是清清楚楚的。他的“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建议不曾解决任何基本问题，因为它们完全没有权力；它们毫无象联合政府那样的东西。他的“改组共产党军队”并“把它们置于美国统率之下”的建议具有挑拨性，是企图在我们（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之间制造误解。我们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如象英国在欧洲有指挥权一样。但是必须指挥一切中国军队。

蒋不断想法制造好象共产党人应对谈判失败负责。他通过召开虚伪的国民大会答应今年立即实行“民主”，玩弄了一套很巧妙的宣传骗术给外国人看。我们不愿相信美国人会这样轻易受骗。

极其重要的是，美国要认识到召开国大是蒋正在玩他的“最后一张牌”。它将关闭谈判之门。一旦会议召开了，木已成舟了，因而妥协也就不可能了。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战斗，我们不仅愿意为现在解放区1亿人的民主权利而战，而且也为中国其余地方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战。

当半个中国被敌人切断了或被敌人占领时，当除了国民党以外所有党派的合法性都得不到承认时，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需要的，和能够挽救它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美国将运用她的影响帮助实现它。没有它，美国一直为之努力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3月30日，谢伟思接受“最快”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当共产党领导人听到消息后，都急于想跟他作一次最后的会见。会见在4月1日举行了。他们对他被召回的原因感到难以理解，但是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或者是华盛顿正在郑重考虑2月28日大使馆人员备忘录中建议的某些政策。但是很明显，这时共产党人并不希望得到美国的军事助援了。在此之前的某天晚上，朱德曾经轻轻敲打谢伟思的膝盖，用他愉快的、像叔叔般的方式说，“我们真的不指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武器了。到头来，不管怎样，我们会从国民党那里得到它们的。”当内战现在看来不可避免时，共产党人真正想要的是美国至少保持中立。他们对他们为十分重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计划作了某种预示，而谢伟思却被迫看不到这次大会的进行了。

共产党代表大会将采取的政策—— 和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1945年4月1日

对外关系：1945年310—17页

附件是当天和好些共产党领导人谈话的备忘录：毛泽东，中

央委员会的主席，周恩来，第二位政治领袖并行使“外交部长”职责；以及朱德，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董必武，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共产党成员，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参加了这次谈话。

在我接到返回重庆的命令的头天晚上，周将军已经得到了消息。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下午和整个晚餐时间，显然是想就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将要采取的立场路线，给我一个直到最近的说明。

概要：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扩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是这种政策，因为：

（1）共产党能够做的任何援助美国部队的事情，都将有助于赢得战争；（2）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1）一方面提出批评性意见，以促使国民党执行更加进步的政策；（2）另一方面，在共产党5点建议基础上提出妥协方案，而这5点建议终会导致真正的联合政府和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建立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的决议已经作出，但实际成立不要几个月时间是做不到的。联合委员会将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代表解放区（现在尚未为中央政府所承认）人民的咨询机构，以讨论共同的问题，策划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组织敌占区的抗战，和鼓励中国其余地方更积极作战。共产党人将拒绝承认战争结束前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拒绝认可这样一次国民大会的代表性，坚决主张代表必须由全民自由选举。概要完。

值得注意的3个新论点：

1. 允准共产党在旧金山会议上微不足道的代表权，并没

有改变他们建立“联合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正在向着“联合委员会”干下去。

2. 拟议中的协商机构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具有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不会忽视的可能的含意。它不是一个解放区政府的联盟，而宁可解释为一个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联合委员会，所含有的威胁是清楚的。

3. 毛关于组织拟议中的联合委员会的日期是不明确的。但是周的秘书后来私下说，假如国民党坚持召开它的国民大会，解放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同时举行。

备忘录：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45年4月1日

下午4时，我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宅时，周恩来和朱德已经在那里了。大家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一般谈话。

大家对我返回重庆的原因都表示关心，特别关心是否可能返回美国表明要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我没有接到被召回原因的透露。）

毛重提了以前讲过的希望：美国对延安的政治观察和接触能维持下去。他表示，中国未来几个月的发展会是很重要的，共产党人希望美国人根据现场接触取得了解。

周作了两次直截了当的谈话，大意是说：不幸，我不能在延安再逗留10天，再多呆10天我会发现这次逗留是值得的和有意思的。（我认为这是暗示党代表大会将在那个时间里召开。）

我提到军事形势。周不认为日军仍然有肯定迹象表明打算占领西安或汉中，但是他相信，他们将终于占领这两座城市，以便把美国空军力量向后推移以保护他们的侧翼和重要的交通线，以便日军计划在中国的长期战斗（共产党人深信这一点）得以进行下去。

我回顾说，当去年日军的河南战役好象有发展为对西安的威胁之势时，共产党人曾提出派部队参加保卫西安。他们互相对目而视。最后朱说，去年共产党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次共产党人愿意等待接受邀请。他好象并不计较这件事情。

接着由毛主导了这次谈话。他情绪异常好——离开他的椅子，用动作给他的谈话添加戏剧情节，并且离题回忆起逗乐的轶事。周偶而解释或引伸一下毛的论点。朱坐在后排，沉默不语和微笑着。

毛简要谈了最近和国民党无成果的协商的经过。他觉得，一般讲，外国人还是不了解，国共之间的问题远远超过两个普通政党之间通常的争吵和诈骗。对中国的未来而言，这里谈到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和生死攸关的问题。

他接着用一些时间讨论了《经济学家》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最近发表的文章，他提出，这两家报刊是不是算得上外国舆论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典型。

《经济学家》曾推断说，蒋宣布11月召开国民大会是一记聪明的打击，因为它“抢先讲了共产党人要讲的事情”。它并且说，假如共产党人不参加大会，他们会犯一次极大的错误。毛指出，即使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党人也不能参加；严格地讲，这是一次一党会议，它的代表是9年前国民党公开进行反共内战时（从那时以后，许多代表都变成傀儡了）虚构地选举出来的；差不多2/3的中国人民（日本占领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是不

会派代表出席的；在这些情况下，也不可能期待从一个自1927年蒋搞反革命起一直搞镇压和反民主的党那里得到真正的民主。他强有力地坚持认为，对共产党人说，赞同召开这样一个伪国大，就是抛弃他们的一切原则和出卖解放区的人民。因此，参加国民大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毛在这一点上讲的许多话，都是重复1945年3月13日和我们谈话中的论点，见那天第10号报告。）

《先驱论坛报》说，由于苏联的胜利和美国的关注，例如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共产党人“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不讲道理了”。毛极为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政策的一贯性和不变性质；甚至在内战的日子里，共产党人怎样呼吁在全民抗日、授予民主权利和充分动员人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统一战线怎样在1936—1937年国民党作出这些许诺后终于建立起来了；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怎样屡次感到必须要求遵守这些原则是国家的统一和胜利地进行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事情。（这一论证的有力可以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亦译作《西行漫记》，译者——中找到有趣的证实。斯诺书中记载了1936年他和毛的谈话。共产党那时和现在的目标是惊人的相似。）

就苏联胜利的影响和美国的关注而言，毛诙谐地回顾说：内战时期的口号是“杀死蒋介石”；新四军事件（1941年1月）后的猛烈的反控诉时期共产党人公开地蔑视中央政府；1943年夏天中央政府用武力威胁边区时造成的交战状态。他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比现在对蒋的态度更为强硬的例证，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苏联胜利和美国关心之前。

毛在重申共产党目标并无变化时强调指出，当共产党还不够强大，兵力不多和完全孤立时，他们就为这些目标而奋斗了；而且不管外来的影响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愿意为这些目标而继续奋斗下去。

毛承认，就某种意义说，国民党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目标没有变，但是当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救药、更加危急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民看到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变得越发强大有力了。国民党抱怨，说明它正感受到压力。无论如何，拖延对它不会有用处。”

接着毛提议，就共产党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政策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从此可以看出，象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样，它的政策是坚定和不变的。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那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望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

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为了加强这一论点，请参看3月13日我写的第10号报告中毛的讲话。）

自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进步的改革；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妥协的要旨包括在共产党

人提出、经赫尔利大使签署的5点建议之中，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假如蒋继续当主席，他和军队必须对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负责。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是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个妥协和其必然的结果联合政府，自然都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地民主的，因为大部分国土在敌后或在敌人占领之下，它不可能有完全的代表性。（毛把中国划分如下：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在当前条件下，这将是可能成立的政府，并且在全国收复以后，它可以实行朝完全民主制的过渡。

共产党人并不持坚要求蒋无保留和立即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他们愿意在一次多党派间的会议上讨论这件事，并制订出细节。但是，这样一次党派间的会议必须有权威性，并且有资格作出对政府有约束力和筹备朝宪政过渡的决定。

问题的症结是，国民党不会接受对它的专政提出的任何限制，因此不可能召开一次具有权威性的会议。所以蒋不理睬召开党派间会议的提议，而赞成召开他的国民大会。

在战争结束之前，在一切党派取得合法地位之前，在全体人民选出新代表之前，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国民大会的召开。

共产党的反对，将是拒绝承认国民大会或接受它的命令。这是合乎逻辑的行动方针，因为解放区人民没有代表。下一步就要看蒋的了。“我们不打第一拳。我们不放第一枪。”

“但是现在计划召开的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它将为蒋提供口实宣布反对党为叛逆。假如他要继续吓唬人，他将尝试使用武力，因为这是他们知道和懂得的唯一的手段。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我们不怕后果如何，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日军一直没能够消灭掉解放区；蒋的征来的士兵，由未经思想训练的不愿作战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又怎么行呢？内战时我们战斗力比现在差一百倍，蒋也不曾打败我们，现在他有什么可能呢？我们不害怕蒋的美国武器，因为一支由征募来的农民组成的军队，不会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去反对为他们的国家和经济、政治民主而战的应征士兵兄弟的。我们担忧的是对中国造成的代价：生命苦难和损失，财产破坏和国家重建推迟。中国需要和平。但是她更需要民主，因为对和平来说民主是根本的。而且，首先它必须赶走日军。我们想，美国也应该关切这一点，因为这涉及它自己的利益。”

我问，假如国民党分配若干席位给他们，要求他们参加国民大会，那共产党人会怎么办呢。周立即强调回答说，他们会拒绝。毛表示要协议，于是周点点头。周作了以下的进一步的发挥：共产党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不能作为先例。也不能把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联合政府或党派间会议当作先例。要多党派作出安排，因为人民选举他们的代表不实际。但是，一个批准永久宪法和创立一个定型的立宪政府的国民大会，却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大会的全体成员必须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不能由政治党派作交易或指定。

毛再续继讲下去。现在重庆（政府）不承认解放区。它们得不到指导、帮助或军需供应，虽然它们正在敌占区艰苦地和敌人奋战。“它们是没有娘的孩子。”它们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为了最有效地坚持作战，它们应当一起工作和作计划。所以共产党人提议，各个地区派代表参加组成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目的是：统一解放区人民的作战努力，讨论有共性的问题，制定一个最有效地击败敌人的联合行动计划；在敌占区，促进、组织抗日；在中国其余地方，激励人民和政府作出

更大的努力，积极进行战争。

毛强调指出，联合委员会不会是一个“政府”，“把它当成政府会是一个错误”。它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不会有一个政府的权力或职能。

关于联合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毛避而不具体说明，他说这些细节可在以后制订出来。他也告诫说，成立联合委员会的明确决定，或它的确切名称，都还有待共产党正式通过。“但是”，他带微笑说，“它们可能将会通过的。”（这听起来不是那样不民主。其实，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一个时候以来一直聚集在延安，而且不断举行重要的会议和磋商。无疑，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经取得一致。所以，大会的实际上的会议，可能不过是正式提出和通过各个报告，选举新的委员会，和通过已经达成的决议而已。）

对我提出的联合委员会多快才成立的问题，毛回答说，这不是几个月的事。因为代表从遥远的地区到达延安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问组成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怎样挑选出来。毛稍许停顿表示说，各个解放区的人民参议会会派出代表。他指出，这些参议会都是通过普选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各阶级、各党派。

对我提的问题，即除了解放区和可能敌占区团体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团体，毛答复说，一切愿意参加的团体都可以参加。当然，这将包括国民党中国的任何团体，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目前国民党肯定不会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直接参加。他说，“席位可以保留。”

毛强调说，解放区的一切团体，并且如果可能包括被占领区的一切团体，会派代表参加，并且说，联合委员会将具有一种彻底的统一战线性质。

我问，假如国民党同意某种联合政府，是否联合委员会的提议会作罢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毛说，“有种种联合政府”。如果存在一种理想的联合政府，可以认为，联合委员会没有必要了，因为联合政府会保护解放区，并尽力帮助中国人民赢得解放。

后 记

1945年4月4日，杰克·谢伟思最后一次离开延安。正如他后来回忆说的，“给我的命令都很含混。命令只是说，尽可能迅速地返回华盛顿。对命令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共产党领导人希望，我被召回是为了进行某些重要磋商，或是为了参加某一重要政策会议。我也是这样猜想的。给我派一架专机。我独自乘飞机从中国直飞非洲。每当我在某一基地停留时，我就被带到大人物的别墅。另外一些时候，沿途照例都是‘谢伟思先生，请走便门’。接机的有时是一位中校或少校，总是说，‘谢伟思先生，请走这边’。接着，他的轿车会把我送到大人物的小型别墅去。把我送回美国的是一架C—54机。飞机飞回是为了进行一次彻底检修。在驾驶舱的后面，专门为我安装了一个坐椅。在专机里，我像一个讨厌的家伙坐在那里。”

回到华盛顿后，谢伟思很快就发现，他沿途所受特殊待遇，并不预示将赞同地听取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相反，他是在赫尔利的坚持下被召回的。赫尔利作为大使，着手要把一切在2月28日电报上签名的外事部门官员都从中国撤回国。从大使馆发回的那份电报受到在华盛顿应受到的关心。3月2日，代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把它送给了罗斯福总统，并附去一份备忘录，提请在赫尔利和魏德迈即将回国述职时考虑这份电报。3月24日（而且可能还早一些）赫尔利见到总统。没有得到那次会见或任何早些时会见的记录。但结果是确定的：总统支持赫尔利。

在赫尔利离开美国取道莫斯科赴重庆之前的4月2日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了他在政策辩论中的胜利，并表明他仍然看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迹象。《纽约时报》报道招待会消息的标题是：《美国禁止给中国共产党人武器援助：赫尔利称我们政策的一致性消除了派别牵联——认为裂痕在缩小》。

10天之后（罗斯福逝世的日子）谢伟思飞抵华盛顿。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了，但是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重要意义并未完结。他在华盛顿被咨询和向新闻记者以及民间的远东专家作情况介绍的过程中，邂逅了菲力普·杰非（《美亚杂志》编辑——译者），并且被扯进联邦调查局对美亚案件的调查之中，当然，美亚案件早在谢伟思回到美国之前就已经爆发了。5月末，联邦调查局已准备好逮捕案件嫌疑犯。因为一个嫌疑分子是海军中尉而受拖累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提请要谨慎从事，因为时值哈里·霍普金斯正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敏感的会谈，而旧金山会议又正进行建立联合国的计划。福莱斯特尔5月28日的日记中写有下面的话：“我指出，现在采取这种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它会使总统在他和斯大林的当前的对话中处于极大的困境*；由于反俄的大肆渲染，这次事件会受到不相称的重视。”当国务院获悉逮捕要停顿下来时，6月2日格鲁立即去见杜鲁门总统，总统指示联邦调查局继续进行下去。6月6日晚，谢伟思和其他5名嫌疑犯都被逮捕了。

正如福莱斯特尔预言的一样，这些逮捕在华盛顿和世界各地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但是它对中国人造成的牵涉比对俄国共产党人造成的牵涉为多。斯克利普斯—霍华德系报纸特别利用这次事件推出他们的首席共产党问题专家沃尔特曼来报道这件事。旧

* 沃特·李尔斯：《福莱斯特尔日记》（纽约：维金出版社，1951），66页。

金山《新闻报》6月7日以通栏标题宣称《共产党人获得了美国的机密》。8日，沃尔特曼继续进行他的攻击，并且不顾事实真相，继续把焦点集中于谢伟思的作用上。《新闻报》又一次在《共产党人使史迪威和蒋决裂》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沃尔特曼的第二篇报道：

在联邦调查局以阴谋违反间谍活动法的罪名逮捕了6人之后，今天获悉，从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档案中偷走的机密军事和公安资料，被用来帮助使这个国家继而反对蒋介石委员长并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进一步获悉，我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国务院主要顾问约翰·S·谢伟思，……也公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表示同情。代表国务院的谢伟思先生，去年随同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战略考察团赴共产党地区的延安。正是在考察团回来之后，出现了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之间尖锐的意见不和，结果，后者被召回国。

右翼报刊，在怀有象他们举出的事实一样可疑动机的政府人士的明显帮助下，歪曲、夸张了案件并使其政治化之后，自由派的新闻界开始进行反击。他们指出，所以援引“间谍活动法”来进行这些逮捕，仅仅因为“政府公务员保密法”未获通过。《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文切尔的广播、皮尔逊、肯特、法尔蒂和斯通的专栏都提出，这些逮捕都是企图窒息对以格鲁为代表的国务院正统作法的批评意见。

斯通对这一案件作了最充分的报道，而且还作出了最麻烦的结论。他在6月8日的《晚邮报》上评述道：“6位被捕者中的每1位，都曾经批评过由副国务卿格鲁所体现出来的在国务院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他们中的3位，都计划出版批评国务院和国民党的书。”11日，他发表文章对这一案件所固有的真正危险提出

警告说：

逮捕事件和斯科利普斯—霍华德、赫斯特和帕特森—麦考米克报系报纸上煽动的恐共运动的影响，已使得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中许多对我们远东政策现时的倾向持批判意见的人沉默不敢作声……逮捕已发展成恐共症，而恐共症又正被用来支持一场清洗，而清洗的结果又在官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中凝聚为对事实的偏见，而那些偏见可能要使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

从延安观察着这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美国报界的解释，即逮捕基本上政治性的，并作出判断：它们标志着美国和中共达成某种暂时解决办法的任何打算的结束。用施克兰的权威的《毛泽东传》一书的话说：

这种气候(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善意与合作)的变化可以很精确地说明其日期：它始于1945年6月《美亚杂志》事件，当时约翰·谢伟思因把他的报告的副本送给杰菲而被抓了起来。要追述一下，1944年末到1945年初，谢伟思在延安和美国军事观察组一起度过6个月时光。已经翻译好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未删改过的版本的杰菲，无疑在延安也是一个受青睐的人物。因此共产党报纸给以极其强烈的反应。《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逮捕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一个转折点。社论说，共产党人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对美国政府也没有敌意，但是他们反对赫尔利之流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通篇社论语调尖锐，咄咄逼人，最后发出警告说，假如美国当局选择支持中国反动派，他们将会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应得的教训。*

* 《毛泽东》（巴尔的摩：企鹅丛书，1967），231—232页。

从这时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变得日益敌视美国，只是在赫尔利辞职和随后马歇尔代表团到达中国时有过短时间的间歇。毛泽东自己的公开声明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变化。甚至在4月2日赫尔利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毛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讲演中还能够说，“和国外、国内一切反动派的预料相反，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俄国——仍然始终团结一致。”可是，到了7月，毛（如果事实上他不曾涉笔于6月25日关于《美亚杂志》事件的社论）捡起了“赫尔利之流”这种措词，并在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抨击中不断使用这种措词。不再说美国是“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了。相反，毛警告提防“赫尔利之流”所造成的威胁：“美国统治人物中的一派，除去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外，还在计划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这样，美国失去了制定一项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友好与合作的政策的机会。相反，我们把自己与国民党越来越紧地绑在一起了，从而赢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敌视。谢伟思在报告共产党人希望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的中国时，曾经发出警告说：“这并不排除他们转而投向苏联，如果他们为了在美国支援的国民党的进攻下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当然，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在国内政策上，内战曾在中共内部产生过类似的激进主义。正如谢伟思报道过的，毛在对史坦因的谈话中在谈到延安稳健的土地政策时，曾预示过这样一个变化：“没收土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它取决于国内和平。如果内战发生，可能跟着而来的是断然没收土地——由群众自发来没收。”

谢伟思等人提出的政策不能肯定会保障美国和中共之间持续的友好。正相反，一旦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战胜者——或者通过内战，或者通过逐步地与和平地夺得对联合政府的控制（根据谢伟

思建议的政策，联合政府或许已经可能出现了）——他们对美国的友谊的需要将会减少，而两个国家之间不和的可能将会增加。然而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加减少了。如果我们曾经容忍中国共产党人掌权，那就没有什么必要造成如此大的威胁，以致把它拖入朝鲜战争，也没有必要去支掌越南南方的军事独裁者以便“遏制”中国。

那么，为什么谢伟思的建议会遭到拒绝呢*？当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而一个月后高思又辞去大使职务时，就失去了对中国和蒋介石采取灵活的和现实的政策的最佳机会。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错综复杂的。可能是，不能强使委员长——罗斯福自己的四大领袖的候选人——接受一位易动怒和不受欢迎的美国司令官。时值选举运动，情况更是如此。许多评论员纷纷预言，选举结果将是势均力敌；罗斯福称这次选举为“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选举；而杜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进行着冷战开始之前的对新政时期共产党人的一些攻击。1944年秋，孔祥熙在华盛顿致力于使蒋介石介入美国政治的这种现实之中，而这些因素，无疑强化了委员长抵制史迪威和他所为之奋斗的一切的决心。

一旦史迪威下台，而赫尔利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影响力量，采纳谢伟思灵活政策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呈送给罗斯福供赫尔利、魏德迈在华盛顿述职中考虑的大使馆2月28日的电报，仍然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无疑罗斯福正在认真地思考这份电报所设想的这种政策。1945年3月，他把埃德加·斯诺召来进行了一次谈话。斯诺记述了这次谈话的一部分内容：

* 我没有早些回答这个问题，对此深为负疚，请参看谢伟思《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的某些问题》，特别是113-128页；以及塔其曼的《如果毛泽东来到美国：一篇抉择的论文》，《外事杂志》，（1972年，10月）

现在，他认识到了代表游击区高效率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他正在考虑直接向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总统就八路军（共产党）在我们援助下在华北地区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出了几个问题。他接着说，当我们逼近日军时我们将运送一些补给品和派联络官到华北沿海地区。……

我问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蒋是唯一的政府，我们就只有通过他才能继续运送补给品。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我们能支持两个政府吗？”

总统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够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斯诺谈到支持“中国两个政府”一节是指，如果罗斯福贯彻了他的计划，就会成为不必要的行动。举例说，假如美国决定从不久即可弄到手的冲绳岛基地出发，直接空运补给给共军部队，美国政府就可以确切地指出：八路军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的第十八集团军；它的司令官朱德得到重庆国民政府委任；共产党部队作战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地区，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政府；而且共产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合法的国家元首，在延安窑洞中甚至还悬挂着他和四大领袖中其他人并列的照片。

可是1945年3月，罗斯福被说服不去执行这项政策。他的决定，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纯军事考虑的影响。应该追述一下，2月28日大使馆的电报强烈要求“首要考虑军事需要”，并且大使馆的建议同意以“我国最高军事当局……与证明他们愿意并能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58年），译文引自《斯诺文集》，第1卷，394—39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够和日军作战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集团进行某种合作，现在和将来都是必需的和可取的……”为条件。在华盛顿，尊重军方意见甚至是更加明显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约翰·卡特·范宣德3月12日向魏德迈谈到大使馆援助中共的建议时，告诉这位将军说：

这些有限的物资援助是否能够有效地用来抵抗日军以促进我们的作战的问题，是一个只有我们军事当局有资格决定的问题，而且他们应当只根据军事考虑来作出决定。假如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要国务院来决定。

魏德迈承认他自己对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和它在抗日中的效用一无所知，但是他大体倾向于不把它当一回事。例如，威廉·D·李海参谋长在3月间我国军事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事说道：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中将和迈尔斯海军准将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中国军事问题。他们都认为，给蒋的中央政府以不大量的援助就可以把中国的叛乱镇压下去。*

当然，这时这个问题在赫尔利3月24日会见罗斯福总统时已经解决了。可是，那种解决办法的意义是有征兆的：军方讨论中共问题，已经不是要武装中国共产党来助帮打日本，而是要镇压“中国的叛乱”了。可是，对于赫尔利来说，这种处理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他2月16日就已经告诉委员长：战争结束以后，假如他和共产党人打仗**，他的美械军会轻而易举地击败对

* 见威廉·李海著：《我在那里》，第337页。迈尔斯是美国海军分遣舰队司令，这支部队与声名狼藉的戴笠手下的国民党秘密警察合作。

** 查尔斯·罗曼努斯和李尔斯·桑德兰：《时间流逝在中央调查局》（华盛顿，军事史首脑办公室，1959），第338页。

方。这确实是规劝蒋奉行和平统一中国政策的独特的方式。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象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 那时魏德迈不能洞察中国共产党军队具有的充分的军事潜力，以便武装他们和日本人打仗是必需的或可取的。

军方的占优势的声音和那个集团因袭的智慧的局限，还不能完全说明作出支持赫尔利决定的原因。罗斯福，假如不是其他的人，是知道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而且是坚定地从事于实现中国的统一的。这种统一不存在，他的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梦想无疑是一种幻想。他也知道2月间国共谈判已告破裂的事实，可能也晓得大使馆电报中的警告：蒋的深信美国只给他的军队以援助，并且使援助不断增加，正使得委员长十分不愿达成妥协。可是，罗斯福在继续奉行赫尔利的政策时，并没有放弃统一中国的希望。他仅仅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而采纳赫尔利的办法，在这一情况下，就需要信任莫斯科会为我们作牺牲。

这里支配一切的因素无疑是对雅尔塔协议感到异常欣快。罗斯福和他的随行人员回来时十分自信，用霍普金斯的话说，他已

* 阿伯特·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58，319页。

经“赢得了和平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而且尽管有人写了大量废话谈论雅尔塔“出卖”，现在很清楚了，美国的确是有能力在那里达成一项异常有利的交易的。不过是对苏联在满洲的势力作了少许让步——这些让步使俄国人在参加对日作战之后，可以用任何方式榨取中国政府的任何东西——我们既能够保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又可保证使苏联信守和蒋介石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

赫尔利看到这一最后条款时，他对中国统一问题得出了他的答案：俄国人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蒋的条件。这种推理方法，不言自明有两个关键的误解。第一，认为中共还未强大到足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国民党。这里，常规军事思想的逻辑可能再一次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第二，认为象其它共产党一样，中国共产党易受莫斯科绝对命令的影响。有相当多的研究共产主义的政府专家向总统提出这种看法。于是，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解释，并派遣他到莫斯科，去弄确实斯大林是否理解他根据雅尔塔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当斯大林表示他愿意支持美国的（即赫尔利的）对华政策时，问题解决了，而现实主义的灵活政策也就完蛋了。

罗斯福可能未曾作这样的考虑，他可能没有把他3月决定看作是最后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上，他派遣赫尔利返回莫斯科然后回重庆，他可能只是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有人怀疑，罗斯福正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延缓作出困难决定的必然倾向。采纳大使馆电报建议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抛弃蒋——但对他的威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把蒋抬高到四大领袖之一的崇高地位之后这么快就采取这种行动，确是困难的一步。3月间，美国政策似乎没有必要作出这样一个重大改变。就在最近，蒋在3月1日的演说中许诺实行改革并开放他的政府，赫尔利预期蒋确是一个民义主义

* 罗伯特·谢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部私人的历史》（纽约哈尔泼兄弟公司，1948年），870页。

者，日本的攻势已被制止，国民党还没有立即崩溃的前景，在这些情况下，没有必要匆忙行动。

当然，问题在于：拖延会使采取替代的政策越发困难。在中国海岸登陆的一切计划很快会被取消，因为在那里毫无疑问会使我们和中共部队直接接触。在对轴心国家作战中，没有军事权宜之计的理论基础，依照美国内部的意见，既援助中共又援助国民党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战争时期我们有最大的灵活性。在8月以后，赫尔利政策的势头已不可逆转。战争快结束时，魏德迈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推行一种有效的美国联络官制度。这项制度把我们和国民党连结起来。下一步自然就是空运这些军队到沿海，以便他们，而不是中共军队，能够接受日军投降，并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攫取权力的衣钵。最后，美国发现它自己完全交托给蒋了，而蒋则完全致力于从事内战的自杀性政策。当1945年11月赫尔利怒气冲冲辞职时，杜鲁门总统召回了刚退役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任命为美国参谋长，率领马歇尔代表团到中国去（1945年12月—1947年1月）。可是到此刻，即使有声望的马歇尔将军，也已经不能使我们避免卷入一场灾难性的和令人难堪的失败中了。

要避免这一命运，罗斯福将不得不承认谢伟思的立场是完全合理的。他不得不预见到，只给蒋以援助增加了委员长的不妥协性，从而使内战不可能防止，而在内战中共产党必然胜利。对谢伟思来说，经过在中国的现场观察，这些建议毫无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但对罗斯福来说，远离现场，又没有任何判断赫尔利和其外事官员互相互矛的报告谁比较正确的任何可靠办法，那些真理就变得更可疑了。要接受事情必然性的概念是特别难的。

对美国人来说，接受事情必然性的概念，不是轻易做得到的。我们是些“热心肯干”的人，根据这一道理，1945年我们正

处于赢得世界大战的边沿。美国的力量已登峰造极。我们的军火库向全世界供应武器，我们的军舰在全世界游弋，飞机绕着地球飞行。只有美国会在工业和军事力量可能不是削弱而是增强的情况下，从战争中走过来。很难相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和我们操纵与控制不了的——而一帮武装很差的亚洲农民，能够在中国朝着“不可避免的”胜利进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亚洲农民是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只能更加使问题复杂化。从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这一观点看来，我们怎么能接受在中国的一场无法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呢？确实可以做某些事去防止这样一种结局。无疑外事官员们爱作消极和失败主义的典型报告。需要的是由一位“热心肯干”的人去积极贯彻一项“无所不能”的政策。而这样一个任务可能没有人比赫尔利更适合了。嘲笑赫尔利的傻念头是容易的，但是只有承认那些傻念头比一个人更强大才是公平的：傻念头属于民族和时代。

最后，在我们评价罗斯福拒绝谢伟思等人建议的决定时，应该记住，这时在美国很多报刊上，已经开始了冷战。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有争议的问题。3月15日那天，众议院议员华尔特·周以德（在国会中他属于院外援华集团，极端亲蒋——译者）在国会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明确攻击武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想法，如同我们在南斯拉夫曾经武装铁托一样。周以德警告存在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委员长的相互配合的宣传运动”，指出这一运动来自三个方面：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中国的共产党集团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和]在我们自己军事部门和国务院内的人”。当我们研究50年代对涉身中国事务的官员——尽管事实上否决了他们提出的政策——煽起的毁谤时，人们只能猜测，假如他们1945年的建议被采纳了，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即使那个政策实现了某种联合政府，并且共产党的胜利既推迟了又是和平

的，授华院外集团也会争辩说，我们实际上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在中国的控制。那种指责自身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这一政策对大多数美国人说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事后的认识可能导致错误。在朝鲜，我们得到某种概念：要制止中国共产党军队需要花什么代价，即使他们是在外国土地上作战。在越南，我们认识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都不是那么容易镇压下去的。由于中苏争端，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联系不是牢不可破的。现在终于能够比较肯定地说，如果外事官员的忠告被接受了，我们的情况会好得多。但是，没有朝鲜和越南战争，他们政策的正确性就会更难得到证实。然而，恼人的是：如果听从了他们的政策，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两次战争来证实这一政策确实是正确的。这就是约翰·谢伟思的政策和生涯的悲剧：只有在被拒绝以后才能得到验证。

译者附录

（一）中国共产党代表林祖涵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报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全文如下。

【新华社重庆十七日电】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报告全文如次：

各位先生！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要我报告国民政府派张文伯、王雪艇两先生与中共中央派本人双方谈判的经过，本人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国共两党关系应该公平合理的调整，在现政治情况下为十分紧要的事情，不仅参政会同人注意这一问题，全国人民也十分关切。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我们与张王两先生四个月来谈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大致有七个重要文件，主席团已印发各位，可请参考。

这次谈判，本人从延安出来抱着满腔热诚，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并很高兴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不期而晤。我们的谈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双方的谈判在原则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谈判尚未最后决定，但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

谈判的重要问题

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与争

取抗战胜利。日寇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国境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形势。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战胜日寇的力量是有的，不过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将这全部力量团结起来、发动起来。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全国力量，来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我们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三大纲领真正实行，就能团结全国力量。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曾说过：“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实行民主，动员人民，实现全面全民的抗战，不应该是政府与军队片面抗战。我们对立即实施民主以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的意见，抗战以来是一贯如此主张，这次谈判也是这样提出来的。

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我们在敌后抗战八年，军事政治形势有很多变化。在抗战初期，当时八万红军，政府只承认编了三个师，奉命出动，渡河入晋作战，并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我们组织些敌后游击挺进队，挺进敌后作战，我们自己看来，几年来在敌后艰苦作战，做的还好。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在晋、冀、察、热、绥、辽、鲁、豫、苏、皖、浙、鄂、粤等省敌人占领区作战，粉碎了许多伪组织，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能够飘扬在敌人后方。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廿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先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同时，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

权，管理和指导这些抗日政权。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它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使边区的人员商旅能够有行动交通往返上的自由。

谈判的重要分歧

我们党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民政府曾有一个提示案给我们，张王两先生要我们照中央提示案来办理，但这两者中间的差别距离很大，以至谈判到今毫无结果。本人现在仅略举几个较大的分歧之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军事问题来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队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份侵华的日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它，增强它，首先应该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西安谈判时我提出请求政府暂编六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表示困难接受，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请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四军十个师。

特别是政府提示案中的编余部队“限期取消”，及已编者“限期集中”二点办法，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因为这些部队是敌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他们正是执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民无分男女，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限期取消就等于不要敌后人民抗日，把敌后解放区再交给敌人，这自然是不应该的。

再从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分歧之点来看。敌后的各抗日政府，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政府由人民选举，领导着敌后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要

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些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提示案则要取消，这是从抗战利益上不可理解的。

再次关于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我们略举几例来谈：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凯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

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

还有，张王两先生给本人的信中也曾责备我党不实行四项诺言，这一点也要加以说明。我们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开会认真检查，检查结果，更证明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拿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表现在努力抗战、齐心合力打击日寇，以及对边区境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们对民权主义的实行，表现在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民选政府，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等一切自由上面；我们实行民主主义，正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前年二十万石公粮减到今年只征十六万石，我们不把公家的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渝。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我们是一方面保证交租交息，一方面实行减

租减息；我们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并发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我们也早已实践了诺言，从无也从未曾想过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求全国政权之统一”，这在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切实在实行民权政治，我们并不会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我们对此也是实行已久，我们的军队在敌后艰苦作战的成绩就是证明。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凡此事实都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实践了诺言。张王两先生曾指责我们立法监察的不独立，但是我们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

虽然，双方的距离还如此远，可是本人可以再度声名，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抗日方针，耐心的期待政府观点的改变。

谈判经过真相

现在，本人再来说明一下自西安到重庆与张王两先生谈判的经过。自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以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因为自民国廿九年新四军事事件以后，两党关系很僵，我是参政员，也因封锁而不能出来。我们请军委会驻延联络参谋打电报出来，表明我们愿来重庆，继续谈判，经政府复电同意后，本人因负边区政务，尚需布置春耕关系，直到四月底才能动身。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一共会谈五次，本人初见张王两先生，主要先请示政府的政治解决究竟是如

何解决法？以及向他们报告边区情形。张王两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我当时提出以本年三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周恩来同志的演说作谈判基础，张王两先生不赞成，他们提议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我认为也可以，因先报告了中共领导下军队的数目，并问中央可以答应给我们编多少？张先生要我讲，我说请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会商几次，到最后一次会面时谈话，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当时我就照我们双方原先约定的首先在这记录上签字，但张王两先生未签，记录系综合双方意见而成，张王信里说只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是事实。

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廿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遂呈僵局。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先生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来问我，我于七月二日有谈话发表在新华日报，表示我党的态度是只要对于抗战团结与促进民主有利，我们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长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我党周恩来同志于八月十三日曾发表谈话，说明谈判并无结果，并解释此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取救急办法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需要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需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政府的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二)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议 (1944年11月)

1. 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统一中国军事力量，以便立即击败日本和进行中国建设。

2. 目前的国民政府，将改组成为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代表的全国联合政府。将制订并实行一项新的民主政策，俾便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将改组成包括一切抗日军队代表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

3. 全国联合政府将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和民治政府之原则。全国联合政府将奉行旨在促进进步与民主，建立

公正、良知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上诉权、人身保护权和居住权之政策。全国联合政府亦将奉行使免于恐惧与免于匮乏的权利见诸实现之政策。

4. 一切抗日部队将遵守并执行全国联合政府与其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获得该政府与该军事委员会之承认。获自外国之补给将予以平等分配。

5. 中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性。

蒋 介 石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1944年11月 日

毛 泽 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11月10日

签字

赫尔利·帕特里克·杰

美国总统私人代表

1944年11月10日

(此件系根据英文文本译出)

译 者 的 话

历史会给人以启示，如果你理解它，洞察它，把握它。历史也会给人以嘲弄，如果你无视它，扭曲它，或者虽然机会在手，而却视若无睹，听而无闻。前者可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后者则只会阻碍甚至使历史发生倒退现象。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John S. Service)就中国抗战形势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并就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可惜这些报告和建议未能被美国政府听取和采纳。今天阅读这些报告，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关键时期仍然以其活生生的事实发人深思。读者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略窥美国当权者的决策过程，也可以从一个外国人的笔下，从某个侧面了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人民命运的决定性关头的各种动向。

现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大曲折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仍然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失之交臂的机会不能复得，但新的机会要靠人去创造。谢伟思的报告，能不能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有用的遗产？这要由未来来回答。

约·谢伟思出生在中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里，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后返美深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谢伟思曾于1941年到1945年先后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和中、印（度）、缅（甸）战区盟军司令、美国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总部供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大使馆工作。他在大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就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撰写报告，经大使审阅同意后，签送美国国务院，供美国领

导人在作出对华决策时参考。

谢伟思在任职期间，曾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两次前往延安。其间，他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就中国的抗战形势、发展前途，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等问题，进行过多次交谈，是与中共领导人进行过广泛直接接触的第一批美国官员之一。他在重庆还访问过宋庆龄、冯玉祥等中国政坛著名人士以及国民党的某些上层人物，就中国的局势和出路进行探讨。他还到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广泛地旅行过。

谢伟思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当时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中美关系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当时中国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气氛、景象和人们的思想情绪与精神面貌。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些报告里，谢伟思向美国政府指出，单纯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打胜对日战争。他透彻地分析了蒋介石处心积虑发动内战的阴谋，并正确地预言，一旦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取得胜利。

为了比较顺利进行抗日战争并使战争尽早获胜，以免美国遭受过多牺牲，谢伟思就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特别是1945年2月提出的建议，他主张美国政府应当改变只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政策，而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援助。这一建议得到美国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的副署。可是，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而且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国驻重庆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把谢伟思调遣回国。

战争结束后，在50年代前期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时，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成了对他罗织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依据。他几乎每年都要受到安全和忠诚调查。1957年，谢伟思虽然在最高法

院胜诉了，但他以后却丢掉了在国务院的官职。

谢伟思的报告写于40年代前期，主要是1944—45年，30年后始得公布。历史发展证明，无论对美国人民来说，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谢伟思都是正直的。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下，正直人的正直陈言往往反而会给他自己招致不幸。值得庆幸的是，谢伟思没有被他的不幸遭遇所压倒，而今仍然以其古稀之年，孜孜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了解与友好的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埃谢里克为了把这些报告编辑成书，花了大量搜集、整理和编辑的工夫，并对谢伟思作了两次长时间访问和交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他在各章节之前撰写了提要式的说明。书编成后于1974年出版。我们现在把它译出供国内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史的人们参考。

中译本略有删节，主要是删去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军事实力的章节。

为了增进读者对书中提到的某些事件的了解，我们查阅到林祖涵同志1944年9月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报告的全文和同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议》（根据英文本翻译），附录在最后，供读者参阅。

黄华同志在百忙中为中文版写了序言；朱穆之同志题写了书名；爱泼斯坦同志撰文介绍了谢伟思的过去和近况，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87年12月

封面
目录
正文